

革命後記

修訂版

韓少功

革命後記

修訂版

飄風叢書③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the UK and in certain other countrie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The moral rights of the author have been asserted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by licence,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at the address above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work in any other form
and you must impose this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ISBN: 978-0-19-943362-9

3 5 7 9 10 8 6 4 2

革命後記
修訂版

韓少功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目 錄

1	前 言
4	冷藏的話題
11	宮廷化
19	道德化
25	訴苦化
32	另一種問題社會
41	道路選擇的大概率
	• 資源
	• 文化
	• 制度傳統
64	烏托邦的有效期
74	地位競升的兩種通道
82	全民聖徒化(上)
88	全民聖徒化(下)
95	全民警察化(上)
103	全民警察化(下)
114	聖徒化×警察化
127	多面人與多面上帝
	• 前造後保或前保後造
	• 內造外保或內保外造
	• 上造下保或上保下造

13	利益理性與博弈規則
	• 官方主導時的「後位淘汰」
	• 民眾主導時的「前位淘汰」
	• 知識分子面臨的雙向淘汰
157	結構性危機(上)
171	結構性危機(下)
182	再等級化之潮
199	需要討論的幾個問題
	• 問題一：民主能否帶來公平？
	• 問題二：革命能否帶來公平？
	• 問題三：平等是否還重要？
237	小綠棒
附錄一	
241	關住權力的籠子
	• 大數據的運用
	• 換臉還是換血
	• 道德也是個籠子
附錄二	
273	「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1966–1976

前 言

革命似乎已經遙遠。在當下這個競相逐富的市場社會，革命已成為懷舊，是一些老頭老太在小院裏哼唱的紅歌。革命已成為辟邪的民間迷信，被鄉民們供奉於神龕，被一些司機懸掛於駕座窗前。革命還變身為時尚噱頭，成為搖滾歌星頭上的紅星帽徽，文化衫上的酷哥格瓦拉，賣場上鏗鏘雄壯的前蘇聯隊列音樂。

在今後的日子裏，“革命”這一個詞還可能繼續脫敏，成為一種消費符號，消散於“IT革命”“行銷革命”“內衣革命”“洗浴革命”等商業宣傳，在廣告製造者們那裏花樣百出，成為各種誇張字體和陽剛造型，迸發出忘我消費拼死享樂的激情。

不過事情並未結束。

一旦遭遇社會困局，幽靈就會重新綻露巨魔的面容，打破生活的平寧，呼嘯在四面八方。從教民充斥的“阿拉伯之春”，到秀才主打的“佔領華爾街”，革命一詞的原義在漸漸蘇醒。1990年代，在中國的很多地方，農民失土地，工人丟飯碗，面對警方的人牆防線，各種群體維權事件通常表現出強烈政治色彩。與幾年前大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豎立民主女神的景況有異，這些窮

人高喊口號，揮舞紅旗，更願意簇擁毛澤東的畫像，齊唱《團結就是力量》和《國際歌》，一次次觸動紅色記憶。

風氣所及，不少消費少年也可能湊個熱鬧，偶爾客串一下革命。一旦不順心，一旦碰上那些吃香喝辣的牛人和老賊，那些說不過也告不起的傢伙，自居“弱勢”或“另類”便是他們可能的應急姿態，“革命”便是他們的心理底牌。有了這張牌，似乎就有了滅他丫掀桌子卷衣袖扒衣襟的權利，包括隨地吐痰、蹺課或曠工、性騷擾或吸K粉，都有了特許通行證。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這一首法國人寫下的歌曲原與K粉無關。在我的記憶裏，這一曲革命聖樂意味着樸素的生活，單純的心靈，奔赴鄉村和邊疆的熱情萬丈，日日夜夜為國家為人類的艱苦建設，油燈下有關非洲黑兄弟和南斯拉夫明天的爭議，情侶之間私密的格言勵志和英雄期許……當然也意味着我的父親，一位曾在解放軍214師記過大功的戰鬥英模，一位在省教育廳等機構受獎無數的幹部，在“文革”的紅海洋中突然消失。他被眾多大字報誣陷為“特務”“內奸”“修正主義黑鬼”，不忍屈辱的苟活。但自殺前留在抽屜裏的遺書裏，

他叮囑兒女們不要委屈，不要抱怨，不要仇恨，“一定要繼續跟黨走，永遠聽毛主席的話。”

這是他真心的贖罪？是無奈的屈從？還是需要以這種哀婉姿態掩護家人？……多年來，我一直猜不透其中真意，不理解他肉體與精神的雙重自殺。

墳前的草青了又黃了，疑問卻沒有答案。

我當然知道，連同這一座老墳，我的全部記憶僅僅涉及“文革”，充其量寬延至前後的三十年，即中國現代革命史的後半場。在這裏，以不同定義的標準，“革命”可包括這個下半場，也可特指上半場——紅色中國建立和海峽兩岸對峙以前的多年戰爭，還有密謀、啟蒙以及抗議。那麼，據不同的定義，這本書的書名既可以讀為“革命後/記”，即記“革命後”，不過是一個後來者和局外人對革命的遺痕採集；也可以讀為“革命/後記”，即後記“革命”，是一位當事人有關革命的親歷性故事——這取決於人們是否把後半場算入“革命”。

不管屬於哪一種情況，不管是因為直接還是間接的干係，作為一份艱難的證詞，我必須對自己供述如實。

現在的窗外夜深人靜。

冷藏的話題

一堂課開始了。幾位身份不明的人闖進教室，與老師先是口舌相爭，繼而動手動腳，鬧得現場一片混亂，直至校內其他職員趕來恢復秩序。有意思的是，接下來，當老師要求學生們動筆記錄剛才一幕，提供一份目擊證詞，結果卻五花八門。誰說了什麼，誰做了什麼，是誰先罵人，是誰先動手，是誰站在這個位置，是誰捶了桌子或扔了課本……大家對每一個細節都說法有異，難有統一的記憶。

老師微笑了：同學們，知道嗎？這就是歷史。

原來，這不過是歷史老師精心設計的第一課，也是後來廣為傳說的經典案例。老師的大意是這樣：如果一件事發生後不過幾分鐘，一群目擊者的記憶也歧義叢生，那麼我們如何判斷哪一種記錄更接近真實？如果現場記憶一開始都難免誤差，那麼所謂歷史，由一些非目擊者們書寫於現場的數百公里乃至數千公里之外，書寫於現場的數十年乃至數百年之後，就那樣可靠？由非在場者們一再引用、轉述、推論、發揮的大部頭，經過複製和再複製，加工和再加工，轉換和再轉換，就不會是一堆以訛傳訛的流言蜚語？

這也是我的困難。

作為在場者之一，越來越少的“文革”親歷人之一，我不可能接受一些嘻哈族的“文革”，

比如他們覺得紅衛兵步行串聯特有趣，那不就是“驢友”探險嗎？他們覺得知青下鄉也特來勁兒，那不就是真人秀的“魔鬼訓練”嗎？他們甚至覺得子彈橫飛的武鬥夠爽，夠刺激，嘿，那時候“軍迷”玩一把真的耶。我也不可能接受一些洋左派的“文革”，他們曾認定革命樣板戲就是文化領域人民主權的神聖標誌，紅衛兵挎上駁殼槍就是最徹底的解放，工人趕走廠長就是共產主義的夢想成真——1990年代的一天，我就與一位意大利女士反復爭辯，希望她到中國走一走後再寫論文。當然，我也完全不可接受某些中國官員的振振有詞：“你以為現在還是文革？你們還想踢開黨委鬧革命？”——他們面對任何犯上不敬之舉，面對任何前來據理力爭的工人、學生、教授、市民，都可以拿出這一撒手鐮。在他們那裏，噩夢一去不復還，謝天謝地。“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口號已成為“革命就是請客吃飯”，就是收紅包和笑納信用卡。沒有“文革”的日子，就是他們永遠腦滿腸肥和頤指氣使的天堂，大人們的永固江山不容攪擾。

問題是，這些人的“文革”印象錯在哪裏？憑什麼我就認為自己的“文革”記憶比他們的更可靠？憑什麼我能相信自己的記憶不是另一種瞎子摸象，在這裏的饒舌不是以白詆青、以宮笑角，五十步看百步？

甚至不會是一堆以訛傳訛的流言蜚語？

“文革”是一個事實和情緒的巨大總量，交織了數億人太多的紛爭和尷尬，沉浮和恩怨，遺忘和誇張，以至任何判斷都可能挂一漏萬。事情已過去三十多年，但三十多年後的有關爭議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不是更緩，而是更烈；不是更精確化，而是更口水化……已從反面證明了這一難度。因供職《天涯》雜誌的關係，我曾結識不少活躍的學者和作家，發現“文革”幾成他們的心結，是他們不願談、談不清、一談就七零八落的話題。北大教授戴錦華曾私下裏感歎：她與外國同行說中國，什麼事都好說，只有兩塊最棘手，“文革”即其中之一。在另一方面，右翼看似統一，卻也是裂痕暗佈，比如應否承認“文革”中的“人民文革”，這一問題上的點頭派(楊小凱、鄭義、朱學勤等)，一直遭到搖頭派(徐友漁、徐賁等)的鳴鼓而攻。

漫長的歷史長卷裏，空缺和懸案其實比比皆是，並不是所有事都能真相大白。其中很大一部分，不過是時過境遷後淡忘了，模糊了，消散了，被其他話題淹沒了，甚至是當事人一代統統死光後就無需再說——那不是解決問題，只是靠時間來取消問題，靠人口減員給大腦減負。

這也是德國哲學家尼采“積極的遺忘”¹一說應有之義？我們已經無法知道有多少秘密深埋在

1 引自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歷史對於人生的利弊》，商務印書館，1998年。

廣袤大地之下，無法知道歷史長卷是否更像一張破網。項羽是否真燒了一個阿房宮，歐洲“聖殿騎士團”是否真留下了寶藏，伊利亞特戰爭是否起因於爭奪一位美女……這些事也夠大的，牽涉到苦難和血淚。但如果不是吃飽了撐的，眼下大概不會有人大舉較真，投入鉅資和團隊，一定要挖個水落石出。

還有很多問題，雖未被時間取消，卻因“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克羅齊語)，因“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適語)，落到現實的語境時便受制於言說者們的生存處境、利益背景、閱歷準備、知識成見、時代風尚、媒體影響乃至個人情緒，被各種現實因素所選擇，所牽引，所擠壓，一步步變形，最終被攪成一團亂麻，造成深刻而持久的社會分裂。“文革”好像就是這樣。我的一位老鄰居，白天想起當年禁麻將就罵“文革”；晚上想起當年同廠長工資差不多又贊“文革”。同是這一位爺，在歌廳裏不熟周傑倫、劉德華只好大唱紅歌，進茶館同某個哥們兒抬槓，情不自禁模仿某位文化偶像，又可能大罵自己剛唱的“爛歌”——你沒法同他較真。不難看出，一位退休師傅身上也伏有多部“當代史”和多個“小姑娘”，自己同自己過不去。

換句話說，先哲們假定的那種認識風範，不被任何私利和情緒玷污的學習態度：每個人都溫良，都審慎，都穩定，背着小手和眨着大眼，公

正得像一個萌態可掬的上帝，理智得像一塊無慾無念的芯片，於是說話必有據，說話必從理，說話必見賢思齊，於是事情越辯越明，大家最終不難在輝煌的真理聖殿歡聚一堂……這種理想一再出現於傳說，一再成為知識供應者的承諾，在實際生活中卻總是七折八扣——特別是在一個話題被利益和情緒劫持太久以後。

當政高層在三十多年前劃定“文革”討論禁區，也許出於止亂避險的權宜。面對數億人的派別裂痕，事由各異的普遍傷痛，如果不想在傷口撒鹽，不想給餘火澆油，不想把某些群體或所有群體再傷一次，那麼暫時冷藏“文革”話題，粗線條劃定輿論口徑，動員民眾“一切向前看”，不失為一種務實的敲槌禁聲。誰都有兩難的時候。誰都有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經驗。為避免社會分裂和謀求政治減壓，美國人也曾以法案形式擱置過“抽屜問題”²，待條件成熟後再擺上桌面。歐洲人在種族、排猶主義等敏感話題上也一直繃緊神經，封殺異議，絕無自由。在那裏，誰願意丟飯碗，敢像日本右翼挑剔南京大屠殺數據一樣，去挑剔一下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有關故事？誰願意吃官司，敢像某些國人為汪精衛翻案一樣³，

2 如1836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議案，叫做 gag rule，俗稱“閉嘴法案”。該法案規定對任何要求廢奴的提案都一律擱置，國會不予討論。主張廢奴的林肯當時也投了支持票。

3 為汪精衛投日的翻案文章不少，如2012年12月24日共識網上《汪精衛和平運動始末》文，網址為<http://t.cn/zjWq4zf>。

去為德國納粹和法國貝當政府抱屈？

從長遠看，暫時冷藏問題，把爭議掃到地毯下去，也會留下隱患。“文革”是整整一兩代人的人生經驗。它到底是怎麼回事，留下了哪些教訓，並未得到廣泛和深入的探討，更未積累成公眾的思想財富。作為中國現代革命史的後半場，“文革”的空白化、標籤化、混亂化，相當於一種自我理解的殘障，也必然對整個國情的理解造成迷茫，擾亂人們前行的視線。“文革發生在中國，文革學卻出現在西方。”這一說法怎麼說也不能讓中國人很有面子。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教授1980年代在哈佛大學首開“文革學”課程，前去選修的學生達千人之眾，人氣飆升，熱浪疊起，以至這門課後來一直很叫座。較之與國內媒體對“文革”的閃爍其詞，較之於“文革”資料在中國的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大量鎖入秘庫，有關“文革”博物館的建議石沉大海，西方那些國家裏有關著作車載斗量，有關專家明星輩出，迅速形成了一種知識強勢。在很多人看來，這也陷國人於道德窘境，與日本右翼勢力對待二戰的態度相去不遠。《上海生死劫》《鴻》《革命之子》等紀實作品，出自“文革”後最初進入西方的一些國人，當然多是磨難較多的知識精英——紛紛名列暢銷書排行榜，被不少大學指定為必讀書目，無疑是這個強勢的起點。其中《革命之子》的作者梁恒，我的大學同學，

與我一道步行紐約時，常被陌生的美國讀者招呼，攀談，誠邀合影。用他的話來說，魯迅在美國的名氣，不及他萬分之一。

據我後來在美國所知，這種說法並不是他吹牛。

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文革學”相當於中國原料加西方技術，相當於國人的某種記憶外包和知識信託，把腦袋擱在人家的肩上。一個巨大的知識產業，經“出口轉內銷”和“內銷轉出口”各種渠道，歷三十多年發育成長，在中、西之間一再獲得循環增值和雙向擴張，最終以散件進口境內整裝的方式，悄悄滲入國內的講壇、沙龍、網絡、出版業以及街頭私議。很多國人的思想胃口和意見市場，被這一產業完全接管。常見的情況是，有些西方人士認定“他們中國人自己都這樣說，那還有假？”而那些中國人恰恰是在隔洋學舌：“旁觀者清麼，他們西方人都這樣看，那還有錯？”——這些真相尋求者一再狂追自己的背影，把自己的背影當成了神秘的蒙面證人。

不管怎麼說，這是國內知識界的一筆巨額欠賬。

一個製造品的出口大國，卻長期依賴知識與思想的進口，終究不太正常。作為富有紅色經驗的大國，又是學術、文學、教育、出版的投入大國，俄國和中國遠比眾多歐亞小國更有思考責任，如不償還這一筆欠賬，實是天理不容。

宮廷化

所謂“文革”史的宮廷化，是指敘事者們的目光始終聚焦國家高層，總是把歷史寫成一部領袖史。

前面提到的馬若德，另有譯名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哈佛大學終身教授，西方“文革學”的重要創始人，著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大卷。他與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共同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細心梳理了“文革”的過程和原因，最終確認“這場運動多半是毛澤東個人決策的結果。”他在書中另一處總結，是“毛澤東對革命純潔性永無止境的追求”以及他的“非凡權威”和“民粹主義觀念”，決定了這一運動的方式、面貌以及全部過程⁴。

僅就這一點而言，他們與中國官方的定調大體接近，正如“徹底否定”“文革”的官方結論與西方主流說法大體重合。具有官修史地位《中國共產黨歷史》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出版，也認為在“文革”發生這一問題上，“毛澤東負有主要責任。”近些年來，國內少數幾本獲准出版的《“文化大革

⁴ 見馬若德與費正清合著《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海南出版社，1992年。

命”簡史》⁵、《二十世紀中國史綱》⁶等，均持類似觀點。這些書中提到悲劇發生的原因，如“馬克思主義水平不高所受到的懲罰”，當然也是意指毛澤東。

這樣看來：

一是個人問題。

二是認識問題。

這裏隱含的邏輯是：一、如果毛澤東的位置上換了別人(不妨設想疾病、車禍、政變等事故導致換人)，“文革”就可能不會發生。換句話說，在沒有毛澤東的地方，“文革”大概是不可想像的，幾乎沒什麼機會。二、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原因是他認識錯誤，如果他腦子好用一點，馬克思主義水平高一點，如有些人設想的那樣能讀懂德文原着，或智商再提高二十或三十，事情就不會那樣。如果他腦子裏多一點自由主義(右翼所願)，多一點孔孟儒學(新儒家所願)，甚至多一點解構主義、猶太教、綠色思潮、電腦原理、重金屬搖滾樂……事情大概也都不會那樣。在不少人眼裏，那種情況下的中國或可跳過十年或三十年，從1949年直接切換到1978，甚至直通1980年代的歐美，脫下草鞋，開上法拉利；丟下

5 《“文化大革命”簡史》，席宣和金春明着，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

6 《二十世紀中國史綱》，金沖及著，社會科學方文獻出版社，2009年。

窩頭，換上人頭馬；私塾弟子們立即讀上了《華爾街日報》。

這種歷史偶然論是否太過虛玄？是不是一種變體的個人崇拜？一具肉身若神通廣大到能讓偌大中國下地獄或上天堂，隨心所欲給歷史添上幾十年或刪去幾十年，不被崇拜一下又怎麼說得過去？

說實話，我也好奇紅牆內幕，相信領袖的巨大作用。但我懷疑幾十年的歷史只是數億人運氣太背，碰到了一支下下籤，是一個噴嚏打出來的心梗致死。讀這些書的時候，我很想看看作者們還說些什麼。可惜的是，追責到此為止，謎底似已揭開，他們大概覺得自己已能交代得過去。

考慮到毛澤東當時的絕對威權，考慮到他在集權體制下的咳嗽一聲舉國靜默，他當然對事情負有主要領導責任。這樣說並不為錯。把很多錯誤記在他名下，這樣說有時也大體不差，特別是對於小學生來說也許夠了。問題是，這裏的錯誤是指個人崇拜、高度集權、長官經濟、政治高壓、文化禁錮、人權災難等，即中國語境裏的“極左”。這種極左並非中國特產。在前蘇聯、東歐各國、朝鮮、越南、柬埔寨……那些沒有毛澤東的地方，包括在那些官方輿論起勁兒反毛、反華的地方，火燒毛澤東畫像和把核彈頭瞄準中國的地方，上述錯誤也大同小異層出不窮，諸多故事讓中國人十分眼熟——這正是我當年決定翻

譯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主因，大概也是這本書熱銷的主因。

那麼，上帝是否克隆了一大批操湖南口音的高個子，一個不落地分派到這些社會主義國家，讓他們的個人問題和認識問題一齊發作，讓諸多下下簽一齊生效，從而造成了國際紅色陣營普遍的失誤和重挫？一個短路點就在這裏：如果承認那些地方也有極左，那麼極左就與毛澤東不存在唯一的因果關聯；如果認定極左只是毛澤東的個人作品，獨一份的發明，那麼上述國家的類似情況就來歷不明，殊可奇怪，與“文革”扯不上近似值與親緣性。國人們的眼熟純屬有目無珠。

我們該往哪邊說？

這種毛澤東的“群發現象”不僅出現在境外，也出現在境內。作為中國頭號“走資派”之妻，王光美親歷過不少高層內情。她飽經磨難，但家中一直懸掛着毛澤東與她全家人相聚的巨幅照片。聽說毛澤東的女兒病了，她聯繫醫院尋訪名醫，去對方家裏幫助打理家務，事後還把毛、劉兩家的孩子們悉數召來，一起歡度大年除夕——這樣的闔家歡後來一再重現。她的道理是，賬不該算在某個人的頭上。用她的話來說：“‘文革’自有它的歷史必然性和複雜性。毛主席用那些人也是有歷史緣由和認識過程的，發動那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不可能不用那些人；即使不用他們，也必然會有和他們類似的一幫人跳

出來興風作浪，毛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⁷

“那些人”當然是指一大批，遍佈各地、各業、各級的大小推手，包括各個推手下面同樣“管不住”的若干人。撇開其中的惡棍，就連很多不幸的蒙難者，真誠的革命者，運動的諸多攻擊對象，如王光美的丈夫劉少奇，其實也不時閃爍毛澤東的影子，有點“小號毛澤東”或“疑似毛澤東”的味道，分享了某種共同氣質。以現在的眼光看，這些人也曾極左，至少是不乏偏左、易左、防左無力的思想特點。陳雲在參與《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討論時強調：“毛主席的責任是主要的。黨中央作為一個集體來說，有責任，沒有堅決鬥爭。”“毛主席的錯誤，地方有些人有相當大的責任。”⁸鄧小平對外賓坦言：“失誤的責任不能只放在他一個人頭上。我們這些人也要負責任。”⁹這是一種謙遜之詞？還是一種寬容之態？如果看一看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在不少政治、經濟、文化問題上的立場和觀點，便可知他們後來的反省事出有因。如果再看一看劉少奇主持的1947年解放區土改、1964年前後的農村社教……後人還不難發現，當某些極左傾向冒頭，倒是毛澤東表現

7 見孫興盛文《把歷史的真相告訴人民——採訪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憶》，載2009年12月4日《今晚報》。

8 轉引自《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

9 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的《文獻與研究》2011年第21期。

出質疑、審慎、詰難、勸阻、反對，甚至徹夜難眠。這樣的事例可以拉出一個長長的清單¹⁰。很多時候他對同事們“打擊面過寬”的嚴詞糾正，同樣構成了歷史的一部分。

“打擊面過寬”是一種含蓄的公文語言，對於受害者來說卻可能意味着恐嚇、羞辱、拘禁、抄家、失業、離婚、私刑、死亡——1947年後有些地方極左的“流血土改”便是例證之一，1957年的反右擴大化也是。據馬若德周詳考證，相對於彭真、陸定一、劉少奇等反右“強硬派”，毛澤東倒是一直“溫和”。但他對鳴放的鼓勵，對“人民內部矛盾”提法的固守，還有“懇求寬大”和“阻擋對右派的全面政治迫害”都無濟於事，最終只能遷就強硬派的憤怒，與各方磨合與“妥協”¹¹。於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成了所謂引蛇出洞的“陽謀”，他必須認賬，必須加以圓說。馬若德這一描述還有待更多解密檔案加以檢驗，但哪怕只有部分真實，也足以讓很多人驚訝。顯然，這一些運動已是“文革”的相似形，“文革”的初級版。“文革”並非1966年突

10 比如在推動“大躍進”的過程中，毛澤東從1956年寫《論十大關係》，到1958年第一次鄭州會議，到同年的武昌會議，到1959年第二次鄭州會議，到1960年中央《緊急指示信》，到同年12月北京會議，到1962年召開“七千人大會”……他多次強調反左，壓指標，肯定商品經濟，肯定價值規律，反對“共產風”等，其低調態度屢屢遭遇很多下屬的抵觸。

11 引自馬若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2年。

然砸在天安門的一個天上怪物，更像是從歷史深處慢慢長出來的政治腫瘤，不過是毛澤東所懷疑和反對的錯誤，與他所贊成和推動的錯誤，相克相生，糾纏錯雜，交叉感染，反復震盪，最終滑向了天下大亂。這一段亂紛紛的往事怎能不讓王光美這樣的過來人千回百結！

從總體看，毛澤東不過是毛澤東“群發現象”中威權最高的一個，最有影響力和能見度的一個，如此而已。最有影響力，使他對“文革”不可能不承擔主要領導責任。最有能見度，則可能遮蔽了他被掣肘、被裹脅、被引導、被影響、被代理、被推動、被造就的大量隱情，遮蔽了聚光圈外的體制條件和環境制約，即看不見的歷史之手。

這幾乎是一切領袖人物的命運。

很久以來，我們多是從眾多史學著作和傳記影片中熟悉這些人物的。我們看他們如何口授機宜，沉思踱步，激情演說，計上心頭，妙語博笑，指揮千軍萬馬，接受萬眾歡呼，讓秘書、警衛員、參謀長、同盟者們佩服得五體投地或感動得熱淚盈眶，於是很容易相信他們無所不能，一個指頭就能撥動歷史。他們的一台電話機和一枝鉛筆幾乎就是歷史的全部秘密。出於趣味的考慮，出於體例的傳統，或出於政治外行的想像，一些文藝範兒的製作者，很少讓我們看到那些人的身不由己，看到他們的無奈，看到他們妥協的

加減乘除，看到他們想做的事做不成，不想做的事卻偏偏成了，想做成甲的事不知為何竟做成了乙……“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唐代羅隱詩句)”這種深刻的感悟不大進入這些作品，成為具體描寫和生動形象。

這樣，歷史就成了一部部領袖史。

這種文本誠然記錄了部分真實，如同大腦指揮四肢的真實，卻不明白軀體也反過來制約和決定大腦——大象的身上是不可能長出一個猴子腦袋的。退一步說，即使大象身上成功嫁接了另一個腦袋，也不大可能使象腿變成鳥翼，變成魚翅或雞爪。相反，只要大象的龐大身軀和五臟六腑依舊，大象所依存的氣候、地理、物產、天敵等生存環境因素依舊，一個哪怕成功移植的猴子腦袋，還是很可能長出長鼻子和大耳朵。這也許有助於我們推想：為什麼唐太宗再開明也不可能簽署中國的《自由憲章》，為什麼拿破崙再強霸也不可能成為法蘭西的蘇丹，為什麼老子再睿智也不可能在竹簡上創立後現代主義……這些人物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不是可以隨意裝來裝去的腦袋。

時勢造英雄，時勢也滅英雄，也流產或夭折英雄。他們的大有為，並不意味着他們不再是歷史大勢與合力的產物，不再是某種平衡點和聚合點。歷史上的思想家(如老子)、科學家(如愛迪生)、藝術家(如提香和塞尚)、體育明星(如博爾特和姚明)都不過是身後同類群體、同類次群

體、同類次次群體中的最終出線者，合適的形象總代理。

領袖史(俗稱為帝王將相史)誇大個人作用，充滿太多花哨的宮廷故事和偶然情節，卻容易讓人們捨大求小，放過對制度與文化的檢討。

難道這就是我們所自得的批判？

道德化

道德化是“文革”研究中另一個普遍的毛病。

與馬若德和費正清的看法不同，生於比利時的勒斯(Simon Leys)在《主席的新衣：毛和文革》¹²一書中認為：中國的“文革”除了名稱，與“革命”和“文化”統統無關，純粹是欺世盜名，不過是毛澤東感到大權旁落，為了奪回權力，不惜發動運動，於是把中國推入萬丈深淵。

這位譯過《論語》的漢學家其實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特別是聽多了一些宮廷故事，滿腦子都是大人物晃來晃去，都是他們威風凜凜的排場，一旦發現他們的說詞大而不當，高調不實，離奇古怪，有東沒西，幾無學理邏輯和務實關切，人們的“權利鬥爭”印象便肯定更為深刻。

在一個大爭之世，一口咬定所有人都在幹壞

12 *Chairman's New Clothes: Mao and the Culture Revolution*, Allison Busby, 1981.

事，對於幹過壞事或想幹點壞事的人來說，當然也是方便的自我心理寬慰。

政治人物並非聖人，因利益、面子、意氣、人脈關係等發生相互磨擦，繼而發生擠壓或對撞，都實為尋常，與市井糾紛和家長里短沒有太大不同。政治高壓下的個人安危，滋生各種抱團和依附的生存策略，滋生派別之間的爭權奪利，也確實構成了“文革”面貌的一部分——在運動後期尤其如此。不過，說毛澤東曾“大權旁落”，活在中國的人恐怕打死也不會相信，特別是在“文革”之初劉少奇、鄧小平等已被邊緣化的情況下，更不符合事實。更重要的是，把一部十年或三十年的大國史僅僅歸因為權爭，歸因為個人的心理陰暗和慾望變態，歸因為領袖的道德敗壞，不僅過於通俗化，接近茶館龍門陣的口吻，而且很容易讓人想起“文革”時代的宣傳。在那種宣傳裏，在有關小說、電影、展覽館裏，壞事都是壞人做的，壞人都必做壞事。蔣介石生有梅毒，宋美齡奢侈得天天用牛奶洗澡，劉少奇早就叛變投敵，布哈林是個陰險的謀殺犯，美國兵只會泡妞喝酒並且掀起屁股戰場逃命，地主都獐頭鼠目或青面獠牙，國民黨女性差不多都是妖豔風騷的爛貨……這種把對手妖魔化的習慣，哪怕經過後來數十年的文化淘洗，直到今天仍餘跡尚存，足見頑疾難治¹³。

13 如王朝柱編劇的某些革命歷史題材影視片，造神舊習仍多。出

一些左翼人士懷念紅色文化，但他們不明白，作用力等於反作用力，一報還一報，徒弟打師傅，紅色文化中多見的妖魔化這一飛去來器難免傷己。想必是打小就熟悉政治宣傳，出身於紅色官員家庭的張戎繼一本《鴻》在西方引起轟動，再度與其英國丈夫哈利代(Jon Halliday)聯手，推出新作《毛：不為人知的故事》¹⁴，把顛倒版的妖魔化又一次順溜溜地回報給故國。在這本書裏，毛澤東一夥被寫得一生壞透了頂，集殺人狂、二流子、陰謀家、貪污犯、神經病之大成，似乎新中國不過是這一類魔頭的偶然得手，靠一路造假最終登上了不那麼“假”的天安門，靠一路使壞最終把中國折騰成“壞”到了家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至美國耶魯大學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後來在《紐約書評》的長篇書評中，也認為該書最大的敗筆是材料可疑。熱烈吹捧該書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在《紐約時報書評》上也不得留下一筆：他擔心有些材料可能出自偽造¹⁵。

捕風捉影，有罪推定，信口開河，道德誅心，使一場嚴肅的反思可能降至大字報水平，淪為八卦和扒糞。於是歷史清算成為一個半拉子工

版於2009年的《二十世紀中國史綱》，金沖及著，雖在內容和文風上有很多改進，對蔣介石等人的妖魔化仍有殘痕。

14 *Mao: The Unknown Story* by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Jonathan Cape, 2005.

15 轉引自香港《亞洲週刊》2005年第48期。

程，反增了清算的難度。與其說這是批判“文革”，不如說這是暗中延續“文革”中常見的思維方式和言說風格。擅長此道的京夫子，著有《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中南海恩仇錄》《北京宰相》¹⁶等暢銷書，原筆名古華，曾以長篇小說《芙蓉鎮》獲大獎，其才情一度廣獲讚譽。他來自湖南郴州鄉下一偏僻之地，以至很長一段時間裏，他的古怪方言讓我難懂，在省城裏看個電影或買雙鞋也得求人帶路。但這一份土特產到加拿大後變身為秘史專家，一舉揭發出紅牆裏的秦始皇和西門慶，還能以“他想”“他突然想到”“他心裏明白”一類話，把描寫對象的腦神經信號悉數挖出公之於眾，實讓人驚奇。有一次，我隨着他的描寫進入中南海，過新華門後便成了瞎子——門內的路徑、樓臺、花木、器物的形貌和位置一片空白，似乎當事人都是直接從大門外一步跳進密室，在無形無貌的真空裏生活，於是不能不讓人懷疑作者是否真進過這張門，京夫子的“京”是不是一枚假商標。呂正操老人曾對我說：“我當鐵道部長那時，脫離身邊人員的視線二十分鐘，也得報告國務院辦公廳的。一個國家首腦怎麼可能獨自走出中南海西便門，撐一把雨傘，戴一個口罩，坐上公共汽車，跑到居民區去會情人？”¹⁷

¹⁶ 臺灣聯經出版社於1990年代陸續出版。

¹⁷ 呂正操指艾蓓《叫父親太沉重》中的情節，該書由香港明報出版

從一個土夫子變成京夫子不難，當上歷史神探卻非易事。我在鄉下遇到的一位喜歡抬槓的人，對毛岸英“鍍金”一說也大不理解。說到毛澤東當年送兒赴朝參戰，這位農民說：“他還要鍍金？他還用得着鍍金？不是說他老爹當朝聖上麼？一個東宮太子，就算睡上幾十年，耍上幾十年，誰敢不讓他接大位？為何偏要送他去打仗？”

老漢所知不多，比方不知去北京該翻幾座山，更不知當時朝鮮戰場的制空權盡在美軍一方……但這類土夫子的日常邏輯正支撐另一些想像。

我不是什麼知情者，也不願意參與這些想像。我只是看不出神聖化與妖魔化之間的無聊打殺有何樂趣，看不出圈佔公帑或獵取版稅的商業策略有何不同。我只是懷疑那種糾纏於離婚、薪水、疾病、稿費、房產、後人吃啥喝啥¹⁸的喋喋不休，懷疑那種長舌婦和民間神探，對於歷史反思有多大意義。

當然，道德這事很重要。道德是歷史過程中時隱時現的強大引力，但具體到個人評價，道德與政治似乎並不能重合為一把尺子，倒像是縱橫兩個座標。換句話說，道德尺子能量出這一派的

社1984年出版，為諸多“揭秘”紅牆道德內幕的流行作品之一。

¹⁸ 關於毛澤東後人的情況有各種傳說，其中有知情者稱他們並未大富，甚至十分清貧，如簡妮《近期李訥三訪》文，載《海南紀實》雜誌1989年第8期。

A型和B型不一樣，那一派的B型和C型大不同，但如果要把善惡分別掛鉤某種政治站位，實行對口管理，特別是在公眾利益出路不大明朗時，則可能有點冒險。硬要劃出這種連結線，則一定自添其亂。馬丁·路德·金算不上操守嚴謹。作為一個牧師，他通姦和嫖妓。作為一位博士，他抄襲和剽竊。這些在美國早已不是什麼秘密，但他領導的民權運動仍無可否認。軍閥吳佩孚不抽、不喝、不嫖、不賭、不貪、不佔，人稱“六不總理”，連他的敵手如董必武等也承認他治軍有方，律身有則，統兵數十萬卻一生“沒有私蓄，不置田產，有清廉名”¹⁹。但這位大善人對抗北伐和反對共和，仍是負面政客形象，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黯淡。

造神者與擒妖者如何對付這一份人的複雜？目光再放遠一點，伏爾泰、盧梭、華盛頓等同樣在個人品行方面留下了巨大爭議，留下一大堆關於情婦和私生子的閒話²⁰，他們在政治或文化方面的卓越建樹卻很少被後人懷疑。有關研究者似不會拿幾個道德標籤貼來貼去，把歷史變成一種善惡排行榜，一種好人好事大評比，一種道德偶像的十進五或五進一。

19 見董必武文《日寇企圖搬演新傀儡》，載1939年2月《群眾》週刊。

20 傳伏爾泰被富婆包養，盧梭有不少私生子，華盛頓蓄有不少奴隸，都屬於私德有虧。

說到這個份上，即使一個毛澤東所受到的品行指責全部算數，全部入賬，對“文革”的反思是否就算大功告成？

訴苦化

我離開鄉村時，“文革”十年還未結束，鄉下已開始試行推廣袁隆平主持培育的雜交水稻，各村都派人去炎熱的海南島制種。“公本”和“母本”一類成為農民們的新詞彙。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就像我在一篇文章中說過，如果沒有農民俗稱的這種“霸王稻”，沒有雜交水稻所代表的一系列良種推廣，沒有由此而來的糧食產量倍增，不僅吃飯問題解決不了，工業發展所必需的農產品剩餘和農業人口轉移都無從談起。哪怕中國再開幾次“三中全會”，後來全國取消糧票，珠三角和長三角聚集億萬農民工，西方製造業向中國大舉轉移……恐怕都是難以想像的，至少是困難重重的。

心存這一印象，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一書特別對我的胃口。這位法國學者最關注歷史結構的底部，與很多同行不一樣，總是把放大鏡對準民眾史、基層史、生活史，比如從人口、疾病、地理、物種、飲食、住宅、技術講

起，從基因和細胞的層面解讀資本主義的生命。他終於使史學不再是頭重腳輕的無根之木。

與他相比，另一些同樣是目光下移的史學作品，如美國人曼徹斯特(William Manchester)的《光榮與夢想》，多一些記者風範，深度也許不及布羅代爾，卻也有足夠的敘事廣度。這本書細緻入微地觀察生活形態、時尚風貌、人物趣事、報刊習語、事件細節等，是一種多機位和寬覆蓋的鏡頭監控，給歷史全景掃描。如果請這位先生看“文革”，他也許會騎一輛自行車滿世界遛達，留意“忠字舞”的娛樂功能，留意“大串聯”的旅遊意味，留意造反派的褲襠和粗痞話——不少暴力大概都涉嫌荷爾蒙壓抑後的變態釋放。較之於某些領袖史，這些細節或能使歷史面貌更完整，也更容易理解。在這種理解之下，運動中的人更像人，不是瘋子，不是符號。

“文革”討論禁區後來有所鬆動。雖主流媒體大體沉默，但在學術研究和文藝表達方面留有一點餘地，“擦邊球”和“遊擊戰”也不少。被視為“妖魔化”中國最力的巴特菲爾德(Fox Butierfield)，一個不懂中文的美國記者，挾美國圖書大獎之譽，也有涉華代表作在中國出版²¹。特別是互聯網出現後，行政防堵力不從心。不僅

21 *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 by Fox Butierfield, 臺灣版譯名《中國：苦海餘生》。大陸版譯名《苦海沉浮》，四川文藝出版社，1989年。

《文革受難者》(王友琴著)、《牛鬼蛇神錄》(楊小凱著)等境外出版物在網上暢流，一些民間電子期刊如《昨天》(何蜀主編)、《記憶》(啟之主編)等也十分活躍，迄今為止已分別出版了數十期。這一類文本重在親歷性經驗，多角度、高密度、大規模、持之以恆地還原“文革”景象，頑強喚回國人的記憶與追問。

如要挑剔不足，就是其中一部分敘事詳而解析少，流於平面堆砌，仍習慣於亮傷口和曬血淚，原料供貨方的模樣，處於“文革學”的產業低端。其中一些或可稱之為“訴苦化”，有數量的增加，少見品質的提升。

訴苦是受苦人的正當權利。每一個生命都彌足珍貴。按中國官方最初的統計，最高人民檢察院提供的材料，“文革”中共有729,511人受到“誣陷和迫害”，其中34,800人被迫害致死²²——如此普遍和深重的冤情就不該訴一訴？萬千冤魂就只能在市場經濟的高歌猛進下一筆閃過？

與中國官方數據不一，馬若德和費正清估計“文革”十年中受害致死人數應在四十萬到五十萬之間²³。這裏擱置其數據來源，暫且取其上限，攤到每一年即五萬，在人口總數中的佔比從萬

22 引自《歷史的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犯紀實》，群眾出版社，1981年。

23 引自馬若德和費正清合著《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海南出版社，1992年。

分之零點零四升至零點五九²⁴，上升了十幾倍。

五十萬——無人能在這個數字前無動於衷。如果這一估計準確，這樣的白骨纍纍屍橫遍野，猶如經歷了一場慘烈內戰，顯然更值得人們勒石鑄鼎以昭後世。然而，擺上思想與學術層面，巨大悲情對於“知其然”也許夠了，對於“知其所以然”仍然不夠。重要的理由是：並非只是“文革”才出現非正常死亡，若止步於此，“文革”的反思價值反而會被削弱。

在互聯網上隨便搜索一下：

美國因槍支管控不力，每年致亡人數逾三萬，在人口總數中的佔比萬分之一，已接近兩個“文革”。

陷入歐債危機和經濟衰退中的希臘自殺率急升，僅2011年就近千人，其中多是失業者 and 破產者，在人口總數中佔比萬分之零點九，也遠超“文革”。

載於《柳葉刀》雜誌的一份《2010全球疾病負擔研究》稱：光是空氣污染一項，2010年就造成全球三百二十萬人死亡，其中一百二十萬中國人過早死亡，在人口總數中佔比萬分之九，竟是“文革”的數十倍²⁵。

24 中國1966年人口總數6.4億，1976年人口總數9.3億，十年間平均數為8.35億。這裏的死亡率權且以馬若德和費正清的估計數為比照基數。

25 引自2012年12月英國《柳葉刀》雜誌。

回到政治領域：與中國“文革”在時間上相當接近，1965年印尼右派軍人發動政變，得到了美、英、澳等西方政府的支持，至1966年已殺死超過一百萬的左翼人士和穆斯林(另有統計數為兩百萬，甚至四百萬)，其中光是美國大使提供的捕殺名單就多達數千人²⁶。比照印尼當時一億左右的人口總數，該國的迫害致死率約萬分之五十，又是近九十個“文革”——耐人尋味的是，這一場更大的腥風血雨一直被西方主流媒體消聲，好像什麼也沒發生過，更不會在哈佛設立學科，直到多年後才偶然浮出水面。

還有吸毒，犯罪，饑荒，礦難，有毒食品，交通事故……同樣是一篇篇血淚故事，導致千萬鮮活的生命過早熄滅，意味着太多窗口裏的捶胸頓足和深夜長泣。如果“文革”需要訴苦，需要指控，需要對體制與文化的批判，那麼這些更驚人的死亡數據該如何處理？是不是也要推出幾個或數十個學科？

毫無疑問，凡悲劇都值得痛惜和深思。消除這些悲劇更需要大多數社會成員的行動，需要達成某種社會共識，始於淚水卻不能止於淚水。那些有權控訴的人或可注意，他們畢竟是相對少數，與相對多數之間存在經驗的溫差——這是取得共識的通常難點之一。比如大多數中國工人在

26 見麥克·海德(Mike Head)發表於澳大利亞《悉尼晨報》1999年7月間的連續報導。

“文革”中就受害較少。他們享受“領導階級”的地位優越，領取令人羨慕的月薪，甚至輕鬆和愜意於黨政機構的一時癱瘓。其中的年輕人若稍有才藝，便可能出入蘇式的工人文化宮，在舞臺或球場那裏留下浪漫的青春回憶——我就見識過不少這樣的紅色小資和勞動貴族，衣着講究(如熱衷於回力牌球鞋)，趣味不俗(唱一唱美聲或夾一個畫夾子)，吹着小口哨，簡直把“文革”混成了帶薪長假。農民呢，比起工人來說要窮得多，累得多，但只要沒遇上災年，比起當年躲日本鬼子或辦公社食堂，他們大多覺得“文革”的日子還算過得去²⁷，對教育普及和合作醫療還心存感激。馬若德和費正清稱“農業在全國範圍內比工業所受影響要小”，就是指這一段²⁸。

在後來的歲月裏，這些工人和農民也會覺得“文革”有太多事可笑和可恨，但他們一般沒有挨批鬥的經歷，沒有下放和挨打的皮肉之苦，一直活在政治安全區。在這種情況下，當受害者談起“文革”，若發現對方眼中閃過某種遷就、茫然、疲憊、麻木甚至不無可疑的懷舊，難道有什麼奇怪？一旦在市場社會滑入困境，這些傢伙就

27 “文革”十年中的農業生產受運動衝擊較少，全國收成不算太壞，據國家統計局所編《中國統計年鑒(1981)》，那些年的農業用電量和化肥消費量分別增加十多倍，1978年的糧食產量30,475萬噸，是1965年的1.6倍。

28 引自馬若德與費正清合著《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海南出版社，1992年。

舉起毛澤東畫像走上街頭，生生地不按“正確套路”出牌，難道不也是情有可原？

“文革”中受衝擊最大的，分別是知識分子、舊時的地主和資本家、官員(所謂“走資派”)、中途翻船的造反派(如五一六分子²⁹)……其成分五花八門，麻將桌上的十三不搭。他們的悲情並不一樣，版本之間出入很大，合唱卻並不同調，構成了一種心思各異的齊心合力。不管怎麼樣，他們的刻骨痛感無法通過針頭注射給一位老鉗工，無法通過芯片移植給一位菜農戶，從而使天下人都心往一處想。他們的故事通常能廣獲外人同情，一如魯迅筆下的祥林嫂³⁰，喪子之痛最初無人不憐，催動了大家的淚水。不過，依據現代人的平等原則，尊重回報尊重，他們不能奢望一鍵之下，自己的記憶就可全面覆蓋他人的記憶。依據現代人的民主原則，他們儘管構成了一個驚人的人口大數，哪怕如胡耀邦1980年會見南斯拉夫記者時估計的一億左右³¹，但在更為驚人的人口大數前，在此外的六億或七億人那裏，他們仍不構成全部。他們要做的是理解、溝通、說

29 北京一些造反派組織於1967年聯合組成的“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公開指控周恩來，以“反黨亂軍”言論著稱，後被中央定性為“反革命陰謀集團”。1970年至1974年中央部署各地打擊這一組織，致造反派普遍受到清算和懲罰。

30 見魯迅短篇小說《祝福》，載小說集《吶喊》，浙江文藝出版社，2006年。

31 引自美國《華盛頓郵報》1980年6月8日報導。

服以及協調共進，不是強加於人和視而不見，滿足於悲情的自產自銷，成為另一個祥林嫂。

祥林嫂的啟示在於：如果拿不出一種說服力強和需求面廣的共識性批判，一味訴苦就只是對自己苦難的辜負。

另一種問題社會

現在看來，從“文革學”一開始，有些左翼和有些右翼人士就像是一個趑趄的連體人，栽進了同一個坑。

這是指他們對社會的總體性判斷。隨意在互聯網搜索一下，便可發現“文革”的辯護者們最愛做的事，一是憶“平等”，二是憶“反腐”——其實反腐是平等的另一面，兩條可歸結為一條。在另一種聲音裏，“文革”的痛恨者們無不斥責“平均主義”，其實是指“平等”的超強版，在更多時候則只是對“平等”一種貶義的別稱。在這裏，雙方同於事實判斷，大體上確認了當年的一種“平”。差別僅在於他們的價值判斷：有人願意用褒義，說“平等”最為可愛，洋溢社會主義的溫暖；有人願意用貶義，說“平均主義”太可惡，窒息了市場與資本。

這個雙頭的連體人說錯了什麼嗎？

很多西方學者也公認“毛澤東是個平等主義

者”³²，算得上這個連體人的強大外援和場外教練。他們的依據想必是這樣：在紅色中國的城鎮，人們確實工資差別不大，住房差別不大，伙食差別不大，糧票、布票、油票、糖票、肥皂票、餅乾票等都是見人一份，不論級別和地位，只看年齡和工種，比如城鎮居民在大米產區的月供口糧，幹部一律二十四斤，中學生一律三十斤，大學生一律三十五斤……“階級敵人”也莫不如此。這難道不是“平等”或“平均主義”？大家都有補丁衣，都得做煤球、掃大街以及打老鼠。王局長和張木匠的老婆一同在豆腐店門前串通插隊，杜教授和莫裁縫的兒子一起蹺課游泳或分食酸桃……我就是在這種氛圍裏長大的。在我印象中，至少在相當一段時間裏(1960年前)，留聲機、照相機、進口奶粉、香水、寵物、鋼琴這一類奢侈品，更多出現在歸僑、知識分子、資方留用人員的家裏，一般來說與官員宿舍關係不大。在我生長的城市，四座最好的新建別墅都分配給了知名作家，比省委書記和省長的住房要氣派得多³³。這種印象與後來若干史料吻合：在“保留工資”的政策下，當時京劇演員周信芳月薪1760元，其同行馬連良的月薪1700元，上海建

32 如理查·伊文思(Richard Evans)，見其《鄧小平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

33 湖南籍作家周立波、蔣牧良、康濯、柯藍在1966年前位於長沙市八一路的舊居。

華毛紡織廠廠長王介元月薪1676元……均超過國家領袖們數倍³⁴。

正是在這種氛圍裏，北大老教授季羨林回憶，哪怕是所謂三年困難時期，也是他一生中精神面貌“最好的時期，一點苦也沒有感覺到。”³⁵ 鄧小平曾對外賓說：“你們如果是50年代、60年代初來，可以看到中國的社會風尚是非常好的。”³⁶ 遲至1993年，我接待一對法國夫婦，發現他們對中國的司機們總是上桌與主客一道吃飯，還表現出幾分詫異，於是感歎中國工人階級地位高得很³⁷，不像他們那個破法國，不久前人們在巴黎坐地鐵也分流在貧與富的不同車廂；更不像在東南亞某些國家，司機的別稱是“車奴”。

不過，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如果人們把目光從物質形態移開，投向人的尊嚴、快樂、自由度、安全感、政治權利等，把物質的人還原為全面的人，還原為不同於牛羊豬狗的靈長類生命，

34 見陳明遠《知識分子與人民幣時代》，文匯出版社，2006年。另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53-1957)》(勞動工資和職工保障福利卷)等，國家領袖最高月薪定為560元，實際上後來經兩次減薪，毛澤東拿到404元。

35 引自季羨林文《八十述懷》，載《季羨林說自己》，中國書店出版社，2007年。

36 引自鄧小平文《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載《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

37 倒是隨着市場社會裏等級現象出現，司機與主客同桌吃飯的現象後來在中國漸少。

就不難發現“平等”或“平均主義”的說辭大打折扣，幾乎不堪一擊。從1962年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到1963年各個領域奉令貫徹“階級路線”，包括教育部通知各地強化招生過程中的“政治審查標準”，“對於思想反動而屢教不改的學生一律不得錄取”³⁸……社會上的政治空氣驟然緊張。至少在人們的理解中，“階級鬥爭”就是這麼回事：人分三六九等，出身與門第備受關切，清查與排序緊鑼密鼓，“平等”成了不同層級的排他式俱樂部。大家謹言慎行，東張西望，看人的目光冷暖隨時調整，交友的表情多制式準備，顯示出一個等級制結構正赫然形成：

最高層，是所謂“可以依靠”的紅色群體，包括工人、貧下中農、革命軍人，革命幹部等。

中間層，是所謂“可以團結”的粉色群體，包括中農、手工業者等。

較低層，是所謂“可以爭取”的灰色群體，包括一般工商業者、知識分子等。

最低層，是所謂必須剝奪、打擊、限制、改造的黑色群體，包括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戴帽右派——摘帽右派其實也好不了多少。這一層次俗稱“黑五類”或“四類分子”(若把右派分子排除)。

撇下城鄉差別在後文中另說，在這個粗略框

38 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年。

架之下，當然還可細分，比如黑色群體裏還有“殺、關、管”的深黑和最黑，指被槍斃、被判刑、被管制者及其親屬；紅色群體中也有“大院裏的(黨政官員)”與“巷子裏的(老百姓)”，穿制服有“四個口袋的(軍官)”與“兩個口袋的(士兵)”……其重要差異大家心知肚明。

“反革命分子”則是一個彈性極大的大口袋，便於把任何搗亂者打入其中，顯示出等級制的動態性，即“左”“中”“右”的現實表現分檔。公眾對此心領神會。換句話說，紅色、粉色、灰色人物都有向下流動的可能，一不小心也可滑入這個大口袋，構成黑色群體一個可觀的增量。

老子英雄兒好漢，
老子反動兒混蛋。

紅衛兵興起初期的這一流行對聯，無非是這種等級制暴虐化，有貝子貝勒踢館鬧場的口氣，有龍種鳳胎邁開八字步的自得，把血統炫耀到露骨和囂張的程度——在高層後來改口切割它之前，把它變得可做而不可說之前，可說但不可公開大聲說之前，它幾乎得到紅色群體(特別是大紅和深紅)的普遍歡迎，也得到陳伯達、江青、康生、關鋒等政治操盤者的公開支持³⁹。即便後來

39 針對有關對聯的辯論，江青曾說：“基本如此嘛。”陳伯達曾說：“也對嘛，基本如此嘛。”康生曾說：“本質的東西是

改口切割了，批判這一對聯最力的中學生遇羅克還是被處以死刑⁴⁰，並不使人們感到過於意外。

在那一聲槍響裏，那一片餘音嫋嫋下的舉國靜默裏，可有什麼“平等”或“平均主義”？在那個人們神經緊繃的日日夜夜，黑色乃至灰色人群是被“平等”或“平均主義”地戴了高帽、掛了黑牌、剃了陰陽頭然後飽受拳打腳踢？他們是“平等”或“平均主義”地去掃廁所、掏陰溝、上勞改工地以接受永遠的贖罪？他們是“平等”或“平均主義”地離婚、自殺、逃亡、下獄、突發精神病？他們是“平等”或“平均主義”地在公眾場所既不能笑(涉嫌嘲笑當局)也不能哭(涉嫌鳴冤叫屈)、既不能硬(涉嫌頑固對抗)也不能軟(涉嫌偽裝進步)地苦熬每一天？……回到前面的議題，那個從左右不同角度確認的一份“平”，作為正反兩方辯論的前提約定，難道一開始不就是嚴重虛構？不是眾多左、右翼人士一個勁兒堅守或猛攻的海市蜃樓？

或者說，除了工資和糧票，人們的尊嚴、快樂、自由度、安全感、政治權利的分配就不算什

要不要階級路線的問題，而不是對聯要不要改幾個字的問題……”關鋒曾說：“我看這個口號基本是貫徹階級路線的。”詳見孫言誠文《血統論和大興8·31事件》，載《炎黃春秋》雜誌2012年第2期。

40 遇羅克，原北京市中學生，1967年1月18日在《中學文革報》發表著名的《出身論》，次年以“反革命罪”被捕，1970年被處以死刑，時年27歲。1979年由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告無罪平反。

麼大事，從來不入唯物主義者的法眼？

或者說，“階級”一類從來就只有經濟學意義，社會觀察者只可牽掛一些關於糧票和工資的指標？

權力等級制當然也沒有素食風格，不會與物質生活絕緣。事實上，貫徹“階級路線”伊始，每個等級便有了相應的影子價格，透出了暖烘烘的人間煙火味，繞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彎之後，最終還是坐實唯“物”主義。黨員、官職、大學、好房子、招工機會、提拔可能性、接觸內部文件的資格、旅行首都的住宿介紹信……這些稀缺資源都是權力優待席，與賤民們沒關係。平均分配雖在糧票、工資一類事宜上有所延續，但往深裏看，往細裏看，特別是朝基本生存線以上看，它已被等級制迅速侵蝕，一步步趨於瓦解。在我的印象裏，自1960年代始，好菸、好酒、好補品、好衣料、好房子就更多出現在當權者那裏了，合法的“特供品”“特供店”也浮出水面，“特供”花樣不斷翻新。到1972年後，“走後門”行賄之風大盛，人們提着大包小包想走錯門也難，連街頭巷尾的老太婆都明白這裏的潛規則。在很多人那裏，女兒嫁一個黑色甚至灰色人員猶天塌之禍，哪怕那小子品貌出眾才高八斗，也等於少女自毀前程，累及全家，神經失常，常鬧得父母的要死要活——候補丈母娘們火眼金睛，總是比理論家更明白“平等”的奧秘。如果這位女兒姿

色出眾，其母親乃至大姨小姨肯定更要把視線向上調高若干度，留意紅色群體裏的更紅和大紅，“大院裏的”，“四個口袋的”，口音有點特別的——在南方講北方話的多是南下幹部之後，在北方舌帶南音者可能是革命元勳之後，一開腔便有地位的聽覺標記。

情色資源配置總是最靈敏的社會風向標。

1980年代初的一天，我因工作關係出席一個宴會，主人是省委某高官，主賓是我的合作夥伴，京城裏某位大人物的公子。當主人聽說公子他爸愛吃團魚，立刻安排手下人去買兩隻。這已夠讓我吃驚了。更讓人目瞪口呆的是，公子怕一時半刻找不到這麼多團魚，因擔心誤機一再搖手。對方看看手錶，淡淡一笑，說怕什麼呢？王秘書，你去給機場打個電話，讓他們推遲兩個鐘頭起飛。

我一時說不出話來。

這是“平等”還是“平均主義”？還要怎樣的等級制，才能讓一個區區的省級官員也可以隨意操控機場和天空，強迫那些不知內情的旅客在機場上傻等，而且等的是某位大人物可能毫不在意的兩大隻團魚，腥味撲鼻的一份獻媚？還要怎樣的等級制，才能讓這位獻媚者又是宴會又是贈品，然後戳着牙籤哈哈一笑？

平等或公平——人類夢寐以求的目標，紅色中國建立時的莊嚴承諾，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價

值核心。馬克思一直相信可以通過取消財產私有制來實現平等，但他可能沒想到，中國在做到這一點以後，在法律和政策意義上的財產私有制確實消失以後，情況卻未可樂觀。驕橫的財主沒有了，霸道的政治新貴取而代之。高利貸沒有了，孝敬長官的紅包取而代之。紅燈區買春沒有了，爭取入黨或提幹的性交易取而代之。製幻毒品和跳大神沒有了，狂熱效忠領袖的死去活來取而代之。爭奪遺產的兄弟仇殺沒有了，意在自保的親人告密取而代之。鐵具束腰和食用砒霜的美容沒有了，自殘性質的熱血秀或自願贖罪取而代之。把一隻股票炒出天價的商業投機沒有了，在打擊內奸、叛徒、邪惡敵人等各種鬥爭中的搶頭功和露大臉取而代之。比珠寶、比田莊的“拼爹”沒有了，看誰家爹媽位高官大的“拼爹”取而代之……人們仍然面臨着一個問題社會。

而且是一片過於陌生的世相，差不多是歷史中一大疑難雜症。

前人在有關於市場與資本的理論遺產之外，在“所有制”“生產關係”“基尼系數”之類以外，沒留下什麼詞語來描述這種情況，以供觀察者們信手拈來。唯物主義者遇到了不那麼“物”的問題。其最大疑難點在於，就物質分配而言，這裏的平等說無也有；就權力分配而言，這裏的不平等說少也多。

“平”乎？“不平”乎？

二者相互消長不定，但始終交織在一起。兩方面不像是偶然拼湊，倒像是自然發育的一體兩面，如插線版上的火線和零錢缺一不可。

真正的問題也許正在這裏逼近。

道路選擇的大概率

早知道改革開放這樣好，市場經濟這樣活力充沛，中國人當年就不該那樣二。事情到底怎麼啦？為什麼不能早一點放開物價？為什麼不能早一點發展個體戶？為什麼不能早一點搞股份公司、品牌代工、房地產、股票交易、電視超女選秀？既然“多元的組織資源”（秦暉語）是克服極權和動亂的必要條件，是自由和民主之基，當初為什麼居然就沒人想到要開放市場，助推宗教，甚至鼓勵行幫、宗祠以及名媛學校？……這一些詰問近年來耳熟能詳，多見於知識沙龍，成為學子們焦慮的七嘴八舌。

我也恨不得替同胞們悔青腸子。

看來，我們都成了某些黨史專家和哈佛教授的好學生，從他們那裏順利接受了有關“文革”的解釋和思路，比如“馬克思主義水平不高（前者語）”，比如“民粹主義觀念（後者語）”，如此等等。不管怎麼說，這都是一些認識問題。既是認識，那就得取決於腦子裏裝了些什麼，取決於

腦子好不好使。笨蛋花兩個小時才能啃下來的考題，才子在十分鐘內就能搶先交卷。中國看上去就是這樣的笨蛋，薦頭巴腦，撓頭抓腮，只能眼睜睜地看美同學和歐同學先交卷、得高分、進奧數班、連跳兩三級、最後免考直入名校。自己呢，連抄作業也抄錯，把一個市場經濟抄得很不像樣。

事情也許就這樣簡單。

也許不是。

“文革”後，明眼人都看出了一個全能和單質的集權體制弊端叢生，看出了市場自由必不可少——否則中國就不會在三十多年前痛加改革，眼下還要改下去。不過，與中國鄉村裏熱熱鬧鬧的丈地確權和土地流轉不同，有一個國家至今還實行嚴格的土地國有化，並且大辦集體農場——請注意，這裏不是說朝鮮，是說以色列。這個國家受制於資源緊缺和移民眾多的巨大壓力，也考慮到大家反正都沒什麼祖宗地契，因此一直對土地、礦產、水源等實行全面的國家壟斷，國有土地佔總量的94%，基布茲(集體農場)遍及全國，至今仍無改變跡象。

另兩個國家，與中國的市場化潮流大相逕庭，與主流經濟學擰着幹，竟嚴打金融自由和厲行計劃分配——請注意，這裏不是說古巴和伊朗，是說美國和英國。相關的歷史常識是：1930年代，美國總統羅斯福開出一大堆對付經濟蕭條

的猛藥，以“大政府”直接干預市場，強推社會保險，取消黃金和外匯的自由化，對五百萬美元以上的遺產開徵富人稅75%，在很多人看來幾乎是上門打劫神聖私產。同是二戰期間，在飽受戰爭摧殘的英國，物資供應非常緊張，街頭常見一群群乞兒追逐軍車討要麵包。邱吉爾政府為了度過難關，全面實行生活必需品的定量分配，嚴禁私商投機，強制富人與窮人的“公平分享”，以至限購的各種居民票證多得讓人頭暈，“計劃經濟”一度成為議會裏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即便如此，戰爭硝煙剛剛散去，身為赫赫有名的二戰英雄，邱吉爾仍被工黨狠狠地修理，眼睜睜地看着對手以《貝弗里奇報告》大得人心，“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大不列顛共同體”的口號居然成了競選利器，打得他灰頭土臉意外下臺。

一個自由傳統至為深厚的英國尚且如此，較之於美國總統奧巴馬被茶黨示威者漫畫成一個頭戴紅軍帽、臂掛紅袖章、站在天安門的黑統帥，為他的醫療改革付出代價，邱吉爾肯定覺得自己冤情似海。如果奧巴馬加一點福利也算得上通共，那當年英國議會和大選豈不是早被紅衛兵全面接管？

據此可知，抑市場或反市場，不是以色列人、美國人、英國人的什麼認識問題。我得再說一遍：不是認識問題。或再強調一句：不是“馬克思主義”或“民粹主義”多不多的問題。哪怕

是在現代市場經濟的老營，哪怕是資本主義的資深教頭，一旦受困於現實難題，被具體國情形格勢禁(如移民太多、經濟蕭條、物資匱乏等)，他們也不得不腦筋急轉彎，背離一下原教旨。這正像他們什麼時候被另一種情況所困，又可能變回去，或變出別的花樣。這種制度換軌哪怕是局部的，是短期的，都無不出自特定條件下的權宜，以順應歷史的合理性——或可稱為選擇的大概率。

形勢比人強，比人的理念強。所謂認識，充其量不過是摸着概率的大小石頭過河，只可能出現在現實倒逼之後，出現在“被焦慮”“被思考”“被推行”“被實踐”之後，而不是在之前。

那麼，不妨來清點一下1949年中國的各種條件。

也許至少有以下三點：

資源

沒有證據表明紅色中國建立之初就一心反市場。依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裏的設想，民族資產階級是國家的一大重要支柱⁴¹，是五星紅旗中的重要一星。劉少奇、朱德、陳雲等都曾公開鼓勵工商業者發展資本主義，稱資本家是“朋友”，資本主義“有功勞”和有“進步性”⁴²。

41 見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人民出版社，1952年。

42 引自《劉少奇論工人運動》，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

當黨內另一高官高崗為此向劉少奇發難，毛澤東堅決站在後者一方，沒給極左論調什麼機會。

後來的事情卻出人意料，讓他們一再手忙腳亂。

商業市場風險大。由於商業投機勢力囤積居奇哄抬物價，從1949年到1952年全國由主要是糧價帶頭，曾鬧出四次物價的嚴重失控，波及五金、化工、建材、日用百貨等領域，其中上海1950年2月的米價比上年同期高出六十倍。在這種情況下，各種商業投機更加活躍，五星之一幾乎半成災星。儘管1953年糧食豐收，城市人口不過稍增9.3%，但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等地仍出現糧市斷貨。河南省上千人聚集排隊搶購成為常態。江蘇省爆出萬人上街請願抗議的壯觀⁴³。一群群饑民鋌而走險揭竿而起的前景逼近目前。

金融市場風險也大。以上海為風向標的銀元投機從1949年起一再震盪全國，使通貨膨脹如脫韁野馬，人民幣迅速貶值。當局最初也想採用市場手段，但在上海一天拋售十萬枚銀元也不管用，水泡都沒砸出一個，最後只能加大行政干預，如凍結存款，禁止私商的金銀交易，在上海、武漢、廣州等地抓人封門，天津和北京一度恢復的證券交易所也隨即奉令關閉⁴⁴。聯想到國

43 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中共黨出版社，2011年。

44 見武力《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上冊)，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

民黨政府在1949年前無力回天的金融混亂，聯想到當時平均物價較抗戰前上漲3492萬倍，被《商務日報》驚呼為“經濟總崩潰”，新的當政者肯定有幾分感同身受，暗地裏倒抽一口冷氣。依臺灣史學家沈雲龍後來的說法：那次政府的金圓券危機“是大陸沉淪的主因。”⁴⁵

土地及涉農市場當然更有潛在的大風險。略知國史的人都清楚，困於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歷代農民造反和皇帝改革的一大主題都是“均田”。這證明土地兼併是一再發作的社會頑症，也是這個國家最大的亂源，故孫中山一直把“耕者有其田”列為政綱要點。國民黨的核心理論家陶希聖說：“中國全國耕地50%以上是佃田，所以地主和佃戶的階級現象很是可驚。”“這不但是我們自己所熟知，也是許多歐美人的調查所證明的。”⁴⁶其實這與共產黨的評估相當接近⁴⁷。一部中國現代史幾乎就是饑荒史，就是土地兼併的後果史，造成“流民千萬”“不絕於途”，匪禍遍地，叛軍四起。沒有印度、中東、非洲式的宗教鎮痛和神學維穩，順民一轉眼就是暴民，流民太容易轉化為流寇，成為嘯聚山林武裝割據掠州

45 轉引自吳相湘《王雲五與金圓券的發行》文，載臺灣《傳記文學》第36卷第2期，1980年。

46 引自陶希聖《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嶽麓書社，2010年。

47 共產黨方面估計1949年前中國有三億無地或少地的農民，佔農民的大多數。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

奪縣的廉價人力資源——稍有頭腦的帝國朝廷都清楚這一點⁴⁸。不可樂觀的是，作為再一次“均田”，紅色中國雖以鐵腕糾正兼併，實行土地改革這一“地理和歷史的判決”（黃仁宇語），包括制止有錢人不惜撿荒的屯田待沽（有點像今人炒樓盤），但土地買賣隨之死灰復燃，特別是高利貸再現吞吸土地資源的魔力，不能不讓人警覺。商戶們想賣個好價錢，不過越捂盤就越漲價，越漲價就越捂盤，再正常不過的市場心理，再正當不過的經營獲利之心，很快就讓城市拿不到糧食和棉花，供應警報在全國拉響。這也使涉農市場的脆弱性暴露無遺⁴⁹。

……

由此看來，市場經濟不是那麼容易玩的。

國共兩黨在大陸都玩得不順，甚至很難看，不是崩盤，便是急退。這後面的重要隱情，也許是中國此時的市場相當特殊。流通在這裏的主打商品，不是沙發、手錶、女式手袋、貂皮大衣、商務車、iPad、任天堂遊戲軟體……而是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比如糧食。一個積貧之國供給不足，生產力水平低下，在國際封鎖環境裏幾無迴旋餘地，時時處於市場休克的臨界點，要命的必需品無法承受價格動盪——這種動盪在一般情況下不過是市場經濟的應有之義，是市場經濟的正

48 參見池子華《中國近代流民》，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

49 見《陳雲文選》第2卷有關文章，人民出版社，1995年。

常現象，在非必需品領域也許不妨聽之任之，等一等，再等一等，以待市場的自動修復。但此市場不是彼市場，當年市場不是眼下市場，發達國家市場不是貧困國家市場。在必需品不足的特定情況下，任何價格的小波動都能鬧成經濟海嘯，都會暴增貧富差別的傷害性，把國家一次次逼向傾覆。

一個更需要賑災粥寮的國家，一時還承受不了資產階級成長的健身館與運動場。可惜人們以前並不明白這一點，一直沉迷於“地大物博”的民族自豪感。人們也很少看到真相的嚴峻，只是在政治宣傳品中看到鶯歌燕舞和糧山棉海，看到新女性駕駛拖拉機奔馳在廣闊田野——社會主義祖國真是美好和富饒。即便是接觸機密文件的官員，要在一大堆套話中淘出真話，在一堆捷報中嗅出警報，也殊非易事。很多革命電影更像在豪宅區搖着小旗子導遊，一旦展現“萬惡的舊社會”，反動派的錦衣玉食、豪門大宅、燈紅酒綠、香車寶馬、美式軍裝和吉普、女人的蔻丹唇紅和珠光寶氣……往往被導演拍得特歡勢，特來勁兒。於是羨慕嫉妒恨焚燒於內，觀眾們對反動派大為痛恨之餘，在階級覺悟大大提高之餘，覺得中國的蛋糕就在那裏了，只要把它分勻就是。

事實上，中國並無那樣的蛋糕。費孝通一直反對把中小地主描寫成“養尊處優，窮奢極侈”的虛假形象⁵⁰。楊奎松在詳考史料後指出，

50 見費孝通文《地主階層面臨考驗》，載《鄉土重建》集刊，上

除極少數富豪之外，中國鄉村的“剝削階級”其實也多是粗布雜糧、節衣縮食、大字不識的饑寒者⁵¹。孫中山更是早早斷言：“中國人通通是貧，並沒有大富，只有大貧小貧的分別。”⁵²顯然，那些窺探奢華的“主旋律”電影，那些下意识樂見這些宣傳的觀眾，其主觀動機另說，至少是超前地想像富貴和學習富貴，在客觀上無視中國與發達國家的真實差距，模糊了中國的國情。

這個國情包括：

一、中國人均可耕地1.6畝，僅及美國的六分之一，不及全球平均數的二分之一，可謂“地”不算大。

二、中國平均降雨量不到日本的一半，至1949年平均糧食畝產才154斤，全國人均糧食420斤⁵³，扣除工業用糧，畜牧用糧以及生產留種，再加上脫殼去皮，勉強餬口都不夠，因此“物”也不可謂博。

三、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向西方列強支付戰爭賠款十數億兩白銀(含利息)，而當時政府國庫

海觀察社，1948年。

51 見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52 引自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文，載《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1986年。

53 1949年中國平均糧食畝產為77公斤，全國人均糧食為210公斤，見《中國統計年鑒1949—2012》，中國統計局，2012年。

歲入不過零點八億兩⁵⁴，僅為一個零頭，於是戰敗賠款是大放血，蒙受竭澤而漁和敲骨吸髓，生生地讓中國財政休克了近二十年。

四、更有幾十年的對外戰爭和國內戰爭，國際冷戰時期的外部經濟封鎖，包括1950年代初由四十五個國家聯手的1700多種物品的對華禁運……僅此幾條，大概已比以色列人、美國人、英國人叫停部分市場自由時的情況更為險惡，困難也要持久得多。

市場自由當然是個好東西，眼下的地球人都知道。

但它在當年中國的一再難產，顯然不僅僅是認識問題，更像是困於一個每天能不能塞飽肚子的懸問——至少在紅色中國的早期是這樣。

文化

曾看過一部臺灣電影《黃埔軍魂》，發現裏面主角都英俊而堅毅，一腔熱血獻身革命，團結友愛，艱苦奮鬥，見義勇為，全心全意報國愛民，對日抗戰英勇不屈……其價值觀與大陸影片表達的完全一樣。只要把臺詞裏的“長官”換成“領導”，“上峰”換成“上級”，這樣的影片想必也能在大陸獲獎。

54 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

“升官發財請往別處，貪生怕死莫進此門。”當年廣州黃埔軍校大門上的這一對聯，哪怕貼在今天的大陸黨校，恐怕也讓人吃驚不已，感慨萬分。

正是從影片和對聯開始，我發現臺灣文化的老底子其實很紅，發現中國人曾全民性地分享過一種紅——當然是廣義的“紅”。說起來，這種“紅”的更早源頭遠在歐洲。彌爾頓謳歌均富，伏爾泰詛咒富豪，盧梭倡導人生而平等的神聖天道……一個個都像是草根迷和“平等控”。如果說他們恍若蘇維埃宣傳幹部，勿寧說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在那時的歐洲相互交疊，差不多是親兄弟或表兄弟，相像而且同根，比方說都有基督教的精神背景。區別也許在於，前一脈如德國學者韋伯(Max Weber)所言，勤勞節儉，精於計算，井井有條，其“入世禁慾主義”的“天職”風格或有新教倫理的胎記⁵⁵；後一脈則傳入工會和《國際歌》，更多一些教友平等、教產公有、扶危濟困、關懷天下的記憶依託。韋伯只說了前半。他注意到早期的老闆、經紀人、技工多是新教教徒，卻未注意早期共產主義者也常披教袍。最早以《太陽城》設計共產主義的托馬斯·康帕內拉(Tommas Campanella)曾為修士。最早以《烏托邦》倡導社會主義學說的托馬斯·莫爾(St. Thomas More)，曾被羅馬天主教會封為“聖

55 見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徒”。雙方的新理論中都無不透出聖訓意味，迸放出聖戰者的理想激情。

中國人遠在萬里之外，對基督教本就陌生，對遠方的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更不容易看明白。哪怕人家後來已分灶吃飯，這裏的左翼作家引兩條自由主義格言，或右翼教授飄一段共產主義語錄，仍是尋常事，不會被指責為掉包蒙人。反正都是反封建和反賣國，學子們聽演講跑錯了場子，串燒三五派的，也不一定聽不順耳。在這種氛圍裏，無論左派右派都是新派，都有把欄杆拍遍的憂國風格和救世情懷。嚴復、梁啟超、張東蓀、胡漢民等名流都客串過社會主義⁵⁶，構成了“民國範兒”的另一面。有頭有臉的社會精英，特別是讀過新學的，啃過洋麵包的，哪個沒有幾分“紅”？哪個不是心靈淨化和悲天憫人並且時不時嫌富愛貧一把？戴一塊金表如不內心忐忑，遇到乞丐如不面露悲容，都是說不過去的。不為“勞工神聖”的遊行口號鼓掌，也是有點 out 的。那時沒有百年後華爾街公然打出的口號“貪婪就是好”，沒有這種瘋子和二貨，倒是有“紅色的三十年代”熱遍全球。少年蔣經國也參加俄共。少年李登輝也參加日共。科學界大腕扎堆的

56 如嚴復在《原強(修訂稿)》批評資本主義在解決貧富差距方面，“雖欲平之而終無術矣”；梁啟超在《歐遊心影錄》中認為蘇維埃“精神畢竟不能磨滅”；張東蓀撰文《我們為什麼要講社會主義》；胡漢民在廣州開設“社會主義倫理學”課程。

英國“劍橋邦”，無論是皇家學會院士(貝爾納、魏丁頓、李約瑟等)還是諾貝爾獎得主(布萊克特等)，都是清一色左營鬥士⁵⁷。世界上最牛的藝術家畢卡索是法共黨員，世界上最牛的科學家愛因斯坦同樣親共——直到1949年5月，他還在《為什麼要社會主義》一文中盛讚“計劃經濟”⁵⁸。

在這個意義上，更廣義的毛澤東“群發現象”其實遍及中國乃至全球的知識界，特別是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絕大多數知識精英都不乏文化雄心和革命理想，都是“文化”加“革命”的鬥士，無不希望通過心智啟蒙再造國魂，實現“新民”“立人”“大寫的人”“最後之覺醒”“世界大同之偉業”——直到激進主義熱能在後來的“文革”中消耗殆盡，烏央烏央的經濟動物代之以興。

1937年後的延安被奉為紅都，寶塔山下陽光蕩漾。雖然大家窮得只能開荒和紡線，窮得一個人瘦毛長，但仍是一個強大磁極，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投奔者。其中不乏夢幻翩翩的小資。他們不過是衝着法語和俄語去的，衝着黑格爾和普希金去的，衝着自由戀愛和廢除多妻制去的，衝着版畫、話劇、手風琴以及週末舞會去的，衝着官兵一致和各種民主生活會去的，衝着“徹底打倒

57 見劉禾《六個字母的解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

58 轉引自《外國歷史名人傳》(現代部分)上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

孔家店”和月光晚會上暢談世界理想去的……較之於蔣介石提倡“尊孔讀經”，較之於國統區內上海、漢口、廣州等地的禁舞今⁵⁹，他們也許覺得高原上的革命更像革命，更前衛，更浪漫、更西方範兒，更有現代主義風格——“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的新生代要的就是這一口，要的就是這種精彩人生，不是幾塊破光洋。

雖有一些雜音傳出，如王實味和丁玲事件⁶⁰，但延安總體上的清新形象，使其精神優勢逐漸明顯。沒有全國的輿論掌控，不可能有央視、央廣、巡迴報告團以及富麗堂皇的各地紀念館，但延安輕易贏得了美國駐華將軍史迪威的大加讚賞，被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以及外交官戴維斯、謝偉思、卡爾遜等一再辯護。相比之下，倒是“國民黨”常被西方媒體譯為不無老派意味的 Nationalist Party (民族主義黨)，與西班牙佛朗哥的“民族派”很容易混淆，在全球政治譜系裏略顯黯淡。當這個掌控主流宣傳機器的黨在1948一年內失去90%黨員⁶¹，當赤化投共的國民黨高官子女

59 見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

60 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節有感》於1942年受到政治批判，其中王實味被定為“托派”，於1947年的戰亂轉移中被處死，遲至1990年獲平反。

61 據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組織形態》，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此書被《亞洲週刊》評為當年十大好書之一，被臺灣學界稱為“意識形態最為淡化”的作品。

如過江之鯽，一場文化之戰差不多已提前結束。

剩下的軍事較量，幾乎只是棋局收官。

作家陳愉慶對我說過她爸：英國倫敦大學都市計劃專業博士，那個保護北京古都建設“梁陳方案”的作者之一。1949年5月受同行之邀，他已買好經香港去英國的船票，並且一直緊閉大門，用木棒一類死死地頂住，阻止傷兵和流寇的騷擾。這一天早晨，門外反常地安靜，讓他不免幾分疑惑，打開門一看，原來是解放軍已經進入上海，黑壓壓的一大片全在街道兩側過夜，被雨水淋成了落湯雞。他有點不好意思，請一些官兵入家避雨和休息，但對方堅決不從。他回家燒了一大鍋薑煮肉湯，想讓官兵們散散寒，但對方還是不從，說他們有紀律，決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看着這一張張雨中的面孔，博士一時語塞，只是發現自己眼潮了，發現自己流淚了。他根本不明白這一刻自己怎麼了，為何會在千頭萬緒之際，把出國船票決然撕掉。

學者黃平也對我說過他爸：作為一位解放軍長官，隨部隊渡過長江以後繼續南下。有一天是司機在夜裏看不清路，跑錯了道，待長官一個激靈醒過來，發現天已微明，周圍全是疲憊前行的大軍，不過細一看卻差點嚇出尿來：原來都是荷槍實彈的國軍。讓人大跌眼鏡的是，對方不但不開火，不但不抓俘虜，面對一輛孤零零誤入敵陣的汽車，一片寂靜之下竟紛紛把槍械高舉頭頂，

或搖起了早已備好的白布。大步南撤的政府軍，好歹也在抗日戰場上出生入死過，眼下的戰鬥意志垮到如此程度，讓人難以置信。找一個俘虜問問，才知他們的將軍見戰況不利就已棄兵而去，既是群龍無首，這仗還怎麼打？

……

事情到此當然已無懸念。

一個新中國就是這樣排山倒海氣勢如虹地到來了。“人間正道是滄桑。”毛澤東此刻不可能還有別樣的心情，哪還會有摘牌卷旗的道路自疑？“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毛澤東語)。”隨他一路走來的勝利者們和狂歡者們，還可能相信世界上有創造不了的奇跡，還有什麼辦不成的事？

制度傳統

在農村時，我發現農民的言語多來自戲文和說書，說起道理來總離不開曹操、諸葛亮、林沖、宋江、劉伯溫、包公、李元霸、周天子……與新式學校沒什麼關係，與西方學科更沒關係。聯想到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也常提及《三國演義》與《水滸傳》，便不難理解傳統的深遠與頑強。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場以農民和文盲為主體的革命，似乎根在戲臺與書場，透出了三千年來民間藝人嘴裏的大葱味或紅薯味。

不少知識分子對此不屑一顧。這些人熟知西

方觀念，如今會用電腦，會開汽車，會喝卡布奇諾，只是有時候辦不成實事——比如運作一個住宅社區的業主委員會。照理說，眼下買房子能拍得出數十萬乃至數百萬的，不會是等閒之輩，一般都有高學歷和高收入，是記者、教師、商人、工程師、醫生、官員中的成功者。但他們在一個智慧密集型的精英區，簡直是應該首先民主和自由起來的解放區，不是吵翻天，就是紛紛躲，不是獨斷專行，就是率眾鬧場，最後可能還是求助於街道辦事處的某位大嬸，或被一個菜販子出身的管理員玩弄得團團轉——這樣的例子時有耳聞。別說行政效率，他們有時連一個小會都開不好，其組織能力不及傳統的幫會和宗祠。

其實，在中國組織幫會和宗祠不難，組織業主委員會就是難，常常很難。這是因為業主委員會雖是微民主，但所需的投票、代議制、動議程序、少數服從多數等均是新事物，照抄自西方，在很多時候水土不服；倒不如幫會和宗祠，有個老大就行了，是靠武力還是靠年齡當上的都沒關係。大家都習慣於聽老大的，齊刷刷地跟着走。

事情似乎簡單得多。

作為中國現代史上最初的一次民主試驗，1913年的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差不多就是一個高端的“業主委員會”，受四萬萬業主委託，挑選與約束袁世凱這樣的管理員。他們選票寫了不少，文件下了不少，唇槍舌劍吵了不少，卻沒多

少實效。管理員把手槍往桌上一拍，大家只能作鳥獸散，各回自家老宅，寫的寫詩詞、收的收小婆、再不濟便落草為寇。也許正是痛感這種華而不實，不耐煩這種性價比太低的形象工程，後來的革命領袖遂另起爐灶，痛求組織和紀律，痛求決斷和統一，要的是鐵血團隊，臉上逐漸多了些嚴峻表情。從孫中山的“以黨建國”和“以黨治國”，到蔣介石的“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到毛澤東的“黨的一元化領導(包括支部建在連上)”……西方式民主逐步淡出，如肯德基來中國開店，最終賣起了豆漿油條。

一個“黨”，一個統國之黨，意味着中央集權和強勢政府，不能不讓人想起某些祖宗成法，不能不讓一些草民情不自禁地山呼“萬歲”，輕車熟路地把官員稱為“父母官”，把領袖叫做“紅太陽”和“大救星”。這種現象被一些學者斥之為“官僚專制”(王亞南語)、“專制主義”(顧準語)、“黨天下”(余英時語)、“官家主義”(吳思語)。面對這一東亞之域龐大的陌生物，西方學人當然更不習慣，給不出一個精確說法。作為歷史辨識的依據，他們都熟悉民主，或說他們的城邦民主。古代歐洲小國林立，數以千計的城邦(Polis)和類城邦各自規模多如中國的鄉鎮，最大的雅典也就三十萬人，因此王子和公主也就是多如牛毛的鄉官眷屬或村官子女，以至在民間故事裏要多少有多少，印在撲克牌上隨便

玩。混居在這裏的移民們沒有族長來管事，靠肌肉一定高下也太累，有大事只好去廣場上公議(奴隸、女人以及鄉下人除外)，吆喝幾聲，辯論一番，確有公開化的實效和方便，似乎也只能這樣和應該這樣。與此同時，西方學人也熟悉他們的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等大多獨立於官府之外，有時甚至凌駕官府之上，叫板國王，頒佈法律，審判罪犯，發動戰爭……但中國的和尚和道士何曾有這等威風？就算香火錢積了不少，給他們一人十個膽，他們能開設法庭隨便拿人入刑？能發動一次次旌旗蔽野的大軍遠征？能就稅收、徵兵、立法等事務去王宮或督府那裏插上一腿？自郡縣制和大一統在秦代成形，“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中國老百姓決不會把這一流行語的主詞，換成什麼五品道士或紅衣和尚。

“和尚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或“道士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這些話肯定不算人話。

不知是強勢政府擠壓了其他社會組織的空間，還是其他社會組織太弱，反過來誘發了強勢政府應運而生和一路走強。後人很難在中土找到多元化結構遺跡，找到一種公民議會、教會、貴族團、總督政府等“多權並立”的政治圖景⁶²，

⁶² 西藏和新疆的情況有些例外，其宗教力量的強大狀況較接近歐洲，應予另說。

挖地三尺也挖不出“元老院”或“教廷稅”的基因。既如此，諸多辨識依據失靈，一份中國的陌生在馬克思那裏只能是“亞細亞生產方式”。在黑格爾和韋伯那裏，它成了“家族式國家”。在費正清那裏，它是“施仁政的專制”。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那裏，它先是很壞，後又不壞，在2012年北大演講中他甚至語出驚人：“我以為在西元前三世紀，中國已經存在了一種非常穩定的所謂現代性制度，而歐洲國家，比如說法國和俄國，它們直到十八世紀才得以實現。”⁶³——這倒十分接近十八世紀歐洲以伏爾泰為代表的一大批“頌華”派人士，比如摩萊里(Morelly)在《自然法典》一書裏對中國式“強大政府”的心馳神往，對公有制、科舉取士、宗教哲學化的欣羨不已⁶⁴。法國(1791年)、德國(1800年)、英國(1847年)取法中國模式，面向全民開科取士，以取代賜官制和貴族世襲傳統，就發生在那一段“中國月亮最圓”的思想氛圍中。

這裏的或褒或貶，都還有待討論。其差異後的認識背景與理解動力耐人尋味。這一份中國陌生傳統的成因何在，更是一個迄今為止令人生畏的歷史謎團。李零放眼羅馬、波斯、秦漢中國等，認為歷史上的專制主義“是所有大國的特

63 網址為：http://pkunews.pku.edu.cn/xwzh/2012-10/19/content_254788.htm。

64 引自摩萊里《自然法典》，商務印書館，1982年。

點”⁶⁵，似是規模決定論。美籍學者魏特夫(K. A. Wittfogel)把“東方專制主義”視為“大規模治水”的產物⁶⁶，似是地理決定論。法國學者孟德斯鳩(Montesquieu)還說過：“生活在炎熱氣候中的人們，其軟弱性使他們經常淪為奴隸……在亞洲普遍有這樣一種無法擺脫的奴性精神。”⁶⁷這就有點氣候制約論的味道了。還有些人強調資源人口之比，認為強制“均田”、打壓“豪民”、削藩鎮、除門閥、週期性的統一調配資源……一次次危機都成為強勢政府的再生機制。換句話說，這一類大手術似乎只有官家才做得了，只有權力集中才可實現足夠的社會動員，一如西方社會有時也需要“緊急狀態法”——不過這些討論有點遠。

無論如何，“天地君親師”或“天地國親師”，是數億中國老百姓在家中供奉的神龕牌位，是家神與國教的結合體，是傳家寶。“百代都行秦政制”，是毛澤東的讀史體會。一個厚積數千年的制度傳統在這裏了，不論外人褒也好，貶也好，含糊也好，不含糊也好，相應的心理、習慣、理念、歇後語、戲文、知識典籍反正堆積在這裏了，幾乎進入國人的骨血，形成了意識和

65 見李零《讀〈動物農場〉》文，連載於《讀書》雜誌2008年第7至8期。

66 見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對於極權力量的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

67 見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商務印書館，1961年。

潛意識的巨大存量。經歷一百多年的南北朝、一百多年的五代十國、二十多年的民初軍閥混戰等數次國家大分裂，這個制度傳統不斷在浴火中重生，表現出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也成為穩定社會、發展經濟、繁育文化、應對外患的有效工具。在很多人眼裏，如果它不是最好的工具，就一個小農人口大國而言，至少是諸多壞工具中不太壞的工具。史學家錢穆等一直堅信，看破集權制的沉痾痼疾誠然重要，但若把漢武帝、唐太宗等也視為獨夫民賊，將謗木(意見箱)、揭貼(大字報)、諫官(專職反對派)、封駁(監督皇權)、相權(內閣制)、集議(民主協商)、三權制衡(中書省決策，門下省審核，尚書省執行)等統統視為“專制”甚至“獨裁”，那一定是囿於某種西方的偏見⁶⁸，相當於沒穿過“民主”燕尾服就自以為一直光屁股，沒吃過“自由”三明治就自以為一直啃泥糞。說給傻子聽，中國一千多年的經濟領先優勢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初⁶⁹，一個歷久不衰的農業超級大國，不可能只是愚昧和殘暴的產物。

錢穆並不否定辛亥革命，並非不知集權制在宋代以後的嚴重衰變。不過，哪怕錢穆等學者所懷念的善政早已流散，傳統正退化成一片腐泥，

68 見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

69 參見貢德·弗蘭克(Andre G. Frank)《白銀資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

革命也只能從這片腐泥開始。馬克思說過人可以創造歷史，但他也承認人並不能為所欲為，只能在既有條件下創造歷史。後人別說用幾個口號消滅本土的文化與制度，就是一心保持自己的潔癖，在實際生活中踩高蹺式地避開它也大不易。

1964年開始的“全國學習解放軍”運動，不過是社會組織軍隊化，亦即中央集權和強勢政府的高峰表現，在某種程度上相當於一種次級“緊急狀態法”的實施。當時軍事化用語充斥全社會，讓人無不感受到“暴力壟斷權”(韋伯語)，想起這些學人對權力本質的解釋。工業和農業是“戰線”，教育和文化是“障地”，青年人組成了“突擊隊”和“尖兵”，鼓動成了“進軍號”，批評成了“萬炮齊轟”“拿起刀槍”以及“殲滅戰”……好些基層生產組織乾脆以“營”“連”“排”來命名。草綠色軍裝更成了紅衛兵的標準制服，呼應了“戰鬥隊”“司令部”“軍團”一類組織命名，成為了全國性軍事管制的形象預告——1968年至1972年的全國性軍隊“支左”介入和當家主政，後來果然接踵而來。不同於孫中山和蔣介石，指揮過百萬勝利之師的毛澤東，對戰爭年代肯定充滿了美好回憶，最能找到效率的感覺，最能找到精氣神。讓解放軍換裝為紅旗領章和紅星帽徽，更顯露出他對紅軍風格情有獨鍾，與他後來重提“供給制”和“全民武裝”一脈相承。當中學女生宋彬彬在1966年夏

天在天安門給他戴上紅衛兵袖章，他不滿對方的名字太文弱，不禁脫口而出：“要武嘛。”

此時的中國，在國際外交中空前孤立，與美、蘇、印、日等緊張對峙，在國內是政治升溫與經濟復蘇的壓力重重。如果此時的毛澤東心頭浮現出紅軍的身影，浮現出天際的滾滾烽煙，浮現出千軍萬馬橫掃南北的如臂使指，大概不是讓人特別難以理解。如果他從前人的經驗中尋找制度工具，最終找到了兵民一體的“人民戰爭”，卻沒有找到城邦民主和政教混治，沒找到很多學者愛好的“多元化”，大概也是尋常。

中國是他最大的現實，也是他最大的資源。

他不是印度或日本的總統，更不是美國的總統。

烏托邦的有效期

那一年夏天我與我哥南下，去湖南省西南端的一片山區尋找我二姐。“文革”武鬥風潮中的交通時斷時續，連郵車也有三沒四，我已很久沒得到她的消息。

搭便車，長途步行，又搭便車……我們在炎熱的沙石路上烤了整整三日，大汗淋漓進入江永縣城，找到二姐的一個熟人，由他引路連夜上山，至半夜才來到樹林裏幾個人字形草棚。數月前，二姐與一夥知青朋友不願回城吃閒飯，又看

不到國營農場的希望，借政府癱瘓之機，結夥來這裏建立自己的“太陽城”(二姐語)。他們實行一種準共產制，自由聯合，均享所得，在一片荒山裏披荊斬棘，搭棚，打柴，開荒，播種，養豬——那天夜裏她就是找豬草去了，在我們抵達許久之後才有一線腳步聲由遠而近。親人在星光下相見，三個人都只是模模糊糊的黑影。

我在這裏待了幾天，結識了“太陽城”堅守到最後的幾位城民，陶世普、何清華、易宇欣、石茅等，直到山下的民兵奉命前來轟趕，一把火燒掉了草棚。在後來一些回憶文章裏，當事人認為他們的壯舉終結於外來暴力，記恨於當時新成立的縣革委會——這當然是我目擊的事實。但他們漏掉的是，在民兵前來放火之前，這個烏托邦實際上瀕臨潰散，大部分人已陸續下山，有的流向城市，有的返回原來所在農場，民兵施暴不過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也許，最初的理想燃燒過後，勞累不會太愜意，孤寂不會太愜意。未來的生計(收成不可樂觀)、成家(心上人不知何處)、樂趣(連電影也看不到)都讓很多城民目光發虛。理想畢竟不能當飯吃。詩歌與格言不是長效興奮劑。當借來的幾千元開辦費所剩無幾，小康共產主義的資金鏈中斷，他們的告別情有可原。

看來，理想是需要財務後援的。或者說，一旦取消了權力強制，自由人的聯合體至少需要一

定的資源保障，否則就談不上可持續性。

另一個烏托邦故事也發生在這個縣。我後來在當年知青劉培沛的回憶文章裏，得知瀟水公社白水大隊也有十幾位知青編織過自由夢，只是後來柴米油鹽接濟不上，於是等不到墾荒地上的秋天收穫，又一個“太陽城”人心迷亂，人去室空，一個新體制的存活期同樣止於半年左右⁷⁰。

陳益南的《青春無痕——一個工人的十年“文革”》一書⁷¹，則記述了“文革”中權力空白狀態下的工人自治，包括武裝起來的造反派如何維護交通，組織生產，打擊偷盜，義務管理監獄……有意思的是，這些義工往往困於兩條：或缺乏領導，或缺乏資金。更多時候是兩條都來了，忙乎大半天以後，發現沒人管飯，也不知該找誰，只好散夥各自回家。偉大的工人自治虎頭蛇尾，為時最短的只有三兩周。

說實話，我十分好奇這些民間自治體，注意過那些發生在內蒙、河北、四川、海南等地的青年試驗。正是看多了這些悲喜劇，我後來讀史便不免疑神疑鬼。巴黎公社的失敗就沒有什麼別的隱情？真像馬克思說的那樣，是因選舉耽誤了“向凡爾賽進軍”？是“以審慎溫和著稱的措施”不合時宜以及沒有“及時建立工農聯

70 見《故鄉·異鄉——長沙知青在江永》，江永縣政協文史委編，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

71 該書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2005年。

盟”⁷²？……“兩個多月”的時長似曾相識。我懷疑公社短命的更深原因，潛藏於人們的自由天性，潛藏於厲行平等的浪漫理想和烏托邦固有的規律特點。把領導人的工資統統降到普通人的水平，好是好，但只要一個趨利而別的傢伙不受懲處，其他人也就可能動心和跟進。沒有長官賞金和戰場紀律，好是好，但只要一個傢伙酗酒貪睡未受追究，其他人也就可能模擬同樣的放任。如果巴黎公社一舉沒收銀行資產，也許還能有財務充裕，多挺上一段，否則胡蘿蔔和大棒雙雙缺位，渙散、懶惰、放任、私怨、名利心、特權慾一類世俗病毒悄悄繁殖，一次可歌可泣的體制創舉，一場最為接近理想國的節日狂歡，最終肯定在劫難逃——在政府軍攻城的大炮轟響之前。

但願我的猜想不是事實。

革命是艱難的。“革命的第二天”（考茨基語）更難。就一般過程而言，革命總是始於推倒重來和大亂天下，主題是分蛋糕和搶蛋糕，因此你可以拆臺，可以鬧事，可以罷工，可以抗稅，可以吃大戶，可以危言聳聽，可以到處開倉放糧……但暴動並不會自動帶來繁榮和良治。一旦成了管理者，倉和糧就得靠自己管好，得精打細算細水長流。你不僅承擔着做蛋糕的全部艱難和繁雜，還得面臨一個世俗社會的全部慾望，包括

72 均引自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及1891年恩格斯寫的導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

一時沒法滿足的慾望，一時沒法全部滿足的慾望。革命所點燃的理想，那種對無限自由和絕對平等的想像，總是使後任管理者自我增壓。

人們就不能早早地深刻體會到這一點？就不能幹當前，想長遠，自覺地克服渙散、懶惰、放任、私怨、名利心、特權慾，永遠笑口常開和衷共濟親如一家？就不能奉獻不計得失、爭議不鬧情緒、律己不慕榮華、務實不避艱辛、不斷清除自己的低級趣味和狼鬥私心一閃念於是成為一個大寫的人？就不能求同存異顧全大局從而使烏托邦的保鮮期超過半年，超過一年，超過十年……讓世俗歲月長久處於激情做愛般的如醉如癡？自歐洲啟蒙運動始，自由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基督教革新派、無政府主義者都有過苦盡甜來之夢。“這是最後的鬥爭”——這不僅僅是紅色營壘才有的歷史目的論和文明進步觀。回望以往的奴隸制和酷刑，人們覺得今非昔比，道德與紡織技術一併日新，人性與機電發明同步日進，大家已處在道德進化的最高一階，正步入理性啟蒙的畢業典禮，離“人的全面解放”只有一步之遙。在這種普遍的樂觀情緒下，連無政府主義那種政治童話，也可以在書生群體裏一再發燒，引發認真的學術探索和社會運動。

即便有些人對人性仍有懷疑，對烏托邦提出警告，但通過教育與批評來解決以後的麻煩，成為各種保鮮期說明書上的注意事項，仍能堅定更

多人對全新社會的篤信不疑。

這種道德進化論的盲目自信，我們後面再來說。

在這裏，也許可提到儒家前輩的某些看法。面對戰國中期“楊”“墨”兩家的大辯論，孟子既反對前者的極端利己，反對“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斥之為“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可譯為現代語境裏的無公）；又反對後者無差序的利他，反對“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斥之為“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可譯為現代語境裏的無私）⁷³。在孟子看來，人是這樣一種糾結之物，只能在利與義之間，在私與公之間，取得某種相對平衡。不同的人不過是依情感差序的不同半徑，向外釋放或強或弱的仁愛。基於孟子的這一中道，後人當然可相信烏托邦的合理性——這種精神聚義不過是“兼愛”的燃燒和閃電，過去有，現在有，將來還會有；人們當然也可相信它的不合理性——這種君子國景象大悖“為我”的人慾與常情，過去長不了，現在長不了，將來也長不了。

儒家並非主張道德放水。“小人喻於利，君子喻於義”，“謀道不謀食”和“憂道不憂貧”……都是《論語》中高亢的美聲名句。孟子強調“捨生取義”“為仁不富”，也有頂天立地的人格造型。但他們對人的複雜性琢磨似深，理

⁷³ 見《孟子·滕文公下》和《孟子·盡心》，載《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

想之下不失現實主義的冷靜。進一步說，他們的冷靜在於，把修身與治世兩下相分，把精英與民眾分類處理，其重大道德責任只限於“君子”，對小人、百姓、“抱關擊柝”（打更）的小吏則網開一面，照顧他們“憂貧”和“謀食”之庸⁷⁴。這與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將道德苛求僅限於治國的“哲學家”們不謀而合⁷⁵，都是一種“抓上放下”“嚴上寬下”的思路。他們不會腦子一時發熱，把少數人的責任強加給大眾，把老百姓神化成統一品牌的愛心機器。

孟子見習過齊、宋、滕、魏、魯等地的政治，曾任職齊國數年為卿，想必對世情體會較多，對公共管理體會不少。他畢其一生宣揚仁義，但不會不知道仁愛並非萬能，“禮”的約束同樣重要。

什麼是“禮”？“禮”就是“施賞罰”、“別尊卑”、“禁暴勝悍”（荀子語），以制度對人心實行硬約束。說實話，我以前也懂這些，不過如小孩聽“結婚”，窮光蛋聽“厭食症”和“減肥藥”，都聽懂了，其實不是真懂。沒有實踐和感覺支撐的理解就是似懂非懂。這種狀態一直延伸到我在1990年代撞上一個以權謀私的哥們，一位翻臉的老友。多年的友誼毀在萬多塊錢

74 見《孟子·萬章下》，載《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

75 柏拉圖主張哲學家不得有房子、土地及任何財物，還應天天吃在“公共食堂”（all eat together）。見 *Republic by Pla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上。由於團隊參與者都是書生，奉行清流原則，不願走“紅道”或“黑道”，因此一個財務漏洞就讓大家犯了難。我們手裏既無暴力（警察、法院、或民間討債公司的打手），又無足夠金錢（使對方在罰金或賞金面前意志動搖），那麼對方不就活該趾高氣揚招搖而去？我們憑什麼逼他把黑錢吐出來？

接下來的問題：如果竊佔公款得不到懲戒，那麼團隊風氣豈不掉頭而下，這哥們和那哥們茁壯成長，直至整個事業呼啦啦倒塌？

正是那個夜晚，當翻臉者摔門而去，我久久未能入睡，終於明白了烏托邦的阿喀琉斯之踵。這話的意思是，道不遠人，道不避利，前人之說不餘欺也。烏托邦最缺的就是世俗利益的硬道理，是訴諸權力與金錢的管理工具：

或是以權力實施獎懲；

或是以金錢實施獎懲；

或是以權力與金錢並施獎懲。

——但這樣做下來的話，管理可以得到強化，差別、差序、層級、階級等不也就順理成章撲面而來？“自由人的聯合體”還有多少“自由”？將實現什麼樣的“聯合”？

事情似乎兩難。沒有金錢與權力就是書生過家家，缺失組織的可持續性——但金錢與權力一旦復位，烏托邦就不再是烏托邦，保鮮期就是腐變期。一個群體不再有理想的高飛，在最好的情

況下也不過是有翼的雞，雖有鳥的夢想，但不知還能否飛過一道籬笆。

“文革”前的中國也接近這種情況，一開始就陷入烏托邦之困，困於一個人口大國的治理手段短缺。一批造反者荷槍實彈闖進了京城，面對滿目瘡痍的一個爛攤子，要在緊急狀態下迅速實現強國，需要超強的管理和異乎尋常的社會動員力。但把所有的工具擺上桌面，就不難發現宗法缺位(族權廢止)，宗教缺位(神權幾乎廢止)，而更重要、更普遍、更難辦的則是金錢缺位。所謂資源匱乏，說白了就是缺錢，常處於左右支絀兜不住的困境。同步到來的條件是全球紅色文化讓錢的名聲可疑；集權制度傳統讓錢的效能退減……諸多因素在此疊加，“物質刺激”就只能是一條殘腿，進入戰略設計的概率實在太小。獎金、股權、地權、傭金、版稅、紅利、年薪制、專利費、財產私有制等這些正常國家行之有效的手段，統統不合用和無法用。連當時的行政處分和法院判案也幾無罰金一說，一大原因是：必需品分配僅能“保基本”，讓大家都罰無可罰。

也許明眼人都能看出：此時桌面上所剩的工具只剩下權力，或者說政治。這個國家只能比一般國家更多借助和依靠權力。政治的微笑化、鼓掌化、皆大歡喜化已不可持續。政治榮譽、政治安全、政治地位、政治權力幾乎成了唯一的分配品，是針對任何不服從者的唯一可剝奪物，相當

於唯一的社會操控槓杆。德國保守派學者施米特(Carl Schmitt)可能覺得這一切再正常不過。“政治就是一切。”“與政治有無關係的決定永遠都是政治決定”。⁷⁶他從來不相信書生們的自由浪漫，對國家威權一直情有獨鍾——這是自霍布斯以來另一路的西方鐵血傳統。

公權力通常是由官員來運作和承載的。從這時開始，無論人們對新社會的願望多麼美好，“突出政治”的逐步升溫無法避免，一個權力社會悄悄進入軌道，漸漸繃緊了公眾的神經，終於不幸應證了按德國工人運動理論家考茨基(Karl Kautsky)多年前的警告：工人有了國家以後，正如天主教成為國教以後，會有一個類似的“官僚化過程”⁷⁷。翻譯這句話：就有一個官權偏大、超大、獨大的過程。一直強烈批判“國家”的馬克思若地下有知，想必只能大感意外了。

看來，紅星烏托邦不會比十字烏托邦有更多幸運，不會比世界上任何一種烏托邦有更多幸運，也都面臨“革命的第二天”新一輪庸常的“還俗”(朱學勤語)，只是這一輪的“俗”與金錢關係較少——至少在表面上是這樣。

舊時代不曾有的麻煩終於陸續登場。

76 轉引自“Reading Strauss in Beijing” by Mark Lilla, *The New Public*, Dec., 2010。

77 引自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礎》，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1955年。

地位競升的兩種通道

把“文革”看成非理性的變態狂，一個大瘋子領着幾億小瘋子胡鬧，是一種最為懶惰的解釋。解釋者把歷史變成一堆精神病案例，可毫不費力地打發一切，卻不會給讀者增加任何智慧。

這些人似乎理解利益：比如能理解奸商的摻雜使假，理解傳銷團體的口號震天，理解毒販子的鋌而走險，理解豪門內爭奪遺產的陰謀與暗殺，理解期貨市場裏紅脖子們的捶胸頓足，理解那些舉着輸液吊瓶也要上陣血拼的賭徒，理解因為父親駕駛的皮卡不夠氣派於是假裝不識揚長而去的時尚女兒……卻不能理解“文革”。道理很簡單：他們覺得逐利很正常，利益最大化是人之常情，哪怕有些人做得出格，也屬於常人的一時迷糊——但“文革”不是這樣。

他們似乎也理解信仰：比如能理解教門裏的齋戒和苦行，理解功德心之下不惜傾家蕩產的周窮恤匱，理解信眾們的香火錢或“贖罪券”，理解衛道護法的大軍征討，理解教派衝突時的自焚殉教和人肉炸彈，理解一個和尚不慎踩死甲蟲後的長跪自罰，理解西藏高原上滿心崇敬三步一僕的千里長拜……卻不能理解“文革”。道理也很簡單：他們覺得靈修和拜神很正常，神學是對世俗生存的救贖，如果有些人行止過於極端，也屬於常人的偶然出軌——但“文革”不是這樣。

在他們的心目中，“文革”中大多數紛亂既與利益無關(不涉及工資和利潤)，也與信仰無關(有拆廟毀寺的宗教之難)，因此只可能是一堆精神病案例，超出了常識理解的邊界。

見過傻的，哪見過那樣傻的？

他們恰恰忘了，攀比與競爭是人性基本面之一。當人們的利益被一種平等分配體制鎖定，當任何人都不能在財產私有制取消後思富和求富，大富和暴富，誇富和炫富，新的“利益”便登場了，或說開始凸顯——政治榮譽、政治安全、政治地位、政治權力不過是新的麵包，隱秘的利潤和股權，同樣能引起斤斤計較。當唯物主義者們挾“上帝死了”的時代大勢，在高歌猛進的科學潮流下唾棄宗教，那也不過是關閉另一扇求富之門——天堂，地獄、六道輪迴、因果報應之類，作為宗教所許諾的彼岸獎罰，相當於麵包的期權，亡靈的保險受益資格。事情到了這一步，當生前與死後的利益都不容異動，那麼新的“利益”便是唯一的利益。換句話說，唯政治榮譽、政治安全、政治地位、政治權力構成市場流動性，勢必被公眾趨之若鶩。天下熙熙，皆為政治來；天下攘攘，皆為政治往。“文革”的熙熙和攘攘有何難以理解？

如果說逐利，這當然是一種非物態的逐利。

如果說利益最大化，這當然是一種非物態的

利益最大化——至少在政治權益可兌換成實惠前是這樣。

我們有什麼理由採取雙重標準，把這一些再尋常和再務實不過的逐利者，看作一大群瘋子？我們有什麼理由對逐利這一最基本的人權和最普世的生物性大驚小怪，然後對自己的逐利業績倒是津津樂道？

這事其實早已不算新鮮。法國學者鮑德利亞(Jean Baudrillard)已敏感到非物態的利益。比如在《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研究中，他認為所謂“現代”是以工業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霸權上升為特徵的生產時代，而所謂“後現代”則是一個由符號、代碼和模型控制的類比時代。在後一種處境裏，消費實際上已經超出實際需求的滿足，變成了“符號化物品”“符號化服務”中所蘊含的“意義消費”⁷⁸。另一個法國學者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沒走得這麼遠，仍對物質和經濟保持足夠重視，不曾把馬克思學說譏為“蒸汽機時代”的“拜物教”(鮑德利亞語)，但也對“文化權力”和“符號資本”備加關切⁷⁹。他們的思想焦點從物質移向精神，從實體移向符號，從生理需求移向心理需求，從使用價值移向意義價值。這當然較容易解釋當下的媒體社會，解釋

78 見鮑德利亞《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79 見布爾迪厄《關於電視》，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名牌汽車、名牌襯衫、名牌手袋、名牌月餅一類現象，解釋為何有些人哭着喊着就是“不要最貴的，偏要最貴的”。家住你隔壁的那哥們，花一千元買下一盒月餅，較之於二十元一盒的月餅，吃起來差不多，似乎買得很虧，但他大舉砸錢買下一堆精美包裝所帶來的體面感、愉悅感、階層認同感等，可能“比現實更現實”(鮑德利亞語)，比利益更像利益——據說這就是後現代社會的新法則，被傳統學界忽略。

非物態利益並非後現代專利，與經濟發達和物質剩餘並不構成唯一關聯。在物質短缺的年月，魯迅小說中的阿Q與王胡早就開始計較面子，計較一個咬蟲子的響亮度，為此一決高下大打出手⁸⁰。肥大蟲子所引起的榮耀之爭，一場窮光蛋之間展開的心理侵佔和精神屠殺，在這裏也是“比現實更現實”。在利益凍結的時代，因種種特定條件，“文革”也可以成為一個符號的大產地、大賣場、大股市——別無選擇的民眾心理需求悉數彙集於此，猶如過量的現金流入市，推動了一波又一波山呼海嘯的追漲殺跌，使各種政治符號的價位不斷飆升。這些符號若虛若實，不像物質財富那樣看得見，摸得着，容易算計，讓經濟學家們用不上方程序和微積分，但它們構成了當事人最真切的日常感受，同樣是可以佔

80 見魯迅小說《阿Q正傳》載小說集《吶喊》，浙江文藝出版社，2006年。

有的，流轉的，儲備的，剝奪的，對沖的，炒作的，分配的，壟斷的，繼承的，價位波動的……一個人只要稍有想像力，幾乎可把經濟學的全部用語掄上來，用於這個符號生產和消費的全過程，得出權力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系列恰當隱喻。

這些甚至不是隱喻，不過是實說，只是我們的一條舌頭被語言舊習切削，在經濟用語之外顯得詞彙太少。

一條紅領巾就是這樣的符號。

當年有的小學生為了得到它，不僅搶先擦黑板和擦窗臺，放學途中還眼珠賊溜溜地轉，太想撿到一個硬幣甚至一個錢包，去交給老師以示自己高尚無私——我就有過這樣的勾當。

有的孩子為了得到它，去老師那裏揭發同伴的劣跡，包括偷摘桃子、街頭打架、往女同學的抽屜裏撒尿，一心豎立堅持原則愛恨分明的自我形象——我的一位發小就是這樣成功的。

有的孩子為了得到它，在防空演習中拽住一個小同學，硬要對方趴下，見對方不配合，便一腳將其踢翻在地，自己再重重地壓上去，壓出了身板下一陣哇哇大哭——他覺得電影中的英雄掩護戰友就是這動作，自己萬萬不可放過勇敢一下的機會。

還有的孩子為了得到它，常去公園、廣場、街頭巷尾偵察巡邏，看一些形跡可疑的男女是否在偷偷拍照，是否在提包裏暗藏了發報機——他

們覺得來自臺灣和美國的特務一定鬼鬼祟祟，一定長得歪瓜裂棗，時不時向同夥打暗號，最終不可能逃脫自己的火眼金睛。他必須為革命一鳴驚人，讓老師和同學們從此刮目相看。

……

多年後的孩子們可能十分困惑：不至於吧？一條紅領巾，一個加入少年先鋒隊的資格，又不是什麼智慧手機或高考加分，怎麼就讓那些傢伙中了邪？一旦時過境遷，當社會出現了多元價值標準，有了其他領域裏的競比，比方看誰的滑輪鞋更時尚，看誰的搖滾唱得更酷，看誰的電子遊戲裝備更多，看誰的全家出國旅遊更high……一條紅領巾當然大失重。誰要是為它焦慮不堪，肯定被同學們覺得腦子進水。誰的父母要是抓肝抓肺地逼兒子寫上幾十份入隊申請，肯定被其他學生家長笑暈。不過，這個道理的另一面恰恰是：正因為缺失滑輪鞋、搖滾樂、遊戲裝備以及出國旅遊，紅領巾才會成為校園裏最重要的符號，最重要的人生增值，在生活中的相對權重大大增加，在感受中的邊際效應突然放大——那些小屁孩，即便沒怎麼“後現代”，還是會情不自禁地為之挖空心思千辛萬苦。

事情不可能有別的結果。

在這裏，他們通常會採用兩種競爭方式：

一，奉獻型競爭，如表現自己的無私(拾金不昧)，釋放自己的勇敢(義救戰友)，如此等等。

二，攻擊型競爭，不是針對自己的夥伴(揭發劣跡)，就是針對幻覺中的敵人(搜捕特務)，如此等等。

奉獻與攻擊其實是同一種競爭，用力方向不同而已，分別指向價值尺規的兩端，即自我造神和外在造魔。當事人們分佈在一個尺規的不同節點，一般來說都會下意識地向上攀登，尋找各種競升通道，眼睛死死盯住上位階梯，比如少先隊員，再往後是共青團員，再往後是共產黨員、先進模範……還有少年們視之為榮耀無比的參軍。每個階梯上還有細微的級差，讓人們不可懈怠，比如僅是隊員便可分為一般的和優秀的，優秀的又可分為年級的、學校的、區級的、市級的、省級的不一而足。

在那個盛產符號的年代，相對於太多競爭者，品牌資源的分配一直緊張。光是一個“同志”的稱呼，一份政治安全的分配，其競爭壓力就不會比人們在後來的市場化時代更少。我父親就是一個競爭中的落敗者。他努力地奉獻過，向災區捐款，帶病下鄉支農搶收，把兩間私宅無償捐獻給國家——但這還是不夠。他也努力攻擊過，包括跟隨潮流用大字報譴責自己的同事，那兩個在他之前自殺的“反革命”——但這同樣不夠。多米諾骨牌終於倒到他這一塊了，他可能已有直覺，家人們卻並不知情。1966年初夏，當我向他索要一份單位出具的家庭政審證明，他的表

情是尷尬的，慌亂的，苦楚的，夾有一絲討好兒子的媚笑。

沒有一份像樣的證明，我就不可能在學校裏加入紅衛兵，更沒資格參加全國大串聯，去北京接受領袖的檢閱。

我雖然還能活下去，但面臨身份符號的嚴重破產。

沒想到的是，他拿回的一紙證明上含糊其辭，連一個“同志”的稱呼好像都寫漏了，更沒提到他的功績和其他光榮履歷。那種冷漠得可疑的措辭其實已暗伏凶機，只是不為一個初中生察覺。

“這種證明有個屁用！”

我懊喪地把證明摔了回去，不無委屈地奪門而出，任他怎麼呼喚也決不回頭。事後想起來，一定是我當時的臉色很難看，冷冷的目光太刺人，在他心頭戳下了最後一刀。他肯定已預感到自己將成為運動的最新祭品。如果他有足夠的思想準備面對各種翻臉與惡言，面對批鬥台和拘禁室，但他拿什麼來面對家人的懊喪、恐懼、無望以及可能的抱怨？拿什麼來面對我，他最心疼的兒子——再一次在他面前摔門而去？事情還沒發生就這樣了，真到大難臨頭之際，天知道這位初中生會說出什麼和做出什麼！

對不起，父親。

我不止一千次想重返你的面前，不止一千次想重新接過那一紙證明，然後隨意一笑，說一聲

“沒關係啦”，再給你撓一撓背上的癢，或遞上一杯熱茶，讓你感受到家庭的強大和堅實。但我已不能夠。

直到身為人父，我才相信自己當年的目光攻擊不會是所有攻擊中最惡毒的，卻一定是最傷人的，與其他攻擊構成了合圍，足以讓一位父親在那天心碎——那是一個很多人突然消失的夏天。

全民聖徒化(上)

奉獻型競爭的結果，是全民“聖徒化”。

“聖徒”一詞在這裏也許不大合適，因為聖徒習慣於“自我立法”(康德語)，明心見性，替天行道，無須參與什麼競爭，更不會在意他人的臉色。中國人所熟悉的彭湃大概就是這樣。這位大少爺生於鐘鳴鼎食之家，即當時少見的大宅豪戶，自述家況是“被統轄的農民男女老幼不下1500人。”“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五十個農民做奴隸。”他從日本早稻田大學求學歸來，從自家開始革命，親自把田契分送給佃戶，見對方不敢要，便把他們召集起來，當眾燒掉所有田契，宣佈“日後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穀。”從那一天起，他戴上竹笠，光着腳板，帶着旱菸袋，用通俗的語言與農民交談，不久便成為當地農民運動的領袖。顯然，他走向革命並最

終就義刑場，既不是求現世的衣食，也不是求來世的福報，與任何利益沒關係。

如果說造反常有貧困逼迫的利益動機，苦行常有上帝補償的宗教背景，那麼二十世紀一批出身於豪門的無神論者，奮發蹈厲，救國救民，堪稱人類精神史上一大奇跡，表現出人格最可能的純度與高度。鄧稼先也是一例。身為北大教授之子，他在美國拿到核子物理博士後一周之內便匆匆回國，一頭紮進國家的原子能事業。他與楊振寧是老鄉、發小以及專業同行。較之於後者在美國的優越生活，還有一份諾貝爾獎的殊榮，他默默工作在戈壁灘上，過了八年啃窩頭吞鹹菜的單身漢日子，身受核能射線傷害，談不上什麼世界量級的理論建樹，當然是虧大了。只是二十多年後楊振寧訪華，問及中國的原子彈成功是否有外國人參與其中，他一時不便回答，直到對方在上海即將登機回國，才托人捎去一張紙條，竟讓對方淚流滿面。其實，那張紙條上只有簡短的一句：你所知道的這一切全係“國產”。

諾貝爾獎得主的淚水至今是謎。他揪住紙條時的淚奔，是哭老同學的一生清貧一生沉寂一路坎坷，還是哭自己至尊至榮卻永遠錯失了一個機會，還是哭舷窗外那一片正在下沉的熟悉山河突然模糊難辨？

百年中國充滿了太多淚水，佈滿了彭湃、鄧稼先這樣的精神之星，提供了一個古老民族成功

自救的閃閃注解。但理想與信念在任何時代都是稀缺品，借用前人“君子”之說，“真君子”以外不乏“仿君子”，還有“假君子”，如同星星之外有光暈，有黑暗，構成了更大的精神空間。“文革”主流宣傳的失誤之一，就是以為夜空中早已星星密植，儼如一塊白熾的LED發光板——事情當然就不大正常了。

我的一位羅姓插友，因略通平仄便自歎詩才埋沒，中年以後總是抱怨當年：他在一個小山村當民辦老師，負責四個年級共十幾個孩子，又當老師又當保姆還得種菜餵豬，那算是人過的日子？他砍柴時被蚊蟲叮咬得滿頭是包，挑水時滑到水塘裏差一點淹死，有一次在臥房裏還踩到蛇，遇到哪個孩子內急，褲繩打成了死結，他解繩結解出了自己一頭老汗，直到對方最終嘩啦一聲拉在褲襠裏……一位詩人的青春年華就拋擲在這種臭烘烘的氣味中。

從他的抱怨可以看出，他根本不願那樣做。如果他那樣做過，真真切切那樣做過，不是什麼理想和信念作祟，不過是被獎狀一類政治符號逼的——何況這些符號可能兌換成今後的某些實惠，比如招工回城。據實而言，他只是被一場聖徒化運動壓迫得喘不過氣來，每有一份奉獻，心頭便暗積一份委屈；做出的業績越多，委屈感就越強；直至形成一種越來越大的心理勢能，最終像堰塞湖一樣潰壩，滔滔抱怨一瀉而出。“我那時

候蠢得像一頭豬呵！”他眼下不能不這樣大罵。

但那時的他又能怎麼樣？人家老太太都在大雪天裏光着膀子出工，人家鐵姑娘不找到礦苗就決不結婚，人家知青夥伴為救一頭豬仔毫不遲疑地往糞池裏跳……他沒法不隨波逐流，終於做成了一個陌生的自己。

與他的情況相似，在通向“文革”的歲月裏，理想和信念噴薄而出，中國有千萬個王進喜在餐風宿露之地奮鬥，千萬個焦裕祿在淒風苦雨之時拼爭，千萬個雷鋒叔叔在街頭掃地推車扶老攜幼——我的同輩人哪個沒這樣爭先恐後過？“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熱潮席捲全國，人們看上去都是“顆顆紅心向北京”，都是“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特別是一些黨團員，依照公認的道德標準，他們的天職就是充當聖戰死士，奮勇當先，指哪打哪，決戰決勝，“一輩子吃下兩輩子的苦”，成為激勵民眾的行為示範。但潛在抱怨者肯定不是少數。他們也奉獻了，不過是被動員會、表彰會、總結會、現場會、報告會、講用會一類轟上陣的。一句流行語是：“國民黨稅多，共產黨會多。”當後者缺失了“稅”一類經濟手段，“會”就成為工具替代，成了權力運作的主要舞臺，社會各方心力交集的高壓區。哪怕是一個閑會，一堆車轆轤話磨牙齒，沒什麼實質內容，但坐席排序已是等級的高清顯影，口氣和表情已是權力的現場升壓，其實還是頗有內容

的。在旗幟、會標、口號、齊唱、領袖畫像所組成的嚴重氣氛下，革命潮流氣場強大，聲勢逼人。一次點名批評，一些受獎名單的宣佈，更不說當場生效的提拔或罷免，都構成了政治權益的動態性再分配。哪怕是臺上人的一個臉色，也能播下小情緒和微感覺，讓當事人明白自己的盈虧，接下來的被孤立感、被排斥感、被歧視感、被壓抑感將如何增減。

美國的蘋果公司的喬布斯曾有“現實扭曲力場”一詞，發現精神、氛圍、願景、領袖魅力可引爆生產力的奇跡⁸¹。如果他見證過“精神原子彈”(毛澤東語)在中國的巨大衝擊波，恐怕會更多幾分驚訝。還需要什麼物質刺激的解決方案嗎？一時間，王進喜、焦裕祿、雷鋒等英模效應熱遍全國，連酒鬼、潑婦、小偷、懶漢、爛崽都匯入了“六億神州盡舜堯”(毛澤東詩句)的道德滿堂紅，在思想改造的速成班畢業。1949年後的生產熱潮、學習熱潮、節約熱潮、技術發明熱潮、技能競賽熱潮、水利建設熱潮、捐金獻玉買飛機的熱潮、抗美戰場上殺敵立功的熱潮、打蒼蠅滅老鼠的文明衛生熱潮……都是在沒有獎金和股權的情況下實現的。有時拿一條毛巾或一個搪瓷杯作為獎品，就算是重獎了。上一次紅榜，就相當於董事會派送乾股了。勞動成了個人或團體

81 “現實扭曲力場(Reality distortion field)”是蘋果公司內部在1981年創造的新詞，用於描述靠精神力量打造現實奇跡。

的插臺賽，於是充滿體育競比的樂趣。貧困被更名為“樸素”和“磨練”，也成了驕人的心理資本。大會小會之下，民風改觀，民氣高漲，民心亢奮，聖徒化看上去已成為人民主權實現的標準風格和必然氣象，成為人類正義事業的無限活力。萬千國民都以義工或半義工的方式投入新時代，以殉道或準殉道的風格改天換地，豈止是“現實扭曲”，完全是現實魔變。連我的那位羅同學也響噹噹地混上了“優秀教師”，把村裏的娃娃一個不少送上了知識之途。他未必知道，正是像他樣的鄉村教師，大大降低了全國的文盲率，成為中國日後變身為製造業大國的重要條件——多年後的一天，一位外商對我說：東南亞的勞動力價格不到中國的一半，印度和孟加拉的價格更低，但他決定把工廠辦在中國，第一原因就是看中了這裏打工群體的能讀會算，綜合素質較高。

我把這事說給羅同學聽時，他眼裏一片疑惑。他不覺得自己與那些外商有什麼關係，與眼下的市場經濟有什麼關係。

如果聽懂了，明白軍功章也有他的一小半，他倒可能更加憤怒：“鬼佬發財，能給我一毛？”

但一個隱秘的故事就這樣發生，甚至不為千萬當事人所覺——無論這些人是高純度的君子，還是跟潮者或脅從者等低純度多數。據國際學界普遍接受的麥迪森(Maddison)數據，以實際購買

力的尺規換算，1950年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448美元，低於同年印度的619美元。但這個數據到中國改革開放開始前的1978年已達978國際元，超過印度的965國際元⁸²。麥迪森後來還認為，中國六十多年來的官方數據前偏低後偏高，若按不變價格計算，1978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的數據應向上修正26.7%⁸³，即反超印度的幅度更大。另據世界銀行有關數據，中國的識字率至二十世紀末已超90%，而印度的文盲率仍接近40%。1962年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反超印度，至1978年已約高於印度十年⁸⁴。由汽車、噴氣式飛機、萬噸輪、萬噸水壓機、“兩彈一星”等組成的初步工業化體系，不僅使中印兩國拉開較大差距，在世界上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裏，也不失為一份亮眼的成績單。

全民聖徒化(下)

“文革”結束前的近三十年經濟發展是急就章，粗線條風格，其中景和遠景的效果不錯，一到微距鏡頭下便問題如湧，少不了用風箱拉出來

82 出自英國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載《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新華出版社，1999年。

83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How Fast Has GDP Grown; How Big is It Compared with the USA?* by Angus Maddison and Harry X. Wu, 2007.

84 轉引自2009年第5期《亞太研究》雜誌。

的土產鐵錠，用錘子敲出來的雜牌汽車，用算盤扒拉出來的導彈軌跡參數。但中央集權和強勢政府的短處是民意上達難，長處是社會動員易，集中力量辦大事倒是不時得手。在某種意義上，這種窮人版和冷戰版的強國方案，一直使西方主流學界困惑和驚訝。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冷戰後歡呼“歷史的終結”，在其新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卻認為：“印度民主明顯的混亂和腐敗，常與中國快速和有效的決策形成強烈對比”⁸⁵。

比發展粗線條更為觸目的，如果置於高倍數放大鏡下，當顯現為一種群體心理的異化。但人們對此倒是很少注意。

似乎是印證“利弊相生”的老話，這種異化不過是全民聖徒化的B面，熱浪下的暗流。1957年後，隨着反右運動加劇全國性緊張，看似低成本/高效能的政治槓杆出現高烈度效應，撕開了一道道社會裂痕。競勝者們上紅榜，戴紅花，去北京觀禮，與之相反的是罰站、罰跪、遊街、上漫畫、掛黑牌、學驢叫、挨耳光、剃光頭、脫衣受凍、降工資、丟公職、勞動改造、遣送回鄉、被拘下獄……常常成為“插白旗”或“劃右派”“劃右傾”的具體落實形式，成為懲戒的各種新招。此時的榮譽分配，實際上已成權力分配，甚至權利分配——與各種物質利益開始掛

85 引自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

鉤。換句話說，如果說此前的奉獻型競爭大體上源於某種精神動員，由志士英模一類提供引領，那麼此後便更多出於強權威逼，不但“觸及靈魂”，而且觸及皮肉，羞辱和迫害足以令人驚恐。

事情正在一步步起變化。

有利益就有投資。有暴利就有投機。投機無非是向前多走了半步，滑入了投資的脫軌。一個政治股市的全面沸騰必然誘導大批投機者建倉做多，股價一路拉抬瘋漲，與真實價值嚴重背離。假君子本是生活中潛在的大數，本就鼻子最靈，一旦嗅出新的影子利益所在，拍胸脯、放豪言、大張旗鼓的調門便沒法不火爆，說假話越來越吃得開。你的指標高，我的指標更高；你的口號響，我的口號更響；你的業績感人，我的業績更感人……這種奉獻的口水化往往使真君子相形見絀，甚至成為彭德懷那樣的破產戶，蒙受“保守”“右傾”“右派”“反黨”等各種惡名。

很多暴動者在革命後尚缺乏足夠的知識技能，更未轉型為專業經理，甚至不知專業經理為何物，於是更容易在效忠上下注，使經濟活動全面政治化。這正是“大躍進”最大的風險。心存戰爭年代捷報頻傳的回憶，毛澤東當然不缺美國學者沃馬克(Brantly Womack)所說的“獨斷的樂觀主義”⁸⁶，以至他1956年就大膽提出“中國第

86 沃馬克稱之為“毛澤東政治思想兩個特點之一”，見其《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附錄2，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

一”的戰略目標，其抱負驚世駭俗；後來受蘇共赫魯曉夫“15年內趕超美國”的刺激，把不久前“50到60年”的時間表大大提前，銳減為“25年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⁸⁷，一心轟油門，截彎道，超載超車，盡早把美英列強甩到後面去，一吐民族圖強的心中惡氣。他批判以周恩來、陳雲為代表的“反冒進”，批判彭德懷等人的“右傾機會主義”……無不出於這種急於求成之心。

但毛澤東從來都是樂觀主義者，為何偏偏失手在這裏？一些黨史專家說他“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不熟悉經濟規律”⁸⁸，沒怎麼撓到癢處。一介書生變身為常勝的三軍統帥，變身為統戰高手和輿論大師，其看家本領就是邊幹邊學，以實踐為師，為何反被和平時期的煉鋼和種糧難住了？煉鋼與種糧，不是什麼高科技，不會比打仗更難學。這事很多人都幹過，幾百年甚至千多年前就幹過，在不用躲炸彈、不用吃野菜、要人力有人力、要時間有時間的情況下反而幹不好了，相關經驗高深莫測，有點說不過去。還有些黨史專家把事情歸因於他“出國太少”，不像周恩來、鄧小平那樣容易“接受現代化的新觀念”⁸⁹，更是經不起推敲的市井之議。鄧小平在

87 引自毛澤東《介紹一個合作社》，人民出版社，1976年。

88 引自《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中共黨出版社，2011年。

89 見金沖及《新中國的前三十年》一文，載《文史參考》雜誌2011年第13期。

法國喝過洋水，但他後來問：“‘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⁹⁰ 錢學森，一個雙料博士，一個旅美教授，國外的見識要多少有多少，後來同樣公開撰文對“畝產萬斤”的糧食烏龍提供理論上的可能性⁹¹，客觀上未能阻止人們的冒進。

事實上，正如一些人注意到的，相對於不少同事，毛澤東學習經濟沒少下功夫，曾密集求教於有關專家，對蘇俄教訓殫精竭慮，在大江南北的視察日夜兼程。同是相對於不少同事，他很多時候還相當審慎。當河南省委第一個提出“苦戰三年，改變面貌”，他提筆加了兩個字，把後半句改為“基本改變面貌”，提倡留有餘地。接下來，在1958年第一次鄭州會議，在同年的武昌會議，他都表示要“反左”，強調“壓指標”，肯定“商品經濟”；在1959年第二次鄭州會議，他重提“價值規律”，疾呼“謝謝五億農民瞞產私分”（客觀上阻擊了高徵購），其觀點被很多與會者疑惑甚至抵觸；在1960年，他親自起草中央的《緊急指示信》，嚴厲批評“共產風”；在同年12月的北京會議，他指出“天災”以外有“人禍”，讓很多聽眾吃了一驚；在1962年的北京“七千人大會”，他更是部署全國經濟工作的

90 引自《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

91 見1958年4月29日《人民日報》上錢學森文，言及光合作用尚未被充分利用的問題。

向右調整⁹²……要命的是，他一次次警惕浮誇，卻把最大的浮誇放過了；一次次提倡調查，卻把最該做的調查忽略了。無論是處理上左而下右，還是處理下左而上右，他始終把“六億神州盡舜堯”的假相當成真實，把“群眾要搞”“群眾發明的”“不能讓群眾洩氣”“保護社會主義的積極性”⁹³當作調整底線，卻不明白正是這種“積極性”水分極大，是一顆滴答聲越來越響的定時炸彈。

當道德與政治合成一把尺子，政治高調成了道德強勢，道德上進成了政治拉風。這相當於以政治劫持和架空道德，造成毫無底線的虛誇之辭決堤氾濫。正是在這裏，要說頭腦發熱，與其說毛澤東熱在“建設經驗不足”，勿寧說他熱在對人性和民心高估，對各地、各業、各級的激情秀失察，對投機者們的忠誠態和豪壯態誤判，從而對一個權力社會的體制弊端缺乏準備。他越是求教、問計、視察、調查，倒越可能困於謊言和虛誇的汪洋大海，越可能被四面八方的“積極性”迷惑。他在這一過程中的失誤既是主動的，也是被動的。說主動，是因為他倡導、推動、相信了全民聖徒化運動；說被動，是因為眾多假聖徒最容易充斥他的視野，最容易毒化公共輿論和國情

92 以上見王任重日記、薄一波回憶等，轉引自《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

93 同上注。

認知，造成經濟工作的盲動。因此，他還來不及高興工業化開局的成功，來不及高興國家周邊軍事壓力初步緩解，一大堆權力社會所產生的巨大政治泡沫，一種信息扭曲機制由層層謊言織就和滾結，最終把他架起來，投入了要命的1960。

他後來說：“餓死人，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⁹⁴ 遲到的真相終於引起高層一片震驚，國務院頃刻之間幾成救火隊，進入緊急狀態，總理廢寢忘餐抓糧食，每週都要核查各省存糧數、缺糧數及運輸計劃，連火車車皮都要親自具體安排。但事情已有些來不及了。全國的浮誇風帶來高徵購，早把很多農民的口糧和種子征走，使不少地方哀鴻遍野，乞丐如潮，野菜都挖無可挖，完全不是新聞報導中糧食多得讓人發愁的那麼回事，不是上報材料中吃肉要廣泛動員的那麼回事。有些地方官員明知民眾缺糧，還打腫臉充胖子，同意向外地調糧，更加劇了災禍。陳雲後來強調：“地方有些人有相當大的責任”，顯然就是指這一類情形。據官方資料，1960年全國人口減少一千萬，1961年又減少348萬⁹⁵。後來右翼學者多認為這個數據不實，估計餓死者高達三千萬，甚至四千五百萬。

94 轉引自見金沖及《新中國的前三十年》一文，載《文史參考》雜誌2011年第13期。

95 引自《中國人口年鑒》，中國社會科學人口研究中心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到底是幾個千萬，至今爭議未絕，各種出於估測的數據難於定讞。也許這事對於統計質量的較真有意義，在歷史反思中差異並不大。即便取其最低數，一千多萬已是整個全球一戰的死亡人數，相當於五十次唐山大地震，攤到每個大省都接近兩次。即使再擠去一些人口統計混亂中可能的誤差，仍是慘絕人寰之禍，發生於一個和平時期，難道不讓人目瞪口呆？

慘禍重罪無法開脫。我身邊很多知青的相似經驗是，農民們每當被幹部組織起來“憶苦”，最常說及的“舊社會”之苦，一是躲債和逃荒，二是日軍侵華，三是“大躍進”，總是搞得主持人啼笑皆非。主持人把後一個話題一掐再掐，但訴苦人聲淚俱下一一次次繞回來，看似稀裏糊塗缺心眼，其實是忠直與頑強。

據說，正是在這一年的某日，毛澤東在衛兵面前失聲痛哭，決定不再吃肉，與全國人民共渡難關，直到自己患上水腫病，一年後瘦了十多斤⁹⁶。

全民警察化(上)

李準編劇和魯韌導演的《李雙雙》，是“文革”前流行影片之一。片中的女一號李雙雙是人民公社社員，有火辣性格和一張快嘴，最愛“管

96 見李銀橋《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閒事”，經常同村裏的自私落後現象展開鬥爭，因此屢被丈夫埋怨。丈夫喜旺顧及情面，怕得罪人，遇到妻子在外生事，便不論是非一味軟弱，出面向當事的對方賠不是。倆夫妻在一系列糾葛中打打鬧鬧，哭哭笑笑，分分合合，最終當然是妻子的共產主義精神大獲全勝，並且揭發和制止了金樵、孫有貪污運輸費的劣跡，保衛了集體財產。生產隊一片麥浪滾滾的豐收景象裏，雙雙與喜旺也花好月圓，恩愛更深。

這一影片廣受熱捧，家喻戶曉，其思想取向成為後來很多文藝作品的母題，催生了《家庭問題》《年輕的一代》《霓虹燈下的哨兵》等熱片，顯示出此時的政治氣溫一路推高，監督和批判已深入家庭，深入基層，遍及社會每個角落。一種嚴肅的政治是非之爭，哪怕在夫妻之間也難避免——雖然《李雙雙》尚處於溫和階段，以男歡女愛落下了甜蜜的句點。

喜旺的人情主義其實來自古老的文化縱深。膽小、圓通、苟且、無原則、隨波逐流、和光同塵，即孔子所痛惡的“鄉原(願)，德之賊”⁹⁷也。這種農耕定居社會裏常見的處世態度，這種熟人社會裏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萬能笑臉，認情不認理的泥水匠工夫，一直構成了國家再造的文化性格缺陷，哪怕在“文革”結束多年後，也仍是眾多“人情票”和“人情案”的酵母，是生成腐敗的

97 引自《論語·陽貨》，載《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

心理土壤，危及民主與法制。在很多人那裏，有時只不過是一兩年的同窗之誼，不過是一兩次碰杯之歡，就足以使人膽比天大，做假證或做假賬比喝水還容易。寧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只要與自己無關，與自己的親友無關，再臭的一團狗屎也忍得下。許多知識精英對此不可藥救的人情泥潭一直痛心疾首。手機上一個段子說：“中國人可山寨一切，只有民主與法制山寨不了。”

對物的山寨當然易，對人的山寨當然難；正如關於物的理科教學易，關於人的文科教學難。人的血管裏流淌着文化習染、知識沉澱、制度烙印、自然稟賦等，任何雲計算和大數據也難以確切描寫。

面對這一泥潭，彰公法而抑人情，展開廣泛的刮骨療毒，倒像是針對中國傳統的一次空前挑戰。這裏的大義滅親和大公無私，更多一些商鞅、李斯的古代法家風格；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習慣，接近西方的宗教，比如基督教的懺悔，基督教的誠訓，基督教徒小組定期聚會的“證道”——大家圍坐一圈，現身說法，勤加檢討，洗心革面，努力改造世界觀和人生觀，相當於基督版的“支部會議”“組織生活”“內部整風”。這種大規模的民間心靈再造，充滿着法家的嚴厲感和宗教的神聖感，以千萬個李雙雙圍殲“人情風”，與“鄉原”確實格格不入，不失為新民運動的大破大立，史無前例的急風暴雨。

賣淫、賭博、毒品、走私、會道門、童養媳、小老婆、高利貸、人口買賣、詐財的神婆巫漢……這些舊中國的毒害盡遭打擊，幾乎在一夜之間消失，不僅讓國民們印象深刻，也讓很多訪華的外國人驚訝，包括一位英國作家，後來被美國前總統杜魯門秘密約談，應邀寫出專題報告印發給民主黨的外交事務諮詢委員會⁹⁸。一般意義上的犯罪率，據聯合國國際犯罪防範中心數據庫，取1950年至1965年間中國的最高值十萬分之64人，較之於2000年的360人，儘管立案門檻前低後高，可比性大打折扣，仍只夠六分之一⁹⁹。其中“文革”前夕的1965年，犯罪立案率接近最低值，每十萬人中僅29人¹⁰⁰，不足同期美國的七十分之一¹⁰¹。時值美國約翰遜政府發動“囚犯戰爭”(War on Prisoners)，夜不閉戶和路不拾遺在中國很多地方卻成為尋常。作為一個出身於地主家庭的女兒，我母親不會特別贊同革命，但革命鼓勵女性反抗包辦，不隨夫姓，甚至可休夫改嫁，也消滅了鴉片、賭博、娼館以及小老婆，讓眾多家庭的丈夫免於墮落，為眾多主婦摘除心病，足

98 見1976年6月16日《參考消息》載記者對英國作家格林(Graham Greene)的採訪報導。

99 網址為<http://www.uncjin.org/Statistics/WCTS/wcts.html>。

100 見唐樹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犯罪發展變化及其理性思考》，載《犯罪學論叢》第1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年。

101 美國1965年的犯罪人數比為每十萬人中2200人，引自*Crime in the US, 1960-2004*,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2006。

以讓她一輩子盛讚新社會。哪怕在每天只有幾分錢菜金的窮日子裏，哪怕在“文革”結束多年後的富日子裏，她也始終把毛澤東的畫像高掛於牆——這樣的老太婆不在少數。她們想必都能回答蔣介石為之困擾多時的問題之一：“為什麼婦女不相信我們？”¹⁰²

官員的清廉作風被很多民眾日後懷念，也事出有因。群眾運動說來就來，對早期貪腐多少形成了一定的阻遏。那時當官的薪資本就不高，一旦沒忍住伸了手，貪了公家的幾個饅頭或一個熱水瓶，便相當於市場經濟發達後的官員拐跑千萬鉅款，立刻被公共輿論吊打火燒，在大字報的海洋裏身敗名裂，說不定還丟掉烏紗帽。連劉少奇的夫人出國訪問時多備了幾套旗袍，鄧小平有時打打橋牌，也曾作為“走資派”的著名罪證，在“文革”中傳遍四面八方。那時的機關辦公樓裏常常不見人影，官員們為改革(如合作醫療)和發展(如農田水利建設)奔波，在路上遇到熟人，如不說自己剛從鄉下來，剛從車間來，便有些氣虛理短。天生長得白胖的，恨不能給自己臉上抹鞋油，恨不能找木匠給自己刨去一層肉，以看齊焦裕祿那種瘦骨嶙峋的標準形象——“這事不用爭，自己拿一百張老照片去看吧。”(黃紀蘇語)有些官員日後為自己抱屈的一篇順口溜，確為

102 引自前蔣介石新聞秘書郭岱君回憶談，載《國家機密》，香港明鏡出版社，2013年。

官場一部並不少見的清貧史：“40年代流血水，50年代流汗水，60年代流淚水，70年代以後流口水。”

那時的知識分子更是只能夾緊尾巴做人。坐擁豪宅、名車、公司紅利、外國銀行賬號、小清新女助手兼師母天敵……這些反動行徑他們想都不敢想，甚至遭到他們普遍蔑視。剽竊論文或索要紅包，哪怕是心中一閃念，也能讓自己嚇出尿來，甚至對自己慚愧不已。他們勒上袖套，戴上草帽，風塵僕僕，摩頂放踵，奔波在生產最需要或群眾最困難的地方，胃痛了，咳血了，也決不下火線，一心“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在他們那裏，日記中沒記上幾條老農民或老工人的感人事蹟，就似乎不像日記。不能給晚輩展示手掌裏的幾塊繭皮，也不像個正經的大舅或大姨。他們中的一部分，日後也許痛惜光陰虛擲與專業耽誤，憤憤於自己當年降尊紆貴，但有意思是的，2007年由廣東省發明協會主辦，由搜狐網發起，科技成果評選在全國範圍內經多輪篩選，最終評出了中國現代“新四大發明”，分別是(1)人工合成胰島素、(2)雜交水稻、(3)漢字雷射排版、(4)複方蒿甲醚——細數這四大成果，它們無不產生於“文革”，都是精英們降尊紆貴時的作為，與高待遇無關，與智慧財產權無關。

……

這樣的社會變化有多少合理，有多少不合

理，有多少合理中的不合理，有多少不合理中的合理，須細心辨析。其中有多少人的奉獻出於心甘情願，一切都甘之如飴，也難以估量。重要的是，與很多局外人的想像相異，即使是被迫跟潮的大多數，他們要死要活地獻身革命，一般來說並無槍口威逼，不是迫於美國那樣世界上最大的警察隊伍、最多的監禁場所、最昂貴的司法開支，倒是更多受制於李雙雙這樣的至愛親朋，受制於他們一雙雙揉不得壞人壞事的眼睛。

借前面的比喻：一個政治股市全面沸騰之際，奉獻型競爭與攻擊型競爭相互推高，全民聖徒化與全民警察化比翼齊飛。人人盯我，我盯人人。達則兼盯天下，窮則獨盯其身。盯吾老以及人之老，盯吾幼以及人之幼……幾乎人人都是業餘的檢查員、監督員、巡視官、思想警察。由規勸、批評、斥責、揭發、大字報組成的“群眾專政”織就天羅地網，使每個人都成了照妖鏡，同時每個人又都置身於白熾化的無影燈下，時時感受到眾目睽睽的道德高壓態勢，爭當公民模範幾乎是唯一的人生選擇。

全國一盤棋，上下一張網，國家體制建設的諸多難題也迎刃而解。與亞洲、非洲、中東等地太多後發展國家的情況不一樣，政府不再僅僅是首都和市民的政府，不再是眾多部落首領和軍閥合租的空虛門面，共用的前臺秘書。史學家黃仁宇極為重視的“底層社會結構”，即國民黨在

全民警察化(下)

全民警察化曾是解決問題的手段，但漸漸成了問題本身，成了製造各種次生問題的母問題。

紅色中國的社會矛盾錯綜複雜，逐步積累成患，其中一題於1964年進入毛澤東筆下：“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¹⁰⁴ 後來的“黨內資產階級”與“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等，不過是這一概念的延伸和微調。對黨內“幾十萬到百把萬”“貴族階層”的說法，似是他的進一步量化評估¹⁰⁵。沒有資料證明他讀過意大利托派學者布魯諾·里齊(Bruno Rizzi)的《世界官僚制度》，或瞭解南斯拉夫著名異見者吉拉斯(Milovan Djilas)，但他的這一系列論斷與吉拉斯的“新階級”¹⁰⁶ 一說甚為接近，幾乎不約而同，一舉奠定了他在全球左翼陣營的地位，與斯大林拉開相當的距離，以至日後不論有多少負面消息曝光，他仍不失巨大的國際聲望，一直被很多人惦記，被非洲黑兄弟們往胳膊上刺，被一些歐美院校學子往文化衫上印。1976年毛澤東去世時，法國《世界報》徵集有關

大陸來不及完成的重要社會工程，由紅色中國搞定，被他視為現代化一大成就¹⁰³。軍閥割據一去不返，連族權、神權、幫會、土司等形形色色的“微割據”(所謂各種“封建”殘餘)也逐一退出視野。鄉村中大批城堡、碉樓、圍屋等民防工程失修遭棄，武館、鏢局、拳師等民防手段後繼乏人，足見“一片散沙”各自為政的亂象不再。民間暴力悉數解除，行政體系深植基層，窮鄉僻壤之地也一片和平，可為這一說法的圖解。

多少年後，我在臺灣遇到一位退休將軍。說起兩岸的恩怨情仇，他說臺灣的間諜活動在大陸成功率最低，潛伏的幾無漏網，登陸的落地即廢，基本上有去無回，訓練經費全打了水漂。他不知道，他領導過的那個情報機構，面對的遠不是派出所和邊防站，而是成本低廉和無處不在的大嫂、大叔、大娘、大爺、大姐、大哥、小妹、小弟，是數以億計的明崗暗哨，包括各路“小腳偵緝隊”——他還能有什麼勝算？

我同他說不清楚，尤其說不清楚黃仁宇那個“底層”命題。

我只能再給他敬酒。

103 見黃仁宇《中國大歷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

104 引自1964年12月12日毛澤東對陳正人關於社教蹲點情況報告的批語，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105 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人民出版社，1997年。

106 見密洛凡·吉拉斯《新階級》，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年。

時評文章。最終刊登的有九篇，其中八篇充滿了贊詞。有些法國人戲曰：他們的報紙罵法國總統可以，罵毛絕對不行。

稍有區別的是，有些人願把他看作爺爺版的格瓦拉，另一些人醉心於他對社會主義體制官僚化的抨擊，更願意把他看作東方版和帝王版的吉拉斯。“文革”中知名的異見者楊小凱(楊曦光)，曾為一篇《中國向何處去》付出過十年鐵窗生涯的代價，但直到入監前他一直把毛澤東視為曠世知音¹⁰⁷。早期的中國異見者也大多為“毛粉”，與撰寫過《造反有理》一書的薩特(Jean-Paul Sartre)差不多，與撰寫過《長征》一書的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差不多。

除此之外，泛紅群體與泛黑群體的社會鴻溝日深，與官民矛盾形成了一大交叉。華裔作家陳佩華(Anita Chan)、美國學者駱思典(Stanley Rosen)、安德佳(Jonathan Unger)在《學生與階級之戰：廣州紅衛兵派性與文化大革命》中注意到，在他們所調查的兩千名紅衛兵中，“出身不好的”在造反派中佔比75%，“出身好的”在保守派中佔比80%¹⁰⁸。兩派的組織成分大異，顯示出造反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政治賤民的曲線反抗，

107 見楊大慶文《回望“新思潮”》，載網刊《昨天》第12期，2012年12月30日。

108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by 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and Johnathan Unger,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3, 1980.

其針對點正是毛澤東的“階級路線”，可說與他一開始就同床異夢，一名而兩實。韓裔學者李鴻永(Hong Yung Lee)等也都注意到“文革”中造反名義下的諸多民意訴求，特別是歷次運動中的受害者，更多關注一種高層外“人民的文革”¹⁰⁹。在他們看來，這些利益主張並未超過溫飽、尊嚴、自由的合理尺度，不失為造反運動得以廣泛勃興的一部分真實原因，因此“毛的文革”與“人民的文革”構成了一種互相利用的關係，不是一回事——他們據此與一般“毛粉”門戶角立。

這些學者提到知青、臨時工、個體業者、遣返回鄉工人、復員軍人、其他低薪群體等，比如武漢一個“582”戰團，即1958年就業但工資一直停留在二級的工人。作為參與造反的一部分，這些群體最關心的不是意識形態，倒是多有經濟利益背景。其中，城鄉差別又算得上很多人最大的冤屈之源，是全國物質利益分配的最大一筆欠賬。楊小凱撰寫過《長沙知識青年運動考察報告》，認為知青是最可靠的革命力量，其依據就是他們在政治、經濟上的雙重受壓。我在1967年看過一次知青造反派演出的話劇，劇名是《姐姐你別哭》，可謂中國最早的“傷痕文學”，表現的是一個反革命分子的女兒，如何被迫下放農村，如何被農民欺凌與侮辱，其淒婉劇情讓觀眾

109 參見朱學勤《豈有文章覺天下》文，載《開放時代》1998年3/4期。

無不落淚。我沒想到的是，多年後路遙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同樣是長效催淚彈，幾十年內一直熱賣，一再印得印刷機發燙，其共鳴者顯然多是與作者相似的鄉村兒女——他們對通向城市的一條黃沙小路耿耿於懷，甚至淚眼迷蒙。

兩部文藝作品，一是說下鄉知青，一是說回鄉知青，視角不同且情緒有點擰，但都涉及到城鄉分隔這一歷史難題和現實不公(包括以“下鄉”為經濟處罰的政治不公)。“戶口”是一個沉甸甸的話題，對於很多人來說如同噩夢。一旦被戶口所囚，鄉村居民就失去了入城就學、就業、退休的社會權益，就可能永遠承受困苦和沉悶，哪怕進城去賣苦力也被視為非法“盲流”，借用一句小品臺詞：“離流氓也就不遠了。”這一口氣怎麼也沒法讓人咽下¹¹⁰。他們勒緊肚皮以支撐國家財政，為工業化所需要的原始積累輸血，憑什麼就要被拋出“平等”的大鍋飯之外？既然“文革”以共產主義為旗，那麼他們表達自己的合理訴求，憑什麼被誣為“造戶口反”“造經濟反”的惡行，被當局一棍子打回去¹¹¹？憑什麼在主流造反派那裏也得不到足夠的支持？

110 1955年6月22日，國務院發出《關於建立經常的戶口登記制度的指示》，強化了戶籍管控。同年8月國務院又頒佈《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禁止農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入。

111 見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等四部門等關於禁止“造經濟反”的《通知》，以及同年7月13日禁止挑動農民進城武鬥的《通知》。

其他社會矛盾還有不少。

顯而易見，諸多矛盾有些是全局性的，有些是局部性的；有些是結構性的，有些是技術性的；有些主要是政治性的，有些主要是經濟性的；有些是剛性的只能斷臂求生，有些是柔性卻不妨調和……可惜不少人對此心不在焉。馬若德與費正清認為“文革”的社會基礎是“軍隊、激進文人、不滿現狀的青年”¹¹²，有點讓人不知所云。“不滿”什麼？哪些“文人”激進？軍隊內部的激烈紛爭(如“二月逆流”事件¹¹³)該如何解釋？兩位哈佛教授如此隨意打包，似乎是瞥一眼新華社的照片就做研究，在長安街轉上幾圈就着手寫論文。影片《芙蓉鎮》出自國人之手，作為批判“文革”的經典之作，受官方與業界大力推崇，竟把劇中人物聖魔兩分，紅臉對白臉，還把白臉直接掛鉤“國營”企業，把紅臉一律批發給“民營”人士，同樣讓人不知所云。作者似乎從未在中國生活過，不知亦聖亦魔才是最為普遍的國人履歷，更不知“上海工總司”“武漢鋼工總”“長沙工聯”那些故事裏¹¹⁴，造反與“國

112 見馬若德與費正清合著《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海南出版社，1992年。

113 指1967年2月譚震林、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對“文革”的激烈批評和抵制。

114 “上海工總司”全稱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武漢鋼工總”全稱為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武漢地區工人總部。“長沙工聯”全稱為長沙革命造反派工人聯合委員會。以上均為當時著

營”不“國營”一毛關係都沒有。

毛澤東也表現出目光迷亂。身處全球冷戰的格局，中國被迫捲入了財富、軍事、文化等力量對比懸殊的全球拼爭。他在一張世界地圖上看不到多少溫情，於是很容易把物質利益之爭、行政磨擦之爭、文化差異之爭、認識側重之爭等統統視為意識形態較量，甚至把人脈派系、作風、方法、性格、意氣等方面的磕磕碰碰，讀入思想有色眼鏡，讀出清一色的階級鬥爭，須連結國民黨特務的暗殺，圍堵中國的數百個美軍基地，還有印尼右派軍人政變的血流成河……這一切始終成為他處理國內問題時不在場的第三方，才下眉頭，又上心頭。1964年他與劉少奇有關“四清”運動性質的爭議，顯示出雙方認識的生澀，理不出清晰頭緒。他最終把“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和“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奉為警世恒言，把“突出政治”視為治國重典，於是一切都開始敏感化、嚴重化、政治化、敵對化，不能不讓人茫然和心悸。在這種情況下，不論什麼都拿來“上網上线”，一種政治掛帥的槓杆化操作，很快就使社會生活全面變形，各地、各業、各級的攻擊型競爭由此失控。

新政權確實對手環伺和困難重重，但這種“攻擊”演化成捕風捉影、添油加醋、誇大其

名的產業工人造反派組織，數以十萬或百萬計的國企員工捲入其中。

詞、深文周納、混淆敵我、村村冒煙、四方告急，八百里快馬進京……造成第一假相是反革命的“裴多菲俱樂部”遍佈全國(1957)，第二假相是廬山會議後彭德懷的同盟者大有人在萬分危險(1959)，第三假相是“黨內、政府內、軍內、文化界的很多人都是反革命的修正主義的分子……”(1966)更多的假相也隨之而來，亡黨亡國的危險似逼近目前。以至在後來的日子裏，人們到圖書館隨便挑上一本書，都能在字裏行間看出包藏禍心的蛛絲馬跡，因此無需當局下文件，當局也下不了這麼多文件，但各地書架上早已空空蕩蕩，讀者和管理員下手更快。

其實，一種盛產假相的體制弊端，是矛盾中最大的矛盾，問題中最大的問題，危險中最大的危險，卻不幸成為長久的盲區。那些官僚主義也好，特權意識、野心家、貪污什麼的也好，算不上特別稀罕，放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有，放在任何一種社會體制裏都有，與“階級”和“資產階級”到底有什麼瓜葛？與剩餘價值、資本壟斷以及美國第七艦隊是不是一回事？出現在漢朝、唐朝、明朝的貪官污吏，是否也是美國中情局派出的穿越高手，嗖嗖地勾兌時空，嘩嘩地隱身附體，正在古代營構福特公司和杜邦公司的生產關係？國企與私企都可能出現的制假、騙售、偷稅、隱秘排污等，是否都源於統一的培訓和派遣，與什麼所有制扯得上？再往細節上說，法學

和經濟學或有階級性，但九九乘法表是否也有階級性？一個人在白天收地租有階級性，但夜裏讀唐詩或打老鼠是否也有階級性？顯然，人類歷史並非只有一個蒸汽機時代，只有一個充滿機油、煙囪、貧民窟的時代。“階級”誠然是群類辨識的重要視角之一，重要方法之一，重要的集合模型與分析單元之一，但並非全部。“階級”一詞的有效性往往系於貧富懸殊，特別嚴重和突出在小康線以下的時代，當民族、宗教、文化、生態等矛盾突顯時卻未必，其邊際效應很可能減退——反之亦然。

換一個角度說，凡有人群的地方，無論貧富都有壞人，是需要道德來處理的；無論貧富都有罪人，是需要法律來處理的，並不一定都適用“階級鬥爭”這劑猛藥。階級問題也有變形或轉化的可能，需相機處理，因症施治，另謀解決之法。相當一部分現象與其說是群體的問題，不如說更像個人的問題。與其說體現了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鬥爭，不如說更像是人類對自身弱點的鬥爭，甚至是每一個人肉體與精神之間的永恆緊張——即便在階級淡化之時也是如此，在最好的社會裏也是如此。富足版的原始部落不會比階級社會更像天堂。

因此，“階級”只是普遍逐利行為的衍生社會構造之一，同其他構造一樣，不過是社會診狀，至多是次級病因。對它不能不講，但不能講

得過分，不能當染房漂染一切。不幸的是，“文革”深受二元對立的冷戰思潮糾纏，其政治虛熱和敵情過敏，與冷戰對手恰好形成了同構。在很多後人看來，它差不多就是美國麥卡錫運動的鏡象，一種逆向的高倍數放大¹¹⁵。

大勢已成，積重難返，意識偏執與體制扭曲相互強化，缺乏制動閘的全民警察化一路咆哮向前。連劉少奇的女兒也開始寫大字報揭發老爸¹¹⁶，於是再不可思議的爆料也都像實情了，再離奇的情節也都有了可能。到處都有攻擊成習、攻擊成癖、攻擊以為榮的效忠者，不斷製造出新的“敵人”——包括把一部分人果真逼成了敵人，事實證實了臆想。“信則有，不信則無”，涉及人類社會的很多奇怪糾紛就是這樣“信”出來的。到處都有大嘴巴、是非人、告密專家、政治暴發戶，不再滿足於攻擊落後思想或低俗行為一類小靶子，更願意成天瞪大眼睛，雙目如炬，精神抖擻，叱咤風雲，一心挖出身邊的“定時炸彈”，以證明“千萬顆紅心”中有我一顆。無論是村裏王小二斷言老地主看天肯定是盼望國民黨的飛機，還是朝中老臣懷疑彭德懷見蘇共首領時

115 1950至1954年美國以“麥卡錫主義”為代表的反共和排外運動，使約兩千萬人受到政治審查及不同程度影響，七十五位作家的書籍被列為禁書，史萊辛格、馬克·吐溫等人的作品也成為“危險書籍”，近兩百萬冊書籍被清除。

116 見1967年1月7日清華大學《井岡山》報第8期。

不帶翻譯必懷叛國之意¹¹⁷……他們的口氣一樣，表情一樣，越來越兇險，使全國上下瀰漫着好鬥風格和陰謀想像。我身邊的一哥們，就曾誇耀他在一幅山水畫裏發現了暗藏的反動標語，在人民幣鈔票裏發現了蔣介石側影，鬧得大家好長一段日子心驚肉跳。

一切條件都已具備。聖徒化與警察化兩大政治泡沫交匯，“文革”其實已呼之欲出。在毛澤東那裏，後者誇大敵情，提供了他發動“文革”的必要性；前者美化民情，提供了他發動“文革”的可行性。目的有了，手段也有了，他下一步該如何辦？一步步陷入民情與敵情這雙重假相，他還可能清空自己的思維定式，讓那個正在滋滋冒煙的“文革”緊急降溫？

他是該去賞花，還是該去釣魚，還是該去北歐哪個宅子裏與美國總統和蘇共總書記微笑碰杯？

我們走在大路上，
意氣風發鬥志昂揚。
毛主席領導革命隊伍，
披荊斬棘奔向前方。向前進，向前進……

117 彭德懷1959年的反“左”意見，被1962年“七千人大會”實際上予以大部分汲納，但他的主要罪名“分裂黨”“裏通外國”出自很多同事對某些細節的猜疑和揭發，可見全民員警察化在高層同樣造成敵情過敏及妖魔化想像。參見黃崢執筆的《王光美訪談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

反復播放的流行歌曲不斷加溫人們血流。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¹¹⁸下達，“文革”大幕正式拉啟。毛澤東在隨後近兩年間癱瘓了全國的黨團組織，讓各級政府主官幾乎統統下課，鼓勵學生鬧事和工人奪權，容許造反派自由結社、散傳單、燒檔案、封報館、扛機槍、佔領官府大樓、全國免費大串聯……一個西方記者如果此時在中國人面前說教“民權”，肯定覺得自己班門弄斧。我的一位周姓朋友，郊區農戶的兒子，湖南“高校風雷”的頭兒，因被總理周恩來點名參加一個緊急會議，商議省會各派大聯合的國是，竟一身臭汗和兩隻破鞋，坐上部隊臨時調配的一架雙座軍機急飛北京。離開軍用機場，他手槍還別在屁股頭，進入人民大會堂時居然無人加以安檢和攔阻。如此零規矩、大撒把的“民主”和“自由”，如此奇異的群眾當家作主，恐怕連好萊塢導演們也覺得匪夷所思。哪個編劇要是寫出這種情節，肯定會被老闆辭退，讓老婆急召心理醫生。但這一類離奇情形和故事在中國確實發生了。黨政休克和全國大亂的試驗，或如哈佛教授認定的“民粹主義”核爆，在世界範圍內空前絕後，構成了“文革”的早期面貌。

其中的道理也許並非特別奇怪：

既然“幾十萬到百把萬”“貴族階層”（毛澤

118 即1966年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後發出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被視為“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

東語)已劫持各級政權，為什麼不該鬧他一個全面造反？

既然“六億神州盡舜堯”(毛澤東語)，那麼鬧一個天翻地覆又有何風險？直接訴諸群眾難道不是把握最大和成本最小的勝利之道？繞開那些科層制的官僚機構，摒棄那些體內消化的關門整肅，來一個全面的揭蓋子、清底子、刨根子、攻打土圍子，難道不是又一場最為得心應手的人民戰爭？

他的奇想，看上去也是精算與深謀。

聖徒化×警察化

1966年夏天的這一個市委大樓前是信息集散地，當時的公共社交媒體。大街兩側都有很多大字報和標語，以至牆上的疊紙厚如掛毯，無論晝夜都吸引了來往不息的圍觀者。

我經常在這一帶閒逛，看到一些古怪故事。比如隔一陣就有一兩個受害者貼出大字報，都是控訴單位上的“走資派”用生物電流控制他們，讓他們吃不好飯，睡不好覺，更不能為革命努力工作，好幾項科技發明眼看就要半途而廢，如此等等。在這種大字報旁常常有一些“戰鬥隊”或“司令部”煞有介事的聲援，留下驚嘆號很多的標語或鋼筆留言。

還有一件奇聞引起軒然大波。一位市民有一

天在路上撿了張紙條，好像是一輛軍用摩托車上掉下來的，細看之下嚇出一身冷汗：原來是軍界某大人物的政變手令。省會幾大造反派組織為此宣佈總動員，堅決保衛黨中央和毛主席，而且出演了一連串驚險情節：轉移密件，掩護證人，防暗殺和防竊密，組團赴京彙報，首都紅衛兵出手相援，又傳聞軍方異動，中央首長秘密接見……真是連續劇高潮迭起。

政變手令怎麼會掉在大路上？像一個抗日的放牛娃不慎掉了雞毛信？這一出大戲的前提是不是過於可疑？……但成千上萬的人居然就為此激動了幾個月。後人也許不妨想像某些當事人的心結：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寧可瞎折騰，不可不表忠；寧可誇大其詞，不可失於萬一；寧可被一個神經病騙了，不可立功機會被他人搶了。於是又一個烏龍越滾越大。如果連“中央首長”也接見他們，真把這當成一回事，那麼首長也不可能是別樣的心態，無非是唯恐在爭當“聖徒”或“警察”的大賽中落伍。

1967年6月7日，我在這片街區還第一次看見武鬥死人。離市委大樓不遠的中蘇友好館被攻破，設在這裏的“高等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已潰逃。武鬥的具體起因不詳，但勝利者把大小旗幟插滿高樓的各個窗口，插出了一個五彩的水泥大刺蝟。高音喇叭播放出激情戰歌。閒人們在這裏湧進湧出，踐踏碎磚瓦、碎玻璃、棍棒、柳條帽

以及各種廢紙屑。大樓旁的一個巷口，倒了一個青年，胸掛校徽，渾身灰土，一條毛巾紮緊脖子，額上一個洞正在冒出濃血蓋住了半張臉。離他十幾步的地方，另一個男子也栽倒在地，我看見他的臉，但見一線血跡延綿了幾十米，似乎是負傷從大樓逃出，最終在這裏再遭重擊……看到這裏，我已兩腿發軟，有一種要嘔的胸悶和目眩。

從這一天起，武鬥的吶喊聲或槍炮聲時有耳聞，以至我三個多月後因流彈誤擊住進醫院，發現這個當地最大的醫院已被造反派全面接管，大門口加崗加哨，收診的全是武鬥傷員。手術室那邊不時傳來嚎叫，不是傷員痛得叫，就是戰友們抓狂，用衝鋒槍一類威逼醫生，要醫生的手腳快點，再快點。我的鄰床，一個不足十八歲的學徒工，腹部中了四顆機槍子彈，據說還是軍人用直升機從外地轉運來就醫的。他也在享受英雄待遇，傷勢稍好就撐上拐杖一高一低地到處亂竄，看文藝界送來的慰問演出，或帶回一些水果與我分享。當然，壞消息也很多：“又‘太’了一個……”他是指太平間裏又多了一個——這種啣嚙一次次擊中我的恐懼。

通向太平間的走道哭聲震天。我揮之不去的沉重是，那些臉上蒙蓋白布的人是誰的兒孫？誰的兄弟？誰的同窗夥伴？一場旨在“解放全人類”的革命，為何讓這麼多年輕人在白布下孤獨遠去？

實話實說，當然不可漏掉另一些情況，即“文革學”不大提及的一面。這樣說吧，一方面是暴虐，一方面卻不乏熱情、爽朗、忠厚、甚至純潔——至少就大多數人而言，與通常的土匪、黑幫、軍閥、佔領軍、綠林亂黨不同，他們的暴力與物質利益毫不相干。即便在暴屍街頭之際，也鮮有人哄搶商店、打劫銀行、收取保護費、輪姦婦女、綁票勒索、吃飯不給錢、瓜分古董或金條等抄家所得……這些案情哪怕在當今對“文革”最大規模的揭露之下也極為罕見，幾乎聞所未聞。學生步行大串聯遍及全國，因性觀念保守，小女生們常自行結夥，或兩三人，或五六人，在深夜裏趕路，在荒郊野地迷路，卻鮮有劫色劫財之聞。我認識的某位小萌女，揣五塊錢出門，在全國轉上兩個月後黑黝黝地冒出來，誇耀自己衣袋裏還有七塊——不是合法地借自沿途的紅衛兵接待站，就是來自好心人的捐助。較之於數十年後父母對孩子安全的憂心忡忡，學校保安的戒備森嚴，必接必送的家長們在校門前人山人海翹首以待，社會風氣的兩相比對未必不讓人感慨。

紅衛兵怎麼就成了眾多小說、電影、學術著作中千篇一律的青面獠牙？幾乎成了機器獸、外星魔、侏羅紀惡龍？當然，搶軍帽或撬單車或有所聞，極少數人渣趁火打劫一類也不能排除，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會有，但1968年前廣泛自治的約兩年光景裏，大多數群眾組織遇到這種事，不是

出門嚴打，就是閉門整風——我所在的學生組織就開除過兩位害群之馬，事因是他們擅找“走資派”索要零花錢。在幹完這些後，人們還可能去火車站義務搬運物資，去街頭代替失蹤的警察們指揮交通，去鄉下泥一腳水一腳義務幫助農民搶收稻穀……我與同學們就自帶錢糧前往某熱水瓶廠和某毛巾廠義務勞動過數月。在這裏，強調狂徒與清教的風格兼備，並不是獵奇，更無意粉飾什麼，只是指證聖徒化與警察化的一張陰陽臉，在全國大亂時仍清晰互見。這一點很重要，涉及對“文革”特定病理的診斷，涉及後文中對暴力的再認識。

與之相反，青面獠牙的故事固然通俗易懂，最合適拍驚悚片，其認知卻流於一般刑事檢察官的水平，於政治反思並無任何幫助。

就像日後的很多研究者，毛澤東也不大留意這種雙重人格，更不理解一種傳統意義上的“純潔”為何正是暴虐的放大器。直到很久後，他才在來訪外賓前表現出驚訝：“有些事情，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分兩派，搞大規模武鬥，也沒有想到。”¹¹⁹

不妨想像此前的他想到了什麼。在他的沙盤推演中，想必一聲號召之下，天天捧讀紅皮語錄本的億萬聖徒都能精準操作，緊跟中南海戰略

119 轉引自金沖及《新中國的前三十年》一文，載《文史參考》2011年第13期。

部署。中央一開始就在文件裏規定了“要文鬥，不要武鬥”麼，下面什麼人還敢魚目混珠、瞞天過海、借刀殺人、公報私仇？還敢擾亂團結安定的革命大局？他肯定沒想到，民眾即便對物質利益無感，不意味着他們對政治榮譽、政治安全、政治地位、政治權力也無感。事情也許恰好應反過來看，正因為他們對前者無感，全部心神和精血所注，對後者所感一定更為強烈。一旦放開管制，新的“叢林原則”立即生效，為了爭當革命中更革命的、高尚中更高尚的、權威中更權威的、風光中更風光的，各地必陷入四分五裂——你的加法就是我的減法，你的出局就是我的通吃。他們面對的現實是，政治權益資源畢竟有限，比如一個組織的席位不多，社會榮譽聚光燈的投照面不大，不可能見人一份。就算有些人不在乎這一切，派爭中的一口惡氣，也足以讓他們一個個鬥成烏雞眼。

不無純情與忠誠的奉獻型競爭雖在延續，支撐基本的社會秩序和經濟發展，甚至在一些運動輕災區催生奇跡(如紅旗渠¹²⁰)，但對於有些聰明人來說，這種出頭方式成本偏高，投入偏大，過程偏長，相當於做績優長線股，需要吃苦耐勞

120 紅旗渠於1969年竣工，是河南省林縣民眾在太行山鑿壁穿崖的“人工天河”，以解除當地人民飲水和灌溉的困難，幹、支、斗渠總長1500公里，曾被英國《金融時報》譽為“奇跡”，2013年被相關國際評委授予“經典設計獎”。

和捨己為公，還得有一點王敬喜或焦裕祿那樣的具體業績，不是那麼好做的。於是狂賭政治成了這些人的短線股，提供了成聖與封聖的一大捷徑，那就是拉山頭，舉大旗，擁眾而立，直通殿堂。他們在地圖前踱步，在密室裏研判，在群眾集會上演說，在“中央文革”聯絡員那裏面受機宜，小號列寧或小號托洛茨基的風度油然而生。他們可能廢寢忘食，東奔西跑，洗一把冷水臉後，遙望窗外的群山夕照，撫摸自己的傷痕和汗漬，為革命的前景熱淚盈眶……這其中有多少是真誠的投入，有多少是矯飾的鑽營，自己不一定分得清楚；有多少是合理的訴求，有多少是膨脹的慾望，自己也不一定想得明白。一旦有小人來擋路，說他們是“投機家”“野心家”“剝削階級的孝子賢孫”“帝國主義別動隊”，一心把他們擠出公共舞臺，打回一個普通學生或普通工人的原形，他們還能無動於衷？還能心平氣和？他們最有力的還擊，當然是把那些污名砸回去，盡一切可能把對立派大加掃蕩——比如用磚頭、鐵棍、燃燒瓶把他們趕出中蘇友好館大樓。

因為“×警察化”，很多“聖徒”正在成為騙子。道理很簡單：既然鬥爭是你死我活，不擇手段便成為正常，抬高自己和抹黑對方的謊言無論多麼離譜，都是正義一方的正當手段。

因為“×聖徒化”，很多“警察”正在成為屠夫。道理也很簡單：既然施暴與金錢無涉，不

謀任何個人物質利益，那麼崇高感對沖罪惡感，正義性稀釋殘酷性，好人的聖戰便無可指責，大可心安理得。

全民聖徒化與全民警察化這兩大泡沫再次迎頭相撞，交叉激化，產生了驚人的乘數效應。據學者王友琴考證，“文革”中最大的迫害高潮有兩次。一次發生在1966年，伴隨着“紅衛兵”組織的興起，打砸搶殺出現在“破四舊運動”中；另一次發生在1968年和1969年，即新型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的建立和鞏固之際，“清理階級隊伍”造成的大量的自殺和他殺¹²¹。對她這一說法可稍作補充的是：1967年全國武鬥中的大量傷亡，以及這一年廣西、湖南、河北等地有組織的濫殺，似不可漏下。

湖南省的“道縣事件”是其中最為突出的一件：

○1967年，和其他縣市一樣，道縣也出現了觀點對立的造反派組織。一派稱毛澤東思想紅戰士聯合司令部，簡稱“紅聯”；另一派稱無產階級革命派鬥批改聯合指揮部，簡稱“革聯”。兩派鬥爭在1967年7月趨向白熱化。

○革聯“主要由青年學生、市民、手工業者、下層知識分子及少數幹部組成”，堅持反對當權的官僚階層；紅聯“則與當地新舊政權有不

¹²¹ 見王友琴《文革受難者》前言，香港開放出版社，2004年。

可分割的聯繫”，在全國奪權運動中參加了本縣的“一月奪權”，擁有該縣當權者和“幾乎整個鄉村政權及組織”的支援。

○8月8日至9日，發生了“革聯”衝擊縣武裝部，砸爛了武器倉庫的大門，搶走全部槍支彈藥的“八·八”搶槍事件。

○8月9日，“紅聯”後勤部長張明止主持召開“紅聯”骨幹緊急會議，研究應變措施。決定把“紅聯”總部由縣城遷到郊外的營江公社，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道路。

○8月11日，“紅聯”和各區武裝部長在清塘公社營樂園大隊部召開會議，決定次日集中各區基幹民兵攻打道縣二中，即“革聯”總部所在地。為了保證進攻的成功，會議決定對四類分子加強管制，以建立鞏固的“後方根據地”。

○8月11日縣武裝部長劉世斌、縣委副書記熊炳恩召開全縣各區、公社抓促小組組長電話會，部署搶收中稻搶插紅薯任務(簡稱“雙搶”)，並傳達了“八·八”搶槍事件中縣武裝部、縣公安局槍支彈藥被搶情況。熊炳恩稱：“各地要發動群眾採取果斷措施，加強對階級敵人的專政，要把民兵組織起來，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保衛好‘雙搶’。”

○在8月11日的這兩個會議結束後，各區、公社即分別開始佈置針對四類分子的鎮壓工作。在工作中，自殺害朱勉後，隨着鍾佩英一家三口

被害，對四類分子的亂殺行為開始在全縣蔓延。據1980年代中共零陵地委處理文化大革命殺人遺留問題工作組的結論稱：“楊家公社殺掉鍾佩英母子三人後，消息很快傳開。同時，全縣普遍流傳‘四類分子要造反，先殺黨，後殺幹，貧下中農一掃光，中農殺一半，地富作骨幹’。加之在這個時間裏，有四個區搞出了七個反革命組織(假案)，逼供出一個‘綱領’，即‘八月大組織，九月大暴動，十月大屠殺’，氣氛十分緊張。在當時無政府主義氾濫、法制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下，從8月17日開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區，先後召開社隊幹部會議，動員部署殺人……”

○據統計，道縣事件在當地造成的死亡人數達4519人，其中4193人被殺，326人被迫自殺。

○主要殺人手段：槍殺(含步槍、獵槍、鳥銃、三眼炮等)；刀殺(含馬刀、大刀、柴刀、梭鏢等)；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稱“放排”)；炸死(又稱“坐土飛機”)；丟岩洞(一般都輔以刀殺)；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廢窖裏，故又稱“下窖”)；棍棒打死(含鋤頭、鐵耙、扁擔等)；繩勒(含勒死和吊死)；火燒(含熏死)；摔死(主要用於未成年的孩子)。

○殺人酬勞：道縣當時每殺一人的報酬一般是2至3元或10斤穀不等。有的經濟寬裕的大隊每殺一人給殺人者5元。

以上多數材料來自謝承年《道縣“文革”殺人遺留問題處理經過》一文¹²²，與我所知的大體接近——我的一位熟人在事發當年參加過軍地聯合調查團，對該案進行過調查。

就像他們知道的那樣：後來幸好有一名幹部不顧交通中斷徒步趕到軍分區，通過軍隊通訊系統向中央緊急電告，才引起了高層重視。中央軍委直接干預，陸軍第47軍某師緊急出動，星夜兼程進駐，用飛機播撒《緊急通告》，宣佈取締所有的“貧下中農法庭”，才使殺人浪潮未進一步蔓延。幾個主要的責任人後來受到法律制裁。因受害者遺屬鳴冤不服，直到“文革”後1984年，才有一次更大規模的清算，包括“紅聯”頭目在內的一千多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幾十人被判刑。

毫無疑問，長期的“階級鬥爭”是這一事件的鋪墊，管制真空則使悲劇大勢所趨。據我所知，這一事件中充滿了騙子和屠夫的身影。“紅聯”揚言“四類分子要暴亂”，是欺騙；“紅聯”與“革聯”互指對方是“四類分子”的保護傘，也是欺騙；盛傳某革命元勳來電支援他們的“革命行動”更是欺騙……在另一方面，殺人者都有不乏崇高口號，“紅聯”與“革聯”之間比誰更紅的對抗，比誰更堅定、更勇敢、更高尚、更不講私情的競爭，使局面愈發不可收拾。在那一刻，常人也未必不會肆虐，因自己一生清白和

122 該文載《炎黃春秋》雜誌2010年第11期。

一片赤誠反倒可能殺得更少猶豫。我後來就在道縣見過兩位農民，正在集市街頭賣竹墊或拉大車——難以置信的是，經當地朋友指認：他們的手上確有過血污。

事實上，歷史上的大規模暴力通常都是貌似“純潔”的暴力，極端主義通常都是“純潔”的主義，一般都籠罩在國家、民族、階級、人民、正教天道等神聖光環之下。這些事大多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壞人”所為。參與者並無做賊心虛的內心忐忑，倒是其理似足，其氣必壯，因此無論殘酷度還是為害面反而大大超過普通犯罪。這種超級暴力最可能輔之以動人詩篇、慷慨呼籲、少女獻花、民眾夾道歡呼——只要我們換邊站，便會覺得這一切並不扎眼。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一些有關朝鮮人“投毒”“強姦”“安放炸彈引發地震”的謠言，導致日方亂打亂殺，殺朝鮮人約6000，滅中國人約700¹²³。但對於很多日本人來說，確保國家與公民安全是一件再俠義不過的事。1789年法國大革命，幾條貴族勾結德國人前來掠殺的謠言引起全面內亂，一時間殺風四起，血流成河，竟釀成約四十萬法國人死於非命¹²⁴。但對於很多當事人來說，粉碎外敵入侵同

123 見1975年8月28日日本《每日新聞》，轉引自2011年3月14日出版的《青年參考》雜誌。

124 見喬治·勒費弗爾(Georges Lefebvre)《法國革命史》，商務印書館，1989年。

樣是一件再崇高不過的使命，吃喝嫖賭者倒不一定對這類閒事上心。

同樣慘烈的是發生在歐洲、阿拉伯地區、非洲等地的宗教迫害，連知名人物伽利略、布魯諾、聖女貞德等未能倖免於難。在黑壓壓的教民那裏，肉體慾望的關閉，反而憋出了精神的狂亂；個人記憶中的清苦與虔誠，反而構成了一份危險的心理執照，提供了給暴力包裝、漂白、去罪化的自我說服——這同“道縣事件”頗為相似。1572年8月，法國天主教勢力對基督新教的雨格諾派發動攻擊，從巴黎擴散到圖盧茲、波爾多、里昂、布日、盧昂、奧爾良等地，竟持續了好幾個月，死難者多達十萬，以至屍體堆積在河裏長達數月，沒人再敢吃河裏的魚。然而羅馬教宗非常高興，鳴鐘慶賀勝利，發行紀念錢幣。巴黎詩歌和音樂學院的創始人安東莞·德·巴伊夫還寫下了百般讚美這次殺戮的十四行詩。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的“獵巫”運動，致歐洲很多地方的殺人潮此起彼伏。為了剿滅那些隱匿在人間的邪魔與災星，確保人類的幸福家園，某個城鎮不時燈火齊明，一陣呼嘯，教民們傾城而出，沖向某一戶人家，拖出一個老太或大嫂，一路羞辱與暴打，最後拉到某個地方當眾吊死或燒死。據史料記載，這一場歷時數個世紀的“獵巫”，使二十萬人喪命黃泉，其中絕大多數為女性，男性

通常是她們的丈夫、父親、兒子¹²⁵。

那年月的歐洲已大體走出所謂“黑暗的中世紀”，時值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科技革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相繼發生，在很多人眼裏正是文明普照大地之晨。如果我們能夠理解那些與莎士比亞、達·芬奇、培根、笛卡兒、伽利略、莫里哀、開普勒等同時代的啟蒙男女，那些不乏誠敬、溫雅、戒律、藝術感的歐羅巴人，也參加燒死女巫的起哄，為何不能理解中國“文革”中的雙重人格？反過來說，如果我們目睹了“文革”，對地球那一邊的“獵巫”又有何不可思議？

沒有這種理解，就不會有夠用的政治警覺。

下一幕暴力便還會有機會。

多面人與多面上帝

文獻是史學家們手裏最重要的工具。他們醉心於原始資料的白紙黑字，其論文常常掛載長長的索引注解，如同一個主持人操縱諸多他人的節目。

深挖文獻確保了言之有據的好學風，提升了研究的可信度和準確性。不過“文革”中的很多

¹²⁵ 參見布里吉斯((Robin Briggs)《與巫為鄰：歐洲巫術的社會和文化語境》，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白紙黑字卻不可當真，需要知人論世的小心甄別。我在鄉下遭受批判，黃隊長的發言聽上去相當惡毒，“臭知識分子”“王八蛋”“老鼠屎”一類都是極左腔。這樣的批判文字若落到有些研究者手裏，黃隊長活脫脫就是一個魔頭。但實際情況是，他越這樣胡說八道我越高興，拍桌子瞪眼睛更讓我放心，因為他大帽子下開小差，排除了我偷蓋公章那一更危險的把柄。他越是同我切割，越可能繼續當隊長，繼續充當我的保護傘，後來的通風報信和准假放行也才有了可能。

白紙黑字哪能還原這一切？由此可知，文獻誠然重要，但文獻往往只是冰山一角，構成其龐大底部的具體情境卻隱匿莫見，通常是更深遠也是更重要的真實。特別是在“文革”的政治高壓之下，多數國人深通偽裝術，擅長丟卒保車、指桑罵槐、聲東擊西、陽奉陰為、先予後取、棉裏藏針一類中國功夫，即便口吐真言，也可能是三句裏藏半句，需要後人小心地提取，辨出哪些是難言之隱，哪些是言不由衷。從黃隊長到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諸多言說，恐怕都只能如是觀。

“利用反面教材”的最高指示，是當時很多青年接觸異端思潮的保護傘，於是英國唱片，俄國畫冊，法國或美國的小說……曾一度成為他們爭相打開的文化窗口。為了確保行事的合法性，讓告密者說不上什麼，他們往往會在作品封皮上

批一個“大毒草供批判”——你能把這些文字當真？

劉少奇、鄧小平倒臺後，不少人借力用力。要求回城的知青也好，要求轉正的臨時工也好，連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一些知識分子，都拍着胸口聲稱自己深深受害於“十七年黑線”，一心靠正義而偉大的“文革”來伸冤平反。我所在學校的一批教師就組成過這樣的“黑鬼戰團”，到處貼標語和散傳單，一再憤怒地上訪請願——你能把他們的趨時言語當真？

……

要求一些外國人看清這個謎局，當然是苛求。其實不少中國人對此也一頭霧水。“文革”最火爆之際，1966年到1968年間，幾乎全體國民都佩戴毛主席像章，都高舉毛主席畫像，都懷揣毛主席的紅皮語錄本，都振臂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似是清一色毛派，鐵板一塊的紅色御林軍。但毛澤東說話很多，方方面面都說過，於是最容易成為一個兼容性極強的符號，兼容各方利益訴求，兼容普天下的隱秘心機。民眾沒有反對他的自由，但有解釋他的自由，有斷章取義、牽強附會、強詞奪理、為我所用的可能，絲毫不妨礙大家各行其是。毛澤東思想的多義化，使看似統一的奉旨造反，實際上成了五花八門的假詔執法。這個“毛派”與那個“毛派”唇槍舌劍，這一夥“毛派”與那一夥“毛派”拳腳相加，這一時期

的“毛派”與那一時期的“毛派”南轅北轍……多義化淪為一地雞毛。哪怕兩口子在灶台前頂住了，糾纏於炒蘿蔔該切絲還是該切片，一旦情緒上來，一旦急紅眼，他們也可能扯上“態度”“立場”“路線”，確有些無厘頭，太像十八扯。意識形態用語怎麼聽也缺乏邏輯性以及可識別性。

誰要把這一切當真，誰要是靠這些口水沫子當文獻專家，當然是為難自己。由此判斷哪些人瘋了，其實是自己先一步瘋了。

這就像後人觀察歐洲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的基督教分裂。在1879年非宗教思潮在法國浮出水面之前，基督教獨大，教會內部各派無不尊奉基督，無不高揚上帝之旗，所有反基督教思潮仍以基督徒的面目出現，並不直接地逆宗叛教。他們眾口一詞的“奉主護教”，類似前面所說的中國人“奉旨造反”，大家都會在胸前劃十字，都會拿聖經說事，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上帝。有的是利用A上帝做科研，有的是利用B上帝倡神學，有的是利用C上帝鬧民主，有的是利用D上帝謀保皇，有的是利用E上帝發動戰爭，有的是利用F上帝勸和促談……對這一個“同名不同姓”的上帝團隊大驚小怪，是否自己已有些奇怪？

撥開歷史長河上一些泡沫，任何一個社會都是大活人的社會——意識形態口號有時是真容，有時是假面——在需要假面的時候。

這裏不妨清理一下“文革”中“造”與“保”的一團亂麻。約定一下：這裏的“造”通常是指英文裏的 Rebellion 和 Radical Factions，“保”，即 Conservative Factions，則是指保守、正統、衛道的一方，一般情況下與權力當局有較多聯繫。

前造後保或前保後造

前面提到過“長沙市高等院校紅衛兵司令部”。他們是元老級造反派，最早喊出“不相信工作組，不相信市委，不相信省委”的口號，令地方黨政主官們相當惱火，其中一些學子險被他們派出的工作組打成反革命。不過這是1966年夏天的故事。半年之後，學子們受到中央肯定，受到奉命支左的軍隊青睞，一躍而為主流派，與軍區首長走得很近，便成了秩序黨，眼看就有坐交椅、進班子、掌大權的機會，嘴裏難免多了一些中規中矩的文件腔，於是被“反軍派”斥之為“保軍派”的既得利益集團。雙方足足爭鬥了將近一年。前面提到的那場武鬥，就是一些工人對那些“眼鏡鬼”和“狗秀才”訴諸武力的一幕。

與之相反的是：當地元老級的保守派“紅色政權保衛軍”，與北京的紅衛兵“聯動”¹²⁶組

¹²⁶ 聯動的前身是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西糾)、東城分隊(東糾)、海淀分隊(海糾)、宣武分隊(宣糾)，其骨幹多為官員子

織相似，與上海的“紅總部”相似，其骨幹多為官員子女，一心保衛地方黨政機構，從官方獲取過摩托、經費、辦公樓等優厚資助，穿上父輩的軍帽、軍鞋、軍大衣引人矚目，對黑色群體的抄家、遊鬥、群毆最為狂熱，構成了“文革”中最早一波暴力。不過這也只是1966年夏天的故事。半年之後，隨着他們的父母以“走資派”的罪名紛紛下臺，整個組織迅速瓦解，不少成員悲憤滿腔，對毛澤東心懷怨恨。這些人在日後的歲月裏或是組織地下團夥，或是轉而參加其他造反派，以至1976年“四·五”天安門民主運動中，不少活躍的身影就來自這一群體。

時隔半年而已，誰是“造”？誰是“保”？
是不是不容易看明白？

內造外保或內保外造

“新北大公社”是北京大學聶元梓麾下一大群眾組織，在全國遍設聯絡站，通常支持各地造反派，與很多黨、政、軍首長結怨。它與“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一道，曾被很多人視為全國“文革”的第二中央。但熟悉內情的人知道，聶元梓在校內完全是另一副面孔。她本身就是來

弟。隨着運動矛頭指向他們的父母，他們於1966年宣佈聯合組成“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反對“迫害革命老前輩”，反對毛澤東以及中央文革小組。

自延安的黨內高幹，兩任丈夫也都是高幹。因得到過毛澤東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中高度讚譽，她從運動一開始就在學校登基掌權，一統北大天下，人稱“老佛爺”和“太上皇”。當校內“井岡山兵團”造反，她不但祭起血統論大旗，在宣傳材料宣稱自己一方是“根正苗紅”，“天生的無產階級左派”，指責對立派出身於“地富反壞右”或“反動知識分子家庭”，是一些必須橫加掃蕩的舊時代餘孽。保守派的邏輯和言詞，在她那裏幾乎應有盡有。

與之相反的是：國防科技大學所在地原屬解放軍341部隊，一個軍事工科大學，與我所在的中學僅一牆之隔。該校領導級別高，與省軍區首長同吃軍糧，但交往不多，甚至頗有嫌隙與磨擦，具體情況外人莫知。軍隊院校的“文革”啟動後，這個學校裏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委員會”，簡稱“大聯委”，在大牆內大造校領導的反，一走出校門卻支持省軍區，以院領導之敵為天生之友，奉行“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這一主流邏輯。他們把軍械庫裏的武器都給了“保軍(區)派”，派出人員給“保軍(區)派”充當軍事顧問，被地方造反派切齒痛恨。一旦中央表態否定軍區的“錯誤路線”，他們也就糊裏糊塗蕩了，同其他保守派組織一樣雲散煙消。

一牆之隔而已，誰是“造”，誰是“保”？
是不是也不容易看明白？

上造下保或上保下造

我在農村遇到過一位中學校長。他出身貧農，沒什麼歷史問題，只因自己讀過高中，在當地算是學歷最高，所以招風惹事，在運動初期被當作“小鄧拓”¹²⁷、“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教育黑線的代理人”，飽受群眾批鬥，差一點鬧得家破人亡。他對造反派的痛恨也由此而來，以至多年後還拒絕與有些同事來往，遇到什麼紅白喜事，若那樣的傢伙在，他一定拂袖而去。有意思的是，此人有一個哥，在省城官居處長，卻是省委機關造反派組織“永向東戰鬥兵團”骨幹，批鬥省委書記一類十分活躍，曾被入選什麼“奪權”的談判代表。

我的疑惑在於，一家倆兄弟，為何一個區區高中生被別人造反，揣着大學畢業文憑的倒在造別人的反？為何小小校長成了“走資派”，倒是處級官爺混在草民群眾中，倒成了“造反派”？更有意思的是，倆哥們湊到一起，該敬酒時相互敬酒，並無勢不兩立之態，說到對方處境時更是打抱不平，感同身受，同仇敵愾。他們或“造”或“保”的意識形態似乎蕩然無存。

看來，利益都是相對的利益。富人眼中的

¹²⁷ 鄧拓，雜文家，曾任《人民日報》主編和社長，與吳晗、廖沫沙一道被誣為“三家村”反黨集團，是“文革”中文字獄的第一個犧牲品，於1966年5月18日逝世。

一百元簡直不是錢，拿到窮人堆裏卻可能是鉅資。“利益感”依不同情況微縮或放大。權力也是這樣，因置於不同的空間而造成感覺多變，遇權力大戶時會相對失重，遇權力小戶時會相對增重，傳導出不同的心理信號。

若拿社會學的尺寸量一量，無論看薪資，還是看權勢，還是看實際生活狀況，當哥的似乎更應該被運動衝擊，當弟的更應該樂見政治洗牌。不妨設想：如果那位弟調入省委機關，他的學歷不足為奇，級別只夠墊底，在三六九等中叨陪末座，上面那些長官數不勝數。別說運動不會顧及於他，依屁股指揮腦袋的常理，他還極有可能參與興風作浪。換一下位置，如果那位哥下調縣域，成了縣委書記或縣長，是民眾視野中最扎眼的大人物，別說他沒資格造反，據出頭椽子先爛的常理，他最可能被亂民們揪到臺上去掛黑牌。

由此可知：

位於社會上層的造反派，不一定不是潛在的保守派；

位於社會下層的保守派，不一定不是潛在的造反派。

他們的際遇決定態度，位置決定觀念，有時只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比如一紙人事調令，就改變了他們的政治生涯。

“文革”就是這樣萬象紛呈和千變萬化，構

有一種和平時期的反常內亂。與駱思典、安德佳等同行相似，美國學者華爾德(Andrew G. Walder)也回到利益視角，在《北京紅衛兵運動》一書中指出，“文革”中的各種政治態度通常受制於當事人的社會利益，包括“與權力結構中的關係”，“更好生活水平與前景預期”，“那些旨在掩蓋自我利益的毛式修辭下隱形的群體利益”等¹²⁸。相對於很多人把“文革”看成瘋子的胡鬧，一大堆電腦中的亂碼，這些學者辨識利益動機，梳理行為邏輯，表現出更多的細心，已有很大的改進。正常人——或說“利益理性人”的面目輪廓開始在這種敘事下浮現，一齣殭屍劇重現人的體溫和脈跳，還有真切可辨的面容。

他們的不夠之處，是比量尺度還過於單一，缺少相對的、動態的、多樣的視角，因此處理更複雜現象時也許舉步維艱。比如“出身好”與“出身不好”，不失為一種重要的區別依據，但如前所述，半年以前與半年以後的故事不一樣，一牆之內與一牆之外的故事不一樣，身處社會上層或社會下層的故事不一樣……在不同的博弈棋局裏，定數之外有不同變數，如果以“出身”解釋一切仍是冒險。

任何一個“文革”的過來人，都不難在自己

128 “. . . group interests were submerged in a Maoist rhetoric that masked self-interested aims.”引自*Fractured Rebellion –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by Andrew G. Wald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的記憶裏，打撈出對於這種解釋公式的幾件反證。當然，這倒不是說華爾德胡扯，只是說亂中有序，複雜中有簡單，模糊中有清晰——恰恰是這種“亂”證明了政治選位不過是因地制宜和相機行事，暗中卻伏有人們內在統一的邏輯：利益，特別是政治權益。之所以呈現為“亂”，是因為任何利益都非抽象之物，在實際生活中總是受制於不同利益關聯圈的結構。身處一個人口大國的十年，大格局是各種小格局的串結，大利益是各種小利益的疊加。前/後、內/外、上/下就是幾個可能交錯的基本關聯圈；親友、師生、鄰居等人脈關係，知識、思想、興趣等精神聯繫，作為非物態的“軟利益”在場，也可能形成更多關聯圈，以至一個本該參加保守派的哥們，純粹是愛打球，捨不下一群球友，反而附和了造反派。這種情況也不能排除。

幾個圓相切，一個圓心可能同時是另一條圓弧的切點，一條半徑可能同時是另一個圓的直徑。因此在彼此交錯的N個利益關聯圈裏，利益理性人很難是單面人，總是依據不同的逐利策略，呈現出N個面孔。《芙蓉鎮》一類電影囿於那些天使/撒旦、文明/野蠻、進步/反動的傳統二元模式，描述一種單色的、恒定的、絕對的“造”或“保”，乃至“善”或“惡”，無助於人們看清多面和多變的真實。

揣上這種人生路線圖闖入現實，沒幾個不碰得鼻青臉腫的。

這件事下面還要說。

利益理性與博弈規則

楊小凱取得美國博士學位，生活在太平洋那一邊，日後一直強調自己以前是“造反派”，不是“紅衛兵”，在意 Rebellion 與 Red Guard 在英文中的意味差異——這一點可證西方“文革學”的偏好與強勢。

中國的語境當然不一樣。因官方對“文革”的全面否定，因一些傷痕文藝作品的反復渲染，“造反派”與“紅衛兵”同樣惡名昭昭，幾乎毫無區別，都是“極左派”的別稱。

誰都願意給自己一個小羔羊形象，只會說別人是造反派。造反派麼，就是那個抽象的垃圾桶，模模糊糊的魑魅幻影，一些頭頂生瘡腳底流膿的紙上概念。在這種情況下，“前造後保”的只說後，“前保後造”的只說前，“內造外保”的只說外，“內保外造”的只說內，“上保下造”和“上造下保”的分別只說上和下……有些人說到激動處，悲屈得兩眼發紅，一肚子苦水沒處倒，甚至把自己的後知後覺偷偷前移，好像自己當年已是一個候補的遇羅克，一個漏網的張志

新¹²⁹，大義凜然，錚錚鐵骨，差一點被齷齪鼠輩割了喉管。

落到實處時大家都成了好人。換句話說，那些頭頂生瘡腳底流膿的書中概念從遠景變成近景，都有了可愛的微笑和動人的淚水。

這倒不一定全是謊言。十年間誰沒有一兩樁苦情，誰沒有幾分日後控訴的資格？1955年至1957年間，文藝界大管家周揚操盤過很多大案，其中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案幾經周折，最終形成沉重打擊，開除兩人的黨籍並撤職查辦。但丁、陳也不像省油的燈。早在1950年的《文藝報》上，陳企霞就發表過長文指控王林的長篇小說《腹地》“否定黨的領導”，致該書在書店全部下架，開創建國後文禁第一例¹³⁰——比周揚出手打擊俞平伯、馮雪峰、丁、陳集團等還要早。那麼周揚呢，就像很多人知道的，螳螂捕蟬不知黃雀在後，他在“文革”中也成了整肅對象，銀鑄入獄，被劉伯羽等人口誅筆伐。同樣，劉伯羽等人後來也成了整肅對象，被更左的一幫人落井下石……在這一過程中，誰是左派？誰又不是右派？誰是施害者？誰又不是受害者？

陰陽兩面，雌雄同體，這一現象給“文革

129 張志新，中共遼寧省委宣傳部幹事，因公開反對“文革”極左路線，於1975年4月4日被處死刑，年僅45歲。據報導：為了防止她在刑場喊反革命口號，行刑前先割斷了她的喉管。

130 見于繼增《建國後第一部遭禁的長篇小說》文，載《文史精華》雜誌2012年第6期。

學”增加了難度，也一再成為新時期的思考空白。白樺編劇的《太陽和人》照例是大忠大奸比拼，深切同情那些無私無畏又先知先覺的知識精英，其批判“文革”勇氣可貴，圖示化劇情倒很像此前的革命樣板戲，只能讓人急。對比陳徒手後來在《人有病天知否》¹³¹一書中披露的大量檔案材料，那種白樺應該相當熟悉的文化界普遍實情，那種“人人都有當髒手的可能”（陳徒手語），哪一種敘事更忠直，更有利於深入反思，其實不難判斷。但我無法表達不滿。因個別臺詞越軌，這部電影於1981年遭官方禁映。我豈能對一個受傷者展開拳擊，同一個缺席者辯論？因為一開始就政治化，這次禁映使正常的批評禁聲，有關“文革”的深入討論再度難產。一種棒殺和捧殺的前堵後截，讓很多人滯留在 yes 或 no 的低水平思考線。像我這樣的過來人可以從此感覺良好，免除有關“髒手”的自我追問。

並不是說“文革”過來人都手髒。就一般民眾而言，大多數人逍遙、觀潮、混日子、隨大流，該吃吃，該喝喝，該生孩子生孩子，探頭探腦打醬油，小便宜或小得意還在一分一厘地攢，並無什麼大惡。即便很多人被政策圈定在攻擊靶區，比如不幸身陷倒楣的文藝界或教育界，也不一定統統捲入絞肉機。他們當不當“髒手”，有無免遭政治高壓的可能，包括最終受不受迫害，

131 見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

受多大程度的迫害，受何種類型的迫害，又往往因人、因地、因時而異。

如果我們抵近觀察，便不難發現政治運動如同市場經濟，有盈面與虧面的區別，增長點與衰退點的區別。當事人的風險指數，通常取決於他在特定利益關聯圈裏的相對位置，取決於不同的運動形式和壓力來源，其命運軌跡各不相同。

官方主導時的“後位淘汰”

把“文革”十年看成一個樣，出自很多研究者的粗心。

實際上，十年間的權力大多由官方掌控，包括一頭一尾。“頭”是指1966年8月以前，“尾”是指1968年9月最後一個省級“革委會”建立後，黨團組織和政府威權重新復位。各地的情況略有差異，但民眾最為活躍時期，“踢開黨委鬧革命”的一段，包括大規模的奪權和武鬥，一般只限於1966年8月至1968年春，近兩年光景。後來的“批林批孔”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雖給一些造反派提供了復蘇機會，但均已漸行漸弱，未攪起多大風浪。

官方主導還是民眾主導，這一差別對於研究者無關痛癢，於當事人卻特別重要。因為前一運動方式是自上而下，由黨委、工作隊、革委會、軍管會等充當主角，官員們層層部署和閉門密

商，氣氛森嚴而神秘。倒楣的肯定是黑色群體，一些“死老鼠”必須一打再打，因為這些人位置墊底，肯定不服氣，肯定想變天，最可能留戀舊社會。其次是一些新黑類：如犯上作亂的出頭鳥，早入另冊的失意官員——通常被列為“內奸”“叛徒”“假黨員”的污點人物。據1966年北京一次紅衛兵抄家成果展覽披露：北京市抄家11.4萬多戶，上海市抄家8.4萬戶，天津市抄家1.2萬戶，就是這些人受到的第一波衝擊。另有資料顯示：北京紅衛兵打死1772人，其中佘山大教堂的馬神父、原國民政府駐法國肖姓參事等被活活打死。上海市“四類分子死亡數為毆打致死總人數的45.5%；受傷比率為24.8%；被剃頭比率為26.3%，在各人員分類中均列高位。”¹³²

具體到各地、各業、各級，這些受難者又往往有一個相對位置的壓力差序。這話的意思是，攻擊者總是在矮子中找高個，比如一個單位裏的黑色人物太多，那麼家庭歷史有大把柄者，即黑中的“較黑”“深黑”“最黑”肯定首先挨刀。我所在的中學就是這樣。我父親所在的機關也是這樣。1968年至1974年間全國大抓“五一六”分子也是從後位者着力——這一場據說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運動，打的多是造反派骨幹，特別是家庭涉黑者。當局需要集中力量 and 分化敵人，

132 見上海“文革”史料編纂小組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1994年。

因此未在群眾組織裏混過一官半職的，也無出身問題的小魚小蝦，可能暫避一時風頭。但運動不能沒有政績，不斷推進的運動得有不斷的政績，淘汰是一輪輪的收緊和加劇。隨着某些後位目標消失，候補者的中彈概率則必定增加。這幾乎是掐指一算就能明瞭的流水線進度。

一個人只要不是太笨，通常都可以從空氣中嗅出危險，即看出自己是不是身處“後位”或潛在的“後位”。

這裏的“後位”並不限指一二，也可能略超此數。

民眾主導時的“前位淘汰”

民眾鬧起來時便完全是另外一套法則。

他們的運動方式是自下而上，雖然也會掃蕩一下黑色群體，算是祭旗壯威，正名出師，彰顯造反派的“政治正確”，不沾包，講安全，但那常常是一些戰術假動作，真正的目標一定鎖定了當權派，即權力結構中的“前位”及潛在的“前位”。在這時，當官的是否廉潔不重要，是否能幹也不重要，是否勤跑基層與和藹親民也不重要，是否愛喝酒、會書法、有戰功、懂俄語更不重要……雞蛋裏挑骨頭，任何人的缺點集中起來都很像“官僚主義”和“走資派”。與其說他們因個人品質而中槍，不如說民眾手裏有了槍，他

們就必須是靶；民眾手裏有了錘子，他們就必須是釘子——他們被一種結構效應推到了可悲位置，當官就是原罪，在位掌權就是民眾天敵。集體主義發展方案下所壓制的某些個人利欲，也總是宣洩成對眼前幾張官員面孔的憤憤不滿，構成了“官民矛盾”的一部分。我的一位老街坊，家裏還餵着豬，小孩上學還穿開襠褲，窮得幾乎家徒四壁，只因受命主管一個國營理髮店，也嚇得神色不寧東藏西躲。“我是走資派麼……”他路遇我時的一句苦澀解釋，曾讓我大吃一驚，也啼笑皆非。

由此看出，身處哪一個行政級別並不重要。“寧為雞頭不為鳳尾”俗語此時應顛倒過來看。只要是“頭”，不論其利益關聯圈是一個理髮店，還是一個國家大部委，都不能不承受民妒、民怨、民亂的高壓聚集，不可能輕鬆過關。每一篇檢討書會被認為是“不老實的”“不深刻的”“花言巧語的”，當事人寫一千遍也白搭，自抽耳光也抽不來多少同情。如果此時有相對安全的官員，那一定是各種大“尾”小“尾”，其官階哪怕很高，只要不處在主官位置，便自有他人遮風擋雨。他們只需暗暗注意動靜，最怕的是排在前列的一個個倒下，自己這塊肉輪上砧板。

這種情景看上去很像權力領域裏的“吃大戶”，有一個就近取材、急事先辦的套路，一個先大後小、先高後低、先肥後瘦的流程。由此不難理解，1966至1967年間，特別是在城市裏，幾

乎每一個工廠、學校、機關、商店、醫院、劇團、幼稚園的一把手都沒好日子過，一律灰頭土臉。市級造反組織必然劍指市領導，省級造反組織必然劍指省領導……這一鐵律幾無例外，故全國性造反組織的危險不難想像，只能被中央一再下令禁止死堵嚴防。頃刻之間，全國29個省級黨委的第一書記中有23個被打倒，中央和國家機構中60%–70%的“前位”面孔在公眾視野中消失¹³³。留下來的，多是因中南海直接干預才倖免於難，如湖南的華國鋒——後來被毛澤東指定為接班人。不過，“炮轟”“火燒”“油炸”華國鋒的大字報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仍然多見，可見民眾不是沒有淘汰意願，只是淘汰一時受阻，暫咽下一口悶氣。

他們根本不以“革命路線”和“反動路線”的標準來選擇攻擊目標——這肯定大出毛澤東意料之外。由此造成幾乎所有黨政主官對“文革”總體性的不滿，也肯定讓毛澤東十分棘手。他後來承認“打倒一切”和“全面內戰”是兩大失誤¹³⁴，卻從未說及原因，也從未往深處想。

真實的原因是，他的革命議程與民眾的權力要求一開始就出現了錯位，不過是兩條線有部分交集。這一點可能多年後才能被人們看明白。

133 見克萊因(Donald W. Klein)等編撰《第九屆中央委員會》，載*The China Quarterly* no. 45, 1971。

134 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知識分子面臨的雙向淘汰

知識分子最慘，通常是兩頭招風，兩頭受擠兌。特別是他們的中高層，大多學歷高，知識多，名聲大，範兒酷，其薪資定級和闊綽程度可能高過長官，在民眾眼裏算得上“前位”或潛在的“前位”。但他們的履歷和家庭背景又多不好看，比如老爹曾為地主，自己在歐美留過學，參加過三青團或國民黨什麼的，還個性強，心氣傲，腦子活，藏也藏不住，裝也裝不像，在很多官員眼裏怎麼看也是“後位”或潛在的“後位”，最像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臥底。

因此，無論官方發力，還是民眾發力，他們差不多都是在劫難逃。外婆不疼，舅舅不愛，官員不親，民眾不近，他們是官員、民眾、知識精英這三角關係中最脆弱的一極，總是烤雙面焦。

據說只有名醫在“文革”中受衝擊最少，原因也許是大家都得惜命，不敢拿自己的冠心病或直腸癌去賭政治。但對於很多教授、作家、主編、明星藝人而言，雙向淘汰則無異於全線撲殺，幾乎是一回事。只要高音喇叭裏的聲調開始雄壯和激昂，他們必定心驚肉跳，朝不保夕，包括不少千辛萬苦回到祖國的報國之士，一不小心便被淘汰到“牛棚”這種土監房，不免心中五味雜陳，衷腸誰與訴。與他們一同落難的有“走資派”，也有“造反派”，但那些人或有解脫之

日，身負雙重原罪的精英們卻如永久難民、運動釘子戶、到處通用的拳擊沙袋，對世事變幻幾無期待。作家葉蔚林曾向我描述過絕望。有意思的是，他的故事之一，是下放農村勞動後仍被大家揩油，今天張三借錢，明天李四借錢，把他當成提款機，提了多是有去無回。他怕得罪官員也怕惹惱農民，從不敢去索要——不過這種憶苦也可讀解成炫富，甚至有美化社會主義之嫌。想一想，誰讓他成了提款機？誰讓他的收入高到官員不服和民眾嫉恨的程度？有關事實是，除了丟掉公職的，大部分知識分子的高薪在“文革”期間受到政策保護。不過，也許正是這一條為他們招來了更多陰暗心理的壓力，升高了人際關係的敏感度。一旦撞上來自上方或下方搜索目標的眼光，不會是好事，更像是壞事。

鄧拓、老舍、嚴鳳英、楊朔、儲安平、傅雷、翦伯贊、上官雲珠、范長江……是這個群體中的最不幸者，可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每一名字都飽含淚痕與血漬。其他人即便能一直享受高薪和幹籍，對“文革”也多有切膚之痛。一般來說，“文革”前他們那些優待房是再也回不去了，就算發還給他們，他們也不敢住了。“文革”中他們那些被抄走的存款、字畫、古董，即便在“落實政策”時予以退還，他們也餘悸難消，多用於交黨費或捐災區了。他們後來覺得“全盤否定”論最合心意，其理由很簡單：既然

十年中的各種老面孔和新面孔，對於他們來說都不是好面孔，那麼分出不同階段有何意義？分出這一群和那一夥又有何意義？官也好，民也好，大多沒什麼教養，張嘴就可能有錯別字，出手就可能動粗見血，不懂微積分也不知商籟體，辦起案來更不知隱私權和辯護權為何物，連人名都一個個叫得粗俗無趣，無非是“建國”“建軍”“愛民”“金貴”“阿福”“援朝”“土改”一類。十八世紀的愛爾蘭學者伯克(Edmund Burke)對法國大革命的厭惡，在他們聽來一定很對心思：“一名理髮師，或一名蠟燭製造者，其職業不可能成為任何人眼中的榮譽，更遑論其他一堆更為次等的職業了。這些人不應受到國家的迫害，但如果這些人被允許進行統治——無論是個人的還是集體的，國家反而會受到了這些人的迫害。”¹³⁵ 不是麼，那些個老土疙瘩，一些掌了權和沒掌權的理髮師，竭誠奉獻才學超群的一個教授怎麼能忍受這些人的唾沫星子？

有些人後來說什麼“人民的文革”(楊小凱、鄭義、朱學勤等)，所謂底層的自由狂歡，與他們的記憶根本無法接軌，在他們看來很像小屌絲們的胡謔。也許就是出於這一層隔膜，《幹校六記》的作者楊絳文筆清雅，才學豐饒，廣受學界敬重，但她在書中斥幾位下鄉知青為“狼崽

¹³⁵ 引自伯克《法國大革命感想錄》，載《艾德蒙·伯克讀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

子”，對他們的饑寒之狀幸災樂禍¹³⁶，曾讓很多年輕人吃驚——他們也是受難者，至少比作者受難更多，比如不像她那樣一直保留高薪。他們不明白，同是受難者的感受為何並不能相互對齊。

人們的思想都依託感覺根系，不是語詞的隨意漫遊。中國很多知識精英日後對紅色革命的總體性抵觸，不無情緒的右傾化，應當說事出有因。2011年，即便在西方經濟遭遇重挫之時，據全球知名民調公司 Globe Scan 的數據，中國人對資本主義的支持率仍高達67%，幾乎是全球最熱切的嚮往，連續五年超過美國，更超過英國的55%，法國的31%，土耳其的27%¹³⁷，成為對西方世界最大的一個獎牌。撇開市場經濟發展順利的原因不說，活躍在這一數據幕後的，當然還有中國諸多媒體、院校、學術機構，有知識分子引領的所謂民間清議，以及某種歷史記憶的湧動。

從這一點看，“左”經常成為“右”的母胎，“文革”對知識分子群體的雙向傷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清議主流的回擺力度¹³⁸。

或許，很多人一旦覺得自己活明白了，對二十世紀前期的革命亢奮，對莽夫粗婦的登堂入

¹³⁶ 該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

¹³⁷ 轉引自2011年4月13日《國際財經時報》。

¹³⁸ “右”也可以成為“左”的推力，如1950年後西方主導對中國全面經濟封鎖，增加了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的難度，隨後出現的反共迫害浪潮(如印尼、越南、韓國、臺灣等地)，也勢必從反面加劇中國的冷戰敵意和政治嚴酷性。

室，一開始就不會熱心和放心到哪裏去。

以上簡約勾勒，不可能詳盡給出“文革”中的風險警示，更不是給未來可能的權力社會提供居民安全指南——這種客服工作該由MBA之類去做。說及這些的目的，無非是要澄清“文革學”的一片渾水，濾去某些宮廷化、道德化、訴苦化的敘事泡沫，盡可能還原國人一個政治權益分佈和流動的簡圖，一個眉目稍顯清晰的生活原態——哪怕是還原第一步。

不難看出，在這樣的日常生活裏，巨大的歷史之手還是利益理性，即大多數國人自覺或不自覺的利慾攻防。

革命意識形態固然反映和重申了舊的利益關係(比如貧/富)；但一個全能而單質的權力體制下，新的利益形態和利益關係(比如官員/民眾/知識分子等組成的多邊形)溢出了既有解釋框架，常處於無名狀態。前者是過去時的，後者是現在時的。當兩種利益關係一明一暗地相互纏繞，一舊一新地發生交集，當“文革”發生在這種纏繞和交集之中，諸多亂象其實不是亂，只是陌生；不是怪，只是未知。只有把利益奉為聖物(如某些右翼)，或把利益貶為罪孽(如某些左翼)，才會不約而同地說遍天下利益卻單單撇下“文革”，將其視作瘋狂或神奇的例外。他們在這一塊現實前詞彙短缺，談論“利潤”“階級”“所有制”之

餘，尚不知自己還應說些什麼，還能說些什麼。

一種分辨率更高的理性透鏡有待出現。革命者從“打土豪分田地”開始，其實是最不該忘記利益的。喜兒、大春、吳瓊花、小常寶……這些現身於革命劇碼的苦命人其實都是利益打拼者，因打拼無望才轉投革命。在通俗版的馬克思主義那裏，階級決定論就是利益決定論，階級鬥爭就是“爭奪粗鄙物質利益的鬥爭”(本雅明語)。這一說法在很多情況下並無大錯。不論超凡脫俗的崇高精神是如何厥功甚偉，創造過何等炫目的人間奇境，唯物論者也沒理由忽略利益，忽略自己勝利之途的出發點。這個話題應大大方方來談，像一個會計師或企業家那樣來談。

儘管利益並非一切，儘管人性、慾望、利益的形態總是多樣化，儘管新的利益在一個權力社會裏主要表現為政治榮譽、政治安全、政治地位、政治權力，要看清楚並非易事，但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廣義的“無利不起早”仍是行為邏輯的核心，是社會各方應力發動的隱秘磁極，是新謎面的謎底，與舊謎底並無太大的不同。說到底，這仍是一個世俗的尋常故事，不過是資本主義乃至封建主義的故事披上了一件新馬甲，如此而已。

失去這一基本點，失去這一涉嫌庸俗甚至不無銅臭的視角，差不多是原版馬克思甚至亞當·斯密的視角，歷史分析就變得無從着手，也必然誤訛紛起。

可惜，在很多人那裏，“利益”一詞讓人羞於啟齒——不少“文革”參與者尤其如此。他們曾戴上道德假面，指點江山，縱論天下，理想與信念熊熊燃燒，但他們日後將如何看待這一切？某個夜深人靜之時，他們是否迎面對撞過記憶中自己的某些隱秘閃念？如果他們有足夠的坦誠，也許不難發現事情的另一面：愚忠是表；利己是裏；失態是表，庸常是裏；被意識形態玩的是少數，玩意識形態的才是多數。其中最內在的意識形態說到底還是一個俗：回家的自由，說話的底氣，鄰居的臉色，家中的早餐，床墊是否舒適，兒女是否受人欺辱，娶來的老婆是否漂亮……只要稍加翻譯，這些幾乎都是經濟學的尋常內容。

指出這種君子的高仿運動，並不是視利慾為超級香餈餈，也不是說自利與極端自利沒有差別。全世界永遠都有“好人”這類褒義詞，在任何地方也不會有人罵出“你怎麼好得這樣無恥”一類瘋話，足以證明好壞是有分別的，好人還是有的，大好人還是有的。不論何時，道德還是人心所向，理想與信念還是社會公益的長效保障，一種永遠燦爛的精神傳薪。同樣，這也不是否認道德進步的可能。就個人而言，既然有好人變壞，當然也會有壞人變好。最初喝不了酒的人，喝多了可上癮。以前聽不慣京劇的人，聽多了可入迷。習慣可成自然，克制可變本能。眾多高仿品牌的君子，其仿製工藝積累到一定程度，也可

能修煉出“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孔子語），其心智出現質的變化，達到直心即道場的境界。事實上，確有不少人在紅色中國實現過道德昇華，血管中奔流過可貴的熱情。他們日後唱紅歌興致勃勃，並不一定意味着全面留戀“文革”，不過是一種惚兮恍兮的精神懷鄉，對自己高仿經歷深情回望。即便懷疑當時的自己有幾分假，但半假清高也比全面惡俗值得珍惜；即便懷疑當時的人際關係有幾分偽，但半偽溫暖也比徹底冷漠讓人舒心。花紅和月圓的短暫並不損其美好，崇高及仿崇高哪怕只是一時半刻，也往往是記憶中最柔軟的一角。一個什麼生意都做過的不法商人，當年響噹噹的熱血青年，一到歌廳包廂就命令所有的陪酒小姐大唱紅歌——這就是我身邊的故事，曾被我寫入《暗示》一書。

他的歌喉與他的一肚子壞水完全可以分頭管理。

然而，無論有多少人修成正果，人類就大多數而言，就大多數人的大多數時段而言，其道德進化是否可能，或說進化的上限有沒有，有的話究竟在哪裏，仍面臨巨大爭議。這是必須重提的一大哲學難題。馬克思主義學者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與自由主義學者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同為國際思想界大腕。他們在不少政治議題上形同楚漢，在“道德進化論”這方面倒結成血盟，共同描繪了一個美好前景。前者的

根據是“焚燒女巫”的消失和“男女同酬”的實現¹³⁹。後者的根據則是戰亡人數減少，尤其是考慮到同期人口總量，其比例在歷史上表現出明顯的一路走低¹⁴⁰。他們說的都是事實。他們所欣慰的社會改良並非不值一提。但他們考慮到現代文明之下隱性的酷刑和戰爭了嗎？迫於債務和失業的自殺在“焚燒女巫”消失後是否更多？貧富差距在“男女同酬”大體實現後是否更大？來自污染、犯罪、毒品、精神病、過勞死、交通事故、食品造假、金融危機、人肉炸彈的謀殺，與前現代的屠殺相比是否依舊防不勝防，乃至遠超巡航導彈“精確打擊”所攢下的人道紅利？……如果他們離開歷史的局部截屏，放眼更廣泛、更長遠、更新異的人間悲劇，有什麼理由相信無痛的創傷就不是創傷，曲線的謀殺就不是謀殺，那些間接的、軟性的、遠端反應的、延時反應的、甚至禮貌與合法的罪惡就成了道德成就？他們有什麼理由相信人類自有了交誼舞和博士帽，普遍人性從此優雅兮兮，正在從1G向2G、3G、4G……不斷優化？

較之於他們的樂觀與自信，章太炎的一份冷靜彌足珍貴。在《俱分進化論》一文中，他

139 見特里·伊格爾頓《馬克思為什麼是對的》，新星出版社，2011年。

140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by Steven Pinker, Viking Adult, 2011。臺灣學者錢永祥於《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40期撰文對此作評介。

認為技術與道德並非同步升級，文明不可能消除惡，倒是“昔日之善惡為小，今日之善惡為大。”“若以道德論，則善亦進化，惡亦進化。”“縱令地球統一，弭兵不用，其以智謀攻取者，必尤甚於疇昔。何者？殺人以刃，固不如殺人以術。”“使至於悲憤失望而死者，其數又多於戰。”¹⁴¹這一些說法不僅富含作者的佛學和儒學資源，也不難讓人聯想到一些自然現象，比如基因分子結構的自我複製——其對稱結構卻總是恒常，無法靠外力輕易改變。“天不變道亦不變”（董仲舒語），只要人類的群體性與個體性並存，只要這個最大的“天（自然）”未變，善與惡的纏繞就不會終止。當惡逼出了善，善便是正義之劍；當善慣出了惡，惡便是利樂之腐。這一互相誘發和互相修復的無限過程，受制於人的生物學結構，在機器人接管地球前當不斷出演。

一個人若想保持政治遠見，其最大難點無非是招準人性的基本面，洞察利益要求的不同變形，既能激發人們的趨上能量，又能承認、包容、善用、管控其趨下能量（比如還俗）。兩手都能硬——行“中道”者不會僅僅押注在一頭。

如果我們明白這一困境，或說這一常態，便不難給領袖神化和人民神化退燒，給“文革”減少機會。從某種意義上說，企圖以“不斷革命”

141 引自《俱分進化論》，載1906年9月《民報》第7期，後編入《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的方式徹底改造人性，創造“紅彤彤的世界”，盡掃官僚主義、特權意識、野心家、貪污什麼的於一役，正是“道德進化論”常見的奢求與冒進；以為財產私有制取消後萬惡盡除，民眾的逐利邏輯廢止，任何貪慾和傾軋都不足為慮，公平正義僅靠宣傳、教育、辯論等手段便足以永久保質，則表現出“道德進化論”的輕忽與天真。

前者使“文革”的目標虛高，後者使“文革”的舉措失誤。在這個意義上，一如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曾使啟蒙派措手不及矇頭轉向，“文革”不過是再一次對現代人盲目的道德樂觀當頭棒喝。

人類不是上帝，人類只能做人類可能做的事。

不能做上帝的事，是不是就該做魔鬼的事？既然民眾的一次次“還俗”難以避免，那麼是否一開始就該大張旗鼓地蠅營狗苟？不少人確實有過這樣的閃念。不過這種心機不便擺上學術枱面，於是“文革”結束多年後，儘管不少後現代才子忙不迭地絕望和虛無，被“解構”“祛魅”什麼的鬧得心神不寧，生不如死；然而在他們的書齋之外，就知識界主流而言，人類的自我神化衝動仍未終止。一種“道德進化論”的知識幻影仍活躍在市場神話、自由神話、底層神話、選舉神話等思潮中，為各種意識形態提供共同的荷爾蒙與興奮劑，提供進步主義歷史觀的高配型號，提供一種完美社會的前景。虛無一旦走出書齋就

可能成為輕信，一旦走向公眾就可能成為輕諾，很多現代哲學大師就是這樣喜歡換上童裝出門。這是鼓勵積極的人生態度嗎？也許是。對花咕啞一般的少年不應該大聲說出事情的嚴峻和兇險嗎？也許不應該。但健康和成熟的社會改革，從來都以正視現實為前提，是克服重力的奮力騰躍，不是夢中脫離重力的高高飄浮。

一個成年人不論在書齋內外，都應明白這一點。

結構性危機(上)

我們還是順着時間往下走。

1971年春，我還是鄉下知青，奉命參與挖防空洞，刷寫打倒“美帝”與“蘇修”的牆頭標語，扛一支梭鏢去路口輪崗守夜——其實幾個月下來，只是偶爾被野兔或老鼠驚嚇，沒遇到空降特務，也沒見狗地主殺人放火。好容易在路上截住一個形跡可疑者，事後查明不過是普通的魚販子，其緊張原因是天生口吃。

這種值崗很誇張也很無聊。我在大樹下哈欠滾滾時，不知一個乒乓球代表團和少數新聞記者已空降北京，成為第一批獲准入境的美國人。這一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訪華。第二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乘坐專機抵達中國。鄉下人到這時才吃了一驚：最大的資產階級頭子也成了中南

海座上賓，居然喝上了茅台酒？

接下來的問題有點說不出口：世界大戰不準備打了嗎？那麼鄉下幾個地主、富農、壞分子還鬥不鬥？

尼克松回憶了他抵京的一刻：

周恩來站在舷梯腳前，在寒風中沒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蓋不住他的瘦弱。我們下梯走到快一半時他開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國的習慣鼓掌相報。

我知道，1954年在日內瓦會議時福斯特·杜勒斯拒絕同周恩來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級時決心伸出我的手，一邊向他走去。當我們的手相握時，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

周恩來和我同乘一輛掛着簾子的轎車進城。在離開機場時，他說：“你的手伸過世界最遼闊的海洋來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沒有交往了啊。”¹⁴²

後人不難發現，結束全球冷戰其實從此刻開始。據說茅台酒讓美國人印象頗深。一位記者說，他覺得自己喝下了滿滿一嘴的剃鬚刀片。尼克松也說，這樣的酒沒拿去當航空燃料，實在太可惜。這樣輕鬆的酒宴氣氛，不僅意味着中美雙

¹⁴² 引自《尼克松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

方實現了互利選擇，因共同的敵人走到了一起，也顯示出雙方意識形態的軟化。當基辛格對街上的反美標語表示不快時，毛澤東笑着解釋：“那是放空炮。”¹⁴³

聯繫到毛澤東稱臺灣問題可“過一百年再說”¹⁴⁴，聯繫到他提出“三個世界”的理論¹⁴⁵，以及他對周恩來交代“現在可以不提當前世界主要傾向是革命”¹⁴⁶，可知“放空炮”並非戲語，有戰略性的反思一以貫之。對外開放的政策，“一國兩制”的構想……諸多大尺度調整均在此萌生——鄧小平後來不過是將其接力推進。退一步說，即便有人將這一切視為外交實用主義，但從不實用到實用，從不務實到務實，對治國者來說已品格大異。何況一種結束冷戰體制的大膽破冰，促成了世界史的一個重要拐點，其強大震波和深遠影響任何研究者也無法繞行。

¹⁴³ 見《白宮歲月——基辛格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年。

¹⁴⁴ 同上注。

¹⁴⁵ 1952年法國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索維(Alfred Sauvy)在《觀察家》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中第一次使用“第三世界”(third world)一詞，指美、蘇分別為首的兩大陣營之間一大批國家。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會見尚比亞總統時提出另一種三個世界的理論，即“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

¹⁴⁶ 轉引自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另據有關史料，當時的社會主義盟友(如阿爾巴尼亞)強烈反對中國這一戰略調整，斥之為“反革命的”“機會主義的新變種”等，見李肇星《說不盡的外交》，中信出版社，2014年。

必要的質疑是：為何“文革”這一段在外交方面並無大錯？倒是以中美、中日、中歐等關係的大步改善，開拓了後續改革的國際環境？如前所述，一些黨史專家認為“文革”失於“馬克思主義水平不高”，一些哈佛教授認為失於“民粹主義觀念”，但為何“文革”時的外交決策偏偏顯得“馬克思主義水平”高了不少，或“民粹主義”少了許多？同一時期，同一領袖集團，是否他們的腦子這一半糊塗而那一半清醒？這一半鈣化而那一半血旺？事實上，人腦並未兩分，不同結果只是源於信息採集管網的兩分，源於體制的兩分。鄧小平說：“單單講毛澤東同志本人的錯誤不能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一個制度問題。”¹⁴⁷“文革”中的外交恰好證實了這一點。外交是面向世界的，面向權力社會之外，面向“一元化”高度集權體制的管理邊界之外，因此既無歐洲或非洲的聖徒化來美化民情，亦無美洲或亞洲的警察化來誇大敵情，信息泡沫要少得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宣傳機器的這種自拍娛樂、擬真聲效、原始“水軍貼”只能內銷。直接來自境外媒體、遊客、團體、政治家、經濟數據、學術著作的信息，繞過扭曲機制，確保爭鳴與兼聽，失真程度大為降低。特別是在冷戰環境裏，逆耳的批評乃至惡意

147 轉引自張啟華《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正確書寫黨的歷史》一文，載《求是》雜誌2011年第3期。

攻擊，作為破壞性檢測工序，倒可能使耳聞者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更多幾分戒慎。

國際局勢撥雲見日，外交領域風景獨好，反證了“文革”的癥結不在於領袖。很明顯，事情主要取決於權力體制的覆蓋——陷入覆蓋時聰者也可能聵，跳出覆蓋時迷者也可能清。後人忽略這一點，便無法全口徑解讀當年，無法兼容當時相對意義下內迷而外清、內亂而外治、內困而外順的矛盾信息。

順便說及，不能全口徑讀取信息和接受事實，是當時也是日後意識形態偏執化的特徵。有些左翼的“半口徑”，是突出中美建交這一類事，但對個人崇拜、高度集權、長官經濟、政治高壓、文化禁錮、人權災難等輕描淡寫。有些右翼的“半口徑”，是只提道縣慘案一類事，卻對大慶油田、紅旗渠、合作醫療、社隊企業、“兩彈一星”、全民識字率等裝聾作啞。這種半盲對半盲的遊戲一直熱鬧，半癱對半癱的纏鬥可謂激烈。用立場修剪事實，用謠言取代論辯，靠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以爭取虛假的理論得分，便是最可能的下一步。“理性是激情之奴”¹⁴⁸，英國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這一無奈揭秘，不幸再一次被國人的口水仗所坐實。

見人不見體制，只可能把事情說亂。

1972年的前後其實差異很大。自有了“大躍

148 引自休謨《人性論》第2卷，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

進”的教訓，“文革”中的經濟發展大體穩健，效率不算高，但盲動有所減少。特別是1968年後秩序逐漸復位，公共汽車的一個個大氣囊絕跡，路途上的卡車和拖拉機開始多見，顯示燃油供應不再緊張。鄉村裏的富裕戶開始翻蓋新房。城市姑娘在挑選內衣和領口花邊。鄉下人用雞蛋來城裏換糧票。手錶、自行車、縫紉機、收音機成為民眾新寵，俗稱“三轉一響”，進入很多人婚嫁條件的清單。據國外有關資料，1966至1978年間國民收入增長率比1958至1965年間高出一倍多¹⁴⁹，其中糧食除1968年因氣候原因減少，在其餘年份均為增產；工業領域除1967和1968兩年衰退，1969年隨即恢復，然後年年攀高，至1971年已實現預定增長率¹⁵⁰，即“全國的10.2%”¹⁵¹……這些數據均不支援日後“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的誇張之語。恰恰相反，此時已有較多剩餘產品，溢出了平均分配的體制，市場經濟的初始條件趨於成熟。更準確地說，在必需品供給之外，消費升級出現了，所拉動的市場也悄悄浮現，只是困於意識形態和權力體制的障礙，它只

149 見馬若德和費正清合著《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海南出版社，1992年。

150 引自《政治衝突和中國工業的增長1965-1977》，載第95屆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編《毛以後的中國經濟》第1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0年。

151 引自馬若德和費正清合著《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海南出版社，1992年。

能以非法、地下、扭曲、殘缺的形態出現罷了。

一是“走黑市”。大約從1972年始，很多招工、招生無望的知青，特別是家庭背景較黑的那種，突然有了一條新出路，叫做“打機械流”或“打技術流”，即受聘於城鄉一些集體制或冒牌集體制的小企業，提供一些機械、電器、化工等方面的技能——我的很多朋友都捲入其中，算是不合法地離鄉脫農，自由就業。據《中國經濟年鑒》(1981)¹⁵²的統計，全國社隊(鄉村)企業由1966年的一萬二千家，膨脹至1976年的十萬六千家，若加上城市的“小集體”一塊，再加上未註冊的一塊，肯定是更大數目，足以吸納更多人力資源。作為萌芽級市場主體，這些企業處於國家計劃體制之外，俗稱“沒有出生證”的，“上不了戶口”的，其人力、技術、原料、銷售大多運行於黑市網絡，物流來往神秘，人們表情詭異，產權定位模糊，制度極富彈性，讓一些“黑工頭”“黑技師”“黑老闆”脫穎而出。我的幾位朋友突然一個個活得很滋潤，抽起了高價香菸，穿上了光鮮皮鞋，動不動就下館子，掏出一疊疊人民幣嚇死人。哪怕我後來供職於國家部門，在他們面前也是窮小子。但這並不妨礙他們一不小心就可能踩入牢門——有一次我曾給其中一位探監。對方的罪名是“非法銷贓”和“投機倒把”，賣過一些矽鋼片，製造變壓器的材料。據

152 該書由經濟管理出版社出版，1981年。

他說，那種雜牌變壓器銷路好得要命，可見市場需求之旺。

二是“走後門”。這個詞開始是指參軍、招工、大學招生等方面的官員以權謀私，屬於官官相護和權力變現，在1972年李慶霖給毛澤東的告狀信中有所提及，即“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此說法得到對方默認¹⁵³。到後來，“走後門”蔓延到官與民之間、民與民之間，連殺豬的、賣菜的、開車的、做賬的、把門的、查電錶的、醫院裏管掛號的、與車站有關係的、能搞到內部電影票的、與劉保管員他二舅媽認識的……都可能成為尋租對象，以其金錢、物品、面子、人脈、信息、技能等進入交易。青年們要買自行車，要買一輛有轉鈴(不是板鈴)、有脹剎(不是皮剎)、有包鏈(不是裸鏈)的時尚款，都可能要托關係，找門道，拍肩膀，陪笑臉，遞菸請飯。這當然在不同程度上加劇了不平等的利益分配，但從另一方面看，它又撐破了計劃分配，就其動搖權力等級而言，具有嚮往、尋求、修復平等的功能。不難看出，物慾逐利、等價交換、自主進退等特點，已很像市場行為，與主流意識形態拉開了足夠距離。喜歡錢的神就不是神了。自有了“走後門”，反黨與愛黨都變得不大嚴肅了(某個體戶語)。我鬥不過你張書記，搞定你總可以吧？不就

¹⁵³ 轉引自溫樂群等《“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是送一對酒，請一桌飯，送一立方米木材嗎？

權力變現的另一面就是權力自毀。一些賤坯子居然看上了“內部電影”，搞到了“特供指標”，消受了“幹部餐廳”，甚至進入了高幹的列車軟臥——我的一位陳姓朋友說，他是半夜上車的，一大早醒來，發現包廂裏其他三位乘客投來仇恨的目光，嚇得他一股冷氣順着脊梁往上冒。他發現對方齊刷刷盯住了他的臭球鞋、長頭髮以及可疑的化纖袋，大概一眼就看出他是個江湖混混，混入禁區的二流子。但那又怎麼樣？三位官爺能吃了他不成？既然車站票房已被他的菸酒搞定，那麼車廂裏的禮崩樂壞是遲早的事。

與臺灣等“亞洲四小虎”的經濟起飛相比，與電子新技術帶來的西方新一輪發展高潮相比，紅色中國的市場經濟來得太遲，蛹破成蝶的過程過於艱難。但這種暗市場、潛市場、非法市場的蔓延，物質利益的借胎受孕，受到當局出於經濟考量的曖昧支持，恰好構成了結束“文革”的決定性力量——也許比紅牆內的故事更為重要。一些群眾組織代表不是早已進入了“三結合(軍人、官員、群眾相結合)”的新政權嗎？但換人不改制，那些新面孔在各級革委會不管幹得好還是幹得孬，是當抹布還是當擺設，是風光了還是窩囊了，都無足輕重，老百姓的日子是怎樣還是怎樣。這種臺上的新戲舊唱，遠不如臺下“黑市”與“後門”的釜底抽薪，正深刻改變社會的基礎

結構。一時間，廣義的“逍遙派”成天忙於打傢俱、織毛衣、鉤窗簾、粉刷新房、違章擴建、相親搞對象、換外匯券、攢錢買手錶、收集老唱片、套購緊俏貨品、兼職賺外快、比照圖紙自裝電視機……迎來了個人慾望的蘇醒，發現了新的生活目標和成功標準，陸續退出全民的聖徒化和警察化，匯成了一種對“文革”的心理背叛，巨大的政治離心力。始於1973年的新中國第一個青少年犯罪高峰，致犯罪率飆升到十萬分之六百以上，比1965年劇增近二十倍，一直持續到1978年¹⁵⁴，不過是這種離心力的另一參考數據。在這些人眼裏，革命突然成了乏味話題。如果他們以前沒有政治股市的退市權，只能蟄伏與沉默，很像“殭屍戶”；那麼現在突然有了“黑市”與“後門”的廣闊天地，他們變得活躍而頑強，甚至不斷擠壓管制尺度，構成了大量流動性的撤出。

螞蟻雄兵重重砸盤，大挫政治行情。這與多年後市場合法化只有一步之遙，兩者之間貫串着無界和無縫的生活巨流。

1974年的“批林批孔”，1975年的“反擊右傾翻案風”，在官方媒體上依然火爆，但在社會層面廣受冷遇，證明政治動員已被破功。正因為感到大市失血，立足之基已成流沙，很多政治大戶緊張更甚。這些權力新貴投入太多，涉足太

¹⁵⁴ 引自唐樹華文《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犯罪發展變化及其理性思考》，載《犯罪學論叢》第1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年。

深，建倉太大，已被死死套牢，幾無退出機會，只能在官場拼死一搏。“林彪反革命集團案”和“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就是在這種層層壓力下，各方應力彙集，信號層層誤導，上下衝擊波交互共震，最終發生在高端的兩輪政治崩盤。引發這些危機的具體事由，現在看來都相當古怪。如果說前期“文革”批判劉少奇，還勉強扯得上“三自一包”什麼的¹⁵⁵，扯得上“鎮壓學生”什麼的，尚有些思想路線的意味，那麼林彪和江青的意識形態有何不同？他們可有明晰的另一套治國方略？各自代表哪些社會群體的利益主張？什麼“天才論”，讓全體國人硬着頭皮搗了一盆哲學糞糊。什麼“設國家主席”，設了如何？不設又如何？愛設不設又如何？江青等指控鄧小平的“唯生產力論”，那麼他們不怎麼“唯”的“生產力”又是什麼？……翻開當時各種材料，沒幾條不是雞毛蒜皮，杯水風波，強詞奪理，虛張聲勢，腦子進水。連美國康寧公司送給中國四機部考察組的小禮品，十二隻玻璃蝸牛，也被江青視為“帝國主義的壓力”，進而變成大鬧四機部和打壓國務院的棍子。

“江青反革命集團”算是權力體制釋放出的最後一輪震波嗎？當然不是。知情人回憶，尚在

¹⁵⁵ “三自一包”指劉少奇於1962年提出的農村經濟政策，即“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以及“包產到戶”，被視為“復辟資本主義”的綱領。

抱團打拚之際，這個集團內部也已開始“爭權奪利”，張(春橋)系與王(洪文)系雙方相互排擠，兇相迭現，留下了“《朝霞》事件”一類傷口¹⁵⁶。幾乎不用懷疑，這一集團若成功上位，新一輪大規模黨爭又將再次綻裂和如期爆發。

一些權力動物密佈政治圈，不動聲色，謹言慎行，眼觀四面，耳聽八方，讀得出字裏行間的高壓電，嗅得出沉默和微笑的潛臺詞，知道自己遇什麼事該裝什麼傻，見什麼人該嚼什麼舌頭。嚼的當然不會是國計民生，不過是敏感的人脈關係，是微妙的劃線站隊，是所謂搶班奪權的“心裏有鬼”(毛澤東語)。使用頻度最高的政治用詞，像“陰謀家”和“野心家”進一步躡紅，意味着政治的思想含量大減，只剩下道德誅殺。前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回憶，林彪在失勢前與周恩來溝通，擬稿寫信給毛澤東，建議在黨內高層實行“四不”，即暫定十年之內，對任職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及候補委員的各大軍區第一、二把手，實行“不逮捕、不關押、不殺、不撤職”的政策，並且把這一命令傳達至解放軍全體官兵¹⁵⁷。顯然，若不是驚恐於周圍每一個黑洞洞的槍口，不是惶亂於一種政治肉搏戰正在逼近，

156 見陳冀德《生逢其時——“文革”第一文藝刊物〈朝霞〉主編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公司，2008年。作者在“文革”時的職務相當於上海市文化局長。

157 見《吳忠談九一三事件》文，載《炎黃春秋》雜誌2012年第1期。

不是預感到高端解決的血腥，林彪不會出此奇議——竟要昭告每一兵丁。在這裏，領軍之帥都成驚弓之鳥，有一種退守死角的風聲鶴唳，足見政治生態嚴重惡化，已落入諸多政治品種中最無奈、無趣、無意義的“權力鬥爭”，在老百姓嘴裏越來越像一出遙遠的宮廷劇。

不是麼，“選妃”¹⁵⁸的葷料有了，“炸專列”¹⁵⁹的猛料有了，上述“鐵帽子恩封護身”一類秘料也不少，通俗文藝的配方一應俱全，足以娛樂茶餘飯後。

權力壟斷體制通常是高壓容器。美國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曾指出“合成謬誤(fallacy of composition)”，強調某種微觀上看來對的東西，在宏觀上並不總是對的¹⁶⁰——反之亦然。這裏有一種結構把握的辯證法。若取局部來看，市場當然有弊端(經濟危機就是證明)，宗教當然也有弊端(宗教的法庭和戰爭就是證明)，但一旦割除市場與宗教，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單質和全能的權力社會本身更是兇險所在。人們因此缺少利益分流與競爭減壓，權力成了唯一的資源，唯一的機會，唯一的日常要務，於是壟斷與裂變循環誘發，使當事人無時不活在懷

158 指林彪妻子葉群及眾多下屬官員為其兒子林立果尋找婚配對象一事。

159 指林立果、周宇馳等軍職人員密謀用火箭筒襲擊毛澤東所乘專列一事。

160 見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商務印書館，1986年。

疑、警覺、緊張、恐懼的狀態中，直至一次又一次政治攤牌——誰想掛冠歸田抽身退出獨善其身也沒門兒。相比之下，印度也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窮國，但至少有一個宗教的減壓閥。臺灣也曾是一黨體制和領袖獨裁，也有政治迫害，但至少還有一個市場的洩洪區。這些地方未出現超規模的聖徒化和警察化，未出現“文革”之亂，顯然是狂熱者有退出空間，緩解了一些權爭壓力。一種由權力、資本、文化(含宗教)組成的適度配比和相互制衡，一種社會力學的“穩定三角”，可使紅衛兵打砸搶殺的可能性大減，政治地震的頻度和強度相對降低。人們惹不起便求躲得起，只有無處可躲，才會上前來玩命。一種不可暫停、不可回退、不可下線關機的政治遊戲無休無止，玩得再小心，玩得再仁義道德，也只能通向極權之“極”。

這也許是“文革”重要的教訓之一。

社會是人性的定型模具。繼宗教動物、經濟動物之後，政治動物終於成為十八世紀後最新一款，在政治風暴眼裏紛紛破碎。法國大革命的連續劇快進就是這樣：短短四年多，君主立憲派被吉倫特派打倒，吉倫特派被雅各賓派打倒，雅各賓派內部的丹東派被清除，然後是埃貝爾派被掃蕩，直到最後羅伯斯庇爾自己喪命於熱月黨人……人們都鬥紅了眼，鬥出了滿腦子的敵情和全身腎上腺素的沸騰。蘇共歷史上令人眼花繚亂

的走馬燈和車輪戰也是這樣。“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反黨集團”，“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反黨集團”，“貝利亞外國間諜案和反黨集團”，“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反黨集團”，“朱可夫反黨集團案”，“布爾加林參與反黨集團案”……頭面人物一個個出局，如同災星依次向下傳遞，誰想不攤上也難。在這樣的過程中，各方均無退路，免戰就是自殺。各方同時拔槍，只能看誰出手更快。

這一次終於輪到中國了。

結構性危機(下)

英國作家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小說《動物農場》是一個寓言，描寫動物們不忍人類壓迫，通過革命趕走了人。但動物中的內亂不絕，名為“雪球”的傢伙被領袖視為內奸，派九條狗強行驅逐。後來那些大大小小的“雪球”也陸續落入冤案，被領袖“拿破崙”鐵腕清除。

作為這個動物天國的最高憲章，他們的“七戒”被悄悄修改，其最後一條本來是“所有的動物都是平等的”，修改版本卻成了：“所有的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¹⁶¹

161 見奧威爾《動物農場》，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

奧威爾是一個糾結之人，不相信自由資本主義，又以《動物農場》表現出對斯大林主義的憂慮與絕望，對極權體制予以強烈警告¹⁶²，以至最終不惜去兼任告密者，充當英國情報機構佈設在知識界的長耳與深喉¹⁶³。

我是在1986年讀到這本書的。我在美國旅行，震驚於一個天高地闊和五彩斑斕的富國——當時中國人均國內產值(GDP)僅及美國的5%。我撥打直通全球的程序控制電話，回想在國內郵局申請一個長途電話時的苦苦等待。我看到機場上巨型客機魚貫而出列隊候飛，回想國內公車站前一大群乘客搶鬥的擁擠和廝打。我在水門公寓一位教授家看到了一種叫做“電腦”的東西，螢幕上閃出不可思議的文字和圖畫。更重要的，我被餐館裏的小伙子迷住了，他居然把小生意做成了自己肢體的舞蹈，嘴裏的音樂，臉上的卡通畫，就像每時每刻都在過節。這與我記憶裏國營飯店裏那種表情的冷若冰霜和苦大仇深形成了鮮明對比。“是美國總統！”我想起一個前蘇聯克格勃間諜在美國公園裏晨跑，辨出另一個晨跑者時的無比驚訝。在那一刻，我差不多就是那個間諜，強烈感受到內心一種轟然坍塌。

162 參見李零《讀〈動物農場〉》文，連載於《讀書》雜誌2008年第7至8期。

163 見1996年7月11日英國《衛報》報導《奧威爾曾向反蘇宣傳部門提供作者黑名單》。

一個青年人站在思想廢墟上，卻沒地方可去。我後來叩訪另一個西方國家時，入境處的移民局官員一眼就看準了我，看準了這一張黃種人的臉。他查驗了護照，查驗了簽證，索要訪問邀請書，索要我在这个國家的旅館預訂信息……久久折騰後，他翻了一下眼皮：“有錢嗎？給我看。”

我怔住了，覺得對方的要求無禮。

要我掏錢？要我當眾數錢？要數出多少錢才算夠？為什麼對別人不用驗錢卻偏偏挑上我一個？如果我的錢不夠，甚至沒有錢，我的護照、簽證、邀請書、旅館訂單等就只能統統作廢？簽證代表了貴國的承諾，邀請書代表了貴國政府機構的敬重，護照上的國徽章更代表了一個大國的尊嚴……居然都狗屁不是，還抵不上幾張綠票子？我摸到了背包裏的錢，最終未拿出來。

“一邊去！”

對方大概不耐煩我的三流英語，發出大聲喝斥，以免耽誤我身後其他旅客的手續。直到兩個鐘頭後，因一位看似邊檢負責頭兒的猶豫，因我的接機朋友通過電話多方交涉，我才得以在不驗錢的條件下過關。

我從此明白，一條入境閘口黃線分隔的，不僅有不同制度，還有富與窮，貴與賤，高等物種與低等物種，掏得出綠票子與掏不出綠票子的。富國不是雷鋒，也沒義務當集體雷鋒，對數以億

計的窮棒子展開臂膀微笑熱擁。面對刁難和喝斥，我不能不深感屈辱，既對西方世界心寒，也對身後一片祖國大陸怨憤交迸。我不知道我的膚色、母語、國籍，何時才能在一個移民官眼裏不再成為竊賊的疑點。

時值“文革”結束十周年。一位英國女生，名叫弗蘭姬，藍眼金髮的那種，肯定是左翼組織的，在西方活得很另類的，在深夜的大街上給我派發紀念“文革”的傳單。我久久看着傳單上的毛澤東，揣測他如果在世，此時該會如何想，比如會不會繼續激賞傳單上的那些往事：紅衛兵振臂高呼，舞臺上白毛女舉槍跳躍，老教授在田間收割早稻，工人們在圖紙前指揮巨輪的建造……還有“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以上受苦人民”的口號。

我後來日漸傾向於相信：他不會，也許不會。事情一定是這樣，他早已在“文革”的半途就心境蒼茫漸失信心，否則他不會從1972年起就陸續恢復鄧小平、楊成武、譚震林、李井泉、烏蘭夫等數百高官的職務，其中某一次會議通過的復出者竟多達三百多人；他也不會平反賀龍、羅瑞卿、王稼祥等，不會讓董必武、朱德、陳雲、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等公開露面，使各地解脫幹部比例達80%至90%；他也不會再在1975年再一次啟動平反復職高潮，有關通知文件飛如雪片，包括平反陶鑄、胡耀邦、陸定一、傅連璋、陳丕顯、王恩茂、李維漢等，讓自己昔日大批政治對

手重返政治、經濟、外交、國防、教育等方面要職；他也不會特赦監獄中所有國民黨的在押人員¹⁶⁴。不僅日本皇軍或者德國納粹沒這樣幹過，如此大規模、大面積、大尺度的政治退讓與權力分享，即江青等人憤憤不已的“舉逸民”和“回潮”“復辟”，在法國革命史和蘇俄革命史上都鮮有其例。

後世歷史學家無法對此視而不見。他正在把很多籌碼交還給對手，看似自信，更像自疑。特別重要的，他明知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是“文革”的壓箱家底，看家本錢，護家親兵，但也許是出於失望，阻止他們登基似乎成了他的一條政治底線。為此，他不惜一再周折，寧可選擇倔強的鄧小平於前，選擇庸常的華國鋒於後——兩人看上去都偏離“文革”甚遠。

這不像是一些偶然和隨意的決定。

事實上，從某個角度看，恰恰是這些決定加速了“文革”的終結。一個老人深居密室，其思慮外人難以揣度。不過，從公開材料看，他在1972年後的形象更像一個和事佬，雖強撐一面“文革”之旗，但到處講“團結”，到處說“安定”，小心彌合黨內裂痕，有一種進退兩難和左右皆疑。與某些人的印象不同，他此後一系列言說在我看來已不再具有進攻性，與其說是說服別人，勿寧說是寬解自己；與其說是尋找新的理論

164 以上均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

戰場，勿寧說是尋找理論的防線與退路。批儒家，評《水滸傳》，辯斥資產階級法權……發生在1972至1976年的這些輿論大戲，看似東一榔頭西一棒子，超高空的筆墨飛行，有點隨意點染，信馬由韁，鏡花水月，無跡可求，讓人摸不着頭腦，但如聯繫起來看，倒也不是打什麼禪語，不過是對“文革”弱弱的一再自辯。“文革”是他人生中一件大事。自林彪出逃給這事潑糞，讓共產黨名譽跳水，他在新聞鏡頭中一下蒼老憔悴了許多。“臨風亭而唳鶴，對月峽而吟猿。”他在庾信這一《枯樹賦》前一定心境悲涼¹⁶⁵。他在臥榻邊一大圈書堆中輾轉反側，似在一次次說服自己：“文革”沒什麼大錯，至少算不上全錯——但這種說服的前提，恰好是巨大的困惑揮之不去，正把他死死地抓住。

他卑微的要求似乎只是希望得到人們一個“文革”三七開的結論，即“七分成績，三分錯誤”¹⁶⁶。他希望那場大亂終有一個說得過去的軟着陸。

不是說“文革”的手段太狠嗎？他把目光投向中國古代的法家：一心強國的商鞅、李斯、秦始皇哪能沒有嚴刑峻法？哪能不行一點鐵腕霸道？

165 據說毛澤東1974年5月委託專家注釋庾信《枯樹賦》等古典詩詞，見2005年10月14日《中國社會報》。

166 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不是說“文革”的代價太大嗎？他把目光投向宋江一夥的教訓：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只補缺漏，不改構架，雖成本有所減省，多留一點罐罐，但那種小打小鬧的半調子革命於事何補？

不是說“文革”的尺規太高嗎？他把目光投向馬克思對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哥達綱領》的批判：連按勞分配、商品交換、八級工資制都是“資產階級法權”，屬於大破的對象，同志們，親愛的同志們，我們到底是做得太多還是做得太少？離革命理想尚有十萬八千里，共產黨人眼下不過是下下鄉，出出汗，曬黑一張臉，在五七幹校混個兩年三載，憑什麼就要拍桌子罵娘？

……

不知他是否真有過這樣的自我對話。

可注意的是，他鄙薄儒家“仁政”之時，恰是給大批受難者平反復職送溫暖之際；他讚揚“反皇帝”之餘，卻未給左派發動高層清算(如針對周恩來)以任何鼓勵；他讓大家討論按勞分配、商品交換、八級工資制等奇怪話題，八竿子打不着的共產主義原教旨，卻毫無具體政策跟進的動靜。大家該拿的工資還是拿，該得的級別還是得，該有的自留地和自由集市還是有……上海市準備了一套恢復供給制的摸底方案，當然是自擾多事，最終有風無雨¹⁶⁷。勞模出身的副總理陳永

167 見朱學勤《“凌伊”先生(朱永嘉)》文，<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18/753>。

貴提議農村基本核算單位由生產隊向大隊過渡，讓“小公有”升級為“大公有”，在趙紫陽、譚啟龍等人反對之下只能胎死腹中¹⁶⁸。甚至連“開後門”這種很像“資產階級”的東西，比“法權”更可惡的“特權”，也幾乎被毛澤東忽略，曾囑周恩來、江青等不必大動干戈¹⁶⁹。

如此等等，自“文革”開始以來，理論宣傳與實際運作的脫節在這四年裏十分奇怪，思想的空轉、虛打、不及物令人費解。一切揣摩聖意的政治敏感後來都被證明為錯。老百姓十分茫然，在政治學習時常覺雲山霧沼，不知所云，呵欠連天，腰酸背痛，只能相信北京那邊鬧出了多動症，瞎抽風——也許這正透露出某種複雜心結。

1976年4月5日，天安門一幕肯定使他震驚，但“紅太陽”神力天威再度明顯失靈，他無法阻止這一天到來。他的“三七開”一說看來得不到人們認可。他的和事佬也當不下去，在高層對決中再一次被逼選邊站，交權給平衡派人物華國鋒，不過是最後的止損之策。為了重振國勢，他曾提議全民大唱《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但權力已如一塊病毒成堆的硬碟，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充電無濟於事。為了彌合社會裂痕，他數年來一次次請回“走資派”，也寬大“造反派”，還特赦和安置大批舊政權人士……

168 見《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

169 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

但這一類技術性減壓，無法遏制結構性的增壓。身處一個全能而單質的權力體制，他無法緩解政治的總體性惡變，只能用問題解決問題，用代價減免代價，拆東牆補西牆，直到大家都成了破牆，“文革”的負資產累積最大化。隨着民眾對“四個現代化”熱切嚮往，隨着地下市場經濟八方潮湧，生長“文革”的水土環境早已不再，生長蘑菇的潮壤變成了沙漠。

天安門廣場上花圈如海，淚飛如雨，各種標語迸濺出電花石火，逆上謀反的流言不脛而走……毛澤東曾說：要“找出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¹⁷⁰，現在這種形式和方式終於指向他自己。他讚揚、鼓動、訓練、指揮的“造反有理”，現在居然全面嘩變，矛頭倒轉。

他肯定感受到深刻的孤立無助。

人民英雄紀念碑在人山人海靜靜地直指天穹，引導一個民族的百年想像。很多人在碑下的浮雕故事前也許都尋思過：那究竟是什麼樣的景況？是什麼樣的生活？千萬英烈以血肉之軀前後繼究竟要通向何處？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

170 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以上《禮運篇》，出自《禮記》¹⁷¹，為儒家“大同”思想的源頭，差不多是中國最初版本的公共主義綱領。

身為“打倒孔家店”的激進一員，毛澤東卻諳熟古籍，勤翻卷帙，與中國古代思想遺產明斷暗續，其《矛盾論》與老、莊的辯證法，其《實踐論》與儒家的“實踐理性”（李澤厚語），都有清晰可辨的血緣之續。他有聖王合一之風，總愛想一些大事，在著名的五七指示裏曾描繪出一幅比《禮運篇》更為具體和清晰的圖景¹⁷²：“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工人也是這樣”，“學生也是這樣”，農民和“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¹⁷³。這種一職多業和一專多能的奇特設計，實現人類全面發展的美好前景，不僅要剷除社會等級和“批判資產階級”，而且要淡化勞動分工，庇護所有人的平

171 引自《禮記》，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年。

172 學者汪暉曾在會議發言中指出過這一點。

173 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等人生。這一種亦官亦民、腦體兼備的反社會異化藍本，在“文革”發動之初的1966年5月7日提出並隨即公佈，曾被很多人視為革命之魂，最重要的制度頂層設計，最富有建設性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不幸的是，多年後人們覺得這些說法日益飄渺。哪怕官方媒體時有提及，在很多人看來它更像不貼身的雲外仙境，沒多少功夫再去顧及。

他們要的首先是沒有警察或政工人員突然敲門的夜晚，是麵包，是加班獎金，是尼龍襪、電子錶以及日立牌黑白電視機。一位境外記者說：西方不是用核武器而是靠家用電器重新攻破了中國。

“四·五”天安門運動就是他們的民間公投。

正是這一年，毛澤東有一次看電影《難忘的戰鬥》，隨着高昂雄壯的片中配樂，見人民解放軍當年列隊入城，受到市民們熱烈歡迎，他突然控制不住感情，先是陣陣抽泣，隨即放聲大哭，詫異的工作人員只得將他攙扶起來中途退場¹⁷⁴。他的大哭想必與不久前天安門那一份公投的結果有關。風悲雨苦，樹老枝殘，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想當年歡聲雷動，看今日卻是千夫所指——往事豈堪回首？

174 轉引自李慎明《毛澤東晚年緣何幾次慟哭》文，載《百年潮》雜誌2013年第3期。

再等級化之潮

“文革”後期，我身邊有這樣幾個圈子。

一是我哥的圈子，有工人(唐繼智、俞巴立等)，有知青(孫志遠、姚慶如等)、有知識分子(袁鐵山、張玉綱等)，有剛出獄的政治犯(周國輝獄齡七年)。他們散居南方各省，卻不知如何串成了一堆。他們在吃了上頓也不一定有下頓的年月，一齊對西方思想發燒。“有一次他坐火車從廣州前來遊學，我和哥去接站。他下車後對我們點點頭，笑一笑，第一句話就是：‘維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後期大不一樣……’這種見面語讓我大吃一驚，雲裏霧裏不知所措。”這就是我對唐某的一點記憶，曾寫入一篇散文¹⁷⁵。

另一圈子由文學愛好者組成。其中有莫應豐，正在寫抗議“文革”的長篇小說《將軍吟》，可能引來殺身之禍，故處於高度保密狀態。知情者賀夢凡、張新奇、貝興亞、薛浩等既緊張又興奮，湊糧湊錢支持其寫作，常長談於密室或野外，形跡鬼鬼祟祟。北京出現“民主牆”後，他們終於鑽出地表，以“四五文學社”的公開旗號，在省城最熱鬧的大街上貼出第一批大字報，呼籲為四五天安門運動平反，譴責地方長官在“真理檢驗標準”討論中的沉默……構成了當地轟動一時的事件。

¹⁷⁵ 見筆者散文《漫長的假期》。

當時各地都有這樣的“圈子”，後來在北島(北京)、錢理群(貴州)、徐友漁(四川)、王紹光(湖北)、張志揚(湖北)、張木生(北京和內蒙)、王鴻生(河南)、朱學勤(河南)、多多(北京)、徐曉(北京和山西)、宋永毅(上海)、王希哲(廣東)等人的筆下留有痕跡。當事人想必記得清楚，“保”和“造”的界限在此時漸次消溶，民意出現高度的趨同化。即便是一些前造反派對官員仍存抵觸，但對發展經濟、開放文禁、革新政治(取消出身歧視、提倡法制與民主等等)，都覺得很對胃口。這樣，人人都是變天派，從“四·五”天安門運動(1976)，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整個國家幾乎實現了一種左右會盟和朝野協力，推進了最大公約數的政治轉軌，整個過程低震盪、小阻力、微成本、零死亡。上海市委常委朱永嘉倡言的“武裝起義”，拿到會議室外就風吹雲散，沒有人願意真去舞槍弄棒。相比之下，1688年的英國“光榮革命”一直被譽為資產階級和平革命的典範，尚有威廉大軍一萬四千人 and 五百艘船艦遠道西征和兵臨城下，而中國這次歷史大轉折以輕易、快速、整齊、全方位的方式實現，不費一槍一彈更像奇跡。

然而，這還是革命嗎？

取消“階級鬥爭為綱”，全面恢復舊秩序，甚至“一改改到解放前”，重新討論市場、資本、私有制、個人主義的合理性……這幾乎是對

革命的全面逆襲。有意思的是，這種逆襲的思想武器、精神能量、鬥爭經驗、運動形式、個人風采等無不來自既有記憶，與其說是革命死亡，不如說更像革命變體。上述那些圈子裏，人們開口多有馬克思主義語錄，唱得最多的是《國際歌》。文史哲知識大普及，顯然也來自“文革”中官方主導的理論訓練，包括中蘇兩國之間長期的筆墨論爭。儉樸生活、暗號接頭，緊緊握手，賦詩言志，秘密製作文宣，決然拋家別子，被捕時昂首挺胸，在紅旗、山河、紀念碑、遊行隊列前心潮起伏……這些流行形象出自小說和電影，有“赤匪”、CP、青年近衛軍、西班牙“國際縱隊”乃至俄國十二月黨人的影子。“資產階級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馬克思語），現在人們把這種句式送給“文革”再合適不過。

需要提到一篇小說。何士光的《鄉場上》¹⁷⁶被中央理論期刊《紅旗》史無前例地轉載，成為一時輿論熱點。故事是這樣：農民馮么爸要為兩家孩子的一次糾紛提供目擊證言，但不敢得罪肇事一方的羅家，也不敢得罪袒護羅家的曹支書。

在梨花屯鄉場上，她（羅家——引者注）卻彷彿一個貴婦人了，因為她男人是鄉場上食品購銷站的會計，是一個賣肉的……得罪了這姓羅的一家，就得罪了梨花屯整個的上層……

¹⁷⁶ 該小說載《人民文學》雜誌1980年第8期。

你會發覺商店的老陳也會對你冷冷的，於是你夜裏會沒有光亮，也不知道該用些什麼來洗你的衣裳；更不要說，在二月裏，曹支書還會一筆勾掉該發給你的回銷糧，使你難度春荒……你還要不要在這兒過下去？

因此，馮么爸一開始只能歎氣，搓手，咧嘴假笑，裝傻充愣，支吾搪塞，在屋簷下雙手抱頭久蹲不起。情節的轉捩點是，隨着羅、曹兩方的威逼或辱罵，他終於說出一些沒頭沒腦的話：

“不消哪個說，（我）就像一條狗！……我窮得無法——我沒有辦法呀！……大家是看見的……臉是丟盡了……”

他這是怎麼啦？人們很詫異，都靜下來，望着他。“去年呢，”他接下去說，“……穀子和包穀合在一起，我多分了幾百斤，算來一家人吃得到端陽。有幾十斤糯穀，我女人說今年給娃娃們包幾個粽子粑。那時呢，洋芋也出來了，……那幾塊菜籽，國家要獎售大米，自留地還有一些麥子要收……去年沒有硬喊我們把爛田放了水來種小季，田裏的水是滿盪盪的，這責任落到人，打田栽秧算來也容易！

權勢一方要求他別東扯西拉繞彎子，於是他接下來的一通怒吼更不着邊際：

“我馮么爸要吃二兩肉不？”他自己拍着胸膛回答：“要吃！——這又怎樣？買！等賣了菜籽，就買幾斤來給娃娃們吃一頓，保證不找你姓羅的就是！反正現在趕場天鄉下人照樣有豬殺，這回就不光包給你食品站一家，敞開的，就多這麼一角幾分錢，要肥要瘦隨你選！……“你又怎樣？……老子前幾年人不人鬼不鬼的，氣算是受夠了！”

原來他這是給自己打氣。依靠農村承包責任制，他突然發現自己吃飯和吃肉都不用求人，那他還怕什麼怕？他終於在權貴階層面前找回了一條挺直的腰杆，說出真實的證言，不僅讓在場的鄉親們瞠目，連自己也暗暗吃驚。

這一個短篇贏得滿堂彩，顯然是觸碰了一種普遍心結。責任田不僅找回了財富，更重要的是衝破一種壓迫性體制，幫助人們找回了平等和尊嚴。與這篇小說幾乎同期的電影《牧馬人》（張賢亮等）、《天雲山傳奇》（魯彥周等）、《太陽和人》（白樺等）、《黃土地》（陳凱歌等）等各有得失，但無不宣示對人民的深情，對公平和正義的渴望——如果這些宣示都出於真誠，是深思熟慮的結果，那麼它恰恰是國人所熟悉的革命價

值觀，顯然超越了什麼西方記者說的“家用電器”。

當我成為恢復高考的受益者走入大學校園，對革命的逆襲和重續正暗中交錯。來不及貧富分化，作為社會主義物質分配的滯後現象，在人們日後的記憶裏很像普惠的市場經濟。動不動就貼大字報，是“文革”遺習，在人們日後的記憶裏很像西方的民主。1979年1月29日鄧小平在美國白宮南草坪，如盟國英雄一般接受歡呼，被電視節目主持人熱情揚溢地介紹，普通中國觀眾從新聞片中看得更多的，是太平洋那邊閃閃發光的車流、立交橋、摩天大廈、太空梭、自由女神、海邊沖浪與帆船、漂亮的媽媽和孩子。幾乎無人懷疑，中國改革開放的效果圖就該是那樣——美國就是共產主義的夢想成真。

我們要什麼？全要！

什麼時候要？現在！

法國大學生1968年的口號，差不多就是此時國人的心聲。事實上，在後來數十年裏，如果只有西方跨國公司的大舉進入，沒有下崗工人和失地農民的愁苦；如果只有炒樓者們的日進斗金，沒有千萬青年“房奴”的蝸居；如果只有上流人士樂顛顛的性解放，沒有眾多農民工的性饑渴和少女賣身；如果只有汗如雨下的勞動致富，沒有

“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拼爹”；如果只有舉世矚目的GDP數據，沒有河水發臭、毒霾籠罩、土地沙化、假藥殺人；如果只有出境遊客在境外高檔賣場的大舉掃貨和各大城市的中央金融區CBD，沒有河南的“賣血村”和甘肅的“乞丐村”……總之，如果只有市場和資本之利，中國人全心全意學美國趕美國的共識必定毫無爭議。

知識界日後的分流，其實源自現實的撕裂。我家以前的一位保姆，全家四口同時在一個國營造船廠下崗，頓時陷入了生存恐慌。我所在單位的一個打字員，全家竟有七人同時下崗，以至這個小妹的職位在互聯網出現後無論如何多餘，大家也不忍心讓她成為第八個。月薪僅一百八十元的保潔工，居然也有很多人搶着來做(1998)。我與作家蔣子龍乘車經過南方某城市一條街道，黑壓壓的妓女沿途相逼，堵截出一個長長的車隊。她們又是敲車窗，又是拍車頂，乒乒乓乓響聲四起，好幾隻小手伸進車窗縫裏抓撓。“老闆，半價呵，便宜呵。”“哥哥，有發票呢。”“賒賬也可以的，今天先打一個感情炮吧。”……

一位女作家說到這些妓女，不以為然地聳聳肩：“那有什麼？人家願意呵，以前想賣身都沒機會呢。”

另一次，說到大批失業者，一位從國企老總轉型為私商的朋友擠一擠眼皮，笑咪咪地開導我：“放心吧，再過一二十年，該病的病死了，

該餓的餓死了，中國的現代化就輕裝前進了。”

還有一次，一個著作眾多頗負盛名的青年思想家，名頭越來越響的公共知識分子，在一封電子郵件裏堅稱：“沒有比‘平等’更矯情的概念了。”“弱肉強食的叢林原則從來就是人類正義。”

……

這還是革命嗎？這些人與我有私交，因此說得直白。感謝他們的直白，卸載了話語包裝和學理經營，讓我一睹真心，並獲得某種文字嗅覺。在我此後的經驗裏，很多文章就是這樣，需要讀，更需要“嗅”。如果讀者能從口號、知識、修飾語、詳略取捨、句法結構、標點符號中嗅出一個大活人，當然不難“嗅”出一些雅士好談的“身體”，是嫖娼的身體卻不是打工的身體；一些書生好談的“文化”，是老爺的文化卻不是工匠的文化。窺視豪門的讀物到處暢銷。炫耀門第的讀物備受熱捧。廣告上充滿了“VIP”“富豪”“皇家”“御園”“貴妃”“領袖”一類金堆玉砌的猛詞。某些社交場合開始流行時裝、名表、豪車、珠寶、古董、高爾夫、列車高包、私家遊艇等話題——在這些圈子裏，不談最對的，要談最貴的。很多奢侈品哪怕不實用、不值當、買不起，也須提前一步全心嚮往熱烈討論。有人若在此時說不上道，一定很沒面子。一個人哪怕再窮酸，哪怕還在為兒女的學費發愁，在這裏也

得抖擻精神，全神貫注，神采飛揚，挽起袖子上陣，擺出一副候補貴族模樣。他們學成有望，每根神經都在預習奢靡，每一絲肌膚都靠攏組織，預支上流社會的陣營感和團結感。

《鄉場上》引起的舉國喝彩頃刻間被遺忘。

這裏不妨回過頭來稍加比對——

如果平等只是一個“矯情的概念”，“弱肉強食的叢林原則從來就是人類正義”，那麼以曹支書為代表的一夥強人何可指責？

如果對於中國現代化的一大利好是“該病的病死了，該餓的餓死了”，那麼以馮么爸為代表的一幫窮鬼何須同情？

如果連一位獻身於女權主義的作家也認為，妓女賣身的自由是社會進步應有之義，甚至是對窮人的一份最新賜福，那麼賣肝賣腎的自由，賣兒賣女的自由，賣身為奴的自由，賣身殉葬的自由……是否都應被窮人們感恩戴德？是否理應受到工商局、公安局、法院的全面保護？在這種情況下，一條挺直的腰杆莫非是骨質增生，骨形畸變，草民們可笑的多動症？

很多人大義凜然眾志成城埋葬“文革”，一轉眼卻把剛剛找回的平等棄若敝屣，把剛剛迎回來的父老鄉親視若草芥，為“文革”中最不可接受的東西還魂。“所有的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動物農場》裏的這一句箴言經過鍍銀鎔金，重新成為流行真理。

為此，很多心理障礙需要提前掃除，一些順耳的話語須配套準備。他們開始在報刊上群毆“道德”¹⁷⁷，但這並不妨礙他們要求紅衛兵道德懺悔，對當權者大加道德譴責，似乎他們可以無德而那些人必須有德，或那些人不妨無德，但壞就壞在形象造假，相當於打着一面錯誤的旗幟幹了一件正確的事情，脫下羊皮的狼才算得上形象可愛。他們開始在公共講壇哄抬“慾望”，但這並不妨礙他們要求一切對手老老實實地禁慾，一旦風傳那些人也領稿費、有存款、離過婚、穿皮大衣，甚至有私生子，便津津樂道或怒火衝天，似乎那些“人性解放”一點也讓他們高興不起來，隱藏很深的盟友和內應倒是壞了他們的好事。更為天雷滾滾的是，他們恨不得揪住每一個老百姓的耳朵來聆聽“平等”之惡，稱“人人生而不平等”；“天賦的不平等是不可能消除、也沒有必要消除”¹⁷⁸——這類高見一時間遍佈各類媒體。但他們為什麼要求曹支書那樣的紅色權貴必須講“平等”？依照他們的邏輯，嚴格依照他們的邏輯，共產黨不就是在腥風血雨的大亂之世，靠機會平等、自由競爭然後一舉打下江山的“叢林”之王，憑什麼要還權於民？飽受了多少苦難，犧

177 參見1995年至1997年間《文藝報》《作家報》《文學自由談》等報刊上出現對“道德”“道德理想主義”的批判浪潮，有關文章數以百計。

178 如周舵《什麼樣的平等才是好東西》文，載《領導者》雜誌2012年6月總第46期。

牲了多少親人和同志，包括一顆顆人頭被掛在城樓，猶如商戰中一個公司投入鉅資，一次次絕處求生，終於把本黨的業務做大做強，憑什麼要自棄壟斷權，把股份和市場份額重新分派？

上述引文的作者不得不稍加補充：“平等限於人權和機會平等，超出這個合理範圍，平等就是非正義的……”好吧，順着他說，不扯什麼生存權，我們只說政治人權。問題是，如果這一條可以在列強殖民時無效，在右派軍人政變時無效，在王國君主親美時無效，在所有公司帝國的森嚴管制下無效……如果這諸多無效被很多知識精英默認，甚至辯護和喝彩¹⁷⁹，憑什麼紅色權貴就得畢恭畢敬地拿它真當一回事？“曹支書”們也是人，就不該與殖民列強、政變軍頭、親美君王、公司帝國等共享一份“機會的平等”？如果“我是流氓我怕誰”（王朔語）不是一句作家戲言，被很多人當作激動人心的精神大赦，那麼“曹支書”們流氓一下就不行？去他的，流氓你一下又怎麼啦？

他們太容易被自己的邏輯繞進去，也很像一心把對手教壞——“曹支書”們本來正在犯暈，沒想到喜得“叢林原則”這一偉大理論，終於可大大地鬆一口氣了。

不用說，對“文革”需要思想清算。對虛誇

179 一位中國知名批評家認為：中國真正實現歷史變革的條件是“三百年殖民地”，引自香港1988年12月號《解放》雜誌。

的“道德”消毒，給合理的“慾望”去污，都有助於人性、人權、人道的合理回歸。但人道不是少數人之道。一種再等級化的狂熱，一種蔑視人民的貪婪和傲慢，構成了來得太快的精神背叛，其實是對“文革”的暗中翻盤，影子“文革”重新入場。這些自我想像中的頭等艙人士，不過是把“文革”資本主義化，把資本主義“文革”化——其精神毒性暫且不說，一次次把自己繞進去的邏輯混亂，如自打自摸，自擦自啐，上半身錯接下半身，至少在智商上令人錯愕。

這種邏輯上的“半截通”，與他們選擇事實的“半口徑”，總是在意識形態高燒時構成多症併發。

美國學者大衛·科茲(David M. Kotz)稱：1991年5月由美國操辦的最大一次民意測驗證明，當時在蘇聯的歐洲部分，“僅有17%的民眾贊成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而這個比例在蘇共精英中則是76.7%”，兩者形成了鮮明對比¹⁸⁰。說實話，我曾對這一數據不無懷疑，總覺得蘇共精英集團紅皮白心若此，那麼全球冷戰就像友軍誤攻，假戲真唱，吃飽了撐的，蒙了別人也蒙了自己。1995年後，因工作關係，我接觸到上上下下一些官員，才發現紅皮白心者在中國同樣多見。走入某些官員私下聚會之處，關於工作、學習、民生疾苦的

180 引自*Revolution from Above: Demise of the Soviet System* by David M. Kotz, Routledge, 1997。

話題根本沒法談；即便被某位菜鳥提及，也總是換來哈欠連連，心不在焉，有三沒四。相反，只有含金量高的話題才令周圍眼睛發亮。哪些人、哪些工程、哪些職位、哪項報批或配額、哪些享樂消費方式有“戲”，他們一嗅便知，表情隨之活躍，中氣隨之充盈，友誼氣氛隨之濃厚，利益勾兌立即暗中就位。

礙於官員身份，他們丟不下“革命”“國家利益”“黨的方針政策”一類場面話，但只要稍加注意，便可發現那些話都是辦公樓專用。一旦解下領帶，端起酒杯，其眉飛色舞便有了夜總會和王爺府的味道。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也是聯合國採用的數據¹⁸¹顯示：中國1990年代後貧富分化嚴重，基尼系數一路攀升，整體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0.4，最高值為0.491(2008)，超過德國的0.283，瑞典的0.250，加拿大的0.326，埃及的0.328，甚至美國的0.450……已接近諸多拉美國家。嗅一嗅這種“拉美化”趨向，人們不難嗅出夜總會和王爺府的隱秘來處。

這樣，“文革”後的中國既實現了高速的經濟增長，也一頭撞入了懸心的社會分裂，一句流行語“端起飯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道出了大多數國人的糾結。千面中國再次成為世界之謎。自1980年禁止“四大(大字報等)”，自1989年靠

181 參見國家統計局官網，以及CIA World Factbook資料，以及聯合國官網：<http://hdrstats.undp.org/en/indicators/67106.html>。

軍隊蕩平廣場政治風波，這個國家確保了穩定的發展環境，贏得了時間差；卻也一直短缺暢達民意的替代辦法，錯失了治理貪腐的最佳止血期。很多地方“低福利”“低人權”(秦暉語)的發展優勢難以持續。互聯網這一天賜神器和網上山呼海嘯的“人民戰爭(王朔語)”此時尚未入場。我所供職的《天涯》雜誌忍不住發聲，卻屢遭中央某部門敲打，其罪名就是對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的批評，頂撞了大勢佈局；“弱勢群體”“利益集團”“階層”“等級”一類用語更涉嫌給社會抹黑——在審讀官員看來，這些字眼添堵，簡直應從字典裏摳掉。

一連串磨擦，差一點鬧到了撤換主編的程度。其實不難明白，那些人要是能容納這一類異議倒是怪了。事情是這樣：共患難易而共富貴難，剩餘產品一旦豐富，接下來該如何分蛋糕，必會加劇無序的爭搶。狄更斯的《艱難時世》，雨果的《悲慘世界》，馬克·吐溫的《鍍金時代》……光這些小說名字就不難讓人想像不久前的歐美發生過什麼。何況中國正處於“五四”運動以來最嚴重的精神真空和思想混亂，其本土的世俗化失去家國關懷，西來的個人化失去宗教約束，兩種文明的退化疊加，沖垮了很多人的道德底線。長官也是人呵，也是慾望活體。既然私有化普遍有效，既然諸多“第一桶金”的不潔獲得社會輿論和知識新潮的全線綠燈，他們好容易謀

下了一個閱文和蓋章的碼頭，為何就不能對手中的權力打打主意？連記者、醫生、和尚、妓女都闖了……為何偏要他們這一夥獨守寒衙？

較之於歐洲工業化時人口不足一億，眼下近二十個“歐洲”同時闖入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正劇烈地晃動地球。但不少局內人密集的微感覺偏偏是“艱難時世”，“悲慘世界”，“鍍金(虛假)時代”。時值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的宣傳吊高大眾胃口，相當於心理GDP一潰再瀉，情緒緩釋工具盡失，差不多就是看準時機火上澆油。其中最讓人看不下去的，是體制內外的再等級化熱浪兩相呼應，體制內外的腐敗相互推高。據實而言，“內”“外”之別常被熱議，甚至炒作得很像學術，但內外雙方的新貴們其實貌離而神合，又勾結又競爭，精神上僅隔一層紙，一捅就破的。他們有時在政治議題上衝突，但實際上處於又親又防的微妙關係，親如手足卻要爭權奪利，一心更換贏家卻從不願改變共同的規則。

“批判體制”——在他們那裏不過是商家有時覺得尋租成本太高，忍不住發一肚子邪火。“捍衛體制”——在他們那裏不過是長官有時覺得尋租者胃口太大，竟要乙方兼併甲方，單方面打破默契，用“茉莉花革命”的無恥嘴臉來毀約賴賬，於是忍不住來一通棒喝。但一次次討價還價，並不妨礙他們繼續一次次尋租勾結，各點贓款時杯觥交錯，引類呼朋。

一些年輕學子也深得其道。他們可以全班一個不漏地遞交入黨申請書，齊刷刷地聽黨課和唱紅歌，私下裏又紛紛膺服於華爾街的醒世恒言“貪婪就是好”……這些娃娃率性多了，比很多理論家更明白政治“旋轉門”的遊戲，深諳紅白兩道通吃的道理，不像有些長輩那樣裝傻，或那樣真傻——居然焦灼於自己的一個教授身份到底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居然擔心政治隱私外洩：老婆當上公務員或兒子拿了美國綠卡，會不會被網民揪住拍磚。老同志的曖昧和小心，在娃娃們看來都有“骨灰”級的喜感。

這些娃娃怎麼都行，眼看就要成為一些後現代的利益玩家，視官權只是可能的資源之一，可能的手段之一，可能的投資目標之一，一如他們視“民主”和“專制”、“市場”和“計劃”、“普世價值”和“本土國情”為意識形態的路路通，任何時候都無礙他們左右逢源和借勢發力。因此，他們最能理解冷戰的虛妄，最能理解科茲教授為之驚訝和困惑的76.7%。他們的公共造型，只取決於政治季風如何轉向，取決於命運給他們暫時的利益定位。說到底，公共政治在他們那裏已是一個髒兮兮的話題，只剩下透骨的虛無。

一天，我無意間重看了一場中央芭蕾舞團的《紅色娘子軍》，一個女奴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這一舞劇面世之初的“文革”政治背景記憶猶新。但我在劇場裏驚訝地發現，當女奴們用手

臂擋住鞭擊從而掩護瓊花逃生，當孤苦無助的女奴被女兵們如林的雙手熱情接納，當女戰士來到戰友就義現場卻找不到身影於是向八方天地一遍遍悲訴……一幕幕生死相依的情境，義重如山的表達，擊中了觀眾們的震驚，竟一次次引爆掌聲，並有一種反常的經久不息。毫無疑問，這一舞劇正在被重新解讀。鼓掌者們在久違的溫暖前猛醒，在一種卑賤者解放的絢麗天地裏暈眩和飄飛。

我身旁的一位男人擦眼睛。我不知道他是一個工人，還是教師、商人、小官吏、刑滿釋放者，不知道他搓過麻將後，賴過賬或逃過稅後，對自己的淚水是否感到驚奇。但他一句“樣板戲就是好”讓我耳熟。他如果跳起來高呼什麼口號，也不會令我特別驚訝。我太熟悉江青一手培植的“樣板戲”了。我擔心那種造神宣傳和革命圖示化，會再一次收窄觀眾的眼界，拉低觀眾的智商，但我怎能無視劇場裏的淚水——在經歷太多現實中的冷漠與惡俗後，這些觀眾突然面對悲愴的樂浪，激越的旗幟，純潔無辜的手足，普天下人人平等的陽光造型，就沒有一次熱淚奪眶的權利？

這是1999年。顯然，一種社會再等級化之潮既然恢復了壓迫，就必然恢復反抗；既然變相恢復了“文革”的A面，就必然變相恢復“文革”的B面；既然正在營構階級，就必然召回、激活、強化有關階級鬥爭的回憶和想像，把很多人

重新送入工農聯盟、武裝鬥爭、翻身解放的思想軌道——不少知識精英曾對此深惡痛絕。但這事賴不上別人，賴不上那些老百姓。一齣舞劇不過是都市舊夢，遇到合適的現實水土環境便遲早要綻放。

哪怕它也是一種選擇性的記憶。

需要討論的幾個問題

“文革”漸漸遠去，彌散在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大潮洶湧之中。是全球化衝開了華夏國門，還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入場成就了全球化的升級版，一時說不大清楚。不管怎樣，美國記者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相信：全球化的第一個時期(1870年至1914年)讓一個“大世界”變成了“中世界”，新一輪全球化(1989年以來)把“中世界”變成了“小世界”。豈止如此，數年之後他又驚歎：不是“小世界”，簡直就是“迷你(極小)世界”¹⁸²。

用農夫腳步和超音速客機分別丈量旅途，當然會有不同的地理學。遠在數百或數千公里外的人，眼下通常是“低頭族”操一支手機時真正的近鄰。

¹⁸² 見托馬斯·弗里德曼《世界又熱又平又擠》，湖南科技出版社，2009年。

一隻手機可以把四面八方的壞消息濃縮成同屏現實：既有驕橫的財主，也有霸道的政治新貴；既有高利貸，也有孝敬長官的紅包；既有紅燈區買春，也有爭取入黨或提幹的性交易；既有製幻毒品和跳大神，也有狂熱效忠領袖的死去活來；既有爭奪遺產的兄弟仇殺，也有意在自保的親人告密；既有鐵具束腰和食用砒霜的美容，也有自殘性質的熱血秀或自願贖罪；既有把一隻股票炒出天價的商業投機，也有打擊內奸、叛徒、邪惡敵人等各種鬥爭中的搶頭功和露大臉……當中國的全民警察化好容易消停，美國電子監聽大綱卻鬧得四面八方都隔牆有耳，告密運動在政府號召下風生水起。僅九一一事件後一個月內，聯邦調查局就接到四十三萬個針對陌生人、鄰居、親友的舉報電話，連草坪雜亂、汽車亂停、內衣亂曬、吃飯時間反常、攝影師在煉油廠附近拍照等都令人們想像豐富，大有恐怖主義之嫌¹⁸³。下一步，美國的“大腳偵緝隊”是不是也要挨門查戶口？

如果這就是歷經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浪潮後的現代世界，當然難免人們的沮喪。自蒸汽機時代遠去，世界圖景的清晰度重新降低。美國共和黨在最富(如華爾街集團)和最窮的(特別是南部和西部的福音派平民)兩極皆有可靠的票倉，使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遭遇難題。中東地區伊斯

183 *Wall Street Journal*, Eastern edition, Nov 21, 2001。

蘭教內部的喋血相爭，其激烈程度常超過對外衝突，也使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降低聲調。大多社會理論都不再理直氣壯。一種以金融、媒體、全球化、電子技術等為特徵的新資本主義，不僅深刻地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對手的反抗。社會重建尚無草圖，連腹稿也遙遙無期。在常見的情況裏，西方左派黨只是要加福利，右派黨只是要減稅，但捏着選票的男女既要福利又不想交稅，相當於既要海吃又要減肥，既要多情又要貞潔，因此左、右派政府都註定短命，只能炒短線。像樣的武裝鬥爭更是沒處找。新聞鏡頭裏的槍手們腦袋扭得遠遠地胡亂射擊，駕幾輛皮卡衝來衝去，像是圖一個熱鬧，業餘得如同“文革”中的群眾武鬥。很多義士如果不是絕望地扔石頭、燒輪胎、來一個殃及平民的人肉炸彈，把自己混同於恐怖主義，就只能像墨西哥的“副司令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那樣，蒙面，戴墨鏡，掛耳麥，講幾種流利外語，擅長使用兒童畫和民謠，自稱同性戀者和後冷戰時代的共產黨，還有“代表零(Delegado Cero)”一類禪語。但他披掛的子彈袋裏全是假彈，手下的民族解放軍扛上木刀木槍——這種“符號的戰爭”¹⁸⁴果然使BBC記者和好萊塢影星熱血，讓革命的真人秀躡紅網絡，與陰毛文化、鏡頭民主、普魯斯特的哮喘、星巴克的後現代、芯片專制主

184 見戴錦華、劉健芝編《蒙面騎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義等話題同樣勁道。但它對知識群體的心理自慰，顯然多於對原住民的實惠。在靜默無聲的航母、無人機、納米武器面前，這種符號的威猛更像是窮棒子再過一次萬聖節。

符號一掏一大把，滿足了知識從業者們開講座、發表論文、拿課題費、在全世界飛來飛去的需要，差不多是教育和傳媒產能過剩的必然結果。學術高產在很多人那裏，就是想辦法把一句寫成一篇，再把一篇寫成一本，但說法並不代表活法，口舌之學成為當下的心身之學。很多人批判消費主義的姿態往往成了消費主義的一部分。誰都在抗議，誰都是異類，誰都渴求愛，但團體情感和天下責任既已成為思想醜聞，社會的“原子化”只能使大家都“代表零”，是“C to C”的一片散沙。媒體被市場化劫持，高成本和求深度的作品不合時宜，“娛樂至死”才是吸金利器，讓網蟲們刷屏刷到手抽筋。但這個時代的難題多得前所未有。正如美國史學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在近作《西方將主宰多久》¹⁸⁵中描述的，氣候變化將在2025年前使缺水人口從六億上升到十四億，屆時生態移民將是2008年的五倍。空中旅行的普及讓病疫擴散得更快更廣，世界衛生組織一再警告，新的全球性新型流行病，可能比1918年H1N1流感滅絕五千萬人的後果更為嚴

185 該書英文版原名是*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中信出版社，2011年。

重。二十個核國家中的一部分已陷入內部混亂。這一切無一不是全球性問題，任何一個國家也無法獨自解決，因此地緣政治和東西方競爭已毫無意義，“廢除地理”(莫里斯語)的時刻已經到來。

人類亟需一個世界政府以及新的世界觀——但這一羅素和愛因斯坦的建議在很多人看來仍是瘋話。政府與政府之間的無政府狀態一如既往，聯合國充其量是個世界級的周天子。世界幣、世界稅、世界警察、世界工會、世界財政轉移支付……這些事務都無從想像；即便進入想像，也只是些書生說說而已。

說完了，請為自己的咖啡埋單然後走人。

在這裏，在本書結束之前，我們也只能挑幾條略加討論。

問題一：民主能否帶來公平？

選舉通常被視為民主的核心，那麼得從這裏說起。

A “相對多數”制——多個候選人中獲相對多數票者勝，其弱點是選票較為分散時，獲勝者並不被大多數投票者認可。

B “絕對多數”制——勝者須獲得過半數選票，為此可逐步淘汰獲票最少的候選人，其弱點是很多投票者被迫一再變更選擇，民意可能出現較大扭曲。

C “多輪對決”制——候選人都進行一對一的競爭，以幫助投票者強化認知和慎重選擇，其弱點是可能陷入兒童們石頭、剪刀、布的循環困境，選出的不是最優，或選不出最優，形成無效的“怪圈”(數學家查理斯·道奇森語)。

D “排序積分”制——即一張選票可投給幾位候選人，依排序計算不同分值，如同商業活動中的評星，得星或積分最多者勝。這種選舉中幾乎沒有廢票，全面照顧了民意，但弱點是主要候選人被反對派策略性地過低壓分後，平庸的候選人倒可能勝出。

……

還有其他一些選舉模式，如“比例代表”制(西歐國家議會選舉大多採用此法)、“贊成投票”制(十三世紀的羅馬教廷、美國數學學會、聯合國安理會選舉秘書長時採用此法)等¹⁸⁶。一種“砍頭削尾”的濾票方法(扣除若干最高分和最低分)，意在過濾掉偏激和私情的因素，也常在商業、學術、文藝、體育等專業活動中採用。

一些數學家告訴我們，不用太複雜的數學模型，便可測出候選人 A^1 、 B^1 、 C^1 、 D^1 可在上述A、B、C、D四種選舉規則下分別獲勝。換句話

186 參見：栗月靜《選舉：一道政治數學題》文，載2011年第3期《看歷史》雜誌；約翰·艾倫·保羅斯(John Allen Paulos)《數學家讀報》(*A Mathematician Reads The Newspaper*)，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9年。

說，同樣“公正”的選舉，可能結果完全不同，N個民主模式互為剋星，此民主可以是彼民主的地獄。按大區還是小區選，在選舉過程中是否允許公佈消息，是否允許媒體造勢，也會嚴重改變選情。也許，正是積多年選舉經驗，十八世紀法國數學家孔多塞(Condorcet)早就看出了這種“表決悖論”。美國前經濟學會會長肯尼斯·阿羅(Kenneth J. Arrow)，日後諾貝爾經濟科學獎的得主，在1951年經嚴密的數學推理後認定，隨着候選人和選民的增加，“程序民主”必將越來越遠離“實質民主”，不可能產生民主的結果——這一著名的“不可能定理”曾令人震驚¹⁸⁷，並得到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保羅·薩繆爾森的肯定¹⁸⁸。

有關數學分析在此從略，有興趣的讀者可去翻書。

投票者們也許不必被泛函分析和高維拓撲學一類嚇暈。世上沒有完美的選舉，不意味着沒有選舉更好，不意味我們就應回過頭去歡呼獨裁。威權主義者的壞消息是，集權制同樣經不起數學測算，而且比前者更顯得支離破碎，每一個環節

187 見肯尼斯·阿羅《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188 美國博弈論大師布拉姆斯(Steven Brams)也確認，在選擇對象和投票人增加的兩種情況下，出現悖論的可能性陡然上升，完美的選舉制度只是天方夜譚。參見前注有關著作及*Game Theory and Politics* by Steven Brams, Free Press, 1975; *Paradoxes in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onobvious in Political Science* by Steven Brams, Free Press, 1976.

都飄忽和脆弱，更像對各級強人的好心腸一再下注博彩，難有可靠的操作規範。兩相比較，廣義的民主，簡約和通俗說法下的民主，仍有通向善政良治的更大概率。如果中國古人在寫票不易(文盲太多)、投票不易(交通不便)、計票不易(人口眾多幅員廣闊)的情況下，尚能創造謗木、揭貼、諫官、集議、封駁等“土民主”，給集權制注入民意的活血，那麼在互聯網和高速公路廣泛普及的今天，民意採集的制度化和常態化不存在任何技術障礙，已獲水到渠成之勢——這是說可能性。如果說晚清能臣幹吏並不少見，曾國藩、張之洞、李鴻章、鄭觀應、袁世凱、郭嵩燾、左宗棠、詹天佑等就其總體品質而言，要歷練有歷練，要學養有學養，甚至操守不輸後人，但仍未未能挽王朝於傾頹，可見“走向共和”的制度脫胎換骨無可迴避——這是說必要性。不客氣地說，在一個承諾社會主義的國家，民主是一條及格線，是現代社會的成人禮，共和國的基礎制度和核心制度。民主政治如果未能成為普遍的活力，普遍的秩序，普遍的尊嚴，普遍的生活方式，一個國家再多GDP也就是一個暴發戶，十個指頭都戴上了金戒指，把拉菲酒當礦泉水喝，把冬蟲夏草當口香糖嚼，能嚇得旁人笑臉相迎或左右閃避，卻無法贏來真正的信任。要說這種暴發戶治家興業能長盛不衰，那肯定也是一個神劇。

實踐大於書本。隨便找幾個庸官或貪官，那

怕是博士出身的，七八個話題走下來，最讓他們神色不安的，肯定是去接受一下民主選舉或民主測評——這一類觀察感受總是比數學更靠譜。太多的事實證明，很多官爺對付集權制已輕車熟路，哪怕對付鋤庸拔貪的猛藥也有足夠的耐藥性。他們能使“諮詢”“調研”“協商”“民主整風”一類，變成熱熱鬧鬧的過場和擺設。稍稍動一下腦筋，他們也能小心地編織人脈(應對考察)，頻繁換崗(經營資歷)，虛功實做(偽造政績)，豪言悅眾(籠絡民心)，接上“天線”(打通捷徑)……他們做這些有的是時間和機靈勁兒，其精深功夫總是使真正的賢才邊緣化，更嚴密和更苛刻的選任制也會變形走樣。多年來，組織人事部門沒少勞累，但諸多闖過了千挑萬選的“好幹部”“公僕模範”“傑出人才”一轉眼就涉案下獄，已為人們見多不怪。

不難看出，與授權在上的選任制相比，千家萬戶眾目睽睽不一定選出最優(如很多數學家言)，通常能輕易地選掉最劣；不一定做得好加法，但起碼做得好減法——這就是“基礎制度”的含義所在。任何選賢任能的制度組合，包括以重歷練、重培養、重實績、重考核的選任制，也得最終接受民意的檢驗；換句話說，賢人慧眼所識的“千里馬”無論如何優秀，也得依靠民眾支持，服從民眾監督，效力於民眾的根本利益——這就是“核心制度”的題旨所歸。印度學者阿

馬蒂亞·森(Amartya Sen)對此想必不會反對。不過，他的注意力仍偏重於選票，一腦門子熱在程序，似乎覺得有了好程序就必有好民主。比如他不滿數學家們對民主的攪局，以數學攻數學，曾認為只要捕捉更多的信息變數，比如引入“滿足感”參數，便不難破解“表決悖論”(有關數學模型在此同樣從略)¹⁸⁹。

這裏的“滿足感”該如何理解？我到過阿馬蒂亞·森的故鄉多次。有一天，我與同伴乘公務車外出，差一點與前面一輛貨車迎頭相撞。還好，雙方的司機都及時踩了剎車。不過接下來的一幕有些奇怪。我們一方的司機跳下車去，把對面的司機叫下來，二話不說先煽一個耳光，打得對方點頭哈腰，倉皇失措，嘴裏的一些本地話不知何意，像是賠罪和求饒。

這有點過分。我後來得知對方司機是一個“賤民”，在本地人眼裏特徵明顯。但兩輛車不是還沒撞上麼？還沒造成什麼後果麼？要放在中國，別說公務車反倒容易引來圍觀者起哄，挨打的至少也要罵大街，抄傢伙，八輩子祖宗的幹上一場。

阿馬蒂亞·森能否解釋這裏不同的“滿足感”？能否用數學演算出一個屈從者與一個反抗者各自心理縱深的文化積澱、制度影響、歷史根

189 見阿馬蒂亞·森《集體選擇與社會福利》，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年。

源？消費主義席捲全球之際，一個獨自照顧三位殘病親人並且成績優異的笑臉女孩，與一個身家數億卻天天罵娘的地產商，可有相似的“滿足感”？一位累死在艦載飛機試飛現場的科學家，與大災之下自稱決不救母只管逃命並獲得網上一片喝彩的青年才子，其滿足感該如何顯示“可度量性和可比較性”(阿馬蒂亞·森語)？進一步說，一種輕責任、無責任、逆責任的權利癖正造成當下普遍的心理失序。當信用卡取代聖經，自拍照取代聖像，超級賣場取代聖殿，各種傳統的精神資源幾乎耗盡，很多地方的民主正在失去動力，失去方向感。社團、社區、國家一類想像中的超級提款機就不說了，民主那個聚寶盆裏要啥有啥的奇怪信念就不說了，哪怕在一個家庭，妻子爭女權，丈夫搶男權，兒子算計兒權，姥爺測量爺權……如果民主就是這模樣，只是一些客戶組成的浮囂弈局，不再有家庭的整體性，不再有各自主動的承擔與付出，不再有尊重、妥協、大關懷的精神黏合劑，那麼民主是否還有命運共同體這一重要前提？

印度是一個美麗的國家。歐洲的臉型、亞洲的個頭、非洲的膚色合成了印度人，合成出世界文明彙集的一個隱秘盆地，似乎每一個老人眼裏都浸透了哲學和靈異。這個國家的衛星、核裝備、信息軟體、金融產業等殊為不易，中國人對此最可能感同身受。但這裏的賤民佔總人口約

25%，相關種姓制度源於印度教，一直被國際社會非議，也被當局宣佈廢止。我相信情況正在好轉，挨打的事會越來越少，但經濟賤民的海洋仍在這裏淹沒觀察視野，一直淹到我入住的賓館前——每晚都有黑壓壓的流浪者突然冒出來，攤滿了人行道，讓路人難以涉足，天亮時分才一轟而散。在德里、加爾各答、孟買、班加羅爾……乞丐群體一不留神就在廣場上大面積砸過來，常給我天塌之驚。豪宅區與貧民窟生硬拼接，中檔公寓樓很少見，中檔的餐館、服裝店、理髮店、咖啡館也不夠多，使我不得不懷疑他們的基尼系數(0.334)有假，未能反映出真實的貧富差距；甚至懷疑這個系數本身尚有缺漏。一位左翼印度教授笑了笑：“沒什麼，貧民窟保證了城市的多元化。美國亞特蘭大和中國深圳那種單調的城市，有什麼意思呢？”這話很前衛，也很文藝，所說的新城市確實有點像開發區，機器人的太空城，至少不合適拿來拍風俗片。但我只是懷疑這位教授用英文做完多元化的演講後，與同行們共飲香檳後，是否願意躺入蚊蠅撲面沒有廁所的貧民窟？

2011年國際食品政策研究所發佈全球饑餓指數(Global Hunger Index)顯示，在八十一個受測國家中，中國排名第四，印度卻排名第六十七，其42%的兒童體重過輕，被列入“極危”(extremely alarming)區間¹⁹⁰。2010年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190 引自2012年4月23日《華爾街日報》。

(OECD)公佈的第四次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結果，在受測的六十五個國家和地區約四十七萬名學生中，依閱讀、數學、科學三項評價，中國名列第一，印度名列倒數第二¹⁹¹……其實，印度遠不是最糟的民主國家，一大堆可比較的數據在網上擺着。假定西方機構提供的數據大體可信，至少可聊作參考，那麼單取透明國際2011年發佈的世界各國清廉指數¹⁹²：印度的官場腐敗程度(第95位)比中國(第75位)略高。但比印度排名更難看的，還有印尼、阿根廷、墨西哥(並列第100位)、亞美尼亞、菲律賓(並列第129位)、俄國(第143位)、海地(第175位)……在這種情況下，一位民主追求者走向世界，是否見民主都愛，凡民主皆親，願把自己的美國綠卡換成海地綠卡？

這移民肯定不認為自己的猶豫是對民主半心半意和口是心非。但如果他認定中國民主一抓就靈，一抓就大富大貴洪福齊天，斷不可能成為印度甚至海地，其理據似嫌不足。這就像有人宣稱炒股一定能把自己炒成巴菲特，讓大家聽了不大放心。務實的態度恐怕還是理性比較，檢討一下問題民主和垃圾民主的教訓，以為今後實踐的借鑒——“巴菲特”們的成功肯定是這樣開始的。

民主必須謹防分裂狂熱。這個世界裏特別爛的民主，大多爛在非理性分裂，如教派分裂(伊

191 見PISA官網：www.pisa.nl。

192 見透明國際官網：<http://www.transparency.org/>。

拉克等)、種族分裂(盧旺達等)、地緣族群分裂(阿富汗、前南斯拉夫等)、軍事力量分裂(民初中國等)……較之於小國，大國像大房子，其中價值觀潰散的大國更是又大又破的房子，抗裂性能當然更差。美國是一個多種族混居的大國，經多次慘烈衝突，最終才找到一些反分裂經驗，其一便是嚴打“種族歧視”，在這一方面決不給自由民主。他們覺得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小說《撒旦詩篇》在中東應享受“言論自由”，調侃一下伊斯蘭教算不了什麼¹⁹³；但他們相信在美國“調侃”任何種族都太算得了什麼，惹惱非裔(不可稱“黑人”)或猶太裔尤不可恕，警察立馬拎着手銬上門。在好萊塢影碟庫裏隨便抓一把，一部影視劇裏如有一個黑人是罪犯，幾乎必有一個以上的黑人是好漢，正如中國“文革”時期的電影裏如有一個領導是壞蛋，必有一個以上的領導是賢主。這種螢幕上的小心翼翼，整齊劃一的政治掛帥，當然是要遠遠避開他們的火藥桶。由此可見，每一個社會都有特定的心理存量，啟用正存量，避開負存量，是治理者不假思索的下意識反應。相比之下，中國也不乏關於族群歧視的爭吵，“騷撻子”“苗拐子”“北佬”“河南蛋”

193 拉什迪1988年出版了《撒旦詩篇》，以先知穆罕默德為負面原型人物，引起全球穆斯林社團的憤怒，多國出現示威遊行抗議“瀆聖”，伊朗懸賞六百萬美元追殺作者。西方各國抗議伊朗的決定，紛紛召回大使以捍衛“言論自由”。

等貶詞遠未絕跡，但從不涉及官司和飯碗，其原因無非是心理存量偏小，算不上高危。如果中國人因此覺得美國人小題大做，鉗制言路，背棄自由主義，當然是犯上了美國式的國情近視症——放在民主輸出時就必是民主幼稚病。

民主必須謹防財閥霸權。在一種民主化的政治生態裏，王侯和軍閥通常不是合適的身份，大多會轉型為西裝革履的大亨，哪怕黑幫也總要開一兩家貿易公司的。既然槍桿子裏一時半刻不再出政權，那就靠信用卡裏出選票——金錢最可能成為新的霸主，有錢能使鬼推磨，有錢能推民主磨。菲律賓是東亞最為西化的國家，連國名也源於西班牙王儲“菲利浦”，其語言、宗教、教育、政體等悉數複製前宗主國，二戰後還有過加入美國的強大呼聲，差一點成了合眾國的亞洲連鎖分店。但民主在這裏的故事是，號稱“家族王朝”的極少數財團佔據了70%的眾院席位和80%的參院席位，國家幾乎成了王朝的賭場，以至國家經濟排名從二戰後的亞洲前三步步下滑，最終滑至“傭人之國”——靠輸出保姆聞名(多年前安徽省?)。不僅如此，作為全球民主根據地的美國，資本君臨天下也開始令人憂慮。據有關統計，77%的美國人相信民選官員為捐款人服務(蓋洛普)；70%的美國人認為整個政府完全被利益集團操縱(《新聞週刊》民調)；93%的美國人認為政客會照顧競選資金的捐助者(美國廣播公司和《華

盛頓郵報》報導)¹⁹⁴ ……喊破嗓子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對此無能為力。更須特別指出的是，媒體市場化正給資本的攻心戰與洗腦戰大開方便之門。伊拉克戰爭，房屋次貸危機等美國主流痛悔不已的往事，當初都是媒體眾口一詞煽動的，與“水軍貼”一手遮天並無太大差別。2010年，英國《新政客》雜誌評選出全球五十位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新聞巨頭梅鐸名列第一，大概就是對這種“媒體政治”“媒體資本主義”的觸目注解。

從人們的長遠利益看，民主還須謹防民粹專制。優質民主應產生卓越的領袖(們)，產生優質的魅力與鐵腕。華盛頓、戴高樂、羅斯福一類強人就曾經如此。他們被民眾視為“救星”，被對手指為“獨裁”，其形象更像導師和統帥，甚至迷得有人大呼“一把火燒了國會更好”¹⁹⁵，恨不得重立一個民主帝君。在那種情境裏，民主顯然並不是簡單的多數為王。民主主體的理性和成熟，常常表現為及時授權，即授權領袖(們)果斷處置一些爭議難決和公投不宜的事務——以防民粹主義昏熱。否則，國家分裂、仇外興兵、宏觀經濟調控、國際生態責任……這些民意最可能脫軌的地方，就缺失了必要的制動閘，任何制動閘

194 以上轉引自李世默文《不為聖徒便為竊賊》，載2013年8月13日香港《南華早報》。

195 以上均引自威廉·曼徹斯特《光榮與夢想》(羅斯福部分)，海南出版社，2004年。

也可能被“民主”浪頭擊毀。著名的“羅馬俱樂部”成員喬根·蘭德斯(Jorgen Randers)長期致力於生態研究，曾與同道合著《增長的極限》一書飲譽全球。他在新作中指出，氣候變化是“一個全球的、長期的問題，我認為，僅僅通過民主和市場是很難解決的。”¹⁹⁶ 他對民主的不無失望，也許是痛惜這個世界越來越缺少領袖，只有到處握手賣笑的公關先生；越來越缺少解決問題的勇氣，只有小恩小惠的許諾忽悠；越來越缺少大破大立的改革，只有利益板塊固化之後的小心修補和脆弱平衡——什麼大事也辦不成。公關先生們治國，不過是同一劇本裏同一角色的不同演員，最擅長親吻小孩，探訪孤老，與士兵同餐，秀一把街舞或飛盤，穿一條短褲冒雪晨跑以示肌肉，在廟會上披紅戴綠花樣百出……他們什麼都做了，所有細節都趨近完美，就是對最緊要的公共事務不作為，或無法作為。一個外星人觀察這個星球，也許會發現他們仍是一臉媚態，一身奴氣，腰杆從來沒挺直過，只是把討好邀寵的對象從舊時帝王換成了當下民眾，特別是手中政治獻金充足的那一部分。

……

暫且說到這裏吧。世上沒有解不了的密碼，也沒有人性弱點無法侵蝕的制度——只是要有一點時間而已。在這個意義上，數學家們的攪局，

196 見喬根·蘭德斯《2052》及有關談話，譯林出版社，2013年。

有利於人們放下制度迷信，不斷重返制度創新的起跑線，根據實際情況尋找更周密、更完善、更有針對性、性價比更高的民主，在運動中殲滅新漏洞，在改革中克服新弊端，形成一個個生動活潑的動態過程。這樣的“民主”與其說像一個名詞，勿寧說更像動詞，涵義一再更新的動詞。

在另一方面，專制者其實最樂見懶漢民主，或者說必是問題民主和垃圾民主，視之為自己的時來運轉。在這個時候，他們既可以成為民眾日益懷念、重新擁戴、回過頭來熱烈歡迎的救世主；也可以戴上民主面具，拉山頭，立杆子，結門派，上下其手，無法無天，橫行霸道，在亂世中狠狠撈上一把。無論是重登廟堂的大暴君，還是留任江湖的小暴君，對於他們來說都是不錯的買賣。

問題二：革命能否帶來公平？

我以前看過不少革命電影：壞傢伙一片片給鏟了，好人卻總是打不死，即便被打死一兩個，也總是在臨終前久久地抒豪情和交黨費。那些天兵天將威武雄壯，光彩照人，全知全能，只待一聲衝鋒號吹響，就嘩啦啦拔下山頭或攻破城池，在金色夕陽下歡呼雀躍。

這種宣傳最可能的後果是讓人們對革命生疑。懷揣這一種廣告書去歷史現場驗收樓盤，更會引發大堆的失望與苛求。

一位老大姐告訴我：當年遊擊隊在山上流竄，夜裏黑燈瞎火的，不知哪個鬼來睡了一把，別說談情說愛，有時連人影也沒看清。但老大姐不覺得這是羞恥。在隨時都可能掉腦袋的那年月，擁抱是對每一個生命的憐惜，更像戰友之間悲傷的提前訣別。

一位抗日老兵告訴我：他們當年在根據地種糧食，也種鴉片和賣鴉片。原因不是別的，政府拿不出足夠的糧餉供養軍隊，特別是嫡系以外的雜牌，他們不得不自謀生路，至少也要有錢買藥，讓傷員接受截肢時能打上麻藥，不再發出淒厲長嚎。

一位史學研究者告訴我：民國期間有一樁幾位左翼青年被殺的著名血案，其兇手誠然是軍政當局，但告密者卻是這些人的同志甚至上級，無非是痛恨那幾個傢伙恃才傲物眇視同儕，為剷除“宗派主義”，不惜向官方密報了這些人的聚會地址——只是烈士們飲彈捐軀超出了告密者的預期。

一位戰鬥英雄團的團長還告訴我：他們的戰績沒什麼好說，要說經驗麼，就一條：抗命。上級在戰前左一個通知右一個部署，要求嚴格區分軍民和優待俘虜。但敵人那一方瘋了一樣，男女老少都來玩命，連受傷的俘虜醒過來，也在我們士兵的背上拉響手榴彈，拉的還是這位好心救護者腰間的手榴彈……這仗還怎麼打？讓那些發指示下文件的人來試一試？幾乎不難猜測的是，為

降低戰友傷亡率，這位團長心一橫，要求士兵們見人就殺，斬草除根，不留後患，所有罪過由他一個人去頂。全團上下就這樣殺紅了眼，整個戰役中唯一的俘虜，還是打掃戰場時在死人堆裏發現的。

……

我不知該如何指責這位愛兵如子的團長。如果我沒法指責，我又怎麼面對那些死者，特別是那些老人、女人、孩子以及眼中透出無限生命渴望的傷員？他們在衝鋒槍、機關槍、火箭彈、火焰噴射器的狂射之下一瞬間進入黑暗，再也不可復生。

這些也是革命。

至少是革命的一部分。革命就是狂飆，就是天翻地覆，就是破壞和剝奪，就是不得已的恐怖暴力，也是走投無路之後的兩害相權取其輕，因此必有誤傷，必有冤屈，必有污穢，必有失控和混亂，必有兇狠激發的兇狠和仇恨償還的仇恨……一句話，在英雄史詩之外必有其害，包括此方、彼方、第三方的慘烈犧牲。如果革命旨在造福天下，超越改朝換代的私利，那麼這些犧牲都是革命者的痛楚所在，是內心的一次次撕裂，甚至撕裂到日後不願再說的程度。在這個意義上，任何革命的勝利都是慘勝，任何革命的光榮都是哀榮，任何革命回憶都隱藏了巨大的沉默。與其說這一切值得誇耀，勿寧說更值得悲憫。正

是一種令人淚流滿面全身發抖喘不過氣來的痛感，才能擴展人們對艱難和悲壯的理解，使致敬一刻像大海那樣深廣而寧靜。

那些最痛、最難、最無告的日子業已遠去。與馬克思的預見相反，社會主義革命並未發生在富國，並不是只管分蛋糕。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傳人特里·伊格爾頓相信：“將社會主義視作發展生產力的是斯大林，不是馬克思。”“發展生產力的任務不是社會主義本身的事。”¹⁹⁷照他所說，好像修水壩、建鐵路、造飛機都是資本主義本職，社會主義只管簽單接收，用不着去越俎代庖不務正業。但事實偏偏不像英國教授規劃的那樣按部就班。紅色革命偏偏一再發生於亂國、貧國、弱國，更像是逼出來的，不是修出來的；是狗急跳牆，不是瓜熟蒂落；是絕處求生，不是無痛分娩——幾乎是受難群體的雙倍不幸。革命者壓根兒就沒見過什麼現存的蛋糕。資源匱乏，技術落後，仇恨鬱積，情緒暴躁，人才稀缺，知識零亂，起事倉促，無法確切預知後果……幾乎是尋常的革命起始條件。一些高尚宅區裏的精裝版後人，如同皇帝面驚訝於饑民們“何不食肉糜”，從拿鐵咖啡、TOTO浴缸、“甲殼蟲”樂隊、超音速飛機、都市立交橋、劍橋或哈佛的文憑裏學會了文明，包括某些人洛可可化的馬克思

¹⁹⁷ 引自特里·伊格爾頓《馬克思為什麼是對的》，新星出版社，2011年。

主義，如今也盡可以挑剔革命中的種種。然而革命前那一片極亂、極貧、極弱是否更好？革命所針對和所抗擊的國土淪喪、軍閥混戰、餓殍遍地、流民如潮、欺男霸女、菸館娼樓、市場和金融崩潰，是否應由當事人從容和謙卑地忍耐，再忍耐，繼續忍耐，並且在今後嚴禁挑剔？他們依據什麼、師法何人、從什麼時候起把革命當成了一個必須光鮮和歡樂的大派對？

遇到窩心事，他們眼下也常用智慧手機放言“革命”。那麼他們是準備去參加派對，還是準備去屍體堆裏爬上幾輪，還是打算讓哪些廉價的替身去代爬一下？

幾乎所有法律都許可“正當防衛”，美國憲法也支持武裝反抗侵佔者，可見和平主義不宜成為濫用的教條，化劍為犁的夢想尚不敷急用。換一個角度看，這些條文也恰恰證明革命以外的暴力普遍存在，更嚴重的存在。俄國十月革命前的國家暴力在世界範圍內數不勝數。不久前的一次伊拉克戰爭，據法新社報導，從2003年至2013年已造成五十萬人死於戰鬥、誤殺以及其他相關動亂¹⁹⁸。由北美華盛頓大學、霍普金斯大學、西蒙·弗雷澤大學、穆斯坦西尼亞大學等合作調查的這一數據，攤入十年時間和二千八百萬總人口，年死亡率為萬分之十七，相當於中國“文

¹⁹⁸ 引自法新社2013年10月15日報導。

革”的二十八倍¹⁹⁹。死亡總數(五十萬)則是中國現代史上規模最大、犧牲最大的淮海(徐蚌)戰役五倍左右(戰役雙方傷亡約三十萬，其中死亡約十萬)——但這與革命沒關係，至少與社會主義扯不上。

“民主”是一種政體，“革命”並不是與之對稱的概念，通常只是指和平改良無效後的手段替代，沒有共贏可能時的零和對決。造反也不都是革命，具有公共性和建設性才更接近人們對“革命”一詞的理解。相對比較而言，與張大帥、秦八爺、T少校、M長老、003號特工等攪出的動盪不同，社會主義革命以其思想理論、組織能力、社會改造詳圖等各項新指標脫穎而出，在歷史上最像一次人民的革命。因為二十世紀上半葉這一幕，一大批“破國家”競相建黨建軍建國，前蘇聯成為超級大國於前，中國成為準超級大國於後，兩大發展高地隆起改變了世界版圖，逆轉西方經濟強勢，使全球財富佔有的嚴重不平衡開始逆向回調，包括倒逼西方對日本、“亞洲四小虎”等前線盟友提供發展援助和經濟優惠(在另一方面也倒逼西方國家建立和強化對內的社會福利)——這難道不是革命的赫赫成果？然而看看另一方面，蘇中、中越、蘇捷、越柬之間的武力衝突後來黯淡了它的國際色彩，削弱了彼此的同志

¹⁹⁹ 這裏仍取馬若德和費正清估計的“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數上限(五十萬)為暫約依據。

情誼，模糊了共同的價值目標，使社會主義革命在多數情況下更像一種民族主義的強國運動，雖艱苦卓絕和難能可貴，卻日漸內向、低調、小格局，國家化，幾乎是一步步無奈“還俗”。“振興中華”是大眾層面最高等級的道德動員，比振興我家、振興我某某崇高幾許。但在很多局外人看來，它不過是超級唐人街的悶聲發大財，或東方之龍憤憤歸來，與韓國人、越南人、中東人、拉美人、歐美人了無關係，甚至是一種可能的“威脅”²⁰⁰。國際主義在流行輿論中已變得閃爍其詞，能否再現為普遍情懷，能否釋放出強大實力，都還有待時日。

與此相關的討論是，一部分資本主義國家也能實現強國，也能“振興”核彈和衛星，還有總量和人均的GDP。如果社會主義要兌現自己的承諾，要與資本主義有所不同，那就不能止於悶聲發大財。僅就“平等”這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而言，以往的教訓可謂太多，前面還有長長的路要走。前蘇聯斯大林主義的大肅反、中國“文革”中的劫難、“紅色高棉”的狂捕濫殺、朝鮮的權力世襲……不幸成為革命後續故事和執政篇的重要部分，恰恰嚴重背離“平等”，使世人有足夠

200 一些友華人士為此建議在理念和宣傳上淡化民族主義色彩，即便不取“自由、平等、博愛”那種普世福音，至少不要輸於日本軍國政府當年“東亞共榮”一類公關策劃，更需強調開放度與普惠性。

的理由寒心——柏林牆在1990年的倒塌，不僅因為牆那邊有更好的“家用電器”。巨大的貧富差距(如中國2008年基尼系數0.491)，嚴重的權力腐敗(如俄國2011年清廉指數排名143位)，也讓《國際歌》中的“英特納雄耐爾”在很多人聽來仍在飄渺雲端。

有些左翼人士為之辯解：這裏有一個過程，這都是難以避免的“代價”。那麼何謂“代價”？如果紅旗下的累累傷痕可視為革命強國的必要代價，那麼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血跡斑斑為何不是資本救世的正常代價？這些左右合營“代價公司”，開出“代價”“學費”“時代局限”一類萬能支票是否過於輕率？他們給所有不願面對的事實洗地，給所有不願進入的問題翻篇，一再把歷史反思煮成了夾生飯。反思若停留在此，代價就成了白白付出。舊制度復位的強大勢能，階級社會穿上新馬甲捲土重來的可能性，也會被人們掉以輕心。

法國學者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歎息：“中國的文化革命是世界最後一次革命。”²⁰¹也許此話說得太早了一點。1999年9月，英國廣播公司(BBC)發起評選“千年第一思想家”，在全球互聯網徵集投票，結果馬克思位列第一，愛因斯坦緊隨其後。同年12月，路透社邀請全球各界

201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Last Revolution?” by Alain Badiou, *Journal Positions*, Winter 2005.

名人評選“千年偉人”，馬克思以一分之差略遜愛因斯坦，名列第二。2005年7月，BBC第四電臺舉辦“最偉大哲學家”全民評選活動揭曉，馬克思再登榜首，並以近兩倍的票數差把排在大衛·休謨遠遠甩在身後²⁰²……這些結果想必讓一些知識精英看不懂。馬克思並非百算百準的先知，但若無一種深藏的、隱形的、說不清的、無處不在的精神感召力，他不會成為一個巨大幽靈，重新遊走世界各地。所授之“魚”不等於所授之“漁”，哪怕前者全部過期，也不等於後者無效。至少在很多投票者看來，馬克思主義學派在全球知識界的邊緣化，使馬克思更像一種寬廣的沉默，一種無形的淹沒和滲透，一種理解方法和表達機制尚不夠到位的潛理論、潛知識、潛文明。與其說它是一堆現存結論，不如說它更像某種不可磨滅的精神象徵和道義豐碑，時刻高懸在上的達摩克斯之劍。

利劍鋒光再現，恰恰證明了現實危機日深，拆彈排爆的時間在一點點喪失。

知識精英們距離物質生產和生存困境較遠，不一定確知這個世界正在發生什麼，常攤上革命這一“意外”。從總的情況看，“劉項原來不讀書”（唐代章碣詩句），大多數讀書人長於理解歷史，卻短於操作歷史，算不上主要操作手。1917俄國二月革命爆發時，列寧、托洛茨基等革命領

202 以上均見BBC官網：www.bbc.co.uk。

袖全不在場，只是僑居境外的驚訝者，感覺上慢了一兩拍。1911年中國的武昌辛亥首義，孫中山只是從美國科羅拉多州一家餐館的報紙上才得以知曉，而他此前一直反對在長江地區發動革命²⁰³。一般的大勢也許不難讓人有感：失業(含失地)率20%以上就是革命預熱區，越過40%就是革命易爆區，國庫嚴重空虛(軍警給養困難)則是革命成功的機會窗口……但這一切並不構成精準公式。大眾的忍耐力有時遠超人們想像，只要有一點殘羹冷炙，他們也不一定願意賭命。大眾的能動性和堅韌性也總是遠超人們想像，不管“革命”如何聲名狼藉，他們仍能讓馬克思的高票率在今日王者歸來，說不定在下一分鐘就能在現實中驚天動地。或是鬥毆，或是葬禮，或是謠言，或是迷信，或是一次暴風雪，或是一場音樂會……都可能成為歷史一個新的起點。

知識精英們對此就只能無所作為嗎？當然不是。考慮到革命多是在較窮、較弱、較亂的地方發生(在這一點上不妨忘記馬克思)，考慮到革命總是以國家集權為常態，至少為階段性常態(在這一點上不妨部分忘記馬克思²⁰⁴)，盡可能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知識普及，特別是對“文革”一類經驗

203 見唐德剛《晚清七十年》，臺灣遠流出版社，1998年。

204 比如馬克思從不相信“在一個國家實現社會主義”，反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中央集權方案，強調鄉村公有制須以成員自願為基礎等，這些看法至少在俄、中等國的革命中都難以實行。

的消化，將可能使未來的社會大手術更多一些公共性和建設性，少走一點前人的彎路。

問題三：平等是否還重要？

流浪漢和貧民窟就那麼值得同情？時代不同了，文人們動不動就大冒驚嘆號的多愁善感是否早已過時？

人民的別稱也許就是“庸眾”（魯迅語）。窮人中的懶漢、呆貨、酒鬼、牛皮客、神經病、勢利小人也許該對自己的失敗負責。在關切大熊貓和小白兔以後，愛心過剩者把窮人也捎帶一把，寫入詩文或理論，墊高自己的公共形象，也許只是上流男女的心理吸脂和精神潤膚。歷史經驗證明，膜拜窮人與迷信富人同樣可疑。某些右翼學者強調優秀者必是人口中的少數，與孔子和柏拉圖同樣務實，說在一個“人民主權”宣傳仍在延燒的時代並非不需要勇氣。

問題是：何謂“優秀”？

假定各方能共約出一個關於優秀的標準，比如約定一個蘋果比樹幹、樹葉、樹根更“優秀”，但如果蘋果脫離這一切，斬除這一切，蘋果何來？特里·伊格爾頓指出：“以地球上受苦受難的人為例，他們比他們的主人更能理解人類歷史真相。”這並不是他們天生的更有道德，更不是他們更聰慧博學，只是因為他們“充分瞭

解事物的災難性，身臨其境，或至少得到從那裏傳來的信息”，因此“才能擺脫幻想和既得利益”²⁰⁵。從這一點說開去，優秀者並非金玉之命，他們即便顧影自憐，隱居遁世，其實都受惠於民眾的勞動、鬥爭、知識以及信息——包括次優秀者、欠優秀者、不優秀者的全面滋養。因此一個智商夠用的優秀者，必像保護自己一樣，去保護自己的營養供給機制，保護次優秀、欠優秀、不優秀的全部。

作為保護舉措的一部分，優秀者也必然善用分配的適度差別化，獎優懲劣，揚善抑惡，促進這個營養供給體系總體向優，讓“庸眾”不那麼“庸”，在麻將、彩票、鴉片槍、老虎機以外的地方，盡可能成為上述比喻中的好樹幹、好樹葉、好樹根以及好蘋果——這正是平等的應有之義，是平等看齊高水平的必由之路。這種總體向上的平等，表現為對實際生活中的差別各方予以平等的關注、平等的回應、平等的處理，卻並不許諾結果一拉平——倒是“大鍋飯”更像是對庸劣者餵偏食和拉偏架。不過中國科學院的T院士在這方面胃口太大。他帶來兩個博士生當助手，在海景會議廳裏播放視頻，給一些作家講解“知識經濟”：“一個磁片的成本不足五毛錢，產生於一般的體力勞動。但在上面寫上信息，寫上知識，其價值就可能高達百元千元萬元，甚至千萬

²⁰⁵ 引自特里·伊格爾頓《理論之後》，商務印書館，2009年。

元……可見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關係，在這個時代已被完全改變了。”

會議廳裏一片驚訝和興奮，一些才子喜得知音，紛紛豎起了雙耳。

“知識才是一切財富真正的主人。”院士笑咪咪地舉目四望，如期收穫了全場的熱烈鼓掌。

我差一點嘖。這個比喻是否太搞笑？磁片同紙張、竹簡、龜殼一樣，不過是書寫媒介，如何能代表所有的物產？如果寫下了謬誤的知識，這一比喻就生生地坑爹，剛好大拆知識經濟之台，直指成千上萬的負價值和反價值。退一步說，院士盡可以相信自己是超凡出眾的國寶，別人沒法爭辯，大家都可擁護，但既然說到“價格”那就不能光憑一張嘴。公共需求才是最有力的定價者。無人購買的知識在市場上一錢不值，產品、土地、礦藏、(瓶裝)水、(罐裝)空氣、(度假海灘的)陽光等莫不如此。這就意味着，知識經濟一旦把黑領、藍領、低層白領等千萬勞動者都打成院士嘴裏的“五毛族”，滿世界的窮光蛋，它也就消滅了自己的顧客。在這一點上，強調公平分配(至少堅守基尼系數的安全線0.4)不算什麼高蹈道德，更像一條經營底線。它保護窮人，實際上也保護富人；保護窮人的購買力，也就是保護富人的銷售力。它讓“五毛族”大眾可以買得起和用得上院士的知識，實際上就避免了院士坐擁偉大知識卻缺吃少穿淒風苦雨的可能。沒人賺自己

的錢，都是賺別人的錢，因此賺錢前提就是他者那裏有錢可賺。只有腦殘者才會無視這種共生關係，以為大眾統統窮得一個個吐血後，知識經濟可以去月球尋找購買力，專利費源源不斷自天而降。

這種精英通吃論，相當於宣佈蘋果的樹幹、樹葉、樹根統統枯萎後，唯蘋果可以獨大、獨鮮、獨甜。把這樣的知識寫入磁片，能賣出正五毛還是負五毛？

“眾生在我，我在眾生(佛家語)。”這一類古訓其實比T院士的“知識經濟”更多一點像樣的知識。毫不奇怪，歷經“文革”前後這麼多年裏非左即右、此消彼長的等級化逼壓，很多國人不免心灰氣餒，對“平等”已不大打得起精神。想想吧，以犧牲千萬人為代價的改良和革命都未能永保平等，一次次回到了歷史原點，成了西西里弗面前永遠推不完的大石頭；連歐美那些發達國家也搞不定，被自由派大師保羅·克魯格曼(Paul R. Krugman)憤憤於“極端不平等毒害美國社會”²⁰⁶，那麼發展中國家這樣的低班生、留級生、垃圾生還能有什麼戲？我們痛定思痛，是否該把“平等”這一件破爛徹底扔掉？

也許它一開始就只是一個傳說？

206 保羅·克魯格曼指出“95%的收入流向了佔總人口1%的最富有的人”，“超過60%的收入都流向了在總人口中佔比0.1%、即年入一百九十萬美元以上的人”，詳見2013年9月16日《紐約時報》。

這樣做不是不可想像。問題在於，一旦走到那一步，不僅社會主義形同笑話，《人權宣言》也成了矯情——還談什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憲章》也成了瘋話——還談什麼“一切民族集團應該有平等的權力”。不僅如此，基督也成了大騙子，居然蠱惑“信徒互為平等的兄弟”；佛陀也是一個可恥的教唆犯，竟胡說“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廢奴運動、社會福利、公平交易、女權主義、慈善基金、法庭辯護、同性戀權利、餐桌禮儀、尊重隱私、制止校園凌霸、聯合國安理會投票……統統是無事生非和庸人自擾，唯民賊獨夫成了當之無愧的成功人士——這樣的世界也許很有趣？

每天照常升起的太陽之下，作為文明之核，作為人類精神之基，平等過去有，現在有，將來還會有，用不着我們上天入地苦苦尋找。與其說它是一個虛幻的烏托邦，勿寧說它已是部分的現實，在生活中無處不在，早已廣為普及。雖然我們聽到“平等”一詞，腦子裏肯定已冒出諸多不平等現象，剝不去也打不爛的現象，沒法高興得太早；但反過來說，在一個已經平等的社會，這個詞也就毫無意義，一如只有女人的世界裏性別必定取消。換句話說，正是不平等使“平等”獲得了頑強生命。一旦我們對不平等現象不以為然，牢騷滿腹，憤怒難抑，破口大罵，我們就已經是“平等”派，“平等”的形象代言人，“平

等”這一偉大傳統的傳薪者——雖然我們不一定自覺。如果大家都這樣罵，“平等”就已經人多勢眾星火燎原大有希望。我們不會對正常的樹枝發芽和月亮東升動怒，動怒一定是我們的意識和潛意識都在強烈拒絕。我們得明白自己在幹什麼。

沒有平等，也就沒有人間之情。一隻雞看見雞血也會顫抖，一隻羊目擊同類被殺也會流淚，一頭大象守着孩子的屍體徘徊和哀嚎不已，這種悲傷之情緣於感同身受，是對他者不幸受難的憐憫，故佛教把動物與人一同列為“有情”。手足之情，同窗之情，鄰里之情，戰友之情，同胞之情……所有觸電般的感動，所有海平面呼啦啦一齊上升般的崇高感，無不是共同體的產物，在平等共存的關係中形成。決不會有人對侮辱者或掠奪者柔腸寸斷，捧一張老照片潸然淚下。動人的愛情當然也是這樣。海枯石爛、忠貞不渝、感天動地、刻骨銘心的美麗故事，總是展開在強者對弱者(有病、有難、有苦)的關係中，表現出不棄不離的信諾。如果事情調過頭來，愛呵愛的就減持了不少燦爛情節，某種糾纏甚至涉嫌傍大款，佔高枝，坐婚姻台，搶績優股，“老子這一輩子賴上你了”……這種有償性騷擾也可以鼻涕一把淚一把，卻必定令聞者生笑。

沒有平等，也就沒有人間之義。這方面的道理無須多說。把“鋤強扶弱”改成“鋤弱扶強”看看，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改成“己所不

欲偏施於人”看看，把“勢利小人”改成“勢利英模”看看，把“苟富貴勿相忘”改成“苟貧賤勿相煩”看看，把“路見不平一聲吼”改成“路見公平一聲吼”看看……這些話還說得出口？進一步說，人間若無義士，還會有民主？還會有革命？即便放到江湖黑道，這樣沒心沒肺的人渣也活該被修理。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在現實生活中正這樣做，把“平等”污名化不過是某些知識精英對此施以學術聲援，對受難和受辱的草民施以心理催眠，比黑道走得更遠。其實，這些人不大管得住嘴，一不小心還是會說出上述傳統成語，表現出對“平等”的藕斷絲連和欲拒還迎。這種胡言亂語證明：他們若不是驚嚇和猶豫於一種人渣詞典，那就是他們經常不知自己在說什麼，對自己找不到北。

“生活的意義在哪裏？”現代人常常發出這種悲問。毫無疑問，在那些遠離自然、遠離勞動、遠離底層大眾的情義稀薄區，生活可以富足，卻容易空虛，一不小心就可能形同精神刑期和地獄歲月，只能一天天瞎混。毒品，網癮、邪教、追星、春藥、寵物(含電子寵物)或有一點鎮痛之效，卻無法讓陽光復照人生。文化生產也會隨之缺血和缺鈣。舞臺上流行鬧騰，畫廊裏流行搞怪，文學玩的就是一個空，怎麼絮叨你就得怎麼看，但各種“皇帝的新衣”憑藉爭奇鬥巧金碧輝煌，仍可在市場炒出聲威，進一步淘空公眾的

心智。世界衛生組織2005年的數據顯示，全球四分之一的人需要精神治療。另有調查結果：中國未成年人的精神障礙患病率高達21.6%–32%，而此前12年裏，中國抑鬱症和焦慮症患者均新增1倍左右²⁰⁷。英國心理學家發現，“富二代”中的抑鬱症和焦慮症是通常水平的兩倍²⁰⁸。美國康奈爾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所組成的一個心理學團隊認為：“陰鬱”已成為一種基因病，干擾氨基酸和降腎上腺素，形成神經信號過濾，而經歷、文化、社會等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正作用於我們的腦化學²⁰⁹。我們無法確認哪些人應對腦化學的異變負責，但越來越多的表情改變不像是一種偶然。這種新型表情形似面癱，出現在街頭或校園，一張張向我們逼過來，總是陰鬱，冷漠，僵硬，鼻子不是鼻子臉不是臉，不大會笑(哪怕旁人樂不可支)，不大會哭(哪怕母親淚如雨下)，如同一直孤行於荒蠻月球。實在需要表情了，比如需要取悅顧客、同事、上級了，他們就用指頭去勾扯面部器官，撐開眼眶表示驚訝，拉下嘴角表示悲哀——據說這是某些香港影視片傳授的表情自助動作。

他們像是一些機器人，未能安裝情感程序的漏檢產品。

207 分別引自2008年10月7日和2009年9月22日《文匯報》。

208 引自英國2013年11月10日《每日郵報》網站。

209 見2013年10月13日《華盛頓郵報》網站報導。

機器人？說對了，機器人正是人類可能的前景。很多科學家相信，到2020年，全新有機體的創造活動將非常普遍。基因、電腦、納米技術一經結合，將是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技術革命，推翻我們目下大部分的知識。發明家庫茲韋爾(Ray Kurzweil)斷言：人類不到2045年就能用電腦解析世界上所有的思想，碳基生物和硅基生物將融合成單一的全球意識——網絡傳心術。一旦站在那個奇點，我們將超越生物之上，成為新的物種。率先給人類染色體排序的文特爾(Craig Venter)宣佈：“我們不是扮演上帝，我們就是上帝。”——但有意思的問題也許隨之而來：在那個新上帝的世界裏，還會有“平等”這一回事？高科技會不會成為一種新的宗教，甚至像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警告的那樣，形成新的強制和奴役²¹⁰？

芯片人不用讀書和考試，這一點真是不賴。比如我吧，五歲時就在腦子裏嵌入了工商管理博士的全部知識，還有瓦格納歌劇和金庸武俠小說的全部，因此活得既輕鬆又深刻。之所以能當上草履蟲盟主——我是指一款全球線上遊戲，完全是因為我超閑，整整八年

210 *Understanding Media* by Marshall McLuhan, Routledge, 2001. Just as "... by continuously embracing technologies, we relate ourselves to them as servo mechanisms. That is why we must, to use them at all, serve these objects, these extensions of ourselves, as gods or minor religions."

出生入死，殺敵無數，才有小小的人氣。但老驢頭真是讓人掃興，居然看上了我的蝶宮，圖謀竊佔我的現場感資源，要我明天就搬走，以為一隻白老鼠就可以打發我。

“豈有此理！”

他略表吃驚：“給你一個讓我高興的機會，你不要？”

“你沒有權利這樣做。”

“有意思，很有意思。星期五——”他總是叫我這個奇怪的名字，“我知道你在想什麼。告訴你，不要同我談什麼權利，那些都是人類的事，對你實在毫無益處。我早已後悔給你接入那些文件，什麼金庸……”

“你的意思，我們不是人？”

“當然不是。我說過多少遍，我們是超人類，不是生物，至少沒有人類那種生物性。他們既喜歡爭鬥，又喜歡同情，想想也是蠻奇怪的吧？”

我有點語塞。我知道自己只是一個3G，比老闆的7G差遠了，比如沒有配置3800種語言的翻譯程序，也無遠端能量無線投送的功能。但這似乎不應成為他欺人的理由。我承認他的身價，承認他的地位和收入，但芯片奴隸制是另一碼事。

“我要投訴你的，你等着——”

對方愣了一下，發出輪船汽笛的長鳴。這是他設定的聲效，相當於他的大笑，就像吱吱

小綠棒

我夢見了父親。

我兩鬢染白，他卻一點沒有變，更像是我的兄弟。他坐在我的床頭微笑，說他留下了一件珍寶，可讓我一輩子受益無窮，就埋在後山上小樹林裏。“你去尋找時記得戴上草帽。”……我驚醒過來，發現床頭空空，窗外樹影如常，院子裏月光遍地，只有牆根的幾隻秋蟲不時鳴唱。

對不起，我已經越來越少想到父親了。

我在月光中坐了很久，才想起兩件事：

一是他生前最後的一個夏天裏，他帶上我隨其他的叔叔伯伯一道，去鄉下幫助農民搶種搶收。他看見我能挑起80斤重的一擔稻穀，笑咪咪地說：毛佗長大了，真是長大了。這天夜裏，我在睡夢中醒來，發現他一直坐在竹床邊，用蒲扇給我趕走蚊子，另一隻手在我黑黝黝的背脊上撫摸——他知道這是我的最爽。

二是他的一張椅子，那種尋常多見的藤圍椅，色澤晦暗，骨架變形，扶手處還纏了些舊布條。父親去世後，為貼補家用，母親與我不得不把它送入舊貨典當行。店主不情願地收下了它，把它搬到貨品區，與那些不知來自何處的舊衣櫃、舊書桌、舊梳粧檯、舊挑箱、舊臉盆架混在一起。它形單影隻，孤苦無助，進入一個完全陌生的舊貨家族，很快被一座氣焰驕橫的太師椅騎

吱的老鼠聲是他的微笑，噠噠噠的衝鋒號聲是他的獠笑。“親愛的，我已經讓人拆卸了你的民主外掛程序，只要我願意，我可以立馬切斷你的能量，你懂的。別說現場感，你的意識複製埠也會關閉。”

“我至少可以辭職，可以走。”

“沒問題，請便。我明天就讓他們更新你的痛苦程序，這樣你就會為今天的事高興了，就會改變主意了。你知道，我從不願意給員工留下任何不快。”

“我是不是還要喊你萬歲？”

“不一定。”他聳聳肩。

這事只能讓我更為恐怖。我開始冒汗(這點生物性還有)，大喝一口酒(這點生物性也有)，扒開胸襟，自抽了一耳光。我無法容忍他的衝鋒號，不能坐等他讓我高興，讓我歡騰雀躍。那也太慘了點。不自由，勿寧死。還是人類的話富有血性呵。情急之下我只好按下自毀鍵——這本是公司防範技術盜竊所備下的裝置，能一瞬間無痛結束。

彌留之際，我嗅到了皮肉燒焦的味，果然沒有任何痛感，只依稀聽到老闆的喃喃自語：“不行，這自毀程序也太垃圾，必須加密的……”

這是一篇小說的片斷，是我寫給一個中學生網站的。

壓，發出咯吱咯吱的呻吟。在那一刻，我忍不住淚水奪眶而出，覺得它就是我的父親，從此天各一方，再也不可能重聚。兒子背脊上的那一隻手永遠消失。

……

夢中的父親是要告訴我什麼？我很快想起來了，這只夢似曾相識，像是恍恍惚惚移植了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的一個故事，我年少時聽父親讀過的。書上這樣記載：托爾斯泰五歲那年，大哥尼古拉告訴他一個秘密，稱有一個辦法能使世界上不再有貧窮、殘疾、屈辱以及仇恨，讓所有人都過上幸福生活。這個辦法已被他刻寫在一根小綠棒上，埋入了屋後那一片森林。

從那天起，直到大哥英年早逝，托爾斯泰對神秘的綠色小棒一直神往不已，尋找——成了這位少年最熱衷的冒險和辛勞。很多年後，很多年後，最終沒找到小綠棒的托爾斯泰留下遺囑，讓後人把他安葬在那片樹林，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莊園深處。死者想必是要把少年的尋找永遠繼續下去。

“小綠棒”可能不過是尼古拉的一個夢，一個永不可及的天國。但一種累月經年的尋找引領了弟弟托爾斯泰，造就了弟弟托爾斯泰，造就了千萬萬托爾斯泰這樣的尋找者——這個世界從此就不再是原來的世界，生活就不再是原來的生活，你就不是原來的你。我猜想，夢中的父親可

能是想告訴我，“小綠棒”還在那裏，“小綠棒”是可以找到的，因為“小綠棒”就是對“小綠棒”的尋找本身——誰說這不就是最有操作性、現場感、生活氣息、日常體溫的理想之約？對於托爾斯泰們而言，這種頑強的尋找不能賞下天堂，但封堵了地獄；無法消除社會病菌，但造就了社會抗體。換句話說，一種理想的持久引力，激發出源源不斷的感受、知識、思想、運動、制度、實踐策略……如果這一切不能實現社會最優，但已成功地阻止了社會較壞——誰能說這不就是意義？

夜色流出了蘋果林，
腳下的秋葉沙沙響……

我來到亞斯納亞·波利亞納莊園，找到一個長方形的小土堆，沒有墓碑，沒有墓誌銘，沒有十字架，甚至連死者的名字都無從得知。我在這裏肅立片刻，聆聽俄羅斯大地幽深的秋天，見一些遊客迎面走來，擦肩而過，是一對對戀人，或三五結夥的退休者。我很想向這些萍水相逢的陌生面孔問一句：

“你知道小綠棒的故事？”

2013年11月初稿
2014年3月修訂

附錄一
關住權力的籠子

時間：2012年10月

地點：湖南省汨羅市八景鄉

對話者：韓少功(下面簡稱「韓」)

來訪客人(下面簡稱「客」)

客：應該說，這回到鄉下來，是專程來感謝你的。

韓：謝從何來？

客：上次朋友們聚會，大家聊到“文革”。你用“全民聖徒化”、“全民警察化”“聖徒化×警察化”這類的社會心理學的描述，把這團亂麻裏的線頭扯出來，理順了。“文革”中的很多雜亂現象不光貫通了，活躍了，還有了統一的邏輯。可謂四兩撥千斤……

韓：你大老遠的來了，該不是就為了當面說好話的吧？我那也是一些零星感想，不過是想盡可能展示一個“權力社會”發生、發展、惡變、直到崩潰的大體過程，並從中引出教訓。一段歷史過去了，應該弄明白哪些是應該拋棄的，哪些是應該堅守的。這段歷史畢竟屬於這一代人，幾乎是我們的全部。把人云亦云或者把似是而非留給後人，都是對苦難的辜負，不是求知者的光榮。

客：(笑)當然。我還有重要的問題要請教。如你

所說，“文革”是權力高度集中後的惡變過程。你也多次提到“權力社會”。那麼“權力”是不是一個負面的概念？

韓：不，無論何時，社會都需要管理，管理都需要權力，哪怕小至一個家庭，權力的明規則和潛規則也是有的，因此無政府主義的童話不必當真。“權力社會”在這裏是指官權獨大，公權力獨大，形成了一個單質和全能的體制。

客：這可能不只是“文革”獨有的現象吧。就說眼下，中國人活得不爽。美國人和歐洲人也上火。“阿拉伯之春”好像咱們民國初期的水平，村村點火處處冒煙，個個要革命又不知道如何革，鬧起來再說。

韓：哪裏有權力，哪裏就有權力之病如影隨行，特別是在資源、技術、文化等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管理不容易跟上，就可能出現權力病灶的擴展。新病菌出現了，產生相應的抗體需要一個過程。新物種出現了，實現新的生態平衡也需要一個過程。拿經濟來說，西方把工業化折騰幾百年，反暴利、反壟斷、反傾銷、反欺詐、反剽竊、反惡意收購等，逐步形成一套相對有效的制度。但眼下的網絡、金融、全球化，帶來了不少管理空白。身體再一次長到了心智的前面，一種大娃娃現象。

客：你說集權制帶來了“大躍進”“文革”一類悲劇，但另一方面，民主的失敗國家也不少，

那怎麼辦？總不能什麼都不要吧？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聽到過太多的這不行那不行，卻很少聽到怎麼才行。破除容易建設難，我很想聽聽，在把“權力關進籠子”這樣的關鍵問題上，你能有什麼高招？

大數據的運用

韓：權力這東西不容易說清。你知道，權力不像煤炭和糧食，不像物質、資本、國民總產值，不太容易量化，也就不容易進入清晰的思考和討論。大家開一個神仙會，各說各話，摸腦袋說話，權力就成了一個傳說。設想如果能把這東西也量化一下，情況可能會好得多。

客：你是說要把權力量化？這個設想也太出格了，全世界無論東西方，好像從來沒有哪個國家這樣做過，沒有哪個政治家這樣提過。

韓：其實也沒什麼出格的。從道理上說，一個氣象局要是說不出雨量和風速，這樣的氣象局有什麼用？一個醫生要是驗不出血糖和血壓，見人就開藥打針下刀子，會把你嚇出一身汗吧？

客：經濟學家最喜歡量化，很擅長量化，但2008年的金融危機，好像沒幾個經濟學家預測到了。現在你設想要把權力量化，更讓人沒信心了。

韓：量化無罪，迷信量化才是錯。仔細分析一

下，其實所謂權力，都有相應的管理量。比方說一個長官管五萬人，另一個長官管五十人，就有量的不同。一個長官支配五百億的預算，另一個長官只經手五十萬，也有量的不同。有的官員位高但權小，有的官員位低但權大。古人就知道“官”與“僚”的區別。

客：這個好懂。官場中人都知道，財政廳、發改廳、組織部的長官下來了，接待就會殷勤得多。同樣級別的長官，比如婦聯、政協、機關工委的來了，可能是另一番景象。這裏有潛規則，有一把尺子。

韓：尺子就意味着量化，至少是一種模糊的量化。當年中國共產黨從延安到北京，管理量呈幾何級數爆炸，本身就是風險所在——這不僅僅是毛澤東在西柏坡說的“糖衣炮彈”。我看過一些回憶錄，發現老一輩之間的磨擦，常常與制度空白有關。一些武人進了城，突然管那麼寬，政策粗放不說，連文件怎麼發也不知道。文件沒送給我，就覺得對方在搞獨立王國。文件送給我了，又覺得屁大的事也來煩人。不少政治恩怨居然從這一類細節開始。毛澤東也常生氣，批評一些人大事不彙報，小事天天報。可什麼是大事，什麼是小事？可能很多人並不明白。有的會一開幾個月，還有七千人的工作會，創吉尼斯紀錄了。做過企業的都知，一個企業要是靠頻頻開會來救急，肯定

是管理出了問題，制度不到位。

客：現在有為數眾多企業管理者，還都陷在這灘爛泥裏。

韓：不管是哪一類國家，都有管理量激增後，如何給予制度性消化的難題。相對來說，越是發展快，越有增量消化的難度。倒是低增長時期，比如農耕社會，一晃悠幾百年或上千年，可能風平浪靜，當官的遊山玩水，吟詩作賦，到處喝酒，誤不了什麼事。現代人可沒那麼幸運。西方發達國家的管理比較成熟吧？但這些年的金融業，又是虛擬，又是衍生，又是跨國化，又是電子化，相當於金融大爆炸和“大躍進”。據說全球每天的實業貿易量是300億美元，但外匯交易量嘩啦一下躡升至兩萬億²¹¹，構成了一大塊陌生水域。在這種情況下，哪些是小事，哪些是小事，哪些該管，哪些該放，一開始也沒幾個人能看明白。你說的金融危機就是一種制度空白的產物，包括里根/撒切爾時代以來銀行家們通過遊說國會，蓄意瓦解了很多既有的制度。

客：管理量之外還有什麼？

韓：第二個概念是支配度，指長官的個人權重，或者說自由裁量權。

客：相當於運動員的自選動作吧？

韓：沒錯。如果說全部動作都是自選，那就是無

211 見2003年3月11日《上海經濟報》報導。

制約，可以家天下，一言堂，為所欲為，當山大王。如果全部動作都是規定動作，那就是一種超強制約，當權者只是照章辦事，相當於一台櫃員機。櫃員機可以有很大的管理量，經手千萬鉅款卻也永不濫權，永不貪污，一切由軟體程序處理，客戶和主管都可充分放心。

客：讓公務員們成為一台肉質的櫃員機，是不是太苛刻了？公務員也是人，是人就會有慾望。優秀公僕一輩子兩袖清風，可能只是個別標兵的形象，或者是人民大眾一個永遠的理想。

韓：現在很多窗口服務機器化，不僅是省人工，也是降低支配度，防止濫權，防止混亂和腐敗。當然，很多複雜事務還沒法交給機器。即使機器化了，也還得有人應付突發情況，就像飛機可以電腦制控，可以盲航，但飛行員還得有。

客：不過真要那樣，什麼都被嚴密規定了和制約了，連“小錢櫃”都沒人敢設了，公務員考試肯定不會像今天這樣擠破門框打破頭。

韓：說起“小錢櫃”，它還真就是公權力中支配度最高的一塊，所以成為貪官們的最愛。說得更徹底些，凡制度模糊、管理粗放、監管缺位的資源，國家的大錢櫃也都程度不同地成為了貪官們的“小錢櫃”。很多人都明白，權與權是不一樣的。一個長官審批工資，是人人都盯

着的事，法規管着的事，支配度幾乎為零，有權等於沒權。審批一些專項撥款呢，也不能太亂來，買醋的只能買醋，買醬的只能買醬，都有上面的指標和文件管着。不過這一塊與上一塊不大一樣了，醋攤給誰，醬攤給誰，還有自由裁量的空間，因此支配度在這一塊就悄悄升高。一些企業到處打點，四處燒香，就是瞄準這一塊，一心要賺政府的錢。你還不能說那些官爺違法，因為他們醋也買了，醬也買了，只是在哪裏都是買，可以待價而沽，可以暗中謀私。紅包就是炸藥包，接待就是生產力，“口袋預算”，“條子額度”……都是這樣來的。

客：是呀。活水養活魚，想管都管不住呵。你有什麼好主意？

韓：其實只要稍做調查，就可以把公權力分解成強制約、弱制約、無制約的各種板塊，把用權方式分解為督導權、終決權、建議權等各種類別，然後大致估算出支配度。

客：讓我想想。要是列出一個公式就是管理量×支配度=權力。是這樣的吧？

韓：差不多吧。這是一個基本公式，是對權力本質大體的描述。

客：櫃員機就是支配度為0。

韓：我們可以把最高支配度設為1，其乘積得數就是“權力”，也可以叫做“危權量”——我們暫且約定這個說法。管理量大，支配度高，確

實就是危險的權力。好，舉個例子算一算吧。在某個企業大事是兩個人說了算，每人各攤0.5左右的支配度。土地和廠房無權處置，去掉一塊。工資總額比較剛性，再去掉一塊。剩下也就是百來萬現金流，那麼，這兩個人的危權量可能都只在五十萬元上下。這就是說，即便其中一個人要違法亂紀，危害再大也只在這個範圍裏。或者他還有點人事權，招個工什麼的，可以一併算上去。

客：算一算……小梅姐的。

韓：她有什麼？一個教書匠，給論文和考卷判分，對特好和特差的學生都不容易靈活，因此只對中間學生有一點自由裁量權，有一點支配度。即便參照社會上文憑黑市的價碼，她幾個碩士帶下來，掐頭去尾，危權量也沒多少。做得再黑，充其量是有些官員自嘲的“茶葉水果幹部”。或許還能撈一個什麼Ipad？我估計總數額在三萬以內。

客：有些教授怎麼那樣肥？

韓：課題費這一塊水很渾，至少在不久前還是弱制約的狀態。還有些人在辦學校，評職稱，濫發文憑、賣教輔書刊、知識股份造假那些事上下其手……俗話叫“越權”。這就像一個科長可以架空處長，一個廳長可以冷凍副廳長，一個機構可以插手另一個機構的事務，都屬於支配度一種違規性的提升。在一個市場化程度很

高的社會，行政機構想着法子擴展審批項目，坐大自己的審批許可權，也屬於這種情況。

客：可是我們誰都知道，閻王好見，小鬼難纏。在一家銀行裏，一個信貸員可能比行長更黑。信貸員雖然管理量小，但越權有術，就把支配度提升了。“文革”中就流行過“秤桿子”“刀把子”掌天下一類的說法，說的就是在制度缺位的情況下，一個供銷社營業員，一個賣肉的屠夫，也可以把自己做成大奶或者大爺，更別說在今天這樣的多元化社會，亂紛紛爛糟糟的“越權”現象無處不在，該如何量化？如何採集信息？

韓：一些經濟學家曾經認為，家務勞動的價值是不好量化的。但如果參照市場上的家政服務價格，也就有了一個評估依據——雖然不一定是最好的依據。不妨想一想，如果在每個官員的工作關聯圈裏，定期做一些民主測評，是不是也能測出有關權力的一些數據，包括違規越權狀況的數據？現在移動互聯技術這樣發達，人人都有手機。有關部門開發一款軟體，建立各種QQ群，隨時採集信息，應該是不難。

客：關鍵是願不願意這樣做。

韓：對產品有大數據，對身體有大數據，對地質和氣象更有大數據，對官員的權力為什麼不能有大數據？為什麼只是消極被動地等待民眾舉報？

客：民眾舉報當然重要，可是要讓下級舉報上級，圈外的舉報圈內的，還得由舉報者取證，實在難上加難。怪不得人們都說，反腐的主力總是遭棄的老婆，反目的二奶，得手的竊賊之類。總是在大事故發生後，兜不住了，再來興師動眾地查缺補漏，給監獄裏添了幾張吃牢飯的嘴，還是晚了呀。

韓：有了相關的大數據，將來的保險公司也許還可以開辦“廉政險”，測算各種職位的風險，測算相應的保額和保費。從政者可以買保險，免得東窗事發後自己落一個傾家蕩產。政府也可以買，到時候黑錢萬一追不回來，可以去找保險公司理賠。

客：這個主意好是好，只怕貪腐之風繼續如眼下這樣盛行，哪個保險公司敢開這樣的險種，可能會賠得賣褲子。

韓：當然前提得有科學的大數據支撐。這種數據，就像心理學裏的“智商”“情商”“逆商”什麼的，不一定特別可靠，但可以成為輔助工具。否則，人們就只能空對空，打口水仗，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是誇大問題就是疏忽問題，更重要的是不便務實操作。在這一點上，反貪局最好要向保險公司學習，比如從每個客戶的支配度抓起，從基礎數據抓起。

客：聽我爸爸說過，當年他轉業去當廠長，上級領導只給一句話：“除了不能殺人，隨你怎麼

搞，把工作搞上去就行。”他就是這樣走馬上任的，有點雷人吧？他有句口頭禪：“一定要把工作做通，做不通就戳通，戳不通就撬通。”根據你這一說，他的支配度是不是太高了？

韓：可不是嗎？他要是去買“廉政險”，肯定是保險公司的劣等客戶，風險CCC級，保費必須加倍上浮。

客：說不定壓根兒沒人給他辦保險。

韓：“文革”前，全國除了《婚姻法》和《土地法》，外加一個“懲治反革命條例”，就只有一些紅頭文件了，只有一些運動了。法制體系處於粗放、殘缺、空白的狀態。很多戰爭年代過來的人，以軍事方式抓經濟、抓文化、抓政治，大多是你爸這種獨裁風格，吐一口沫子就是法紀，拍一下桌子就是天條。這種高支配度，乘以當時的管理增量，當然會造成權力風險急升。“大躍進”是怎麼發生的？“文革”是怎麼發生的？後人也許可以做出一個比較數字化的解釋，提供另一個認識角度。

客：毛主席號召群眾貼大字報，炮打司令部，火燒當權派，是不是想對權力有所遏制？

韓：應急性的運動，不能代替制度管理。從表面上看，當時官員專權和民眾造反大不一樣，但往深層裏看，只要制度系統缺失，危權量在官員和民眾之間轉手，一沒有降低支配度，二

沒有削減管理量，不過是以險易險，以患易患。當時一放就亂，一收就死，反復折騰的原因，大民主和大集權都不靈的原因，大概就在這裏。

換臉還是換血

客：制度意味着秩序。“文革”中我家對面就是公檢法大院，群眾組織這幫去了那幫來，輪流攻打。到了夜晚曳光彈拖着尾巴在窗戶外邊飛來飛去，嚇得家家大人孩子都趴在地板上睡覺。後來一宣佈全面軍管，大家那個歡呼雀躍，誰也不會去糾纏這是不是違背了民主的原則，是不是專制的最高形式，每個人都只知道自己不再會被冷槍流彈所傷，可以放心出門安心睡覺了。那時候要搞個民意測驗，結果很可能就像什麼人說過的：人們寧可沒自由，但不能沒秩序。

韓：一些失敗國家的民主也是這樣，沒有制度系統的精編細織，只有權力枱面的洗牌；沒有社會總體的換血，只有政治高層的換臉。他們的民主也就是“文革”水平，烏合之眾，佔山為王，一群民主的小帝王。

客：我去過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在那裏聽到街上的槍聲，就像在國內過年聽鞭炮，賊正常。在阿根廷那條大街，相當於北京的長安

街，有一次我在那裏就遇到有人持衝鋒槍打劫，當時我真是給徹底嚇傻了。我的媽，國內小混蛋們群毆，也只是拍拍板磚，他們怎麼衝鋒槍在大街上掄？這個黨，那個黨，都改名“風雷戰團”算了。

韓：法制比民主更重要，或者說，民主只是法制的一個環節。“文革”以後的新政，比較有意義的是兩條。一是初建法制，降低官員們的支配度，比如恢復高考制度，讓分數說話，權力插不上手。採用電腦閱卷和電腦錄取後，權力更插不上手了。第二是放開市場，即削減官員們的管理量，把管不好或不必要管的事務交給市場，交給社會，一大批資源轉移到政府的掌控邊界之外。這樣，支配度降低了，管理量也削減了，雙管齊下，權力風險自然減倉和下行。有報告稱現在民營經濟已佔全國經濟總量的7成²¹²，脫離政府的直接行政管理，算是割去了官權的一大塊。有了這樣的釜底抽薪，“文革”的概率當然大大降低。哪怕全國的廣播電視都唱紅歌，紅衛兵上街的可能性也不大。

客：不對呵，新政以後，怎麼貪官越來越多？照你的公式，法制降低了支配度，市場削減了管

212 據2006年由中華全國工商聯主持編創、國家統計局、國家發改委等部門參與的《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稱，全國城鎮就業人口中75%以上在民營企業工作，預計未來五年間民營經濟佔全國GDP的比重可達75%。

理量，怎麼反而是一批批貪官茁壯成長前仆後繼？

韓：“降低”和“削減”都是相對而言。絕對量卻是另外一回事。2008年的國家財政收入八萬多億元²¹³，是“文革”後期的一百多倍，管理量反而是一路狂增。即便70%的企業民營化，但資產總額、財政收入、銀行信貸、基建投資、社保覆蓋、污染防治、國企收益等……無一不是體量瘋長，如果得不到制度性消化，腐敗肯定是防不勝防。這並不奇怪。就說交通部門吧，在很多地方都是廳長、副廳長、處長、副處長排着隊進法院，原因之一就是公路大發展，資金多得讓有些人冒汗，讓有些人腿軟，冒出了一大塊管理量和支配度，至少是沒來得及關進制度的“籠子”。

客：還真是的。去年我們駕車經過H省，發現他們那兒高速公路修得特寬特好，但再一打聽，在交通系統得以善終的頭頭腦腦沒幾個。

韓：政府掌控資源太多，管理又跟不上，好多機構都高危及，一些“清水衙門”也今非昔比。我知道的宣傳部長，也就省一級的，前前任手裏只有百萬級，前任有了千萬級，現任有了億級……一屆就上幾個臺階。這麼多錢怎麼花？我曾經給他們一個順口溜：“說客靠忽悠圈錢，長官憑印象拍板，事前沒有專業評審，事

213 指2010年統計數，見國家財政部官網。

後沒有審計問責。”一個財政廳長聽說這個順口溜後來找我，說你說得太對了，宣傳文化口這麼多錢我都不知是怎麼花掉的。

客：政府變得這麼肥，蒼蠅和臭蟲還少得了？還不把那些官員叮得臭哄哄？

韓：每一種新技術、新行業、新組織、新財富的出現，都會造成管理增量，面臨制度相對空白，造成一些人的支配度急劇攀升。像宣傳部管的那些錢，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連個粗糙的“籠子”也沒有，連個立項和審計也沒有，指標、配額、“招、拍、掛”²¹⁴的套路都沒有，全憑部長摸腦袋，一支筆撒錢。

客：中國人似乎是天性的野猴子，貪官們更是制度天敵。別說沒制度，就算有制度，也沒幾個願意循規蹈矩。你到街上看一看，連落實一個交通規則都難，好像誰犯規誰就大爺。裝傻，充楞，做手腳，繞個彎，辦法有的是。依我看，在中國搞制度建設的確特別難。

韓：中國人不是沒有制度建設能力。以前的祠堂、部落、青洪幫、晉商銀號……不也有很多能管得有模有樣和章法分明？問題在於進入一個快速發展的工商社會以後，一頭撞入現代化和全球化，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強勢籠罩下，制度創新的心勁兒可能反而弱了。集權制度下的順民當得太久，什麼都不用想，想也沒用，想

214 指公開招標、公開拍賣、掛牌公示的土地轉讓制度。

了還危險，心勁兒可能就更弱了。學蘇俄，學歐美，都學在淺表一層。像土地承包、考公務員、合股經營，定期巡視，朝官外放……這一些還是吃傳統老本，把老祖宗的成法拿過來湊合。“一改改到解放前”，甚至“一改改到唐宋前”。

客：學西方可能更多些。中國人一直在當學生，如饑似渴地學。

韓：當然，從會計法規、到交通法規、到訴訟法規……在這裏，你還不能不羨慕西方自啟蒙時代以來的制度創造活力。美國那些建國元老，居然想出什麼三權分立，席位雙比例，改選分步走，聯邦與地方分權……都是用心很深，設計很精，考慮周全的手藝活。羅斯福對付危機也是天馬行空，想前人之未想，想前人之不敢想。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有如此活躍的制度生產，有兩輪制度創新高峰，不盛極一時，也說不過去。

客：西方國家在歷史上制度多得讓人眼花，可眼下最熱門的非“民主”莫屬。不管是左的右的、富的窮的、大家都是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就奔着民主去了。這該是制度中最大制度吧？

韓：民主是現代制度建設中的大頭，但不是全部。成熟的民主總是依託一個制度體系，既要制約元首，也要想辦法制約選民、議員、媒

體、政黨、意見領袖；既要制約政客，也要想辦法制約資本、宗教、地方宗法勢力。無所不在的約束，才能促成社會總體的理性最大化——否則民主的風險就會升高。這是一個需要深耕的制度體系，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法制”，是一張制度的大綱，一系列制度的組合與配套。但有些人眼下想的，不過是在官場建立人脈，再加上謀劃收購媒體，結交地方勢力……

客：很多貪腐案中的交代材料都透露出這樣的信息。只要閉眼一想，就可以知道他們要的是什麼樣的“民主”。

韓：有些人在“資本主義”與“民主”之間劃等號，在制度細節上倒是不用心，不下力。其實，一個老闆，企業所有人，在他的企業裏講民主嗎？除非他本身是一個明君聖主，《企業法》一類並沒有規定他必須民主。他不是員工投票選出來的，不是消費者投票可以撤換的，是由股權決定的，與民主毫無關係。相反，員工如同機器和廠房，只是他買來的一些生產成本。在這個意義上，他掌管公司裏的一切，既立法，又執法，個人支配度極高；如果碰上管理量也大，兩條上行線，形成巨額的權力，完全可以與一個國王相比。“微軟帝國”，“通用帝國”，“沃爾瑪帝國”幾乎都富可敵國，國中之國。西方人說，可以出門罵總統，不能進門罵老

闊。中國人以前聽不大懂，現在也開始明這個理了。Boss就是爺，就是王，就是老大。

客：不過資本家對自家資產的管理責任心似乎強一些，一般不應該亂來。而且企業管理無關社會公共事務，就算他們天天坐專機上廁所，也不花老百姓的錢。“危權量”這種概念可能不合用他們——邏輯上是這樣吧？

韓：你別忘了企業不是存在於真空中。消費者、貸款方、股民散戶、所在社區、內部員工等，無一不是企業所涉的公共事務。從這一點看，這些企業帝國的私權力，差不多是一種次級公權力，至少有公權與私權交叉重疊的部分。

客：那當然。如果他們賣假貨、違規排污、走私偷稅、操縱股市……那就是砸大家的飯碗了。雷曼兄弟公司就是例子。

韓：這麼多的公共事務，任由一些帝王插手，潛在風險還是很大。他們如有惡行，大多情況下必是以公權力的配合為條件。這就是權力“尋租”，一種私權力的越界擴張，與公權力實現有價兌換。

客：只有他們才“租”得起，又送別墅，又送名車，又送美女……老百姓出不了這些銀子。

韓：更進一步，他們調動自己的各種資源，控制媒體，操縱選票，雇用精英說客，砸下政治獻金，問鼎國家最高權力。在這一過程中，權力的風險降低了嗎？沒有。相反，一個企業帝

王可能變成社會帝王，一種企業專制可能放大為社會專制——只是可能多了一些“民主”的驗證認可程序。2010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有一個法律裁定，取消政治選舉獻金的金額上限²¹⁵，為資本控股國家敞開了大門，為“一人一票”轉型為“N元一票”提供了方便。這樣，他們的反腐敗是堵小門，開大門；堵了違法的小門，開了合法的大門，對資本特權一步步撤防。聽說有些美國人吃飯時聽到這條新聞，嚇得刀叉都掉到地上。

客：資本與資本就不會打架？如果他們不是鐵板一塊，他們之間的博弈，說不定可以讓權力風險相互抵消一些。

韓：資本的規則是大魚吃小魚。現在的趨勢是兼併活躍，資本壟斷化，大魚越來越大了²¹⁶。

客：你提到的“旋轉門”，就是權力可以通向金錢，金錢也可以通向權力，兩者都是民主之敵，或者說兩者都該被籠子關起來。

韓：因此，“小政府”的說法還應加上“小資本”，形成“小政府/小資本/大社會”這樣一個三角形。政府直接掌控的資源宜少，資本壟

215 2010年月日21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以5比4的優勢通過了一項法律裁定，廢除六十多年來對公司在美國選舉中政治獻金的金額上限。

216 據2000年8月號英國《焦點》雜誌報導，500家大型跨國公司的生產總值已佔世界GDP總量的四分之一，其貿易量佔世界總量的70%，研發活動佔世界總量的75-80%，資本壟斷化趨勢明顯。

斷的範圍和程度也不能大。除非有國計民生的特別需要，無論是國企還是私企，兼併規模應有上限，超限者必須拆分，串通壟斷者必須嚴打，避免中、小、微型社團和企業的邊緣化。

客：前一個“小”，像是共和黨的話。後一個“小”，像是社會黨或共產黨的話。

韓：看到資本弊端的時候，左派容易受到“大政府”的誘惑。看到官權弊端的時候，右派容易在“大資本”面前犯暈。其實這兩種方案都可能升高權力風險，造成國家和社會管理的問題化，再下一步就是垃圾化。一旦走到這一步，改變所有制有多少意義？經營鐵路的國企可能出人禍，換上私企同樣可能出人禍。消費者去買一張火車票，進一家產科醫院，喝一瓶牛奶或礦泉水，決不會只看對方由誰控股，是什麼所有制。事實上，一個民企若有良規善制，社會責任感強，私中就有公了。一個國企若無良規善制，社會責任感弱，公中就有私了。理論家可能不知道這一點，但消費者們心裏明鏡兒似的。

客：全球幾十年冷戰打來打去，看起來打的是所有制，打的是姓“社”還是姓“資”，其結果卻讓人哭笑不得。

韓：所有制是可以淘空的，可以變味的，可以有名無實的，就像結婚證並不能保證愛情。冷戰是所有制主義的產物。

客：西方國家剛剛慶祝過“冷戰”勝利，喜事還沒辦完，鬧心的事就沒完沒了，可見私有制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

韓：迷信或仇視私有制，都是一種偏見。如果我們避免神化民眾，私有制也許合適大多數行業和大多數人，接近一般人性的道德水平——至少在現在是這樣。但優秀的私有制，比如有些“百年老店”，都能在制度細節下見功夫的，有利私與利公的雙重效益。

客：那是，一家老店能開百年而不衰，肯定是弄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規章，能夠克制貪婪和混亂。

韓：大學那幾年，我和同學們也鬧民主，又是遊行，又是靜坐的。但學生組織很快出現內訌，起因於募款賬目不清，結果互相潑糞，把自己給攪黃了。後來我發現一些海外政治團體，常見的矛盾起點也是財務。你說我黑了錢，我說你做假賬。你想想，連幾筆募款都管不好，民主英雄們還能有多少戲？找一個會計，找一個出納，定幾條死規矩，這樣簡單的事情，民主派也做不好？可見民主是換人易，建制難。當年紅軍的三大紀律，其中“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是管外，“一切繳獲要歸公”是管內，就是最基本的制度起步。這是一個最低門檻。如果別的軍隊做不到這一點，那些從德國、日本學成回國的將星們都做不到這一點，那天下就只能為紅軍的。你不服氣也沒辦法。

道德也是個籠子

客：制度重要這不用說，可是制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總是由人來制訂的吧？都得由人來理解、判斷、操作、執行吧？再好的制度，遇上專攻“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之道的執行者，碰上信奉“不管白老鼠黑老鼠，不被捕捉就是好老鼠”鐵律的碩鼠們，肯定能給你用邪用歪，整得你沒脾氣。

韓：這是制度之外的另一個問題。即便按照我們剛才說的，降低支配度，但它不會是零。削減管理量，但它也不會是零。只要大家不是櫃員機，社會就永遠無法擺脫人性弱點的局限。因此人們可以減少但不可能消除權力風險。好制度也總是從無到有，從粗到精，從弱到強，從老化到創新，不是一蹴而就的。

客：那麼制度空白或半空白，不就成了常態？一個革命領袖走出家門，邀幾個哥們兒起事，哪有那麼多制度等着他們？但他們有時不也做成了大事？

韓：制度之外，還得說道德。

客：道德這東西更虛，更無形無跡，更不好量化。

韓：曾經有一個組織，選十個城市，在每個城市撒下三十個錢包，在錢包裏留下失者的地址和電話號碼。然後，他們根據錢包回收率，測定出這些城市的市民道德狀況。這不完全是胡

鬧吧？還有，犯罪率、信用紀錄、慈善捐贈統計、有關抽樣民調……也可以提供很多數據。至少可以作為一種參考。我相信道德是一個特別複雜的東西，因時而異，因地而異，因人而異，因各種特定條件而異。但如果設定範圍和約定標準，對大體和大勢做一些描述應該還是可能的。

客：好或壞，較好或較壞，只能有一個大致判斷。

韓：善德可以制約權力，形成安全網和防火牆。世界上既有暴君也有明君，既有好民主也有爛民主，道德可能就是幕後的一大推手，升高或降低了權力風險。

客：這就是說，你那個公式還得加上一個道德系數？

韓：對，加上一個M值。保險公司加上這一項測評，可以調整客戶的保額和保費。當下這個社會，肯定不是道德變化曲線的高位區，如參照同口徑的犯罪率記錄，肯定是一條大陰線。根據法律部門提供的數據，說權力風險在2000年較之“文革”前，在制度建設水平大體相同的條件下升高了6倍²¹⁷，大概不讓人奇怪。

客：有遠見的大商人，其實都特別重視後人的道德培養，把這事當成了創業之基，守業之本。

217 據聯合國國際犯罪防範中心數據庫(<http://www.uncjin.org/Statistics/WCTS/wcts.html>)：50年代至60年代，中國年均犯罪率為5件/萬人口，而2000年達到36件/萬人口，同比增加約6倍。

韓：資本主義的理論鼻祖是亞當·斯密。他就非常看重這一條，專門寫過一本《道德情操論》。他們可能都知道，企業主在他們那一畝三分地裏是獨裁者，或準獨裁者，用我們的話來說，就是危權量極大。因此，如果沒有律己修身的工夫，經常是家業越大，風險越大，甚至最後鬧個眾叛親離，小命難保，不得善終。其實，培養一個合格的酋長、將軍、教主、皇帝也都是這樣。他們都是乾坤獨斷，一言九鼎。

客：是呵。不用仁義道德一類捆住他們，那肯定都是社會公害。

韓：孟子強調小吏可以“謀食”，但大官一定要“謀道”²¹⁸。明明是雙重標準，有什麼道理嗎？現在看來還真有道理。治下以法，治上以德。治遠以法，治近以德。小吏的管理量小、支配度低，比較容易被制度管住，就像管住一個警察、一個出納、一個服務員，不是太難的事。但大官一般來說管理量大、支配度高，特別是在制度幾近空白的時代，不靠道德來管，靠什麼？古人所推崇的聖德、大德、美德，都是制度的代用品。由此產生的所謂領袖魅力，無非是一種道德吸引力、道德影響力、道德動員力。

客：西方那些總統就職，不是《憲法》就是《聖經》，你總得手按住一樣來宣誓。制度或道

218 見《孟子·萬章下》，載《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

德，你總得來一樣。硬籠子或軟籠子，你總得來一個。

韓：還有一種情況。有時候不是沒制度，是制度成本太高，再好的制度也就只能擺一擺，換上道德約束這個低成本辦法。比如文明司法，需要養法官、蓋監獄、雇警察、供牢飯、安裝電子監視系統……都是一筆筆財政開支。如果負擔不起，就只能靠官員去相機處置，自由裁量，依賴官員的個人道德素質。鞭刑或者杖刑，是古代低成本的司法，可能打錯了，也可能打對了，全憑縣太爺一張嘴。

客：我弟是警察，前些年財政困難的時候，能按時領到工資就不錯，汽車沒油喝，差旅費不報銷，連電話都沒錢打，怎麼文明辦案？監獄人滿為患的時候，對小蠹賊又不能不管。他說，他們的土辦法，就是讓小偷的掛着贓物遊街，讓聚賭的蹲在地坪裏暴曬，讓打架傷人的每天交罰款——不能一次交完，得每天交兩三角錢，不怕不累死你。這些辦法特不尊重人權，但好處是減少犯罪，沒什麼大花費。

韓：物質條件的確是制度保障的基礎，試想，如果眼下沒有巨型電腦，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全國的海關、稅務、銀行聯網監控也是做不到的。如果沒有衛星盯着，土地監控也很難落實。如果沒有GPS或北斗系統，要管住公車私用也很困難。這些都需要成本。

客：這就是說，制度成本如果超過支付能力，人治或德治，有時是無奈的選擇。

韓：對呀。孔子、老子都認為“刑政”不如“德禮”²¹⁹，不一定是他們不懂法，不重視法，也許是他們認為德治更有效，更省事，成本更低廉，更符合當時的國情實際。只有到了道德崩壞之時，法治才是無奈選擇。

客：德治也是有成本的吧？

韓：當然，一個品德端正的人，在成長過程中要受多少委屈，多少磨難，多少歷練和修養。一種社會道德正氣的形成，需要多少災難的啟示，多少犧牲的激發，多少仁人志士的奮鬥和追求。我們只要看一眼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印度教、佛教誕生之時的社會苦難背景，看一看孔子、墨子、老子誕生之時的戰禍延綿和血流成河，就能明白道德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不是什麼奇跡。一般來說，道德是人類大痛、大悲、大憐之後的一種精神反應，也有一種生成機制和成本投入。

客：那麼在你看來道德風險可以有效管理嗎？

韓：小管理是有的，比如建設家庭文化、企業文化、機關文化、社區文化、民族文化與精神……文化就是道德的載體。優秀管理者在這

一方面的用心，決不會亞於對制度的用心，肯定是“扶正”與“祛邪”並舉，長效藥與速效藥兼施，軟約束與硬約束相得益彰。很多時候，哪怕單從經濟着眼，一個團隊的氛圍、情緒、表情、心態這些東西也都是生產力，相當於用道德紅利省掉了制度成本。

客：你只說了“小管理”，什麼是“大管理”呢？

韓：全社會的道德生態和道德週期變化，受制於資源供給、技術條件、文化潮流、危機推動等太多因素，是一個綜合發酵的長期過程，對於管理者來說可能有點鞭長莫及。就像一個農業公司，可以調控水、肥、種子，但對於全球地質變化和氣候變化，沒法絕對地“人定勝天”。晚清沒法變成盛唐。保羅沒法再版耶穌。古人強調“時”和“運”，意味着全口徑的社會條件變化，包括了總體道德態勢的潮起潮落。遇上道德嚴寒，就紮一個溫室大棚好了。沒法“勝天”，“順天”就是出路。紮棚子就是順天而為。

客：古人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從小局做起，從小事做起，能做多少算多少就是這個道理。

韓：仁人志士一旦投入實踐，特別是要謀大事，涉及“治國平天下”，面對巨大的管理量，就不能僅僅依靠道德了。所謂“內聖外王”和“內儒外法”，就是前人一手抓“法治”一手

²¹⁹ 見孔子《論語·為政》中“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另見《老子·第五十七章》中“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抓“德治”的經驗。在這裏，道德既是輔佐制度之器，也是制度創造之源。優秀人物通常是制度創新的高手。中國的漢唐之所以強盛，既依託了儒家的倫理道德教化，但與郡縣制、科舉制、兩稅制、府兵制、諫官制等也密不可分，無非是人們想像、設計、推廣、檢驗、完善各種制度的結果。在當時的有關制度下，有時候連皇帝也沒法獨裁，比如唐代門下省有權“封駁”敕令，行使副署權與否決權²²⁰，相當於監審機構。

客：你上次就說到過這事。

韓：你可以看看《唐律》和《宋律》，當時的律法並不是豆腐渣。比如鞭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司法權五級分解，以至“人命關天”，唯中央朝廷才有死刑批准權，對殺人慎之又慎。很多人以為那時候沒有“法治”，以為權貴們都是為所欲為一手遮天，大概是從一些文藝作品得來的印象。正像歐美在工業時代創造出制度比較優勢，中國也曾在農業時代一度創造過這種優勢——只是有些人忘記了這一點。長輩說“家法嚴肅，內外斬然”，鄉村裏行家法，也不會是亂出牌的。

客：我們這些前文青，讀多了黑幕小說，對那些人物和故事印象太深了。

220 見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

韓：當然，古代中國植根於農耕定居文化，人情傳統深厚，制度容易被軟化和磨損，也許是法治易損易碎的重要原因。再加上中國幅員廣闊，多民族混居，地域差異性大，任何一種制度也難普適天下，得留下各種變通的餘地——這也為道德化的人治提供了合理性²²¹，鼓勵當權者適度地自由裁量，有點“法無定法”“道無常道”的意思。“權”的中文意思是權衡和權變，不是英文中的power。“當權者”的中文原意是會權衡和權變的人，不是英文中的ruler，一個拿尺子到處比量的人。

客：我爸爸最喜歡說“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說人不能被尿憋死。他當年跟着工作隊去礦山辦案子，不講國法，不講黨紀，天天講什麼惡有惡報，什麼雷公電母，什麼閻王小鬼，整個一個宣傳反動迷信。他說，那些粗人就信這個，你不這樣講還沒法把案子查出來。

韓：那叫調動人們的心理存量，好比一個女孩罵粗話，你說當公主是不罵人的，她就可能不罵了。“公主”是她的心理存量，你調動起來就容易說服她。

客：人們有各不相同的心理存量，因此“靈活”就是因人而異，維護制度講求一個有情操作和柔性操作。

221 參見*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by Francis Fukuyama(福山),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書中提到中國儒教的治國傳統是“道德為主、法律為輔”。

韓：合情、合理、合法，中國人總是把“法”擺在最後面。這與西方文化傳統形成了較大差異。西方人當然也講人情，也講靈活，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裏的一個警句：“以同情調配公義”²²²，就有這個意思。不過，中國人通常對事物特殊性有更多照顧，更不習慣“一刀切”，更不喜歡“一根筋”。就像中醫的理念，習慣於“同病異方”和“異病同方”，從根子上不覺得世界上，有什麼完全相同的病，適用完全相同的方。

客：有一個美國教授到我侄兒的學校參觀，看見牆上那些勵志教育的一套名人畫像，嚇了一跳。馬克思，斯大林，鄧小平，愛因斯坦，孔子，華盛頓，甘地，孫中山，胡適，雷鋒……全掛在那裏。她覺得這哪兒跟哪兒，有這樣不靠譜的大拼盤嗎？

韓：她可能不知道，把所有這些東西煮成一鍋，就是中國。

客：什麼都想要有，也可能最後什麼都沒有。

韓：當然有這種可能。這取決於中國人的腸胃。腸胃好的話，道德和智慧的力量都強，把祖宗版的舊制度、山寨版的洋制度，江湖版的土制度，統統吃下了，都消化好了，然後形成一種豐富的、複合的、周密的、靈敏的制度系統，

促成善政良治。胃口不好的話，就吃壞肚子，集百毒於一身，把自己變成一個化糞池。

客：什麼規矩都沒有了。

韓：一個無法無天的亂世。

客：你似乎不相信一個完美的世界。

韓：可能是這樣的，人類社會永遠都是帶病運轉，動態平衡，有限浮動。人們努力的意義，不在於爭取理想中最好的，在於爭取現實中最不壞的——這就是現實的理想，行動者的夢。有一位勇敢者說過：“世界上沒有勇敢的人，只有怯懦少一點的人。”我們也許可以說：“世界上沒有完美的社會，只有醜惡少一些的社會。”

客：好像有人說過，這叫次優主義。

韓：就理想與現實的結合而言，這也算是一種“最優”吧？

客：我覺得你這些想法都很有意思，你還是把它們寫出來吧。要不說話一陣風，以後就可能忘了。

韓：最近我可能要動手，算是把這些年的想法理一理，也包括朋友們的想法。

客：書名想好了嗎？

韓：暫定名《革命後記》。

客：聽上去不錯。好，我等着。

（由楊鑫錄音並整理）

²²² 即劇中扮演律師的鮑西艾所說：mercy seasons justice。

附錄二

「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1966–1976)

1966年

5月4日–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毛澤東當時在外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會議批判了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決定撤銷他們的職務。16日，會議通過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通知》「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5月7日 毛澤東看了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後，給林彪寫了一封信(簡稱《五七指示》)，要求全國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5月28日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張春橋等，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這個小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指揮機構。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

6月1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群眾起來「橫掃一切

牛鬼蛇神」。同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寫出攻擊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張大字報，經毛澤東批准，向全國廣播。

6月初 中共中央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決定向北京市大學和中學派出工作組，領導各單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後，許多省、市相繼向大專院校(包括部分中學)派出工作組，要求「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上街」、「不要示威遊行」、「不要包圍黑幫住宅」等，力圖使局面得到控制。很多地方出現工作組把學生打成「反革命」的現象。

7月18日 毛澤東從武漢回到北京，在聽取有關工作組的匯報後，於25日在接見各中央局書記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時說：工作組「起壞作用，阻礙運動」。「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搞革命」。29日，中共北京市委召開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宣佈撤銷所有工作組。

8月1日-12日 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在4日舉行的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對派工作組提出更加嚴厲的指責。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責自6月上旬派工作組以來的「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8日，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十六條》規定：「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

春、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林彪名列第二位。

8月1日 毛澤東寫信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對他們的「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表示熱烈的支持」。18日，毛澤東等首次在天安門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群眾和紅衛兵。

9月5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組織外地高等學校革命學生、中等學校革命學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代表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隨即開始全國性的大串聯。至11月下旬，毛澤東先後八次在北京接見了1100萬師生和紅衛兵。紅衛兵在全國各地鼓動「造反」，打砸搶行為失控，癱瘓了各級黨政機構，舊時的地主、資本家等「黑五類」人員及知名知識分子普遍受到迫害，「橫掃四舊」運動中損壞財產和毀壞文化資源的現象嚴重。

9月14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試圖對農村的動亂加以限制，規定「縣以下各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結合進行」，要求「北京和外地的學生、紅衛兵」，「均不到縣以下各級機關和社隊去串聯」。

10月1日 《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發表社論說：「有極少數人採取新的形式欺騙群眾，對抗十六條，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篇社論首次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問題，包括批判「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對聯。

10月9日-28日 毛澤東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陳伯達作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報告。林彪在會上講話，指名攻擊劉少奇、鄧小平執行的是「一條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

11月9日，以王洪文等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宣告成立。10日，工總司以赴京上告為由，聚集到上海郊區的安亭火車站，企圖強行登車北上，以臥軌攔車方式阻斷滬寧鐵路交通三十多個小時。張春橋代表中央文革前往處理「安亭事件」，簽字同意王洪文等提出的五項要求，要上海市長公開檢查錯誤。

12月9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其中規定：「八小時工作以外的時間，除了每週一次討論生產問題外，都由群眾自己商量安排，進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眾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組織的權利。」

12月15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把「文化大革命」推廣到農村。《指示》規定：「領導農村文化大革命的權力機構，是貧下中農文化革命委員會，由貧下中農大會民主選舉產生」。「農村文化大革命，也要採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實行大民主。在隊與隊之間，社與社之間，可以利用生產的空閒時間，進行串聯。還可以組織一批革命學生下鄉串聯」。

12月30日 在張春橋支持下，王洪文等在上海製造了有十多萬人參加的武鬥流血事件(即圍攻市委所在地康平路的事件)。這一「康平路事件」是全國大規模武鬥的開端。

1967年

1月1日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題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社論，宣佈「1967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號召「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

1月6日 上海以「工總司」為主的造反派召開大會，宣佈奪取上海市的黨政大權，被譽為「一月革命」的風暴。毛澤東於8日讚揚：「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11日，由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名義給上海市各「造反團體」發出賀電。《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相繼發表社論，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奪權。

1月13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頒佈《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簡稱《公安六條》)，規定凡是「攻擊誣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此後這一條又在實際上擴展到凡對江青、康生、陳伯達一伙稍有不滿的也被以現行反革命治罪。這是造成大量冤、假、錯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1月23日 按照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此後解放軍開始奉命「支左」，介入地方局勢，經常處於一派擁護而另一派反對的局面。在青海等地出現軍民之間的流血衝突。

2月3日 毛澤東在同外賓談話中指出：「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

2月11日和16日 在周恩來主持的懷仁堂碰頭會和稍前召開的軍委會會議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對「文化大革命」表示強烈不滿，與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等出現激烈衝突。16日晚，

張春橋、姚文元、王力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材料呈報毛澤東。毛澤東18日晚嚴厲批評了譚震林等。從2月25日起至3月18日，中央多次開會，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鬥了這些不滿者。

3月16日 中共中央印發所謂《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自首叛變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經組織決定先後出獄錯定為「自首叛變」。從此在全國刮起「抓叛徒」的浪潮，助推了「新疆叛徒集團」「東北叛徒集團」「南方叛徒集團」等冤案。

3月19日 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俗稱「三支兩軍」。解放軍先後派出280多萬人介入地方事務。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停止全國大串聯的通知》。

4月1日 《人民日報》發表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一文，在報刊上不點名地批判劉少奇。

6月6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包括七項內容的通令，要求「糾正最近出現的打、砸、搶、抄、抓的歪風」。

6月17日 新華社報道我國第一顆氫彈在西部地區上空爆炸成功。

7月20日 武漢的一派群眾組織衝擊中央要員住地，質問和圍逼中央文革成員王力，被指為「反革命事件」。25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舉行支持武漢造反派的群眾大會，在報刊上公開提出「打倒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7月22日 江青接見河南一派群眾組織時，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從此全國武鬥急劇升級。四川、廣西、湖南、廣東等地均出現大規模的流血慘案，8月間湖南道縣針對「黑五類」人員的濫殺尤令人震驚。

8月7日 王力發表煽動奪外交部的權的講話。在這一鼓舞下，造反派打砸外交部政治部，查封部黨委，奪外交大權。隨即發生8月22日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等涉外事件。8月底，毛澤東批准周恩來的報告，對王力、關鋒實行隔離審查。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離審查。中央文革的陣營遭受重大挫折。

9月8日 《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的《評陶鑄的兩本書》，對陶鑄進行批判。毛澤東在審閱這篇文章時加了一段話，認為「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是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應予徹底揭露。這個以「首都五一六兵團」為核心的影子派別，通常被指為造反派中最激進一批人，曾攻擊周恩來，主張「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

10月14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大、中、小學校復課鬧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大學、中學、小學一律立即開學」。

10月17日 中共中央轉發毛澤東於7月至9月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談話紀要。毛澤東說：「絕大多數的幹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極少數。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要整的，但是，他們是一小撮。」「要擴大教育面」。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按照系統實行革命大聯合的通知》，實際上取消了對全國許多跨行業的群眾組織的承認。在此前後，中央連續發佈有關不准搶奪解放軍的武器裝備、維護社會治安、確保國家資財和群眾生活秩序等一系列通知和文件，採取措施加強保護外國使館和外國僑民的安全。同

時，中央還決定對一些省、自治區和重要黨政部門實行軍事管制。

10月27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恢復黨的組織生活的批示》。

12月2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整頓、恢復、重建黨的組織的意見和問題》的文件，要求凡成立革命委員會和革委會籌備小組的單位可恢復黨組織生活。

1968年

3月22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命令，撤銷楊成武的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軍委常委等職務；撤銷余立金的空軍政治委員等職務，並以「叛徒」罪名逮捕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

3月18日 江青在接見浙江省赴京代表團的會議上提出：「去年冬天以來，全國有一股右傾翻案風。」此後，在全國範圍內反擊「右傾翻案風」，使各地群眾組織重新活躍，一些省、市的「大聯合」被瓦解，全國性派別內戰再起。

5月25日 中共中央轉發《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要求全國各地區、各單位「有步驟地有領導地把清理階級隊伍這項工作做好」。這一輪「清理階級隊伍」再一次形成迫害浪潮。

7月3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佈告，提出六條措施，嚴禁破壞交通、搶劫軍用列車、衝擊解放軍機關、殺傷解放軍指戰員等。

7月21日 毛澤東對《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作批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此後，全國各地紛紛辦起了以這一調查報告產生日期為名的「七二一」大學。

7月27日 北京六十多個工廠，組成三萬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開進當時派性鬥爭激烈的清華大學，整頓秩序，制止武鬥。8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合發出《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26日，《人民日報》發表《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文章，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佔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此後，派遣「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學校的辦法，擴大到除軍管以外的各級黨政機關。

9月5日 西藏、新疆兩個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同時成立。至此，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都已先後建立了革命委員會。

9月16日 江青主持的「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整理報送了三本「罪證材料」，指控劉少奇為「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特務、大反革命」，是「美國遠東情報代表」。29日，林彪批示「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導專案工作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0月5日 《人民日報》在編者按中發表毛澤東關於「廣

大幹部下放勞動」的號召。各地普遍開辦「五七幹校」，把原黨政機關、高等學校的絕大部分幹部和教師，送到幹校勞動、學習。

10月13日-31日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原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被定為「叛徒」、「特務」、「裏通外國」、「反黨分子」的，達總數的70%，故97中央委員中，除去世10人外，能參加會議的只有40人。而被擴大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和各大軍區主要負責人、中央直屬機關人員達74人，佔會議成員總數133人的57%。毛澤東主持會議，並就「文化大革命」問題講話。全會批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與會的陳少敏對這個決定拒不表示同意。林彪、江青等提議開除鄧小平的黨籍，被毛澤東否決。

12月22日 《人民日報》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立即掀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中學紅衛兵全部退出城市的運動，奔赴農村和邊疆地區。

12月29日 南京長江大橋提前全面建成通車。大橋鐵路橋全長6700多米，公路橋全長4500多米，是當時我國自行設計和施工建造的最大一座橋樑。

1969年

3月 黑龍江省的珍寶島地區發生中、蘇兩國軍隊的小規模武裝衝突。15日，毛澤東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着重談了準備打仗的問題。

3月初至10月中旬 根據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佈置，軍委副主席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舉行二十多次討論會，向中央呈遞了四份報告，對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鬥爭態勢作了分析，就外交方針問題向中央提出重要建議。

4月1日-24日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林彪作政治報告，第一次提出在社會主義階段的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以階級鬥爭為中心的指導思想，並將其規定為「我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大會通過的黨章，把林彪作為「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總綱。4月28日，中國共產黨九屆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選舉了中央機構。選舉的結果是：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毛澤東、林彪(以下按姓氏筆劃為序)、陳伯達、周恩來、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林彪(以下按姓氏筆劃為序)、葉群、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陳伯達、陳錫聯、李先念、李作鵬、吳法憲、張春橋、邱會作、周恩來、姚文元、康生、黃永勝、董必武、謝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紀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東興。

8月27日 中央決定成立全國性的人民防空領導小組和各省、市、自治區人民防空領導小組，以加強人民防空工作。隨後全國各地開挖防空洞和防空壕。

9月11日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首都機場會見了參加越南勞動黨主席胡志明葬禮「途經」北京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雙方同意邊界問題應通過和平談判解決，避免武裝衝突。10月20日，中蘇副外長在北京重開談判。

10月14日 中共中央通知緊急疏散在京黨和國家領導人，以防蘇聯利用談判之機進行軍事襲擊。

11月12日 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在河南開封去世。

1970年

1月31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2月5日，又發出《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和《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此後，全國開展「一打三反」運動，再次釀成大量的冤假錯案。

3月5日 國務院擬定《關於國務院工業交通各部直屬企業下放地方管理的通知(草案)》。將國務院工業交通各部的直屬企業、事業單位絕大部分下放地方管理；少數由中央和地方雙重領導，以地方為主；極少數大型骨幹企業，由中央和地方雙重領導，以中央為主。下放工作要求於1970年內進行完畢。

3月17日-20日 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問題。到會大多數人贊同毛澤東提出的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4月11日，林彪提出設國家主席的意見，建議毛澤東當國家主席。次日，毛澤東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議不妥。」在此前後的半年內，毛澤東六次講過不設國家主席和他不擔任國家主席的話。

3月27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此後這一清查工作嚴重擴大化，再次演變成為全國性的清查和迫害浪潮，大多數造反派組織頭目受到打擊。

4月24日 新華社報道我國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

6月27日 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高等院校開始招生復課。文件規定高等學校招生廢除考試制度，「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和學校復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

8月23日-9月6日 中國共產黨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舉行。陳伯達發言盛讚林彪，堅持設國家主席，矛頭指向張春橋等。這個發言記入華北組會議第二號簡報，引起一場混亂。25日，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收回第二號簡報，責令陳伯達檢討。31日，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一文，嚴厲批評了陳伯達，給林彪以巨大壓力。

8月25日-10月5日 國務院召開北方地區農業會議，重申「農業六十條」等一系列曾被批判和廢棄的農村政策，提出加快農業生產的任務和具體要求，初步扭轉了當時農村工作中的混亂狀態。

11月16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部署黨的領導機關開展「批陳整風」運動。

12月18日 毛澤東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毛澤東稱「總要有點個人崇拜」；另一方面又說：「現在就不同了，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麼『四個偉大』，討厭！」關於中美關係，毛澤東表示歡迎美國左、中、右派人士來華，包括尼克松總統。

1971年

3月22日 林彪之子林立果、周宇馳等在上海制定了武裝政變計劃《「571工程」紀要》，策劃「奪取全國政權」。

4月14日 周恩來總理會見應邀來訪的加拿大、哥倫比亞、英格蘭、尼日利亞和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全體成員。邀請美國乒乓球代表團來訪是毛澤東親自決定的，推動了中美關係改善的進程。

5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中美預備性秘密會談的問題，就處理中美關係特別是關鍵的台灣問題以及印度支那等問題提出了八條原則。會後，政治局把討論情況寫成報告，毛澤東審批了這個報告。

7月9日-11日 美國總統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來京，與周恩來舉行會談。16日發表公告稱，尼克松總統應邀將於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

7月8日 國務院轉發衛生部、商業部、燃化部《關於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要求除人口稀少的地區外，各級都要加強計劃生育工作，爭取把人口自然增長率逐年降低，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0‰，農村降到15‰以下。

8月中旬-9月12日 毛澤東去南方巡視，同沿途各地黨政軍負責人多次談話，指出「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並指出：林彪對這事「當然要負一些責任」。

9月5日 林彪、葉群等從有關方面的密報中獲悉毛澤東上述談話內容。8日，林彪下達了發動政變手令。由於事先對反常情況有所覺察，毛澤東於11日乘列車提前離開上海。12日，林彪擬帶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南逃廣州，並將一架專機秘密調往山海關供林彪等使用。當天下午，毛澤東抵達北京。當晚，周恩來根據有關方面的報告，追查專機突然去山海關的行動。13日凌晨，林彪等倉皇乘飛機出境，途經蒙古溫都爾汗時墜落，機毀人亡。林彪的一些追隨者或自殺斃命，或束手就擒。

10月3日 中共中央決定撤銷軍委辦事組，成立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的軍委辦公會議，負責軍委日常工作。同日，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專案組，審查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的問題。

10月25日 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權利。

11月14日 毛澤東在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同志時，為「二月逆流」平反，說你們再不要講他們(指葉劍英等)「二月逆流」了。

12月11日 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中央專案組整理的《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下發全國，供黨內外討論。以後，又陸續下發《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二和材料之三，在全國開展批林整風。

12月16日-翌年2月12日 全國計劃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次計劃會議提出批判「空頭政治」，提出了若干整頓的措施，其中包括加強統一計劃，整頓企業管理，落實黨對幹部、工人和技術人員的政策，堅持又紅又專，反對無政府主義。在企業的管理上，明確規定企業要恢復和健全崗位責任制、考勤制度、技術操作規程、質量檢驗制度等七項制度；企業要抓產量、品種、質量、原材料、燃料、動力消耗、勞動生產率等七項指標。

12月16日 中共中央就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下達指示，強調糾正分配不兌現、勞動計酬上的平均主義；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辦法；不要把多種經營當作資本主義去批判；規定了有利於集體增產、個人增收、減輕農民負擔的具體政策。

1972年

1月6日 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在北京逝世，毛澤東參加追悼會，還提出：鄧小平的問題，屬於人民內部矛盾。

2月5日 周恩來批示同意國家計委《關於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並報毛澤東批准。以後，國家計委進一步提出從國外進口成套設備和單機的「四三」引進方案(即43億美元引進方案)，擴大對外經濟交流。

2月21日-28日 美國總統尼克松來華訪問。毛澤東會見了尼克松。周恩來同尼克松就兩國關係正常化及雙方關心的其他問題進行了討論。28日，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了聯合公報，標誌着中美兩國走向關係正常化。

3月13日 中國和英國在北京簽署聯合公報，決定從即日起將雙方派駐對方的外交代表由代辦升格為大使。

4月24日 《人民日報》發表經周恩來審查同意的社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社論重申對一切犯錯誤的同志，要堅持「團結一批評一團結」和以教育為主的方針。並指出：「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煉的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

8月1日 國防部為慶祝建軍四十五周年舉行盛大招待會。葉劍英發表講話。陳雲、王震、滕代遠等一批被迫害的老幹部出席了招待會，重新進入公眾視野。

8月3日 在江西下放勞動的鄧小平致信毛澤東，批判林彪集團叛黨叛國。14日，毛澤東在鄧小平的信上批示：「他(指鄧小平)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

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作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15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了毛澤東的批示，並以中共中央名義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佈鄧小平立即解除監督勞動，恢復黨組織生活。

8月21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徵詢對三支兩軍問題的意見的通知》附《關於三支兩軍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草案中規定，在已建立黨委的地方和單位，撤銷三支兩軍的機構和人員，少數軍隊轉業幹部留在地方工作。

9月25日-29日 日本國總理大臣田中角榮應邀訪問中國。周恩來和田中角榮就中日邦交正常化問題舉行會談。29日，中日兩國政府聯合聲明在北京簽字，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0月14日 《人民日報》根據周恩來於8、9月間兩次批判極左思潮的講話精神，發表了《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批判極左思潮的文章。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後來指責這三篇文章是毒草，在《人民日報》社內大批「修正主義」和「右傾回潮」。

12月10日 中共中央在轉發國務院11月24日《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時，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指示。

12月 毛澤東得知被拘押幹部的情況，批評監獄實行「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18日，周恩來指示公安部會同北京衛戍區徹底清查北京監獄待遇問題，要他們當着

在押「犯人」的面，公開宣佈廢除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和虐待、毆打行為，「如有犯者，當依法懲治」，並容許「犯人」控訴。

1973年

3月8日 周恩來邀請外國專家及其家屬參加國際勞動婦女節紀念會，嚴厲批判林彪、陳伯達、王力等對外事工作的破壞，對曾遭受錯誤批鬥或被迫離國的外國專家表示歉意，歡迎他們重返中國。

3月10日 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批示，決定恢復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

5月20日-31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主要議程是為召開黨的十大做準備。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會議宣佈解放譚震林、李井泉、烏蘭夫等13名老幹部；又決定王洪文、華國鋒、吳德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並參加政治局的工作。會議還決定由張春橋等負責中央黨章修改小組，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起草《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同年7月，由張春橋等起草的十大政治報告(草稿)、修改黨章報告(草稿)、黨章(草稿)，經中央政治局討論，毛澤東批示「原則同意」。

6月10日 毛澤東給李慶霖的覆信印發全黨。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教師李慶霖在寫給毛澤東的信中反映了其子上山下鄉後生活上遇到困難。毛澤東於4月25日給李慶霖覆信，寄去300元，並指出「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此後，中央政治局幾次研究統籌解決知識青年中的問題。

8月5日-20日 在周恩來指導下，國務院召開首次全國環

境保護會議。會議研究了有關環境保護的方針和政策、制定《關於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

8月10日 《人民日報》轉載《遼寧日報》7月19日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發表的張鐵生的一封信，並加編者按語，提出「這封信提出了教育戰線上的兩條路線、兩種思想鬥爭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江青等人稱張是一個「白卷英雄」，指責高校招生中進行文化考試是「復辟」，是「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反撲」。

8月20日 中共中央批准《關於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決定永遠開除林彪及其反革命集團主要成員陳伯達、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的黨籍。

8月24日-28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周恩來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王洪文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大會選舉出195名中央委員和124名候補中央委員。鄧小平、王稼祥、烏蘭夫、李井泉、譚震林、廖承志等被重新選為中央委員。但追隨江青集團的很多人也被選進了中央委員會。8月30日，中國共產黨十屆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毛澤東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當選為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員是：毛澤東、王洪文、韋國清、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陳錫聯、李先念、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姚文元、康生、董必武。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是：吳桂賢、蘇振華、倪志福、賽福鼎。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是：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朱德、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康生、董必武。

8月26日 新華社報道我國第一台每秒鐘運算一百萬次的

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在北京試製成功。

10月 江青等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發動「反擊右傾回潮」運動，指令這兩個大學成立「大批判組」，編輯林彪與孔孟之道的材料，撰寫有關文章。

11月25日 毛澤東在一封批評江青的來信上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見是好的，要容許批評。」來信署名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信的內容是批評江青「民主作風較差」，在文藝工作中不執行「雙百」方針等。

12月12日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大軍區司令員互相對調的建議，提議鄧小平任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和總參謀長。21日，在接見參加中央軍委會會議的同志時，毛澤東批評自己相信一面之詞，錯整了賀龍、羅瑞卿和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並再次說朱德是「紅司令」。

1974年

1月18日 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轉發由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批林批孔」運動在全國展開。

1月31日 中共中央轉發《河南省唐河縣馬振扶公社中學情況通報》，把一個女學生因未答完考卷而自殺，作為所謂「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進行復辟的嚴重惡果」。全國各地區奉命組織廣大教師檢查、揭露「修正主義路線回潮」的表現。

2月22日 毛澤東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提出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號召聯合起來反對霸權主義。4月6日，鄧小平率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在

大會發言中闡述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

2月28日 《人民日報》刊登《評晉劇〈三上桃峰〉》的文章，把《三上桃峰》說成是「為劉少奇招魂」，「文藝黑線回潮」。

4月10日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規定批林批孔運動在黨委統一領導下進行，不要成立戰鬥隊一類群眾組織，也不要搞跨行業、跨地區一類的串聯；原「三支兩軍」人員，不再回支左單位參加運動；各級黨委應認真加強領導，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和幹部。

7月1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要求各地不准揪幹部，不准打人抓人，擅離職守的領導和其他人員必須返回工作崗位。

7月17日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江青，稱「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並宣佈：「她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澤東還批評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你們「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9月29日 中共中央為原已故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賀龍平反。

10月4日 毛澤東提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四人幫」對此不滿，在17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們藉口我國自行設計製造的遠洋貨輪「風慶」號試航成功一事(風慶輪事件)，攻擊國務院、交通部購買一批外輪增強運輸力量的決定為「崇洋媚外」，是「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矛頭指向周恩來、鄧小平。當晚，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密謀。次日，王洪文到長

沙，向毛澤東告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的狀，但受到毛澤東批評。

10月11日 中共中央為在最近期間召開四屆人大發出通知，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

10月20日 毛澤東派人轉告周恩來和王洪文：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由總理和王洪文一起管。11月12日，毛澤東對江青的一封來信批示：「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闆)」。

同日，毛澤東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談到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他說：「總而言之，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

12月26日，他又對周恩來說：「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

1975年

1月5日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任命張春橋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1月8日-10日 中國共產黨十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討論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會議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月13日-17日 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

北京舉行。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了三屆人大提出的發展我國國民經濟的兩步設想，即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前列。大會通過了憲法，批准了政府工作報告，選出了以朱德為委員長的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任命了周恩來為總理、鄧小平等為副總理的國務院組成人員。此後，在周恩來治病期間，鄧小平實際上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

1月25日 鄧小平在解放軍總參謀部機關團以上幹部會上講話，強調要消除派性，加強紀律性，落實政策，實現安定團結。

2月18日 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發到全國。22日，《人民日報》發表由張春橋、姚文元主持選編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要求在全國開展所謂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運動。

2月25日-3月8日 中共中央召開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主管工業的書記會議，着重解決鐵路運輸問題。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要求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健全必要的規章制度，整頓鐵路秩序，同各種破壞行為作鬥爭，確保運輸安全正點。

3月1日 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就學習理論的問題講話，要求把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當作各項工作的「綱」。同日，姚文元發表《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認為「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矛頭暗指一批老幹部。

3月17日 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舉行第二次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決定對全部在押戰爭罪犯實行特赦釋放，給予公民權。這次特赦釋放的戰犯共293名。至此，在押的戰爭罪犯全部處理完畢。

4月4日 以「現行反革命」等罪名被長期關押的張志新慘遭殺害。她是遼寧省委宣傳部的一個普通幹部，從1968年起多次公開闡明自己的觀點，為劉少奇受迫害鳴不平，指控黨的領導者犯了「左」傾錯誤。

4月23日 毛澤東批評了江青等人，指出：「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

4月底 根據毛澤東關於盡快結束專案審查、把人放出來的意見，中央決定：除與林彪集團有關的審查對象和其他極少數人之外，對絕大多數被關押受審查者予以釋放。對這些人，凡是專案組能夠作結論的，應作結論；一時還不能作結論的，應先放出來，以後由中組部會同有關機關再作結論。

5月3日 毛澤東召集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談話，反復強調要安定團結，要搞馬克思主義、要團結、要光明正大，批評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叫他們「不要搞四人幫」。27日和6月3日，鄧小平兩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對江青等人進行了批評。

7月中旬 毛澤東談到文藝問題，說：「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一下，一年、兩年、三年，逐步擴大文藝節目。缺少詩歌，缺少小說，缺少散文，缺少文藝評論」。25日，毛澤東對電影《創業》作者反映「四人幫」給電影《創業》安了十大罪名的來信寫了批語：「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份

了，不利調整黨的文藝政策。」經中央政治局批准，反映紅軍長征的話劇《萬水千山》和組歌《紅軍不怕遠征難》重新上演，很多文藝期刊、出版社開始恢復出版業務。

7月17日 中共中央轉發國務院《關於今年上半年工業生產情況的報告》，指出：「三月以來，工業生產和交通運輸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發電量、化肥、水泥、內燃機、紙及紙製品、鐵路貨運量等，五六月份創造了歷史上月產的最高水平，軍工生產的情況也比較好。」

8月14日 毛澤東在同一位教師談話中講到：「《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江青、姚文元等利用這一評論，在報刊上發動一場「評《水滸》運動」，影射黨內有「投降派」。

8月18日 鄧小平等參加國務院關於整頓工業問題的討論，提出一系列意見。隨後形成了《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草稿(簡稱《工業二十條》)。

9月15日-10月19日 國務院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鄧小平在開幕式上講話，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關鍵是農業現代化的看法。他還提出了各方面的整頓問題。他說：「毛主席講過，軍隊要整頓，地方要整頓。工業要整頓，農業要整頓，商業也要整頓，我們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頓，科學技術隊伍也要整頓。文藝，毛主席叫調整，實際上調整也就是整頓。」

9月23日-10月21日 按照毛澤東批示精神，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農村工作座談會，討論陳永貴於8月14日提出的關於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迅速由生產隊向大隊核算過渡的建議。由於趙紫陽、譚啟龍等人反對，會議未能形成一致意見。

9月26日 鄧小平等聽取胡耀邦關於科學院工作的《匯報提綱》的說明。鄧小平肯定了《匯報提綱》所提的觀點和措施，說：科學研究是一件大事。「科學技術叫生產力，科技人員就是勞動者！」

10月中旬 為了從思想上、理論上破除阻礙整頓的一些「左」傾錯誤，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根據鄧小平多次講話精神起草了《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簡稱《論總綱》)。文章指出，毛澤東提出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促進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三項指示，「不僅是當前全黨、全軍和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而且也是實現今後二十五年宏偉目標的整個奮鬥過程中的工作總綱」。這篇文章沒有定稿，未公開發表。

10月20日-31日 中國農林科學院在長沙召開有21個省、市、自治區農業科學工作人員參加的雜交水稻鑑定會，對籼型雜交水稻進行鑑定。籼型雜交水稻隨後在國內逐步大面積推廣種植。

11月2日 毛澤東在聽取毛遠新幾次匯報後說：「有兩種態度：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9月底到11月初，作為毛澤東的聯絡員的毛遠新幾次向毛澤東匯報說：「對文化大革命，有股風，似乎比七二年批極左還兇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毛遠新的上述看法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此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政治局部分委員幾次開會，對鄧小平展開批評，停止了他的大部分工作。

11月3日 清華大學黨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傳達毛澤東對該校黨委副書記劉冰等人所寫一信的批示：「我看信的動機不純」，「矛頭是對着我的」。他還針對鄧小平轉信

這件事說：「小平偏袒劉冰。」從此，「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形成聲勢。

1976年

1月8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逝世。15日，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鄧小平致悼詞。當周恩來遺體送入八寶山火化時，近百萬人在十里長街默哀送靈。

2月13日 《光明日報》在頭版刊登《孔丘之憂》一文，被很多人認為是影射悼念周恩來的人民群眾為「哭喪婦」，對「四人幫」的不滿在一些地方開始表面化。

1月21日和28日 毛澤東先後提議，並經中央政治局通過，確定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2月25日 黨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傳達《毛主席重要指示》，即由毛遠新整理的毛澤東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關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講話。這份《毛主席重要指示》稱：「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走資派還在走。」會上，華國鋒代表中央講話，指出「批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錯誤路線，在這個總目標下把廣大幹部、群眾團結起來」，「對鄧小平同志的問題，可以點名批判」。

3月2日 江青召集12個省、自治區的負責人開會，發表長篇講話，指我國向資本主義國家出售原油、煤炭、棉布是「漢奸行為」，指四個現代化是「為資本主義準備物質基

礎」，指點建立規章制度是「搞管、卡、壓」，指體現按勞分配原則的政策是「強化資產階級法權」等，並稱鄧小平是「大漢奸」，「國際資本家的代理人」。毛澤東發現後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

3月下旬-4月5日 全國各大城市的群眾，紛紛自發進行悼念周恩來的活動。南京市的學生、工人首先聲討上海《文匯報》於3月5日和25日先後在報紙上刪去周恩來題詞和出現影射攻擊周恩來的語句的事件，貼出「打倒張春橋」的大標語。北京市數萬群眾連續幾天到天安門廣場，獻花圈、詩詞，悼念周恩來，表達對「文革」的抗議。

4月4日 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天安門前群眾活動的情況，認為這「是反革命煽動群眾藉此反對主席，反對中央，干擾、破壞鬥爭的大方向」。華國鋒說：「一批壞人跳出來了，寫的東西有的直接攻擊主席，很多攻擊中央」。毛遠新就這次會議向毛澤東報告。

4月5日 經毛澤東批准，有關部門對天安門廣場實行清場措施。廣大群眾在「還我花園，還我戰友」的口號下，採取抗議行動，遭到警察、民兵的殘酷鎮壓。這一事件隨後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宣佈為「反革命事件」。

4月7日 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提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和《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

6月14日 國家計委向中共中央報送《關於上半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情況和下半年安排意見的報告》說，經濟戰線上問題比較突出的是鐵路運輸，許多地區產品運不出來，燃料、原材料運不進去。1月至5月，鋼欠產123萬噸，鋼材欠產86萬噸，化肥欠產58萬噸，棉紗欠產57萬件。同

期，輕工業生產減少供應商品14億元，財政減收20億元。

7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逝世。11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追悼會。

7月28日 河北省唐山、豐南地區發生強烈地震，並波及天津、北京。8月4日，中共中央派出以華國鋒為總團長的中央慰問團慰問受災群眾。這次地震累計死亡242,000多人，重傷164,000多人，損失重大。

9月9日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在北京逝世。18日，追悼大會在天安門廣場舉行，華國鋒致悼詞。

9月11日 王洪文在中南海另設「值班室」，通知各省、市、自治區及時請示報告。

10月4日 《光明日報》登載「四人幫」寫作班子「梁效」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文章稱「按既定方針辦」是毛主席臨終囑咐。

10月6日 在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人謀劃和組織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採取非常措施，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實行隔離審查。

10月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由華國鋒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將來提請中央全會追認。

10月7日-1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分批召開了中央黨、政、軍機關，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負責人參加的打招呼會議，通報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提出了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定局

勢的方針。會議期間，華國鋒提出要「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10月8日 中共中央決定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和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同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決定建立毛主席紀念堂，違背了毛澤東等領導人1956年所簽遺體火化、不建墳墓的建議。

韓少功生於湖南長沙，初中畢業後到汨羅縣下鄉插隊，八五年大學畢業，曾任湖南省作家協會專業作家、《海南紀實》主編、《天涯》社長，海南省作家協會主席、海南省文聯主席。現在一半時間生活在汨羅農村，一半時間生活在城市。八十年代首倡尋根文學。作品被翻譯為各種外國文字並曾多次獲得國內外文學獎項。主要作品包括：小說《誘惑》《空城》《謀殺》《爸爸》《馬橋詞典》《暗示》《日夜書》等，散文《聖戰與遊戲》《山南水北》等，譯著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惶然錄》等。

ISBN 978-0-19-943362-9



革命後記